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秦漢魏晉南北朝室

卜憲群 楊振紅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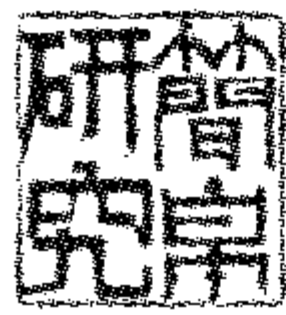
簡帛研究

二〇〇五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簡帛研究

二〇〇五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秦漢魏晉南北朝室

卜憲群 楊振紅 主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簡帛研究. 2005 / 卜憲群, 楊振紅主編.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5633-7726-8

I. 簡... II. ①卜... ②楊... III. ①簡（考古）—中國—文集②帛書—中國—文集 IV. K877.0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34363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

出版人：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廣西師範大學印刷廠印刷

（廣西桂林市臨桂縣金山路 168 號 郵政編碼：541100）

開本：880 mm × 1 240 mm 1/16

印張：19.75 插頁：2 字數：400 千字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0 001～2 000 冊 定價：88.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顧 問

田余慶 [日]永田英正 何茲全 林甘泉 徐蘋芳
裘錫圭 [英]邁克爾·魯惟一 饒宗頤

編輯委員會主任

李學勤

主 編

卜憲群* 楊振紅*

編輯委員

卜憲群* 邢 文 李學勤 宋艷萍* 汪桂海
馬 怡* [日]靱山明 侯旭東 孫 曉 [日]富谷至
陳松長 梁滿倉 鄔文玲* 楊 英* 楊振紅* 蔡萬進
趙 凱 劉 馳 戴衛紅*

(顧問、編委以姓氏筆畫為序排列，加“*”者為本輯執行編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簡帛研究系列圖書

尊敬的讀者：

您好！我社簡帛研究系列圖書已出版以下品種，如在當地書店無法購買，請致電我社郵購部（0773—5806962）或在當當網、卓越網上購買。謝謝您的關注！

書 名	定 價	作 者
長沙走馬樓簡牘研究	20.00	高敏 著
額濟納漢簡	880.00	魏堅 主編
漢簡研究	39.80	[日]大庭脩 著 徐世虹 譯
簡帛研究2001（上下冊）	248.00	李學勤 謝桂華 主編
簡帛研究2002—2003	88.00	李學勤 謝桂華 主編
簡帛研究2004	98.00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主編
簡帛研究2005	88.00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主編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究文集	68.00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主編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	36.00	蔡萬進 著
漢代行政記錄（上下冊）	80.00	[英]魯惟一 著 于振波等譯
簡牘與制度——尹灣漢墓簡牘官文書考證 （增訂版）	39.80	廖伯源 著
居延漢簡研究（上下冊）	80.00	[日]永田英正 著 張學鋒 譯
秦漢刑罰制度研究	36.00	[日]富谷至 著 柴生芳等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發營銷中心

電話：0773—2802508 傳真：0773—2802139

簡帛研究

選題



辨析字形
理解文義
環珠重聯
審系篇題
終成圖籍
補史之逸

政煥學書



目 錄

郭店楚簡的大同思想·····	[美]郝樂爲/1
引據與中國古代寫本文獻中的儒家經典《緇衣》研究·····	[美]柯馬丁/7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從政》篇研究（三題）·····	陳 劍/30
上博竹書研究三題·····	單育辰/44
上博簡《昭王毀室》篇字詞補釋·····	禰健聰/49
《三德》研究四題·····	曹 峰/54
從睡虎地秦簡《游士律》說到漢初的游士·····	陳 君/60
里耶秦簡所見戍卒索隱·····	王煥林/67
讀簡帛《周易》札記五則·····	蕭從禮/76
張家山漢簡“去（盍）”字補釋·····	孟蓬生/84
漢簡長安至河西的驛道·····	初世賓/88
敦煌懸泉漢簡所見人名綜述（三）	
——以敦煌郡太守人名爲中心的考察 ·····	張俊民/116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釋文校訂稿 ·····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研讀班/145
蔣席·皮席·蒺席	
——長沙東牌樓簡牘研讀札記 ·····	王子今/166

讀東牌樓漢簡《侈與督郵書》

——漢代書信格式與形制的研究	馬 怡/173
東牌樓東漢簡牘斷簡綴合與研究	鄔文玲/187
東牌樓人形木牘研究札記	莊小霞/205
簡牘所見“棄妻”“去夫亡”“妻棄”考	賈麗英/212
小議簡牘文書中的“告”“謂”句式	
——秦漢官文書用語研究之一	蘇衛國/222
談漢代碑刻、簡牘中的賻贈名籍	汪桂海/235
說“步兵還民”	胡平生/244
平夜君成楚簡“卜筮祭禱簡”初探	
——戰國楚的祭祀儀禮	[日]工藤元男/253
《曹沫之陳》中竹簡的綴合與契口	[日]竹田健二/269
秦律、漢律關於未遂、預備、陰謀罪的處罰	
——以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為中心	[日]水間大輔/277
2004、2005 年張家山漢簡研究綜述	王 寧/301

郭店楚簡的大同思想^①

[美]大西洋大學 郝樂為

內容摘要 這篇文章討論了郭店出土諸文獻之間的思想共通之處，從而探討《五行篇》《老子》《唐虞之道》以及其它郭店文獻之間的內在關聯。郭店墓中的文獻，探索大同的表現範圍很廣泛，但有重要的相同點。修行的方法是在達到二項相對論的融合和協調，而這些相對的兩者，在一般的邏輯上是無法結合為一的，不管是仁和義、禪讓和世襲、赦免和大誅、美和惡、有和無等等，皆是如此。

關鍵詞 五行篇 老子 唐虞之道 大同 儒家

《五行篇》和《老子》是郭店出土文獻中的雙璧。除了郭店以外，馬王堆漢墓也埋藏著這兩部著作，這似乎說明它們乃是當時宇宙觀的代表作品。祇不過，由於現今流傳的《五行篇》乃是漢代以下的儒家傳本，因此一般將其歸類為儒家典籍，而非《老子》系統的文獻。^② 這篇文章是要從另外一個角度，討論郭店出土諸文獻之間的思想共通之處，從而探討《五行篇》、《老子》以及其它郭店文獻之間的內在關聯。這裏所謂的相同，當然不是絕對的，而是以《五行篇》為中心，來探討郭店楚簡之間的思想相近之處，因此與一般以諸

① 本文係第三屆國際簡帛研討會（Mount Holyoke College, U. S. A., 2004 年 4 月 23—25 日）論文暨在臺灣大學的演講稿（2005 年 5 月 20 日）。筆者是佛州大西洋大學（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歷史系助理教授。特別感謝中研院近史所助理研究員張哲嘉博士協助潤飾本文。

②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子百家的後世傳本來探討出土文獻的方法，有著不同的切入點。^① 另外一個值得重視的觀點是，墳墓是神聖的空間，因此祇有特別相關的文獻纔有資格獲選陪葬。也就是說，這些出土文獻一定能夠代表墓主或其傳人的思想、政治觀或宇宙論。

絕大多數的學者認為，《唐虞之道》主張禪讓政治，反對世襲立儲。^② 筆者認為這個解釋有待商榷，因為文章中還存在兩個政治方法。不管是立論方式抑或是文字，《唐虞之道》都與《五行篇》相近。兩者皆提出了彼此相對而無法折中的兩種選擇，《唐虞之道》的主題是君主產生的方式；而《五行篇》則是法庭裁判的準則。《五行篇》從一開始崇尚把五種道德同時形成於內而時行之，這就是所謂的“大同”（unity）。同樣，讀過《五行篇》之後，反觀《唐虞之道》就會發現，在立儲之道上也有類似的“大同”。

如《唐虞之道》中說：“唐虞之道，禪而不傳。^③ 堯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己也。禪而不傳，聖之●^④盛也。利天下而弗利己也，仁之至也。故昔賢仁聖者如此。身窮不貪^⑤，沒●而弗利，窮^⑥仁矣。必^⑦正其身，然後正世，聖道備矣。故唐虞之（道，禪）也。●”^⑧ 在此，唐虞之道包括禪讓（聖）和“利天下而弗利己也”（仁）。仁聖，這兩者有不同的含義而引文上也有區別。這兩個方法也明顯地存在以下的例子：“堯舜之行，愛親尊賢。愛●親故孝，尊賢故禪。孝之施^⑨，愛天下之民。禪之傳，世亡隱德。孝，仁之冕也。●禪，義之至也。”^⑩ 它的政治旨趣是要推崇兩個彼此相對的道德行為：愛親和尊賢。愛親是由家族關係所產生的德目，尊賢則是從國的角度來作道德評價。雖然彼此相對，但皆是道德卻毫無疑義，所以該文的主旨應該是希望促成國與家之間的和諧，這就能表達大同的概念。一般來說，對執政者而言，國與家的優先權是彼此衝突的，好比說禪讓能為政府找到更有才能的人物，但卻會減低傳承的重要性。

第二個例子表面上有兩組並列的概念：尊賢則禪讓，或者是愛親則世襲。尊賢是跟禪

① 參看郝樂為（Kenneth W. Holloway）“‘The Five Aspects of Conduct:’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5.2, July 2005.

② 在2004年的亞洲學術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Meeting）上我提出了一個論點，主張《唐虞之道》是鼓吹大同政治哲學而非提倡禪讓。不同意這一觀點的論文有：劉寶才《〈唐虞之道〉的歷史與理念——兼論戰國中期的禪讓思潮》，《人文雜誌》2000年第3期，106—110頁。禪讓本來被歸類成墨家的學說。參看顧頡剛《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古史辨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0—33頁。

③ 更詳細的討論參看李承律《郭店楚簡〈唐虞之道〉譯注》，《郭店楚簡の思想史研究》，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思想文化學研究室，1999—2004，52—104頁。

④ 黑圈代表竹簡的盡頭。

⑤ 文物本為“均”，但不太配合文獻的平行內容。參看《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157頁。

⑥ 文物本為“躬”，《郭店楚墓竹簡》，157頁。

⑦ 文物本為“北”，讀為“始”，《郭店楚墓竹簡》，159 n. 6。

⑧ 《郭店楚簡校讀記》，95—99頁。

⑨ 文物本為“方”，圖片有“方”在上，李零的“施”應該是來自下面的兩個符號。《郭店楚墓竹簡》，39, 157。《郭店楚簡校讀記》，95—99頁。

⑩ 《郭店楚簡校讀記》，95—99頁。

讓和義有關，愛親則與孝和仁有關。仁乃是家的道德行為的闡揚，義則是國的理想典範的顯現。因為仁或義都是好的道德行為，事實上很難在兩者之間擇一。所以《唐虞之道》就指出“愛親忘賢，仁而未義也。尊賢遺親，義而未仁也。”仁義合一是修行及政治的極致，而且是郭店楚簡思想的主要特色。國與家的目標難以大同，祇有如堯舜般的聖人纔能達到。因為大同是郭店楚簡中表露的目標，《唐虞之道》不能宣稱僅偏於家或國，也不能主張專重仁或義。這種理論很理想，不過治理方式能達到大同，是因為家與國都得以兼顧。

郭店文獻中有許多兩兩相對的論點，從此就能看出《唐虞之道》和《五行篇》之間的雷同之處。如《語叢一》中提到：“(厚於仁，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薄於仁，尊而不親。”^①《尊德義》中提到：“仁為可親也，義為可尊也。”《六德》中提到：“仁，內也。義，外也。禮樂，共也。內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婦也。”^②“義者，君德也。非我血氣之親，畜我如其●子弟……”^③這些例子雖然短，卻都與《唐虞之道》和《五行篇》類似，存在著彼此相對的論點，也說明了這些文章注重仁與義能影響家與國之間的和平大同。

《五行篇》中有關修行過程的部分，主要是用連鎖論(sorites)來表達大同的重要性。文章的連鎖論可以分成兩組：其一是仁、智、聖^④；其二是仁、義、禮^⑤。第一組的例子：“仁之思也精。精●則察，察則安，安則溫，溫則悅，悅則戚，戚則親，親則愛，愛則玉色，玉色則形。形則仁。”^⑥這裏的修行過程開始於內，顯現於外。所謂的開始於內，指的是人的思想改變，譬如“思也精”，第一組的連鎖論是從思想的改變開始。^⑦在仁的修行過程中，思想改變之後就產生“安”、“溫”、“戚”等三種對外的感情，這是思想變化的結果。第一組仁智聖的連鎖論和本體之外有關的改變，祇出現在引文的後段部分。仁的連鎖論中也提到了親和愛，這兩者也是思想改變的結果，但是需要有三者才能顯現。在文章中，“愛”出現以後就有“玉色”，一個修行的外在顯現。玉色的改變是屬於本體之內的。在智和聖的連鎖論中修行的過程也是開始於內，顯現於外。仁和智有“玉色”，聖有“玉音”，這三個都是明顯的外在表現，是第三者(他人)能看到或聽到的現象。第一組仁智聖的連鎖論，總結於“形”。“形”在《五行篇》開頭曾被討論如下：“五行皆形

① 《郭店楚簡校讀記》，160 頁。

② 《郭店楚簡校讀記》，131 頁。

③ 《郭店楚簡校讀記》，131 頁。

④ 簡 12 到 16。

⑤ 簡 20 的後段到簡 21 的前段與簡 32 到簡 37 的開頭：這兩部分在郭店和馬王堆次序不同。龐樸認為馬王堆是正確的，廖名春主張郭店邏輯上比較合理。龐樸：《竹帛〈五行〉篇比較》，《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20，1999.1。廖名春：《荊門郭店楚簡與先秦儒學》，《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20，1999，46 頁。

⑥ 《郭店楚簡校讀記》，78—80 頁。

⑦ 第一部分連鎖論是“思”這個字最後一次出現在《五行篇》。

於內，時行●之，謂之君（子）。 ”^① 如果道德行為形於內而顯現於外，第三者會稱呼這個人是君子。這就證明修行是開始於內，顯現於外。這三種道德的內外現象都不同，但君子要養成和實行它們，所以也是一種大同。

爲了瞭解仁義如何同時進行，我們需要注意《五行篇》的修行過程是着重本體與外在的結合。譬如，“善，人●●道也。德，天（道也） ”^②，“聖人知天●●道也”^③。天是道德最重要的根源，所以人在修行時也要瞭解天道，將天道引用於本體之內而結合爲一。在《五行篇》，修行是從本體之內開始，逐漸擴展，與外在結合爲大同。外在是指本體之外的元素，好比第三者。本體需與第三者有所聯係，所以修行是發生在社會中，而不是由個人單獨進行。

社會表現，第二組連鎖論和第一組不同之處有三：其一，第一組的開頭和最後一個字是相同的，所以稱爲語句間隔反復連鎖論（epanaleptical sorites）^④，第二組沒有這個特點。其二，第二組在連鎖詞串^⑤之後對每一字彙加上個別的解釋^⑥，所以稱它們爲雙連鎖論（double sorites）。其三，第二組是與行為有關的。第二組的例子：“不變不悅，不悅不戚，不戚不親，不親不愛，不愛不仁。”^⑦“顏色容貌溫變也。以其中心與人交，悅也。中心悅旃，遷●●於兄弟，戚也。戚而信之，親[也]。親而篤之，愛也。愛父，其繼愛人，仁也。”^⑧第31簡關於仁的連鎖論又提到“悅”，這個字在第32簡中被解釋爲“以其中心與人交，悅也”。“悅”在此特別指一種跟第三者溝通以後的感情。“戚”也是指與第三者的交流。在第32和33簡這個字被解釋爲“遷於兄弟，戚也”。最後，在第33簡有“愛父，其繼愛人，仁也”。這些例子都必須要有第三者才能進行，所以跟第一組連鎖論很不同。第一組是內在修行，而第二組是社會應用。

仁在社會的運用，可見於第37到41簡，是從仁義的角度來作法庭裁判。如果是小罪，就歸於仁的範疇，而可被赦免。大罪要有誅殺，而由義來規範。在《唐虞之道》中，也有類似的情形：有兩條路能走而無法折中。犯人能被赦免和被誅殺，國王也祇能有一個。這種情況對一般的人是完全衝突，但聖人能克服。道德行為不是一天的事，縱使今天赦免，或許明天會有大誅。今年縱使以禪讓立君，仁和孝順也依然要尊崇。無論如何，結論是修

① 《郭店楚簡校讀記》，78—80頁。

② 《郭店楚簡校讀記》，78—80頁。

③ 《郭店楚簡校讀記》，78—80頁。

④ 簡12到16。

⑤ 簡20到22。

⑥ 簡32到37。筆者所謂的雙連鎖論（double sorites），是廖名春所說的馬王堆編者改郭店原文段落順序的地方。《荊門郭店楚簡與先秦儒學》。

⑦ 《郭店楚簡校讀記》，78—80頁。

⑧ 《郭店楚簡校讀記》，78—80頁。

行是從本體開始，將天道引用於內，道德形成於內以後，逐漸擴展與外在結合，進而應用於社會。應用於社會就是幫助他人修行，重複上述的過程來達到道德大同。這樣的方法論，與《太一生水》是相似的。

《五行篇》提到“和”與“同”之處，主要在第4和第5簡：“德之行五和謂之德，四行和謂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道德形於本體之內，可達到天道的境界，就相當於《太一生水》的“太一生水，水反輔太一”的循環。“反輔”是因為修行到了某個程度後，人可以應用於社會，並宣揚道德。由上述論點總結，《五行篇》的中心思想是傾向於儒家的道德傳統，但其方法論是與《老子》、《太一生水》相同的。不過《五行篇》是較詳細地解釋修行的過程，而《老子》只提到修行的結果。

邢文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到《老子》和《太一生水》在哲學上是相關的。^①根據這個理論，我們可以引用《太一生水》來概略建構郭店《老子》的宇宙觀。《太一生水》主要是描述宇宙的根源：“太一生水，水反輔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輔太一，是以成地。”^②從修行的角度來看，引文的意思是指萬物跟太一彼此關聯，太一生宇宙萬物，萬物返回輔助太一，所以萬物的來源是共同的，儘管體現的方式各自不同。

上述《老子》第15和16簡所提到的“美”與“惡”的關係，也可從《太一生水》的角度來解釋。“美”與“惡”不是單獨存在的現象，而是與其它宇宙萬物的現象相關聯。人是萬物之一，如果人能瞭解美與惡的一致性，就能體會到萬物共同的來源是類似“水反輔太一”的過程。因此，這個宇宙觀是萬物大同的概念。這個大同是存在於本體之外的。當我們瞭解這個概念之後，本體與外在就能結合成一體而達到大同的境界。

郭店《老子》的大同是個人修行過程的結果。平常的人會分別美和惡，有和無，等等。悟道之後，這種表面的區別就被消除，而能看破世俗的偏見。“天下皆知美之為美也，惡已；皆知善，此其不善已。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聲之相和也，先後之相隨也。”^③此引文中有一連串的二項相對的字(binary opposites)。雖然是相對的，修行的目標是體會到它們的一致性。“美”和“惡”感官上的體現不同，不過“美”到了極端就開始有“惡”，“長短”、“高下”等等也是如此。假設引文適用於其它宇宙萬物的現象，未經修行的人所能感受的祇是片面的，因此是不正確的。此差異是因為不瞭解宇宙萬物的相互關聯性；如果能夠真的體會到這個道理，就能運用大同的概念。

① 邢文：《論郭店〈老子〉與今本〈老子〉不屬一系——楚簡〈太一生水〉及其意義》，《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20，1999。

② 《郭店楚墓竹簡》，125頁。

③ 《郭店楚墓竹簡》，112頁，15—16簡。

郭店墓中的文獻，探索大同的表現範圍很廣泛，但有幾個相同點。第一是修行的方法是在達到二項相對論的融合和協調，而這些相對的兩者，在一般的邏輯上是無法結合為一的，不管是仁和義、禪讓和世襲、赦免和大誅、美和惡、有和無等等，皆是如此。第二，修行的應用可以廣泛涵括整個社會或宇宙。

引據與中國古代寫本文獻 中的儒家經典《緇衣》研究

[美]普林斯頓大學 柯馬丁

一、引據在中國古代文本中的出現

與許多傳世的古代文本一樣^①，中國古代寫本文獻也有徵引其它文獻的情況。有時這些徵引有明確標記（如，通過置於引文之前或之後的特定形式），有時僅僅包含在論證或敘述中。但不管哪種形式，引據都不僅僅是參考其它文本。它是文本寫作與傳承的一個核心特徵，涉及作者、編纂、文本的完整性以及被徵引文本的總體地位和作用等問題。引據似乎尤其出現在有傳承歷史的文本（受到保護且超越時空而流傳的文本^②）的文獻中。這些文本隸屬於更大的文獻環境，依靠與其它文本建立的關係得以立身；並且，受到專門學術團體出於某種利益（用最籠統的說法）的保護和傳揚。有傳承歷史的文本會為社群關於過去的基本記憶、成套的思想概念與道德價值賦予結構、形式、身份和意義。它們的意義在於表達和不斷產生種種思想關係並參與社群事務。通過對這些文本口頭或書面形式的學習、保

① “文本”被用來作為一種中性表達，指稱或以口頭或以書面形式，或者同時以兩種形式存在的文獻。對於如本文將要討論的寫本，我實際上假定它們代表文本中一些同樣通過口頭和記憶傳世的特定書面作品。本文係第三屆國際簡帛研討會（Mount Holyoke College, U. S. A., 2004年4月23—25日）論文。

② 此嘗試性定義，請參閱柯馬丁（Martin Kern）《分析中國古代文本變體和書寫文獻產生模式的方法論反思》（“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Analysis of Textual Variants and the Modes of Manuscript Production in Early China”），《東亞考古學刊》（*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2002年第1期，143—181頁。

存和承傳，一個社群賦予自己的觀念和價值一種文本的表達，並將社群身份與其真正或想象的源頭連接。

一個社群的文本有多種彼此關聯的方式。其中，直接引據不僅僅表達特定思想的一致性；同時也強調文本創作本身的實踐。新文本通過引據指涉早期文本，並因此使二者共存於一個文本系統中。而且，徵引早期文本的新文本也是未來有望被徵引的文本。^①換句話說，引據是寫作中鮮明的修辭方式，它反映早期文本並且參與這些文本的傳承歷史。有如《禮記》關於青銅器銘文的解釋，創造銘文的人“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②。同樣的道理和歷史性視角也適用於徵引早期文本的文本。引據是祖先崇拜的文本形式。新文本借助引據成為某文化譜系的一部分，其中，先人被賦予的聲望和尊貴的地位反過來成為支撐、確立後人地位的權威。新文本重申舊典長久的權威，使該傳統得以永存；同時它（現已成為該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也提升了自身且增強了自己有望傳承的可能性——祇要它與舊典親密的依附關係受到它們同屬社群的重視。

中國古代寫本文獻中，有傳承歷史的文本的明顯的例子就是現有傳統中擁有副本，即那些歷史延續至今的文本。這類文本迄今大約佔所有出土文獻的百分之十^③。但也應將《五行》這樣流傳至少一百年（據郭店和馬王堆出土文獻記載）的文本算在內，儘管它們的傳承歷史最後停滯在某一點上。出土文獻中，引據尤其經常運用在與儒家傳統有關的文本中。在儒家傳統中，聖人及其“舊道”常常受到頌揚；因此，徵引舊典便成為哲學論爭本身的一部分。但這並不意味著每一儒家傳統的文本都需靠引據來建構。例如，今本《禮記》所輯眾多篇章似乎祇有部分呈現出這一特色。

出土文獻中引據的用法多種多樣。含蓄（沒有標明）引據祇有在可從其它文獻獲知的情況下才能確認。我們極有可能會失掉戰國和漢初時已消失（而且，迄今為止也未曾在其它文獻中發現）的文本中引據的信息。正因此，我們對引據的說明很可能不全面或者甚至會曲解。例如，郭店出土的名為《性自命出》和上海博物館（以下簡稱上博）名為《性情

① 關於戰國時代文本共同體和思想譜系的詳細探討，參閱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中國古代的寫作與權威》（*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第二章，53—97 頁（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99）。我認為，陸威儀的分析直接涉及祖先系譜與哲學系譜、祭祀崇拜與詮解承傳之間結構上的一致性。參閱柯馬丁《特寫：陸威儀的〈中國古代的寫作與權威〉》（“Feature: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by Mark Edward Lewis”），《國際中國評論》（*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2000 年第 2 期，346—347 頁。

② 《禮記·祭統》。

③ 鮑則岳（William G. Boltz）：《中國古代文本的合成性質》（“The Composite Nature of Early Chinese Texts”），選自柯馬丁輯《中國古代的文本和禮儀》（*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華盛頓大學出版社，2005，50—78 頁。

論》^①的一篇重要文獻似乎不含一個引據——儘管事實上，它顯然屬於戰國和漢代吸引大批思想家就命運、人性、情感、修身，以及音樂和詩歌、生產等問題展開廣大範圍論爭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在引據確切的意義上探討許多部分重複的短語和其它互文現象很容易引起誤導。“引據”假定兩個或更多文本間的單向關係：某文本引用早期資料。然而，這種相當簡單的模式並不能充分涵蓋所有中國古代的互文現象。固定形式會運用在一系列專題（比如音樂）討論中，以證明主題的集中和語言的一致。因此，固定短語、主題參引、敘述手法、歷史軼事以及論證順序等都有可能足夠廣泛地應用在釋義或變文中，它們在各種書面和口頭創作中的不斷出現表明了一種更為流動、擴散的現象。這便很難從中確定出層級分明的文本從屬關係。^②相反，較之整個文本傳統繁多嘈雜的現象，對確定文本的明確徵引就是承認該文本突出的完整性和權威。

這並不是說，文本的完整和權威必是像它們的明確引據可能使人想到的那樣確然。正如史嘉柏（David Schaberg）在對《左傳》和《國語》的研究中指出，同樣的引據有可能在此文本中被歸於《詩》，彼文本中卻被歸於《書》。另外，古代編史著作中的言說者在引用傳承下來的詞語時，“對他們的文本並沒有一個全面、均等的認識”，應當考慮到文本書面和口頭承傳複雜的交互作用以及流動和變異的相應現象。^③再者，正如長久以來注意到的那樣，中國古代文本對《書》的徵引是很不穩定也不一致的。^④甚至祇有《荀子》是傳統公認的引《書》始終匹配現有《書》中被稱為“今文”篇章的先秦文本。所有其它引《書》的文本，不管章節題目還是詞句，都時常會包含與今本《書》不一致的引文。或許，《荀子》

① 這兩個文本命名都出自文獻的現代編纂者。

② 相同的短語或者甚至相同的故事在許多古代敘事作品和一些近來出土文獻中都可以發現。後者的一個例子就是馬王堆出土的與《戰國策》相同的一些篇章。參閱福島由美子（Yumiko Fukushima Blanford）《〈戰國縱橫家書〉帛書研究》（“Studies of the ‘Zhangguo zonghengjia shu’ Silk Manuscript”）（博士論文，華盛頓大學，1989）。郭店本《窮達以時》，第10—13簡，在提到伍子胥的故事時，包含一個與《韓氏外傳》、《說苑》、《荀子》中的短句都有很接近的部分重疊的短章，見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27—28、145頁。同時，廣泛流傳的伍子胥軼聞的敘事傳統也出現在其它許多文本中。郭店本《尊德義》第22簡（《郭店楚墓竹簡》，56、174頁）有一個與《論語·泰伯》相同的長達十一個字的句子；另一個十個字的句子出現在第28—29簡上（《郭店楚墓竹簡》，57、174頁），引的是被歸於孔子名下的《孟子·公孫丑》。

③ 史嘉柏：《一個模式化過去：中國古代歷史編纂的形式和思想》（*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01，66—80頁。

④ 後來被當作《書》來徵引的文集似乎相當的松散和雜多不一。參閱陳夢家《尚書通論》，中華書局，1985，11—35頁；劉起鈞：《尚書源流及傳本》，遼寧大學出版社，1977，4—24頁；屈萬里：《尚書異文匯錄》，聯經出版實業，1983。另有陸威儀《中國古代的寫作與權威》，105—109頁（附進一步說明）和史嘉柏《一個模式化過去》，72—80頁。

在公元前3世紀晚期與今本《書》的大部分成形於同樣特定的社會和思想背景下；^①或者，它對《書》的採用在公元前1世紀後期被劉向追溯式地標準化了。^②事實上，這種追溯式標準化很可能範圍相當廣泛地發生在所有引《詩》的先秦和西漢文本中。^③

二、郭店與上博《緇衣》寫本

由於迄今進行的不是有關文本傳播，而是中國古代文本中引據實際應用的研究。因此，該論文主要探討郭店與上博《緇衣》寫本與它們的今本《禮記·緇衣》的區別。^④兩種寫本頗為相似。儘管其中有不少的文本變異，但卻擁有許多共同的字面特色；另外，在篇幅、內容以及章序上它們也都相同。^⑤郭店《性自命出》和上博《性情論》的寫本也有類似的情況。這不尋常的重疊現象——該現象可從同時同地（即楚）寫本系統中的寫本文獻推知——促使學者們推測，上博竹書有可能曾經出自郭店地區。如同兩種《緇衣》寫本許多字面上的一致一樣，它們與今本《禮記·緇衣》的不同也很大程度上相似。基於它們結構上的一致——這並不排除某些字的不同措詞——以及集中分析整個文本結構而非單個字詞含義的實際目的，我將兩種寫本視作一個文本。

《緇衣》在今本《禮記》中擁有特殊地位。它傳統上被認為是歸於子思名下的四篇之一，在《禮記》中與其它三篇《坊記》、《中庸》和《表記》結集在一起。這四篇加上《大學》和《孔子閑居》，佔了《禮記》中絕大多數徵自《詩》、《書》、《易》的引據。下面的表格說明這些文章中（常以“云”或“曰”引入）引據的分配：^⑥

- ① 在我看來，能代表該文化背景的一個現象，即秦帝國毫無疑問擁有它自己的官本《書》，由官方指定的博士進行研究。博士們極有可能負責編纂（如果確實沒有同時也創作的話）其中一些章節。參閱柯馬丁《秦始皇碑銘：中國古代帝國象徵的文本和禮儀》（*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 in Shih-huang: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ese Imperial Representation*）（美國東方協會，2000），183—196頁（附進一步說明）。注意，秦朝博學的大臣李斯就是荀子的學生。
- ② 第三個可能性或許是這種追溯式標準化發生在楊倞（9世紀）校編《荀子》的時候。
- ③ 柯馬丁：《出土文獻中的〈詩〉》（“*The Odes in Excavated Manuscripts*”），選自柯馬丁輯《中國古代的文本和禮儀》（*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華盛頓大學出版社，2005，149—193頁。
- ④ 今本《禮記》採用的是阮元附校勘記的《十三經》本，即發行於1815年的《十三經註疏附校勘記》中的《禮記正義》（中華書局，1987）。郭店寫本來自《郭店楚墓竹簡》，15—20、127—137頁；上博寫本出自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6、45—48、169—213頁。
- ⑤ 參閱《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另外，關於兩種寫本文獻各自引《詩》的不同文本變體的詳細分析，請參閱柯馬丁《出土文獻中的〈詩〉》。
- ⑥ 關於引《書》，我在統計中包括了所有可從傳世的《書》（或真或偽）中得知篇名的文本以及篇名看似屬於《書》的文本傳統。如同上面已經指出，戰國時代被冠以《書》之名的文集有可能大大超出傳世的今本《書》。《孔子閑居》中八處引《詩》，其中有四處不是靠引導詞標記的。參閱下文關於《民之父母》的討論。

表一：《子思子》篇、《大學》與《孔子閑居》中的引據

	詩	書	易	其它
坊 記	14	4	2	3
中 庸	16			4
表 記	18	3	3	
緇 衣	22	15	1	
大 學	12	9		1
孔子閑居	8			
匯 總	90	31	6	8

相比較而言，《禮記》中剩下的一共四十四篇有九篇引《詩》，總共卻祇有十三處。^①引其它文本的數量也大致相同。這表明即便被認為屬於儒家傳統的文本當中，徵引早期文本也不是普遍現象。《禮記》幾篇祇有一處以引《詩》結篇。相反，在被稱作《子思子》的四篇中，引據則是循環公式化結構的一部分：一段短章通常起於引導詞“子曰”，結於某經典引據，構成中間“子”之言（一般較短）的框架。《坊記》（三十八章）、《表記》（五十四章）、《緇衣》（二十四章）基本上都是以這樣的短章結構的。《中庸》類似的章節長得多，且會插入其它更冗長的章節。除了《子思子》四篇，其它《禮記》諸篇都沒有一連串以“子曰”開頭的章節。換句話說，除《大學》和《孔子閑居》顯著的例外，引據在《禮記》中多半必定要有一個專門的公式化結構，而且該結構章章貫之。典型的例子是《禮記·緇衣》第二章：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願，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②

不算每章開篇引導詞“子曰”，今本《禮記·緇衣》二十四章中除一、四兩章外，有二十二章有明確插入的引據。換句話說，整本《緇衣》是由明確指涉傳統中其它著名文本的章節緊密交織而成的。就《緇衣》作者而言，用引據實際支撐每一章顯然很重要，因而這就產生了論述的統一修辭結構。由於不能在現存文本中一一找到對應，我們無法肯定《緇衣》中所有引據的出處。但察其文本語言，這些今本中没有對應的引據也確乎應屬於戰國時代稱為“書”的較大文本群；而且，就像那些與今本《書》對應的引據一樣，它們也是由特定標題（或是章節題目或是其它）引入的。這種指定個別標題（相對統稱的“書”）的方式，使引《書》明顯有別於引《詩》。後者差不多都統引為“詩”或置於如《大雅》或

① 以阮元本為準，其它引《詩》的篇章有《檀弓下》（一處）、《禮運》（一處）、《禮器》（一處）、《大傳》（一處）、《樂記》（三處）、《祭義》（二處）、《經解》（一處）、《射義》（二處）及《聘義》（一處）。

② “緇衣”《詩·鄭風》和“巷伯”《詩·小雅》均出自《詩》。最後一處引自《詩·大雅·文王》。

《小雅》這樣比較寬泛的範疇的稱謂下。^①

《禮記·緇衣》以“子曰”開篇，繼而由另一明確引據作結的結構方式，使章節擁有框架且成為自我包含的文本單位。而且，該結構實際在全篇所有章節的擴展，形成一種統一而連續的系列論述。由於該結構形式基本限定在《子思子》四篇，因而顯得更為突出。因此，引據作為一種構成工具，既為每一章節提供整體性和穩定性，也賦予章節系列整體的一致性。在此，引據有幾個不同功能，其中之一即指涉一套建立的權威經典且使文本的每一章都與之關聯。同時（有可能更重要），章節的固定結構形式有益於維護穩定的傳承，不管相對於單一章節還是章節系列。

《禮記·緇衣》共引《詩》二十二處，與今本《詩》都有對應。另外還包括一處引《易》（二十四章），以及其它九個不同標題下共十五處引據。這九個標題的其中八個都可在今本《書》中找到對應：四個存於今文《書》，四個屬偽古文《書》。剩下的一個標題指涉古文《書·咸有一德》中的某個言說者。這些標題有可能幫助啟發了古文《書》的偽章標題。無論如何，追溯到約公元前 300 年，這四條標題出現於寫本文獻說明了它們在戰國後期確實存在。^②在本文中我將摘引出這九種不同標題下的十五處《書》引據。與今文《書》的文本不同，在約公元前 300 年（即郭店和上博寫本文獻的假定年代），《緇衣》寫本所有的這一類引據都被視為屬於同樣的經典權威文本。

我們可以分成幾個層面，對《禮記·緇衣》三十八處引據與它們對應的郭店和上博《緇衣》寫本加以比較。比如，可以設問：兩種文本分別包含哪些引據？其長短如何？它們如何被標記和安排？以及標題和文本有何不同？首先，兩種寫本與《禮記·緇衣》本章序不同，該差異影響了引據的應用。下表即為二者章序對比：

表二：《禮記·緇衣》與《緇衣》寫本的章序

《禮記·緇衣》	《緇衣》寫本	《禮記·緇衣》	《緇衣》寫本
1	——	13	13
2	1	14	11
3	12	15	10
4	8	16	——
5	7	17	5
6	6	18	18
7	14, 15	19	21
8	16	20	22

① 整個《禮記》本祇有三處引《書》是由一般引導詞“書云”或“書曰”引入的：一於《坊記》，二於《喪服四制》。

② 迄今，《禮記》本中祇有《緇衣》一篇和《孔子閑居》半篇（對後者的討論參閱下文）被證明屬於戰國後期，因而可以確證它們的引據應不晚於約公元前 300 年。除說明寫本中目前可以看到的很少幾處標題和引據外，此論與古文《書》的真實性問題沒有關係。

9	9	21	20
10	3	22	19
11	2	23	17
12	4	24	23

寫本不包括《禮記》本第一和第十六章，而《禮記》本第七章在寫本中則被一分為二（第十四、十五章）。結果，寫本共二十三章，《禮記·緇衣》則有二十四章。如上表所示，《緇衣》寫本與《禮記·緇衣》整體章序差別相當大，但這兩種版本的一些章節群卻都穩定，儘管各自內部章序亦仍有不同：

表三：《禮記·緇衣》與《緇衣》寫本中配比的章節群

《禮記·緇衣》	《緇衣》寫本
4 - 5 - 6	8 - 7 - 9
7 - 8	14 - 15 - 16
10 - 11 - 12	3 - 2 - 4
14 - 15	11 - 10
19 - 20 - 21 - 22	21 - 22 - 20 - 19

儘管寫本不包含《禮記·緇衣》第一章和第十六章，但卻仍然包括所有今本二十二處徵之《詩》的引據（今本《緇衣》第一章和第十六章都沒有引《詩》）。寫本另外（郭店簡 26 與上博簡 13—14）包括一處長達十字引自某逸詩（以套語“詩云”引入）的引據。^①此外，郭店本還包括一處引《小雅·都人士》的附加的四言句，在現有版本（無論今本《詩》還是今本《緇衣》）或者任何其它地方都不曾出現。不完整迹象顯示它也同樣包含在上博寫本中。^②

除了引《詩》，寫本還包括所有今本《禮記·緇衣》的引據，但以下除外：

（a）由於寫本不含《禮記》本第十六章，因此也不含該章的四個《書》引據。《禮記》本第十六章是全篇最長的一章，也是唯一一個含有如此多《書》引據（卻未引《詩》）的一章。較之其它《緇衣》章節的套式化結構，該章因而有些反常。它是《禮記》本中僅有不包含於寫本的較長章節；另一不存於寫本而《禮記》本卻有的章節是不含引據的 19 字短句的首章。

（b）《禮記》本最後第二十四章引《詩》、《書》和《易》作結；寫本引《詩》結篇卻沒有引《書》和《易》。

① 注意，《禮記·緇衣》中的“曰”與“云”在直接引據中起同樣的語法作用。

② 附加句最後兩個字出現在上博文獻第 10 簡的開頭；所引《都人士》開頭十個字和引據之前五個字皆無。第 9 簡後部和第 10 簡前部都絕斷。第 9 簡後部折裂的殘片現存香港中文大學，包含《都人士》的徵引之前五個字和徵引本身開頭六個字。徵引隨後的四個字大概處於第 10 簡前部折裂處。參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184 頁。（也有可能，現存香港中文大學的殘片後部折裂了一個字，上博寫本第 10 簡前部祇折裂了三個字。）

總之，寫本沒有引《易》，也沒有《禮記》本中不包含的《書》引據。但它卻對應今本中所有的引《詩》，而且包括一個現有文獻系統無法索之的附加引據。下表即為《緇衣》寫本與《禮記》本資料徵引相對比重的對照：

表四：《禮記·緇衣》與《緇衣》寫本引據數量對比

	《禮記·緇衣》	《緇衣》寫本
《詩》	22 (57.98 %)	23 (69.69 %)
《書》	15 (39.47 %)	10 (30.30 %)
《易》	1 (2.63 %)	——
匯總（百分比）	38 (100 %)	33 (100 %)

我們無法確定目前現有的兩種《緇衣》寫本就是今本《禮記·緇衣》的祖本。今本《緇衣》有可能在章序安排和引據的選擇上都參照了其它早期（口頭或書面）文本；也有可能《禮記》本的編纂者採用了現在為我們所知的兩種寫本代表的文本，卻通過有意增刪引據而對之進行了改造。但不管怎樣，我們都可以說，較諸今本《禮記》，寫本引《詩》的比重絕對大於對其它資料的徵引。^①該觀點將通過下文對單個章節引《詩》模式的考察獲得進一

①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在對寫本《緇衣》及其相應《禮記》本的對比研究中試圖證明，《禮記·緇衣》的編纂者是根據與郭店寫本一致（或接近一致）的某一竹書文獻編纂今本《緇衣》的，但由於他所使用的竹書賴以連接的綫繩斷裂，竹書破損為一堆單片竹簡。結果，編纂者在努力重新復原的過程中丟失或混亂了其中部分文本而同時也加進了其它文獻中的資料。見夏含夷《試論〈緇衣〉錯簡證據及其在〈禮記〉本〈緇衣〉編纂過程中的原因和後果》，選自謝維揚、朱淵青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287—296 頁。該推論基於幾個假定。其中之一就是將每一簡片字數（如約 21—24 字）相對標準化（而非確實固定的字數），以及假定每一章節都必始於新簡片的頂部。儘管這種推想——如同眾多單嚮度因果關係的詮釋一樣——或許第一眼看上去有吸引力，但我認為在若干處是沒有說服力的。其一，沒有理由假定今本《禮記》的編纂者實際是根據一個恰好與我們現在發現出自同一時期和地區的兩種寫本一致（或基本一致）的文本開展編纂工作的。其二，即便真有一個繩綫開裂的特定文本，後來《禮記》本的章節也不太可能是由這一文獻構成的。毫無疑問，漢代《緇衣》備受推尊的地位使之有廣泛的口傳記憶以及種種書面形式的文本傳播和接受，編纂者不會僅僅孤立使用一個文本。比如，據人所習知的故事，劉向（前 79—前 8）在公元前 1 世紀後期為宮廷藏書館編纂《荀子》時，不得不對大量資料（包括全部章節重複的各種版本）詳查而細選十分之一才能選定其中的權威版本。參閱 John Knoblock《荀子全集的翻譯和研究》（*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88—1994），卷一，105—110 頁。其三，原則上，比較靈活的每片簡的字數統計——按夏含夷的算法，二十一字也好，二十四字也好——確實太容易操縱，所以不能作為單獨主要證據。其四，即便僅限《緇衣》一篇，被推薦的方法最多可解釋某一些段落而對另一類段落則根本無能為力。在這一情況下——見 293 頁——夏含夷竭力想補救他的問題，因而提出或許有另一種未知的、不同的寫本存在的可能性，在此特別章節中作為說明《禮記》本的根據。但原則上，這一假設將會導致他的整個方法論都值得懷疑。其五，就像我曾在幾篇文章中所探討的，一種完全集中在傳抄過程的推論無法解釋眾多明顯表明口傳傳統迹象的文本變體。參閱柯馬丁：《根據近期出土文獻看中國古代詩學》（“Early Chinese Poetics in the Light of Recently Excavated Manuscripts”），出自奧爾加·拉莫娃（Olga Lomová）編《再雕龍：理解中國詩學》（*Recarving the Dragon: Understanding Chinese Poetics*）（查爾斯大學出版社，2003），27—72 頁，以及《分析中國古代文本變體和書寫文獻產生模式的方法論反思》、《出土文獻中的〈詩〉》諸篇文章。總之，儘管寫本復制——恰如口授和記憶的常規模式——確實在戰國文本文化中佔一席之地，但我仍然不能夠信服夏含夷對《緇衣》研究所得出的籠統觀點，即，對特定寫本的復制和模仿成為構成中國古代種種現有文本單一的主要原則。（注意，一旦我們考慮到《禮記》的編纂者會同時使用幾個寫本，那麼，夏含夷用以分析《緇衣》的方法甚而會變得更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它們都不得不是紊亂的，而在各竹簡的不同字數上也都不得不恰恰一致。）

步說明。就引據長短而言，寫本與今本大體一致。儘管有幾處顯著的例外：

(a)《禮記》本第十七章有八句引自《小雅·節南山》，其中前五句並不包含在今本《詩》中。而這五句也同樣沒有出現在寫本（第五章）中，後者該引據僅為三句。《禮記》本該引據前兩句都是五言，這對《詩》來說是極為罕見的現象。而且，《禮記》本第六句也是五言，但該句在寫本以及今本《詩》中則都為四言。其區別在於另外附加的一個助動詞“能”，其顯然是可有可無的成分。^①

	標記	《詩》引據		
禮記十七	詩云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	誰能秉國成	不自為正，卒勞百姓
郭店五	詩云		誰秉國成	不自為貞，卒勞百姓

(b)《禮記》本第九章引了《小雅·都人士》的前六句。寫本第九章包含顯然是今本第三、四、六三句的變體。就像《禮記》本第十七章（寫本第五章）一樣，寫本較之《禮記》本，引《詩》都非常突出地短小。寫本中所有的章節對一首詩的引用也都不超出四句，因此，寫本比今本短的引據都堅持一種標準範圍，即一至四句之間，而且多數情況下是一個對句。《禮記》本較長的引據顯然沒有甚麼標準形式。

	標記	《詩》引據			
禮記九	詩云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行歸於周	萬民所望
郭店九	詩云		其容不改，出言有X		黎民所信

(c)《禮記》本第十五章的一處《書》引據含十六個字，與之對應的寫本第十章該引據為十五個字。其用語亦各有不同。^②

	標記	《書》引據
禮記十五	君陳曰	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郭店十	君陳云	未見聖，如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迪聖

(d)《禮記》本第十四章的一處《書》引據比寫本第十一章的該引據長出四個字，措

① 此處及下文，我嘗試說明《禮記》本和郭店本（由於結構相同，在這裏郭店本代表兩種寫本文獻）之間的結構差異。單一章節由數字標明（即，“禮記 17”就是《禮記·緇衣》第 17 章；相應地，郭店本第 5 章就是“郭店 5”）。這一層面的分析，不涉及實際寫本的書寫模式差異、它們不同的詮釋可能性以及種種書寫和詞彙變異的含義。相反，我希望把文本全部結構差異講得很清楚而且易於理解。因此，我採用盡可能簡單的表述方法，運用《郭店楚墓竹簡》的編輯者校訂的文本和他們對單個字的讀解。輯者們不能轉錄為標準字形的以“X”代入。我將文本分成明顯獨立的幾部分，以便易於確認《禮記》本與寫本的彼此背離之處。

② 該引據祇出現在偽“古文”《書》的《君陳》一章；該本此處對應《禮記》本該章的引據。

辭亦有部分不同。寫本比《禮記》本節律上更為一致。^①

	標記	《書》引據		
禮記十四	葉公之顧命曰	毋以小謀敗大作	毋以嬖御人疾莊後	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郭店十一	X 公之顧命云	毋以小謀敗大作	毋以嬖御塞莊後	毋以嬖士塞大夫，卿士

(e) 一處引“今文”《書》之《呂刑》（《禮記》本叫《甫刑》）的引據，在《禮記》本第三章和今本《書》中均有的兩個首字寫本第十二章沒有。寫本由於韻律性的重複，比之今本節律上更為一致。

	標記	《書》引據		
禮記三	甫刑曰	苗民匪用命	制以刑	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郭店十二	呂刑云	非用錙	制以刑	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f) 《禮記》本第十三章又一處《甫刑》的引據由五個字組成，而相應寫本第十三章和今本《書》中該句都為四個字。其區別在於《禮記》本多出一個否定詞，而鄭玄注《禮記》時已認為該詞應該取消。^②同為今本《緇衣》該章，一處緊承“今文”《書》之《康誥》的引據也是單一的四言句。

	標記	《書》引據
禮記十三	甫刑曰	播刑之不迪
郭店十二	呂刑云	播刑之迪

與直接引據相關的另一問題即，它是如何被標識的？《緇衣》寫本對《詩》的徵引由引導詞“詩云”（十九次）、“大雅云”（兩次）或“小雅云”（兩次）引入。今本《緇衣》中，兩處標記“大雅云”的地方作“詩云”，一處“小雅云”作“小雅曰”，三處“詩云”作“大雅曰”。《禮記》本第二十二章唯一一處引自《國風》的詩歌由標題《葛覃》引入，使之成為唯一一個由特定標題，而非一般術語如“詩”、“大雅”或“小雅”等引入的引據；而在寫本相應的第十九章中，它由一般引導詞“詩云”引入。《禮記》本所有引《書》以及一處引《易》皆由引導詞“XY 曰”標記，“XY”幾乎不變地成為一個復名標題。^③ 與此相對照，寫本《緇衣》無論引《詩》還是引《書》，所有引據都一律由“云”引入。而《禮

① 該引據及其標題在現有文獻中找不到對應。
② 參見《禮記正義·緇衣》。
③ 《禮記》本第 24 章（寫本第 23 章）的“易曰”和《禮記》本第 14 章（寫本第 11 章）的“葉公之顧命曰”是兩個例外。

記·緇衣》對“云”和“曰”的並用則似乎沒有甚麼統一的體系或原則。

根據《緇衣》的構成來看，《禮記》本和寫本最重要的區別表現在引據的整體安排上。以上的討論說明，寫本在引據本身的最基本形式和引據標記上都顯示了更大的一致性和規律性。引據的宏觀分佈以及整體文本秩序則甚至更有力地說明，《緇衣》寫本與《禮記》本相比，前者是根據嚴格的引據原則組織結構而成的：

(a) 寫本不包括《禮記》本中不含引據的第一章。值得註意的是，該章引導詞不是“子曰”而是“子言之曰”這樣一個《緇衣》中其它地方不曾出現的形式。

	引導詞	子所言
禮記一	子言之曰	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b) 寫本第 1 章是《禮記》本第 2 章。

	引導詞	子所言	標記	《詩》引據
禮記二	子曰	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願，刑不試而民咸服	大雅曰	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郭店一	夫子曰	好美如好《緇衣》。惡惡如惡《巷伯》，則民臧 X 而刑不屯	詩云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較諸《禮記》本該章，寫本表現了幾處措辭的明顯差異，其中之一即“子”之言整體上更簡煉的辭風。但最值得注意的是該章構成了寫本文本的開篇，“子”引述《緇衣》和《巷伯》中表達的嘉德美行^①作爲君主效仿的典範。^② 與《禮記》本不同，寫本開章直接提到《緇衣》，而《禮記》本則將之作爲全篇的標題。^③ 此外，該章引《大雅·文王》作結，用《詩》的核心篇之一來推崇古代聖賢君主的最高典範。

(c) 《禮記》本第三章在引《書》之《甫刑》（即《呂刑》）後增加了十二字的總結性的一般陳述。與之相應的寫本第十二章則祇有《呂刑》引據本身。另外，寫本在這次引據之前有一處《禮記》本中沒有的某逸詩的兩句引據。

① 文本似乎在說“惡惡如惡巷伯”（即，以“巷伯”爲“惡”的直接賓語），但這是沒有意義的。《緇衣》和《巷伯》確實指涉《詩》的兩個篇名。在《緇衣》中，“緇衣”確是被頌揚的，但《巷伯》中的“巷伯”卻不是被嫌惡的。他是一個憤恨宮廷中惡言中傷等卑劣言行的人，因而宣稱作此詩以諫。

② 在對所引《文王》和“子曰”的話語的解讀上，郭店編纂者和上博的編纂者陳佩芬將“型”解讀爲“刑”（與今本《禮記》相同），而且對郭店本作“屯”與上博本作“刺”的解讀未作定論。相反，夏含夷作了雄辯的論證，即，認爲“型”讀如字（模型的意思），而以“屯/刺”讀爲“頓”。這樣，“型不屯/刺”即“模型不破壞”——恰好等於《詩》的意思，特別是《文王》。見夏含夷《試論〈緇衣〉錯簡證據及其在〈禮記〉本〈緇衣〉編纂過程中的原因和後果》，294—295 頁。

③ 《緇衣》寫本如同大多數古代中國寫本一樣沒有標題。

	引導詞	子所言	標記	《詩》引據	標記	《書》引據	引據後結論
禮記三	子曰	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遁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蒞之，則民有孫心			甫刑曰	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郭店十二	子曰	長民者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歡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X心。故慈以愛之，則民有親，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蒞之，則民有遜心	詩云	吾夫夫共XX，X人不斂	呂刑云	非用殄，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d)《禮記》本第四章不含引據，第五章卻引《詩》兩處、引《書》之《甫刑》(《呂刑》)一處。這兩處引《詩》，前一個出現在寫本第八章(與《禮記》本第四章對應)，後一個則獨自出現在寫本第七章(與《禮記》本第五章對應)。這樣，與《禮記》本第四章相應的寫本章節遵守了以引《詩》作結的標準形式；與《禮記》本第五章相應的寫本章節，也遵循同樣出現在其它幾個章節中有所擴展的標準形式，即包含一處引《詩》、一處引《書》。

(寫本將引《詩》放在引《呂刑》之前。《禮記》本第二處引《詩》恰在結尾。)結果，兩種寫本都參與有規則的章節結構，而相應的《禮記》本則都有背於該結構。一處引《詩》出現在寫本和《禮記》本不同章節中以驗證不同的哲學論爭，這一事實表明了引據意義內在的靈活性和普適性。

	引導詞	子所言	標記	《詩》引據				
禮記四	子曰	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郭店八	子曰	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以命，而從其所行。上好此物也，下必有	詩云	號號師尹，民具爾瞻				

		甚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民之東也						
	引導詞	子所言	標記	《詩》引據	標記	《書》引據	標記	《詩》引據
禮記五	子曰	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	詩云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甫刑曰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大雅曰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郭店七	子曰	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道，豈必盡仁	詩云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呂刑云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e)《禮記》本第七章相對較長且包含兩個獨立的主題；它以一處引《詩》作結。《禮記》本第八章長度一般，引《詩》兩處結篇。寫本中，《禮記》本第七章被分為十四、十五兩章。寫本第十四章（對應《禮記》本第七章的前一部分）以《禮記》本第八章結尾並置的兩處引《詩》的其中之一作結。這樣，與《禮記》本第八章相應的寫本第十六章卻僅一處引《詩》。與《禮記》本第七章後一部分相應的寫本第十五章由標準引導詞“子曰”（未在《禮記》本此處出現）引入，鮮明標誌出新章節的開始。緊承該引導詞的部分包含了《禮記》本第七章的整個後一部分，也包括最後的引《詩》。與在《禮記》本第四、五章和寫本第七、八章的情況一樣，一處引《詩》被用來支持兩種不同《緇衣》版本中的兩個不同論點。總之，《禮記》本七、八章與寫本十四、十五和十六章相比，寫本的結構很明顯地更為一致。

	引導詞	子所言	標記	《詩》引據	標記	《詩》引據
禮記七	子曰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詩云	淑慎而止，□不讐於儀		
禮記八	子曰	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詩云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大雅曰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郭店十四	子曰	王言如絲，其出如 X，王言如索，其出如紼。故大人不倡流	詩云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郭店十五	子曰	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則民言不 X 行，不 X 言	詩云	淑慎而止，□不讐於儀		
郭店十六	子曰	君子道人以言，而 X 以行。故言則慮其所終，行則稽期所敝，則民慎於言而謹於行	詩云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f)《禮記》本第十八章包含各自獨立的兩部分。首先起自通常以“子曰”開篇的十九字短章，接續的第二部分也同樣起自“子曰”。該章相應的寫本第十八章不包括沒有引據的第一部分，其餘部分則引《詩》和一處《書》引據作結，保持與寫本其它章節形式上的一致性。寫本與《禮記》本該章的不同在於，其結尾將引《詩》置於引《書》之前。

	引導詞	子所言	引導詞	子所言	標記	《書》引據	標記	《詩》引據
禮記十八	子曰	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子曰	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	君陳曰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詩云	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引導詞	子所言	標記	《詩》引據	標記	《書》引據
郭店十八			子曰	君子言有物，行有格。此以生不可奪志，死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齊而守之；多志，齊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	詩云	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君陳云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g)《禮記》本第二十四章以三處連續的引據作結：一處短小的標準式引《詩》，緊承一處較長的《書》引據，最後一處引《易》。與之相應的寫本第二十三章則遵循標準形式，僅以一處引《詩》作結。

	引導詞	子所言	標記	《詩》引據	標記	《書》引據	標記	《易》引據
禮記二十四	子曰	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	詩云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兌命曰	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易曰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婦人吉，夫子凶
郭店二十三	子曰	宋人有言曰：人而亡恆，不可為卜筮也。其古之遺言與。龜筮猶弗知而況於人乎	詩云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上文已經指出，寫本《緇衣》共有二十三章。其章節結構由每章後面的一個四方標點（郭店本）或一個筆畫（上博本）標示。另外，末章之後有一小注“二十又三”。不管該注意圖如何，是誰所為，它似乎表達文本的長度的確定性，有可能也表達寫本堅持已經存在的某一種文本的長度。所跟二十三個標點，指示文本本身的整齊性，有可能也表明章節的固定秩序和文本的完整性。因此，如果說今本《緇衣》確是從我們所看到的兩種寫本發展而來，那麼，後來的編纂者必定由於某種原因對早期文本進行了有意識的改造。

除目前所列個別結構上的差異外，寫本和《禮記》本另一個彼此背離的方面表現在引據的安排上。今本《緇衣》不僅整體上包含更多的《書》引據，而且似乎賦予《書》和《詩》同樣標準文本的地位和權威。因此，《禮記》本第三、十三、十四和十六章祇引了《書》而未曾引《詩》。寫本不包含今本第十六章，而對應今本第三章的部分有一處附加的引《詩》（引自某“逸詩”）。寫本也不包括今本第一章（無引據）。最後，寫本與《禮記》本第四章（無引據）對應的部分有一處引《詩》（該引據《禮記》本中出現在第五章）。因此，《禮記·緇衣》有五章全沒引《詩》，而寫本此種情況卻祇有兩章。另外，今本同一章節中同時引《詩》和《書》時，次序是任意的。而寫本中，引《詩》總置於引《書》之前。

總而言之，與《禮記·緇衣》相比，《緇衣》寫本引據的用法表明文本結構更具系統性且賦予《詩》以更大比重。後者一個特別有力的說明，即寫本以對《緇衣》的徵引開啓全篇。寫本開篇引《緇衣》（進一步延深到另一首詩《巷伯》）強調“子”認為君主應把《詩》作為學習治理國家之道的權威資料以使“型不頓”的道理。接著，再次引《詩》結篇，作為支持“子”的觀點，即，當下治理應從歷史中選取正確楷模。該引據頌揚了君主的典範“文王”，而這一位典範人物最完美最理想的出現不是在一般歷史知識中而恰是由《詩》中冠之以其名的一首詩所塑造的。《文王》這首詩體現的是對文王（模範君主）的紀念。因此，通過標題徵引（“緇衣”和“巷伯”）和直接引據（“文王”）的總體運用，《緇衣》寫本第一章把《詩》——而且祇有《詩》——樹立為標舉君主典範的最終範本。如同《文王》表現的是文王的美德，《詩》文集總體上展現的是道德和智慧範型的全部品質的總匯。從第一章開始，《緇衣》寫本主要由一系列引自古老的《詩》的引據結構而成，間以《書》引據的輔助、支撐。寫本中祇有兩處與《禮記》十三、十四章相應的部分在以引《書》結篇前沒有引《詩》。

《緇衣》寫本中，《詩》整體的突出地位反映了戰國後期顯著範圍內其作為經典文本的獨一無二的地位。該時代傳世文獻中其它任何文本幾乎都未曾如此經常地被引用過，而且也沒有任何一個像它那樣如此引人注目地出現在出土文獻中。另外，考查不同寫本文獻對《詩》的引用，會發現該經典具有突出的文本穩定性：《緇衣》中除一處單獨引自某“逸詩”的引據外，所有引《詩》——總共五十六處來自二十九首公認屬於《詩》的引據——都一

一對應於今本《詩經》。^①對照這五十六處來自各種不同寫本和今本《毛詩》的引據，可以看到它們無數文本上的差異——大體佔全部字數的 31.6% 到 42.7%——幾乎全部表現在書寫（相對於詞彙）變體上。換句話說，我們目睹了貫穿全篇的語音（因而極有可能也是詞彙的）穩定性和無所不在的書寫的靈活性或非穩定性的結合。^② 儘管戰國後期至漢代早期，大多傳世文本中的引《詩》整體書寫上的穩定性無疑反映了某種根據今本《毛詩》的徹底的追溯式標準化，但實際的詞顯然在最早寫本出現的時候或者有可能更早的時候已經基本上穩定下來。^③

《書》引據沒有表現出同樣的詞彙穩定性。《禮記》本與寫本引據上的差異既表現在字的數量上也表現在實在的詞上。而且，很顯然公元前 3 世紀後期確立的《書》文集與在公元前 300 年左右——祇不過早二三代——被作為權威文本來引用的《書》文本有所不同。而那時郭店古墓中的《詩》文集相比較而言則更為統一，而且更好地保護了文集當中各個單個文本免受詞彙變更的影響。原因之一大概是由於節奏、四言句以及其它音調特質的存在使得《詩》異乎尋常地容易記憶並且較少依賴書寫。如果說有甚麼特殊的話，那就是《詩》的書寫變體與詞彙穩定性之間的結合在共時性流通和歷時性承傳過程中顯示了某種有利傳承的口頭成分。^④《緇衣》寫本以及其它古代寫本文獻都有迹象表明，《詩》的詩歌結構對它的穩定和流傳以及被徵引方式都有重要意義。^⑤不管《書》文本是否主要以書面形式承傳——儘管它們被冠以“書”的名字，但確也一直有理由懷疑——基本上不具有與《詩》同樣有規律的詩歌結構。^⑥

① 參閱柯馬丁《根據近期出土文獻看中國古代詩學》，33—35 頁。我在統計中包括了引《詩》的五種文獻：馬王堆《五行》帛書（見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研究》，汲古書院，1993）；郭店《五行》竹書（見《郭店楚墓竹簡》，29—35，147—154 頁）；《緇衣》竹書出自郭店和上博《緇衣》竹書，以及上博《孔子詩論》竹書（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3—4，11—41，119—168 頁）。同時也包括了在我早期調查中還沒有出版的上博寫本《民之父母》（見馬承源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54，166 頁）的三處引《詩》。另一方面，儘管阜陽雙古堆（見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出土的嚴重損毀的竹書殘篇應是《詩》文集本身一個斷篇，但我仍然沒有將其包括在內。

② 柯馬丁《出土文獻中的〈詩〉》。

③ 正如柯馬丁《出土文獻中的〈詩〉》所論證，假定書寫變體——這些變體是同音或接近同音，因而可以用來作為假借字——實質上包括不少詞彙變體，這是違反直覺的。

④ 參閱柯馬丁《根據近期出土文獻看中國古代詩學》與《出土文獻中的〈詩〉》中的相關論點。

⑤ 認為《詩》更有效的傳承僅僅由於其更為有力的經典地位，同時宣稱它主要靠書面形式承傳，這種觀點是有缺陷的。寫本高度的書寫變體以及整體缺少傳抄筆誤的現象都表明有別於那種寫本傳抄的機械過程。參見柯馬丁《根據近期出土文獻看中國古代詩學》及《分析中國古代文本變體和書寫文獻產生模式的方法論反思》。

⑥ 史嘉柏：《一個模式化過去》，66—80 頁。《緇衣》寫本某些《書》引據與相應《禮記》本的不同在於前者節律的一致性較強，這或許可以看作是某種口頭承傳的補充標誌。

三、其它郭店、馬王堆、上博寫本文獻的相關發現

明確徵引並非出土文獻的整體現象而恰是一種特殊現象。任何其它出土文獻都不會像《緇衣》寫本那樣包含一連串結構緊密而有系統的引據^①。但郭店與上博寫本文獻也有其它幾處明確徵引的情況。首先，郭店《五行》篇有七處引《詩》（卻沒有對其它文本的徵引）。馬王堆《五行》篇不僅包括較早郭店本的所有引據，而且還另引了《關雎》，明顯比幾種郭店本在引《詩》上有擴充，還在另外的討論中對其中許多引據進行了重複徵引。和寫本《緇衣》一樣，郭店和上博其它寫本文獻引《詩》也都非常短小（通常為並聯的兩個四言句）。兩種《緇衣》寫本祇有一處三句和兩處四句的引據。郭店《五行》篇也祇有一個引據為三句。上博《孔子閑居》沒有一個引據超過兩句。比較而言，公元前2世紀早期的馬王堆《五行》篇——遲於郭店和上博本至少整整一個世紀——卻包括一些引某首詩達四、五甚或六句的單個引據。^②這與這兩種文獻整體結構上的差異有關：眾所周知，馬王堆本與其它一些早期文本一樣分成“經”和“說”兩部分，其中，較短的核心“經”文由一些分開的章節詳細闡明。^③該特定結構或許可以說明兩種《五行》篇之間引據模式的差異，它同時也符合對於《緇衣》的推論——有可能後來的《禮記》本比早期寫本包含一些更長的引據。

兩種《五行》篇的另一區別表現在引《詩》與文本其它部分整合的情況：它們在郭店本中不是被當作引據引入而是融入哲學論爭中，馬王堆寫本卻使用了引導詞“詩曰”^④，但這並不表示郭店本的引據是沒有標記的。郭店《五行》篇除兩處之外，全都在引《詩》之後緊跟一個套語“此之謂也”——這是一種今本《孟子》和《禮記》六個章節都熟知的引《詩》模式。^⑤該模式五個例子中有四處是作為一章形式上的結尾出現的；第五個例子出現在某章中間。兩處無標記的引據則都出現在一章的開頭。因此，“此之謂也”可以被理解為是專門為了結束前面論爭的一個引據標誌。與引導詞“詩曰”的進一步區分在於，後置的“此之謂也”使引據的作用明確：被徵引的文本使論爭扼要中肯。通過該修辭手段，不

① 注意，即使包括相關《禮記》本的《坊記》和《表記》兩篇（二者同樣每章都起於“子曰”），《緇衣》仍然非常突出：儘管從篇章上看，它比其它兩篇都引人注目地短小——《坊記》有三十八章，《表記》有五十四章，而尤其是《表記》包含一系列相當長的章節——但它卻絕對包含更多的引據（總共三十八處，相對於《坊記》的二十二處和《表記》的二十四處）。

② 對該問題的充分探討，參閱柯馬丁《出土文獻中的〈詩〉》。

③ 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研究》；龐樸：《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萬卷樓，2000。

④ 注意此處與寫本《緇衣》“詩云”的不同。

⑤ 參見《禮器》、《祭義》、《樂記》、《學記》、《經解》、《喪服四制》。

是那古老的《詩》而是新的論爭得到了闡釋和證明。《詩》本身則僅是被提及的，不需要證明。當然，僅有“詩曰”的情況也一樣：《詩》在此也同樣被援引為標準文本。嚴格地說，“詩曰”和“此之謂也”是一個完整引據框架均分的兩部分，就像它偶爾出現在現有文本中那樣：“詩曰……（引文）……此之謂也（即，前述哲學論爭）。”不管一個文本是用該框架的前半還是後半，另一半則總是不言而喻的。

在郭店出土文獻中，《成之聞之》是僅有的另一篇引據明顯發揮作用的文本。首先以 6 號簡為例，有可能它上面的引據完全不是一個引據而是一個修辭工具：文本用短語“昔者君子有言曰”引入一個出處不可知的短小的類似諺語的句子。然後，同樣的引導詞再次出現在第 37 號簡上。第 7 和 8 號簡包含一些與今本《禮記·祭統》篇和《表記》篇類似的短句。但或許更值得注意的是，該文本還包括五處引《書》的例子，其中一些與現有“今文”《書》部分重疊。^①這五個引據其中四個後面緊跟“喝”的問句，而所有這五個引據都接有對引文的簡短解釋，讓人想起《春秋公羊傳》解經傳統的修辭結構。在簡 22—23 和 29—30，該模式進一步發展為由熟知的套語“君子曰”引入的一個陳述。在簡 30，這一附加引據後面仍再次承接“喝”句及另一解釋，而簡 37 同樣模式的修辭問句和簡短的回答也接於“昔者君子有言曰”的引據之後。（最後，另一個“君子曰”的例子出現在簡 36，此處沒接另一引據，也沒有緊跟修辭性的問答模式）。^②

《成之聞之》寫本這種詮釋方式表明了《書》及“君子”所言被賦予的特殊權威。它引《書》不是作為自我詮釋的證明，而是貫穿古典評注模式——一個經典文本首先被認可繼而被詮釋。換句話說，《成之聞之》呈現了“解”或“傳”的姿態。它同時也將引據與實際的論爭緊密結合在一起；這種結合很可能使之不會像《緇衣》引《詩》那樣似乎可以在不同章節間置換。

迄今我所看到的上博文集四卷中，除《緇衣》和《孔子詩論》（一個對討論《詩》有貢獻而不是在哲學論爭中引《詩》的文本），另外一個含有引據的文本就是《民之父母》。^③該

① 第 22 和 29 簡引的是《君奭》，第 38—39 簡引的是《康誥》。另一處是歸在大禹名下的五個字引據（第 33 簡），還有一個像似出自某一復名的《書》一章的標題（最後一個字是“命”）（第 25 簡）的四字引據。

② 上博文本的一個短章《昔者君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85—90、239—246 頁）同樣也兩次使用了“君子曰”。此語在現有文獻中人所熟知，如《左傳》及《禮記》的幾個篇章都有。

③ 這裏，我不考慮有破損的長篇寫本《容成氏》。該篇第 9—10、46—50 和 53 簡上包括幾段被歸於幾位古代文人名下的言論或對話。參閱《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101—102、138—142、145、257—258、286—290、292 頁。從引證其它文本的意義上說，它們並非引據。我也未將已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中的兩篇寫本算在內，即，《採風曲目》和《逸詩》。《採風曲目》的寫本提到《碩人》以及一些與今本《詩》沒有對應的詩歌標題。但並不包括這些詩歌的引據。《逸詩》的殘簡寫本就是兩首在傳統文獻中未見的詩歌文本，而不是一篇包括徵引詩歌的文章。

文本與《孔子家語·論禮》的大部分相應，而且，大體上也與《禮記·孔子閑居》的前半部分類似。^①《民之父母》起於《詩·詠酌》中由一個對句表述的問題，即子夏問孔子：一個君主“何如而可謂民之父母？”^②由此，文章分五步描述了孔子對詩、禮、樂的探討，直到他提出“三無”：“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孔子進而被請求找出《詩》中與“三無”相應的對句；之後，他以五個用押韻的小節構成的段落展開進一步論述並結束全篇。^③每一節由三段四言對句——共二十四個字——構成，而用韻在偶數句上。儘管這五小節並非引自《詩》，但卻表現了標準的詩歌特色：四言句、尾韻、重疊詞。《民之父母》（而今本《禮記》和《孔子家語》都非如此）第三節以“為民父母”作結，這樣，由於重新回到開頭所引《詠酌》，整篇文章顯得十分完滿。下面就是寫本《民之父母》與《禮記》本該部分的對照一覽表，均標出了韻尾：^④

《民之父母》第三節	《禮記·孔子閑居》第五節
無聲之樂，施及孫 _子 。	無聲之樂，氣志既 _起 。
無體之禮，塞於四 _海 。	無體之禮，施及四 _海 。
無服之喪，為民父 _母 。	無服之喪，施於孫 _子 。

總之，《民之父母》與它對應的《禮記》本與《孔子家語》本有許多文本上的差異，包括附加短語、語法詞以及書寫和詞彙變體等。這些差異加在一起已遠非文本秩序的某種無意混淆。^⑤當下探討的一個獨特且非常有趣的地方在於，詞彙變體甚至擴展到韻語。此點最有力地說明，兩種文本間的差異或是有意組織結構（後來的編纂者改造早期文本）的結果，

- ①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15—30、149—180 頁。《禮記》該卷與《民之父母》對應的一段後面緊接的是另一段包括另外四個引據。這一段也佔據了幾乎半卷《孔子閑居》，但《孔子閑居·論禮》中祇有它的一部分。我認為《孔子閑居》這後半有可能原來是獨立的文本。換句話說，即《民之父母》所含文本本身是全面的，並非殘卷，也不是原來與《孔子閑居》後半的合成。
- ② 《民之父母》與《禮記》、《孔子家語》本不同，在子夏引《詠酌》之前沒有關於子夏與孔子對話情況的一個引導式短語。（在文本的頭一簡上，估計祇缺“子夏”的“子”字；這樣，第一簡長短與其它簡（特別是文本最長的簡 5、7、8）相同。）
- ③ 從第 8 簡開始，文本引《大雅·昊天有成命》的一個對句以及《邶風·柏舟》的一個對句的前半。由於第 9 簡上半部分裂損，這一部分幾乎可以肯定包括了《柏舟》引文的下句以及另一個引自《邶風·谷風》的對句。注意，今本各個文本祇引《昊天有成命》的一個單句，而《民之父母》卻引了整個對句。
- ④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28、172—173 頁。兩種文本該部分的小節排序是不同的，寫本第三節對應《禮記》本第五節。總的來說，即《民之父母》的 1—2—3—4—5 小節在《禮記》本的對應位置是 1—4—5—2—3。《孔子家語》祇包括《民之父母》的一、五兩節（《禮記》本的一、三兩節）。
- ⑤ 《民之父母》該部分每節二十四個字與《禮記》本排序的差異似乎恰可歸入夏含夷的假定，即後來的編纂者在安排現有文本章節時，是通過處理一串失去繩綫因而毀掉了原來章節順序的單個竹簡進行的。注意，就像對待《緇衣》的情況，學者們指出《民之父母》章節安排優於今本，所以暗示其結果是由於早期承傳過程中某種程度的退化或意外造成的。但請參閱我上文注 22 中對夏含夷的推論的批判。

或者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本傳統。但不管哪種情況，詞彙差異的確存留在文本固定的形式框架中。與其它四節一樣，該節保留它固定的韻部：儘管《禮記》本和《民之父母》包含一些完全不同的句子，但兩種文本都用純粹的“之”部押韻。^①《孔子閑居》第四節與對應的《民之父母》第二節之間幾個主要的不同，進一步表明詞彙變化是在穩定的形式中發生的：

《民之父母》第二節	《禮記·孔子閑居》第四節
無聲之樂，塞於四方。	無聲之樂，日聞四方。
無體之禮，日逮月相。	無體之禮，日就月將。
無服之喪，純德同明。	無服之喪，純德孔明。

該節各種變體中，祇有“相”和“將”擁有同位聲母和相同的韻母，可作為假借字（而不需要被解釋為詞彙變體）。不過，有趣的是兩個屬詞彙變體的“逮”/“就”以及“孔”/“同”都僅是聲母不同，韻母卻相同。這再一次表明整體上對形式（聽覺接近）的關心超出了真正詞彙的差異。從某種程度上說，該觀點更為適用於《孔子家語·論禮》，該章第二節對應《民之父母》第五節和《禮記·孔子閑居》第三節：

《民之父母》第五節	《禮記·孔子閑居》第三節	《孔子家語·論禮》第二節
無聲之樂，氣志既從。	無聲之樂，氣志既從。	無聲之樂，所願必從。
無體之禮，上下和同。	無體之禮，上下和同。	無體之禮，上下和同。
無服之喪，以畜萬邦。	無服之喪，以畜萬邦。	無服之喪，施及萬邦。

《民之父母》和《禮記·孔子閑居》的一、三對句都表現出與《孔子家語》明顯的詞彙差異。然而，儘管有這些句法和意義上的不同，這兩個不同的版本仍然具有相同的韻字，即“從”和“邦”。

總之，《民之父母》與其對應今本的不同，起碼有三點值得注意：其一，它比兩個今本更鮮明地注重《詩·詠酌》，即，首先以《詠酌》開篇，然後在最後押韻段再次提到該詩的“民之父母”這一概念，正是這兩處徵引構成了《民之父母》全篇的基架。相反，兩種今本則不包含第二處徵引，《禮記》本和《孔子家語》本該章實際上也都不是以含五節的押韻段結尾的。^②其二，在對《昊天有成命》的徵引上，寫本引了一個對句——引《詩》的標準形式——而兩個今本卻祇引了一個單句。其三，寫本最後一段以有《詩》的風格的對句構成，甚至跨越一系列詞彙變體而表現出詩歌形式的穩定性。

① 兩個版本中的韻詞都屬於“之”部：《民之父母》中的“子”、“海”、“母”和《禮記·孔子閑居》中的“起”、“海”、“子”。

② 寫本中，該篇結尾是由一個“L”形的黑鉤標記出來的。

四、嘗試性結論

郭店與上博結集的各种文本，祇有少數我們可以證明後來的傳承歷史：今本《周易》承續了上博文集的一個《周易》本；郭店《老子》初本延續到今本《老子》（其間經由馬王堆寫本《老子》）；郭店《五行》篇由馬王堆《五行》篇承續；《緇衣》郭店、上博寫本延續到今本《禮記·緇衣》；《孔子家語·論禮》與《禮記·孔子閑居》二者都承續了上博的《民之父母》。^①雖然臆設“道家”文本和“儒家”文本涇渭分明的區分確實太簡單，但在我看來，《周易》和《老子》的宇宙論思想使之應該區別於其它四種文本，也大概使它們相關於另一不同的知識傳統和社群。（與其它學者一樣，我估計郭店《老子》丙篇與談宇宙發生的《太一生水》有同樣的竹簡形式並非偶然，而有可能暗示它們曾屬同一個文本。）除了《周易》和《老子》以外，郭店和上博寫本當中僅有三篇可以證明擁有更為後來的傳承歷史的文本恰是引《詩》的。如同上面已詳細論證的那樣，兩種《緇衣》寫本與《民之父母》比之它們的今本與《詩》都有更緊密的聯係。寫本都是引《詩》以提供完美君權的典範。在《民之父母》中孔子談到“三無”時，實際上子夏所問“何詩近之”也意在請求徵引明確的詩句。換句話說，正是《詩》——就像《緇衣》徵引《文王》——樹立了聖人的楷模，且使之成為不斷效仿的典範。

相反，我們無法瞭解僅引《書》而且將其置於某種詮釋框架下的《成之聞之》的情況。當然，考慮到上博、郭店文獻的各种特點，我們不應忘記，所有推論都僅取證於兩個地方出土的有限文獻。而且，這兩個古墓在時代和地點上都相隔甚近，且有可能屬於同一知識團體。然而，這一有限的證據卻表明，由引《詩》而緊密結構在一起的文本傳承的希望會更大；但卻不能說類似的情形會發生在引《書》結構的文本上。這當然不是說後一類型的文本不會承傳。畢竟，公元前3世紀後期出現了一個經典《書》文集，而且也有一些像《禮記·學記》這樣一連串引《書》卻未有一處引《詩》的文本。更何況，還有無數不含任何引據的古代傳世文本。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推測，對文本來說，引《詩》有可能提高更廣泛的共時流傳和長期的歷史傳承的機遇。

詩歌形式的力量是使《詩》與徵引它的文本緊密結合在一起且同時賦予二者一致性和

① 這裏，我沒有包括上博楚簡中的《內禮》寫本。該寫本總共十條簡中，前六條部分與《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的前幾行有重疊之處，也與《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有簡短重複。第8簡也與《禮記·曲禮》有一處短小雷同。但即便與《大戴禮記·曾子立孝》中的重複也極為有限；另外，較之《內禮》寫本，現有文本明顯較短，結構和意義也顯然不同。尤其，《曾子立孝》也並不遵從寫本那種嚴格的對應和有節奏的結構；此外，《內禮》寫本包含後來出現在不同禮書中的寫本斷章，不可將之與現有禮儀傳統中的某一特定文本相聯。反過來，《曾子立孝》則很像後來把拆用的《內禮》寫本章句與其它資料結合而形成的文章，而絕不是從《內禮》文本直接發展而來。

持久性的一個方面。今本《書·堯典》（僞《古文尚書·舜典》）談論音樂，並且涉及詩歌言說及其獲得長久記憶的方式兩方面的內容^①，其對“詩言志，歌永言”的宣稱並非微不足道。同樣不可忽視的是這段話被歸於古聖王典範舜的名下，而《堯典》正式編纂（如果說不是實際創作）的年代應為戰國後期或秦帝國時代，即離上博、郭店文獻的創造時代不遠。^②所有三個引《詩》的古代寫本——《緇衣》、《五行》、《民之父母》——都是以極為公式化的節律構成的：《緇衣》表現一種完全固定的孔子言論形式，包括它以引據作結的一致性結構；《五行》則以一系列螺旋式、頌歌般的有節律的語言闡釋“五行”；《民之父母》同樣基於數理的安排——“五至”、“三無”、“五起”——最後以上面探討的“五起”的詩式語言結尾。

該公式化手段使意義鑄於確定的形式中，即便在詞彙變異的情況下也有助於文本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它們在結構上類似於《詩》引據所嚴守的形式；比較而言，經歷同樣詞彙變異的引《書》的句子就不會拘於形式上的限制而保持原初的語言。能夠確保詩句及其它嚴格的公式化表達都不會瓦解的不僅僅是他們單獨的形式，最重要的是恰屬同樣形式的一系列其它表達對此形式的嚴守一致。確實，早期中國文本穩定性的產生也還有其它重要的因素，但一句詩長度或節奏的變化將改變整首詩的平衡，《五行》或《民之父母》一個短語的公式化結構的變動將會推翻整個論點，仍是值得注意的。（形式不同導致意義差別的一個絕佳的例子是《曾子立孝》中的前幾行，以及《大戴禮記·曾子立孝》中與之相應的章節。）這兩種情況都表明，文本的整體性維繫在所有部分反復、循環的連貫性上。這一點對《緇衣》單一章節整體而言同樣也是正確的：章節內每一部分的順序都是固定的。這種“詩式語言”——我在最寬泛的意義上用這個詞來指涉在美學意義上被組織、強化的特定語言模式——實質就是口頭語言的表達和接受現象。這並不是說，像《五行》、《緇衣》或《民之父母》這些文本只以口頭形式流傳，但這確實意味著，甚至在書面文本可以獲得（或容易寫出）的情況下，誦讀和記憶的需要與習慣仍是這些文本最一致的特點和標誌。另外，它意味著口頭語言的詩歌形式對哲學論爭本身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正如當下討論的這些文本充分證明的那樣，句法和節奏組織的種種特定模式與即將展開的論爭的推理過程無法分割地交織在一起。最後，甚至在寫本充分出現的早期文化中（我們姑且謹慎假定為），文本結構留存的誦讀和記憶的習慣必然也會支配文本的流通和傳承過程，既保持形式的連續性

① 這裏，“永”的兩個意思是在唐代《尚書正義》中就已獲知的。

② 關於《堯典》的年代研究，參閱金谷治《秦漢思想史研究》，第二次修訂本，平樂寺書店，1992，353—374 頁；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40—168、272—273 頁；陳夢家：《尚書通論》，中華書局，1985，135—146 頁。

也維持總體語言的穩定性。^①

我認為，使《民之父母》、《緇衣》和《五行》能夠長久存在既而獲得歷史傳承的第二個因素乃在於，與《詩》密切相關的文本成為追念和模仿《詩》本身被認為所體現的過去典範的最佳典型。如同《詩》尊崇古代典範，《詩》也如此成為引《詩》的文本膜拜和效仿的典型。戰國時期各種文本（包括寫本）絕大多數都徵引本質上是紀念頌詩的《雅》、《頌》，這不僅僅是一種巧合。與其它文本相比，引《雅》、《頌》更經常地被用來追溯周朝治國的源頭，服務於戰國儒學的真正意圖——尋求歷史的指引，使古老的典範成為當下國家治理的方針。圍繞引《詩》結構一篇文本意味著，該文本將穩固地與《詩》的文本譜系聯係在一起，繼而承續對聖賢崇高而正式的紀念；它同樣也意味著賦予該文本無可置疑的權威。

詩歌表達的力量，紀念的意味，援引傳統權威，這一切都保護了戰國哲學著作免於隨意衰變和消失的危險。然而，同樣應該指出的是，無論《緇衣》還是《民之父母》都對《詩》不提供固定的解讀方法。它們並不說明《詩》，而是將《詩》展現為自明和擁有權威的文本。不是《詩》受到哲學語言的詮釋和說明，而是引《詩》以闡明和確證哲學論點。這是《緇衣》和《民之父母》與馬王堆《五行》篇和上博《孔子詩論》二者都有區別的地方。後兩篇不僅僅引《詩》作為效仿的一般典範，而是讓古老的詩歌服從某種特定、明確的詮釋模式。該模式在公元前3至2世紀廣為人知，這一點可從散布在一些現有文本中的迹象得到證實。^②但由於公元前一世紀後期，《五行》和《孔子詩論》發展起來的解經學逐漸喪失地位，先是受到“詩三家”的蔭蔽，最後終於湮沒在《毛詩》傳統下。後者雖僅在西漢平帝時（公元前1—公元6）才被官方經典化，卻在之後的兩個世紀逐漸崛起，到東漢末年已基本暗蔽了所有其它諸家。或許正是這一歷史演進過程結束了《五行》和《孔子詩論》的流傳與延續。確實，《孔子詩論》以及很大程度上馬王堆《五行》“經／說”也是如此，它們早期擁有的眾多聲望和傳承不僅僅是因為引《詩》，而且有賴於得力的詮釋；但當該詮釋傳統一旦不再被接納，這兩個文本必然就招致冷落或者簡單地被遺忘了。許慎《說文解字》^③和鄭玄《毛詩傳箋》等著作對《毛詩》傳統新的地位的確立和鞏固，使《五行》和《孔子詩論》的解經模式變得滯後。相比之下，《緇衣》和《民之父母》將《詩》融入哲學論爭的做法，卻足夠靈活普遍地適用於新詮釋。因此，就在《五行》和《孔子詩論》逐漸消湮的年代，《緇衣》和《民之父母》卻雙雙並入《禮記》。

（何金俐 譯）

① 也請參閱我在《分析中國古代文本變體和書寫文獻產生模式的方法論反思》和《根據近期出土文獻看中國古代詩學》中的討論。

② 柯馬丁：《根據近期出土文獻看中國古代詩學》以及《西漢美學與“賦”的產生》（“Western Han Aesthetics and the Genesis of the Fu”），《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63卷2期，2003，383—437頁。

③ 這裏，我想到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引《詩》作注時有許多用的是《毛詩》的解讀。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 楚竹書《從政》篇研究（三題）^①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陳劍

內容提要 本文從三個方面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從政》篇作了研究。“一、簡文補釋兩則”釋甲篇簡8的“滷則失衆”爲“鹽（嚴）則失衆”，釋乙篇簡1的“口惠而不係”爲“口惠而□（原有脫文）不係（繼）”。“二、關於《從政》與《論語》”，補充指出了《從政》中跟《論語》很接近的文句；對甲17—甲18的一段話跟《論語》相關內容的關係作了進一步分析。認爲《從政》跟今傳《論語》之文有關的內容，可能是根據《論語》的原始材料或相關材料，也可能是根據當時流傳的《論語》別本。“三、關於《從政》與‘子張之儒’”，不同意《從政》“本來應該是《子思子》中的一篇”的看法。補充指出了《從政》篇中與子張有關的材料並加以分析，認爲《從政》篇可能屬於“子張之儒”的作品。

關鍵詞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從政》 字詞考釋 《論語》 子張之儒

一、簡文補釋兩則

（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從政》簡甲8—甲9^②：

① 本文係第三屆國際簡帛研討會（Mount Holyoke College, U. S. A., 2004年4月23—25日）論文。本文受到“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作者專項資金資助項目”（FANEDD）資助（項目批准號：200311）。

② 張光裕：《〈從政〉甲、乙考釋》，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以下簡稱“《上博（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聞之曰：從政有七幾：獄則興，威則民不道，滷則失衆，恠（猛）則無親，罰則民逃，好[刑]^①【甲8】□則民作亂。凡此七者，政之所恠（殆）也。……【甲9】

其中“滷則失衆”的“滷”字原作如下之形：



原考釋云：“从水，其右旁有異於‘西’，釋暫缺。”何琳儀先生釋為“洒”，謂“洒當訓‘散’或‘播’，亦作‘灑’。”^②陳秉新先生亦釋為“洒”，訓為“高峻”^③。按不論是訓“散”或“播”或“高峻”，其實都是無法講通簡文的。周鳳五先生釋右旁為從“舟”，謂“此字從水，舟聲，可以讀為轉張、譸張，訓‘誑也’，見《尚書·無逸》。簡文是說，為政者如果欺誑不實，就會失去民心”^④。周先生所引字形上的證據，即《包山楚簡》簡276“受”字所從的“舟”形，蘇建洲先生已經指出跟簡文“滷”字右半所從並不相同。^⑤

黃錫全先生指出：“戰國文字‘西’與‘鹵’每每混同，不易區分。如包山楚簡的鹽（鹽）、鹽等字，所從的‘鹵’有的就與‘西’字寫法一模一樣。”他據此釋此字右半為“鹵”，此可從。但他認為“𩚑”就是見於《玉篇》、《集韻》的“滷”字，同“鹵”，訓為“鹵莽”^⑥，卻不可信。其所引以為說的《莊子·則陽》的“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鹵莽”、“滅裂”都應該是疊韻連綿詞^⑦，我們在古書中，實際上是找不到“鹵”字單用就有“鹵莽”義的例子的。

我們認為，簡文“滷”字與字書中音“郎古切”、訓為“苦”的“滷”字其實無關，兩字僅是同形字的關係。簡文“滷”其實應是“鹽”字異體。

① “刑”從陳偉先生《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從政〉校讀》說補，其所從“井”尚隱約可見。陳文見簡帛研究網站，2003年1月10日，<http://www.jianbo.org/Wssf/2003/chenwei01.htm>。

② 何琳儀：《第二批滄簡選釋》，《學術界》2003年第1期，88頁。

③ 陳秉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補釋》，《江漢考古》2004年第2期，90頁。

④ 周鳳五：《讀上博楚竹書〈從政〉（甲篇）札記》，簡帛研究網站，2003年1月10日，www.jianbo.org/Wssf/2003/zhoulengwu01.htm。後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181—195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下引周鳳五先生說皆見此文。

⑤ 蘇建洲：《上博楚竹書（二）考釋四則》，簡帛研究網站，2003年1月19日，<http://www.jianbo.org/Wssf/2003/sujianzhou05.htm>。蘇文同意何琳儀先生釋“洒”之說。

⑥ 黃錫全：《讀上博楚簡（二）札記（壹）》，簡帛研究網站，2003年2月25日，<http://www.jianbo.org/Wssf/2003/huangxiquan01.htm>。後以《讀上博楚簡（二）札記八則》為題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460頁。

⑦ 朱德熙：《長沙帛書考釋（五篇）》，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5，206—207頁。朱先生指出，“莽字《廣韻》有‘莫補切’一讀，先秦時期也常與魚部字叶韻”，“鹵莽的莽也讀如魚部字”。

戰國文字中“鹽”字多作“𩇛”形，見於包山簡 147^①、上博竹書《容成氏》簡 3 等。或上半增从“水”作如下之形：



可隸定作“𩇛”。此字見於齊“亡𩇛右”戈（《殷周金文集成》17·10975），黃盛璋先生釋為“鹽”，“亡鹽”即齊地“無鹽”，^②其說久已得到公認。“𩇛”字“从水从𩇛或从𩇛从皿，是𩇛的繁構”。^③

衆所周知，戰國文字中省略偏旁的現象非常多見^④，“𩇛（鹽）”形省略“皿”旁，就成為簡文“𩇛”字了。“𩇛”既可釋為“鹽”，則在簡文中顯然當讀為“嚴”。從讀音來看，兩字古音韻母相同（韻部都是談部，中古都是開口三等字），其聲母“嚴”為疑母，“鹽”為余母，也有密切關係。諧聲系統中不少余母字跟舌根音有關，如“穎”、“穎”為余母字，其聲符“頃”及同聲符的“傾”等則是溪母字；“姬”（見母）从“臣”（余母）聲，“君”（見母）从“尹（余母）”聲，“愆”（溪母）从“衍”（余母）聲，等等。見於秦文字並為後世所延用的“鹽”字，應即在“𩇛”形基礎上加注聲旁“監”而成（“監”跟“𩇛”可以看作共用“皿”旁），“監”字本身也就是舌根音見紐字。此外如“與”（余母）字本从“牙”（疑母）聲，其聲旁後來寫作“与”的就是“牙”之變形^⑤，更是說明“鹽”、“嚴”相通的聲母關係之佳證。

古書中“嚴”常用為“威嚴”義，引申為“嚴厲”、“嚴急”（《說文·卩部》：“嚴，教命急也。”），可跟“寬”相對為言。如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敬而起之，惠以聚之，寬以治之，有嚴不治。”《鹽鐵論·周秦》：“故政寬則下親其上，政嚴則民謀其主。”而在《論語》中，“寬則得衆”之語兩次出現（《陽貨》、《堯曰》），正跟簡文“嚴則失衆”之語相反相成。

前引此段簡文還有兩處需要作一些補充討論。“恟”字原考釋引《說文》“恟，憂也”與《詩·小雅·頍弁》“未見君子，憂心恟恟”為說。我們以前將它釋為“猛”，謂：“‘猛’即‘威而不猛’之猛，《左傳·昭公二十年》云：‘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

① 參看林澧《讀包山楚簡札記七則》，《江漢考古》1992年第4期，收入《林澧學術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20頁。劉釗：《談包山楚簡中“煮鹽於海”的重要史料》，《中國文物報》1992年10月18日，第43期第3版。

② 黃盛璋：《燕、齊兵器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中華書局，1992，30頁。

③ 趙平安：《戰國文字中的鹽及相關資料研究》，《華學》第六輯，紫禁城出版社，2003，107頁。

④ 參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刪簡偏旁”、“刪簡形符”部分，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205—206頁。

⑤ 裘錫圭：《讀〈戰國縱橫家書釋文注釋〉札記》，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84—85頁。

以濟寬，政是以和。’可與簡文講‘從政’的‘猛則無親’參讀。”^①但在讀音方面僅說“‘丙’與‘猛’音近可通”，而未舉證，引起其它研究者的懷疑。^②今按郭店《老子》甲本簡33“攬鳥獸獸弗扣”，“獸”今本作“猛”。“獸”字从“丙”字增“口”形的繁體為聲符，與“猛”同从“犬”為義符，應即“猛”字異體。此可為簡文“怵”之讀為“猛”之佳證。从“丙”之字跟“猛”相通，跟“陌”、“貊”之从“百”聲相類。

簡文“怵”字原讀為“治”，周鳳五先生主張讀為“殆”，云：“簡文‘七機’指的是為政者的七種不當措施以及所招致的七種不良後果……‘七機’的用語與價值判斷都是負面的，則讀作‘政之所治’，意指七機能使政治清明，顯然是不妥的。簡文應當改讀為‘政之所殆’。殆，危也。《論語·微子》：‘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用語與簡文類似，可為旁證。”其說可從。另可補充一證：《逸周書·命訓》云：“極命則民墮，民墮則曠命，曠命以誠其上，則殆於亂；……極福則民祿……；極禍則民鬼……；極醜則民叛……；極賞則民賈其上……；極罰則民多詐，多詐則不忠，不忠則無報。凡此六者，政之殆也。”與簡文相近。

（二）《從政》簡乙1：

……[九]曰犯人之務，十曰口惠而不係。……【乙1】

原考釋已引《禮記·表記》：“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以及《郭店楚墓竹簡·忠信之道》第五簡：“口惠而實弗從，君子弗言尔”，謂與簡文“口惠而不係”“意同”。

“係”字原作如下之形：



徐在國先生認為此字應該釋為“繇”，讀為“由”，訓為“從”。^③他引曾侯乙墓竹簡“𣎵”、“𣎵”、“𣎵”諸形為證，這些字所从的“𣎵”的象形初文訛變為“係”形（是由“𣎵”形即“繇”、“繇”中的“𣎵”形再進一步訛變而來的），跟簡文確很接近，因此

① 陳劍：《上博簡〈子羔〉、〈從政〉篇的竹簡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簡帛研究”網站，2003年1月8日，<http://www.bamboosilk.org/Wssf/2003/chenjian01.htm>。《文物》2003年第5期，56—59、64頁。周鳳五先生主張讀為“梗”，引《方言·二》“梗，猛也”、《廣雅·釋詁》“梗，強也”為說，謂“簡文是說，為政如果剛猛強悍，人民就不親附”，對簡文的理解跟我們大致相近。

② 單周堯、黎廣基先生云“‘猛’字古音明紐陽部，與‘怵’字之幫紐相距較遠”，主張讀為強迫之“迫”。見單周堯、黎廣基《讀上博楚竹書〈從政〉甲篇“怵則亡新”札記》，簡帛研究網站，2003年1月22日，<http://www.jianbo.org/Wssf/2003/shanli01.htm>。此外，徐在國先生主張讀為“妨”訓為“害”，“意為傷害則失去親近”，見徐在國《上博竹書（二）文字雜考》，《學術界》2003年第1期，102頁。

③ 徐在國：《上博竹書（二）文字雜考》，98—99頁。

釋爲“繇”在字形上不能說沒有根據。但問題是簡文講不通。

徐先生引《論語·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鄭玄注“由，從也”爲證，表面上將簡文跟《忠信之道》的“口惠而實弗從”相對應聯繫了起來。但從意義上講，“口惠而實弗從”的“從”意爲“跟從”，而“民可使由之”之“由”意爲“經由”，其所訓爲的“從”，實爲“由從”、“自從”之從、所從來之“從”，與跟從之“從”意義並不相同。在古書中，恐怕實際上也是找不到“由，從也”之“由”用爲“跟從”義的例子的。

“口惠而不係”跟“口惠而實弗從”、“口惠而實不至”相當，“係”所表示的詞的意義似乎跟“實從”、“實至”這樣的主謂結構相當，這是不大可能的，實際上也找不到這樣的詞。要講通此句，首先要承認“不”上脫漏了一個“實”一類的字。脫字之例竹書中並不罕見，如郭店簡《緇衣》簡40、《語叢四》簡27都有正面抄脫數字、補於簡背的例子。^①脫漏一字的也有，如上博竹書《子羔》簡1“昔者而弗世也”，劉信芳、孟蓬生先生都將“世”解釋爲“（父子）世襲”之意，即《禮記·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之“世”，是很正確的。^②“昔者而弗世也”，“而”上顯然抄脫了一個“禪”、“讓”一類的動詞。^③

我們是同意張光裕先生釋爲“係”的，字形上還可補充證據，如馬王堆漢墓帛書的“係”字，“系”旁或作與“人”旁相連之形，跟簡文之形很接近。^④簡文“係”當讀爲“繼續”之“繼”。

“係”和“繼”讀音、意義都很相近，兩字常有通用關係。《爾雅·釋詁上》：“係，繼也。”古書中“係嗣”與“繼嗣”義同。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係心”注：“係，古文繫、繼二形。”《周易·坎》上六爻辭“係用徽纆”，《穀梁傳·宣公二年》注引作“繼”。“係”與“繫”常通用無別，而“繫”跟“繼”也常通，如《詩經·召南·何彼禮矣·序》“車服不繫其夫”《釋文》：“繫，本或作繼。”《爾雅·釋蟲》有“密肌，繼英”，《釋鳥》又有“密肌，繫英”，“繼英”、“繫英”當同。^⑤《周易·繫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馬王堆漢墓帛書《繫辭》八行上作“係”。^⑥帛書以“係”爲繼續之“繼”，跟簡文用字習慣相同。

①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136頁注釋103、219頁注釋26所引“裘按”，文物出版社，1998。

② 劉信芳：《上博藏竹書試讀》，《學術界》2003年第1期，96頁。孟蓬生：《上博竹書（二）字詞札記》，簡帛研究網站，2003年1月14日，<http://www.jianbo.org/Wssf/2003/mengpengsheng01.htm>。後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473頁。

③ 補記：白於藍先生《讀上博簡（二）札記》已謂：“筆者以爲該句中‘者’與‘而’字間很可能漏寫一‘禪讓’之‘禪’字或與‘禪’字義相近的字。郭店簡《唐虞之道》簡有‘禪而不傳’語，可與本簡之‘[禪]而弗世’參照。”我寫作本文時已讀過白於藍之文，但因疏忽而失引。白文後來發表於《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485頁。

④ 參看陳松長編著《馬王堆簡帛文字編》334頁“係”字前兩形，文物出版社，2001年6月。補記：後來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周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按此書實際到2004年4月市面上才見到）中此類寫法的“係”字多見，字形上已無需多加論證。

⑤ 以上參看朱祖延主編《爾雅詁林》222—226頁引諸家說，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⑥ 傅舉有、陳松長編著：《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118頁。

繼續義之“繼”用作動詞，可以理解為“以……繼續於……之後”之意。《左傳·桓公十二年》：“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信不繼”據下文可以補足文意變換為“盟而信不繼”，與簡文“口惠而[實]不係（繼）”的說法很相近。

二、關於《從政》與《論語》

《上博（二）從政》的原“說明”部分已經指出，本篇內容“可取與《論語》、《禮記》等儒家典籍及睡虎地出土秦簡《為吏之道》比觀”，在考釋中並隨文指出了多處簡文內容跟《論語》的聯係。後來研究者又揭示出，本篇甲 15+甲 5+甲 6+甲 7 一組簡文中的“毋暴、毋虐、毋賊、毋貪”等內容，跟《論語·堯曰》第二章“子張問從政”的“屏四惡”很接近（詳後文）。由此，《從政》與《論語》的關係問題，自然為我們所關注。

首先，在已為整理者和其它研究者所指出者之外，《從政》中還可以找到跟《論語》很接近的話。簡文甲 19 云：

聞之曰：行險至(致)命；飢寒而毋會，從事而毋訕；君子不以流言傷人。

其中的“行險至(致)命”，原考釋引《禮記·中庸》“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幸”為說。周鳳五先生謂“……‘行險’，指行於險地；‘致命’猶如《論語·憲問》‘見危授命’的‘授命’，必要時‘殺身成仁’的意思。”按《論語·子張》首章云：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與簡文同，較引《憲問》的“授命”為說更加貼切。簡文“行險致命”顯然也應該理解為“行危險之事要（準備）獻出生命”^①，跟《子張》的“見危致命”大致相同。請注意，這話在《論語》中是出自子張之口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後文還會討論到。

第二，周鳳五先生曾推測說：

我們不妨假設，《從政》是儒家學者傳習《論語》或《論語》原始材料的紀錄……

《從政》甲、乙篇可能與《論語》有關，其內容可能是“七十子之徒”或其後學闡述《論語》或相關材料的紀錄。

① 陳美蘭亦引《禮記·中庸》“小人行險以僥幸”為說，釋簡文為“行險會導致送命”。雖然對“行險”跟“致命”的關係的理解與我們不同，但亦以“行險”為“行危險之事”而非“行於險地”。見陳美蘭《〈從政〉譯釋》，載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85 頁。

我們覺得，因為《從政》篇殘損頗為嚴重，現存簡文還有不少地方文意尚不清楚，文意大致清楚的部分，也有不少內容跟《論語》關係不大。因此是否可以將《從政》全篇都說為“儒家學者傳習《論語》或《論語》原始材料的紀錄”，我們還沒有太大把握。但如果僅就《從政》中可以確定跟《論語》有關的內容講，周先生的判斷是成立的。下面我們再通過具體分析一個例證來作一點補充。

簡文甲 17—甲 18 的一段話，跟《論語》相關內容的關係有特別值得玩味之處。簡文云：

[君子先]人則啓道之，後人則奉相之，是以曰君子難得而易史（使）也，其史（使）人，器之；小人先人則_毀敵之，[後人]【甲 17】則_毀毀之，是以曰小人易得而難史（使）也，其史（使）人，必求備焉。……【甲 18】

其中“是以曰君子難得而易使也，其使人，器之……是以曰小人易得而難使也，其使人，必求備焉”幾句，張光裕先生已引《論語·子路》中“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與簡文相對照，是很正確的。

進一步研究，首先可以確定的是，簡文是對《論語·子路》所記孔子之語的進一步解釋。對比《論語·子路》，簡文多出“君子先人則啓道之，後人則奉相之”、“小人先人則_毀敵之，後人則_毀毀之”兩句。不難看出，這兩句正是分別對其後的“君子難得而易使也”和“小人易得而難使也”的發揮和解釋。楊澤生先生指出，上引簡文較《論語·子路》文多出的“君子先人……”兩句，可以跟《荀子·不苟篇》的以下內容對讀：

（君子易知而難狎……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敬縛紕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不能則妒嫉怨誹以傾覆人……

並謂：“簡文中的‘先人’、‘後人’與《荀子》中的‘能’和‘不能’相當，‘啓道之’與‘開道人’相當，‘奉相之’與‘恭敬縛紕以畏事人’相當，‘陷（引者按：楊澤生先生主張簡文此字釋讀為“陷”）毀之’與‘妒嫉怨誹以傾覆人’相當。”^①這些意見顯然是正確的。君子不管能或不能，不管領先於人或落後於人，都能與他人很好地相處，所以“易使”即容易使喚、容易派給他工作，小人則正好相反。（下文略而祇說“君子”這方面）

簡文的兩個“是以曰”也值得注意。《荀子·大略》云：

① 楊澤生：《〈上海博物館所藏竹書（二）〉補釋》，“簡帛研究”網站，2003年2月15日，<http://www.jianbo.org/Wssf/2003/yangzesheng02.htm>；又見楊澤生《上博竹書考釋（三篇）》，張光裕主編《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2003，283頁。

……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君子難說”云云顯然也來自前引《論語·子路》文所記孔子之語，用“故曰”引出，正跟簡文的“是以曰……”相類，都是對孔子之語的發揮解釋。因為“君子”明達事理，所以難以非其道者悅之，不可不以誠心事之。

其次，簡文之意其實還有跟《子路》文很不相同之處。《子路》原文是說，君子容易事奉、容易在他手下做事，而難以討得他的歡喜。簡文卻是說，君子難以得到，而容易使喚、容易派他做事。《子路》之文和簡文分別觀之，各自都是十分通順的。可是由於它們整體上的一致性，以及簡文所表現出的闡釋發揮《子路》之文的特點，二者的關係又難以否認。這個矛盾該如何解釋？

仔細對照，簡文“難得而易史（使）”、“易得而難史（使）”分別對應於《子路》“易事而難說”和“難事而易說”，“得”與“說”相當，“使”與“事”相當。我們知道，雖然當時“史（使）”跟“事”二字已經分工明確，但它們本係一字分化，字形和讀音都很接近，意義也有密切關係。而“得”跟“說”，也是可以找到其關係的。

“得”字古有“（人跟人之間）親悅、投合”一類意思，就是後世常說的“與某人相得”、“相得甚歡”之“得”。《左傳·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杜預注：“得，相親說也。”又如：《左傳·桓公六年》：“少師得其君。”《潛夫論·交際》：“得則譽之，怨則謗之。”《論衡·書虛》：“葵丘之會，桓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睚眦不得，九國畔去，況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肯留？”《字彙·彳部》：“得，又合也，人相契合曰相得。”

由此我們可以設想，《論語·子路》記載的孔子所說“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等語，流傳過程中可能有過諸如“君子易事而難得也”、“君子易事之而難得之也”、“君子事之易而得之難也”一類的變化，或是最初就有這一類的說法與之並存。其中的“得”字本為“相親說”之意。但是由於“難得”、“易得”最習見的用法是表示“難以得到”、“容易得到”，流傳過程中遂產生誤解，“君子難得”等之“難得”被理解為諸如《禮記·儒行》“（儒）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一類的“難得”，“事”也被改成了形音皆近的“史（使）”（“易使”之說也常見，如《論語·陽貨》：“……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論語·憲問》：“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從政》之文，就是據已被誤解成了“難以得到卻易於使派”之意解釋發揮的，結果造成上下文臆斷為兩橛：《子路》之文本係圍繞“君子易事而難說”展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是說明“難說”的，“及其使人也，器之”是說明“易事”的（因為君子根據各人的材器使派人，所以手下人易於事奉他），意義連貫。而《從政》之文，“君子難得而易使”是說使派君子，

“其使人，器之”又是說君子使派人，文意就不如《子路》之文連貫了。

據以上分析，可以肯定《從政》此處解釋闡發《論語》之文，其所據不同於今傳《論語》。後文要引到的簡文“四毋”，也是跟今傳《論語》相關之文有密切關係但又並不完全相同，陳偉先生據此認為：“簡書也許屬於今傳《論語》的祖本系統，或者是與之並行的另外一系。”^①《論語》的具體成書年代雖無定論，但從近年學者據郭店簡等研究所得結論來看，在《從政》寫成的時代，《論語》應該已經成書並且流傳。^②看來，《從政》跟今傳《論語》之文有關的內容，可能是根據《論語》的原始材料或相關材料，也可能是根據當時流傳的《論語》別本。

三、關於《從政》與“子張之儒”

《韓非子·顯學》說“自孔子之死也”，“儒分爲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從政》無疑出於儒家後學，那麼究竟應屬於哪一派呢？下面就來討論這個問題。

楊朝明先生認為，《從政》“本來應該是《子思子》中的一篇”。^③對這一判斷，我們表示懷疑。

楊先生此說的理由主要有三條。首先是認為簡文多見的“聞之曰”與“子曰”相同，“後面所引述的應該是孔子的話”，而“以‘聞之曰’的方式敘述孔子學說，非子思莫屬”。其第二條理由跟第一條密切相關，認為簡文的結構係每一節以“聞之曰”起始，集中論說一個主題，彼此相對獨立，“跟現存《禮記》中的《子思子》四篇（即《坊記》、《中庸》、《表記》、《緇衣》）進行對照，其結構完全一樣”。

這兩條理由的關鍵在於“聞之曰”就同於“子曰”，這個推論很成問題。簡文中確有“聞之曰”後面的話係出自孔子的，如張光裕先生已指出、也為楊先生所引用的甲 11 “聞之曰：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又見於《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緇衣》、《郭店楚墓竹簡·緇衣》以及《禮記·緇衣》，“聞之曰”皆作“子曰”。按“聞之曰”即“聽說……”，完全可以理解為儒家後學稱述從老師處聽到的話，這類話包括一部分原本為孔子之語而為老師所傳述者，自然不足為奇。我們前文已有分析，

① 陳偉：《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從政〉校讀》。

② 參看郭沂《郭店竹簡與先秦學術思想》，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335—339頁。王博：《論〈論語〉的編纂》，收入其所著《簡帛思想文獻論集》，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299—337頁。楊朝明：《新出竹書與〈論語〉成書問題再認識》，《中國哲學史》2003年第3期，32—39頁。

③ 楊朝明：《上博藏竹書〈從政〉篇“五德”略議——兼說〈從政〉應該屬於〈子思子〉佚篇》，簡帛研究網站，2003年4月23日。又參楊朝明《新出竹書與〈論語〉成書問題再認識》。

《從政》有不少內容是對《論語》類材料的闡發解釋，而皆冠以“聞之曰”，是難以都說成孔子之語的。

退一步講，即使承認“聞之曰”同於“子曰”，反而更能確定《從政》非子思所作。楊先生已經引到《孔叢子·公儀》云：“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也。’”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焉。’”子思之書，正是因為要標榜其所記是可靠的孔子之語，所以言必稱“子曰”、“子云”、“子言之”、“子言之曰”或“仲尼曰”，並因此而引致當時人們的懷疑。在今存很多人認為出自《子思子》的《禮記》的《坊記》、《中庸》、《表記》和《緇衣》四篇中，情況正是如此。《荀子·非十二子》說子思“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之稱“先君子”，其係指孔子也是明確的。子思之書如所稱引為孔子之語，恐不會皆冠以言說者不明的“聞之曰”。

楊先生的第三條理由是認為《從政》篇“與郭店楚墓竹簡中的儒家著作頗多有相通之處”，而郭店簡中的儒家著作就屬於《子思子》。按這一推論的基礎遠非定論，郭店簡中的儒家著作有哪些能夠確指為《子思子》之作，目前大家意見基本統一的恐怕祇有《緇衣》、《五行》、《魯穆公問子思》三種。其它諸篇頗有異說，也有不少就被指為屬於子張之儒的。^①

我們認為，《從政》跟“子張之儒”的關係更為密切。周鳳五先生曾說：

……郭店《忠信之道》與這次同書公佈的《從政》、《昔者君老》，凡涉及《論語》或其相關材料的，似乎都與子張有關。眾所周知，《荀子·非十二子》批評當時的儒家，除了前述子思、孟軻之外，還有“子張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子游氏之賤儒”三派。郭店與上博兩批楚簡，與《論語》相關的論述集中於子張一人，說明“子張”一派曾經流傳於楚國。這是研究先秦學術史的第一手材料，可謂彌足珍貴。

僅就《從政》而論，我們贊同周鳳五先生將它跟子張一派相聯系的意見。

《從政》篇中與子張有關的材料，已為研究者指出並有深入討論的，主要是以下一段：

毋暴，毋虐，毋賊，毋貪。不修不戒，謂之必成，則暴；不教而殺，則虐；命無時，事必有期，則賊；為利枉【甲 15】事，則貪。聞之曰：從政：敦五德，固三制，除十怨。五德：一曰寬，二曰恭，三曰惠，四曰仁，五曰敬。君子不寬則無【甲 5】以容百姓，不恭則無以除辱，不惠則無以聚民，不仁【甲 6】則無以行政，不敬則事無成。三

① 參看姜廣輝《郭店楚簡與原典儒學》，《郭店簡與儒學研究》，《中國哲學》21，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263—273頁。廖名春：《荆門郭店楚簡與先秦儒學》，《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二十輯，36—74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王博：《郭店竹簡與子張之儒的研究》，收入其所著《簡帛思想文獻論集》，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87—129頁。

折（制）：持行視上衣食☐【甲7】

研究者已指出，“毋暴、毋虐、毋賊、毋貪”等內容跟《論語·堯曰》第二章“子張問從政”的“屏四惡”很接近：^①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簡文的“敦五德”，周鳳五先生謂“也很可能是《論語》‘尊五美’的另外一種傳本或闡述”^②。上引文中間略去部分即“五美”的內容：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對“五德”與“五美”的關係，楊朝明先生進一步有具體的闡發，認為兩者實為“相互貫通”，請參看。^③總之，簡文這一大段內容都明顯跟子張有關。

關於簡文“五德”，原“說明”及考釋還引用了《學而》“溫、良、恭、儉、讓”及《陽貨》的“恭、寬、信、敏、惠”加以對比，云“互有同異”。按《論語·陽貨》云：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恭、寬、信、敏、惠”也正是子張聞之於孔子之語，跟簡文“寬、恭、惠、仁、敬”比較有三者相同，顯然也是很接近的。郭沫若在論“子張之儒”時曾認為，《論語》中跟子張問有關孔子的答辭曾經過子張氏之儒的潤色甚至傳益，“例如像‘問仁’和‘問從政’兩條，在《論語》中比較博衍，而和子張的精神卻十分合拍，可能也就是出於傳益的例子”^④。簡文跟《論語》這兩條的密切關係，恐非偶然。

① 前文注所引周鳳五《讀上博楚竹書〈從政〉（甲篇）札記》、陳劍《上博簡〈子羔〉、〈從政〉篇的竹簡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

② “敦五德”近於“尊五美”，敦，厚也，與“尊”義相類。此“敦”字及簡甲5“敦行不倦”的“敦”原作“臺”，張光裕先生釋讀為“敦”是很正確的。其下半所从“羊”形有所省變，郭店簡《成之聞之》簡4之“淳”字所从“羊”形亦有所省變，二者可相比較印證。不少研究者主張釋為“墉（庸）”，無法講通簡文，實不可信。

③ 楊朝明：《上博藏竹書〈從政〉篇“五德”略議——兼說〈從政〉應該屬於〈子思子〉佚篇》。

④ 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收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2冊，人民出版社，1982，128頁。

除此之外，還可以補充以下幾條材料。

第一，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簡文“行險致命”與《論語·子張》首章：“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相合。《子張》篇全記孔子弟子之語，包括子張、子夏、子游、曾子、子貢諸人。簡文稱述子張之語而云“聞之曰”，可據以推論作者可能係子張一派的後學。

第二，我們在前文考釋過的“嚴則失衆”，跟上引《論語·陽貨》“子張問仁於孔子”而孔子答語中的“寬則得衆”相合，也跟子張有關。^①

第三，《從政》乙3云：

聞之曰：從政，不治則亂，治已至則□

試對比《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有善勿專，……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寬裕以容其民……”

“南面臨官”亦即“從政”，簡文雖然下已殘斷，但仍然可以看出跟《子張問入官》有關文句十分接近。《子張問入官》的“寬裕以容其民”，還跟前引《從政》甲5—甲6的“君子不寬則無以容百姓”大致相同。

上舉材料已經足以反映出《從政》跟子張的密切關係。此外，《從政》的主要內容，不外乎“從政”與“修身”兩個方面，也跟《論語》等文獻所反映出的子張的興趣（或者說傾向）是相合的。《上博（二）》213頁“說明”謂本篇“內容多次強調‘從政’所應具備之道德及行為標準”，214頁謂“內容除談及政教法治外，亦述恭遜與忠敬之道”，“恭遜與忠敬之道”與諸如甲18+甲12+乙5+甲11一組圍繞“名”與“行”的關係展開論述的簡文等，都可以用“修身”來概括。而從《論語》等文獻看，子張的興趣或傾向正偏重於政事、修身兩個方面，尤其是政事方面。《論語》中諸如“子張學干祿”（《為政》）、“子張問政”（《顏淵》），及《堯曰》問“何如斯可以從政矣”，還有《大戴禮記》的《子張問入官》篇，無不可以看出這一點。《論語》中跟“修身”有關的諸如“子張問行”（《衛靈公》）、“子張問善人之道”（《先進》）、“子張問明”（《顏淵》）、“子張問崇德辨惑”（《顏淵》）、“子張問仁於孔子”（《陽貨》），等等。

總之，《從政》篇內容比較明確的部分，很多跟子張直接有關，其總體傾向也與子張素所關心者相合。據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從政》篇可能屬於“子張之儒”的作品。不過，《從

① “寬則得衆”又見於《論語·堯曰》首章之末：“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此五字衍文），敏則有功，公則說。”翟灝《四書考異》以為此數句即“子張問仁”章之“脫亂不盡之文”。參看程樹德《論語集釋》，中華書局，1990，1367—1368頁。

政》篇殘損頗為嚴重，現存簡文也還有不少沒有真正讀通；同時我們對所謂“儒分八派”的真實情況以及各派之間的交流影響，其實所知甚少。考慮到以上情況，我們可以審慎一點說，在目前情況下，如果一定要按儒家八派劃定《從政》篇的派別的話，與其說《從政》出自《子思子》，我們倒寧願將它劃歸“子張之儒”。希望隨著上海博物館所藏戰國楚竹書的逐步全面公佈，我們對這一問題能有越來越深入的認識。

補記：

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中，有一些資料可對本文有所補正。

一、《季康子問於孔子》篇簡9—簡10：

丘聞之：臧文仲有言曰：君子強則遺，威則民不（以上文字在簡9）道，鹵則失眾，盟則無親，好刑則不祥，好殺則作亂。

此段文字與本文所論《從政》簡甲8—甲9文句大多相同（參看禰健聰《上博楚簡（五）零札（一）》，簡帛網，2006年2月24日）。其中“盟則無親”與《從政》的“慍（猛）則無親”對應，“盟”字跟《上博（二）子羔》簡2用為“德明”之“明”的“𡗗”，和《上博（四）曹沫之陳》簡31用為“明日”合文之“𡗗”當為一字異體，在此顯然也應當讀為“猛”（參看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簡帛網，2006年2月19日）。

上引簡文中“鹵則失眾”句跟《從政》的“鹵則失眾”對應，“鹵”和“鹵”表示的顯然是同一個詞。“鹵”字原作：



整理者原釋讀為“俞（逾）”，前引禰健聰先生文釋讀為“訊”。楊澤生先生《〈上博五〉零釋十二則》（簡帛網，2006年3月20日）隸定作“𡗗”，釋為“鹽”字異體，讀為“嚴”。楊澤生先生此文也將本文所論《從政》篇甲8的“鹵則失眾”釋讀為“鹽（嚴）則失眾”，請參看。

按此形下所从就是“鹵”字，其較為特別之處在於比一般的“鹵”字下面多出一長橫筆。同樣寫法的“鹵”字和“鹵”旁曾侯乙墓竹簡中多見（參看白於藍《曾侯乙墓竹簡中的“鹵”和“櫓”》，《中國文字》新二十九期，193—208頁，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年12月）。至於其長橫筆之下又再加一短橫為飾筆，與楚文字中常見的“至”和“室”等字情

況相同。

將《從政》的“鹵”字跟“鹵”字結合起來考慮，如它們釋讀為“鹽（嚴）”符合事實，則“鹵”字似可分析為从“宀”从“盥（鹽）”或“鹵（鹽）”省聲。

二、《三德》篇簡 16 有“奪民時以土功，是謂稽……（中略）奪民時以兵事，是[謂……]”一段話，范常喜先生《〈上博五·三德〉札記三則》（簡帛網，2006 年 2 月 24 日）指出與之相似的文句見於《呂氏春秋·上農》，甚是。其中簡文有“喪台（以）係樂”句，《呂氏春秋·上農》作“喪以繼樂”。這可以作為本文讀“口惠而不係”之“係”為“繼”的一個有力補證。

上博竹書研究三題

吉林大學古籍所 畢育辰

內容提要 本文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五)中的三處疑難詞語進行考釋、句讀。認為《曹沫之陳》的“圯成”應讀為“既成”，義猶“既成列”、“既成陣”；《季庚子問於孔子》的“母歸”應讀為“如歸”；《融師有成氏》的“融師有成氏，狀若生有耳不聞，有口不鳴”應斷為“融師有成，氏狀若生。有耳不聞，有口不鳴”，其中的“氏”是指示代詞。

關鍵詞 上博竹書 文字 考釋 斷句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五)^①自從出版以來，研究文章不斷，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但是由於竹簡編聯難度較大，再加上不少文字字形難以辨識，至今還有不少問題尚未得到解決。這裏我們試着對這其中幾個疑點進行探討，不當之處，還請批評。

上博(四)《曹沫之陳》簡46下+簡33^②：

卒欲少以多：少則惕（易）輟（察），圯成則惕（易）治，果勝矣。

①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 此二簡從陳劍先生編聯，參看陳劍《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站，2005年2月12日，<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chenjian001.htm>。

此句釋解紛紜。“卒欲少以多”，李零先生疑指“卒欲少而精，以質量彌補數量”^①，似把“多”理解為“能以少當多”之意。按此中的“以”是轉折連詞，義如“而”。《黃帝內經素問·標本病傳論》“夫陰陽逆從標本之為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淺而薄，可以言一而知百也”^②，其“少而多”的修辭與此類同。

“𢇛”字諸家多未釋，蘇建洲先生疑讀“潛”或“遷”，讀為“潛師”或“遷師”^③，迂曲難通；我們看《曹沫之陳》簡45“其賞淺且不中，其誅重^④且不察”的“察”作“𢇛”，其右旁與“𢇛”字完全相同，故“𢇛”也應讀為“察”。^⑤

“圪”，從李零、陳劍先生隸定。陳劍先生疑“圪”為“壘”^⑥，陳斯鵬先生釋為“埧”，並連上字“𢇛”讀“𢇛埧”為“轄埧（管）”^⑦，李銳先生又釋“埧”為“自（師）”^⑧，於形、音、義似無所據。蘇建洲先生把“圪”所從的“𠂔”旁與上博（三）《周易》簡44的“气（汔）”作“𠂔”相對照，認為完全同形，從而肯定隸定為“圪”之說。他又說：“筆者以為或許讀作‘既’，楚簡的‘氣’，通常寫作從‘既’從‘火’。‘𠂔成’，即‘既成’。”^⑨我們認為他的釋讀是正確的。不過蘇先生於此做猶疑之辭，所舉證又頗薄弱，故後來學者都未能信從。這裏我們再做如下補充：在銀雀山竹簡《十問》中，“气”常可通“既”，如：“交合而舍，敵人氣衆以強，勁捷以剛，銳陳以胥，居之奈何？”“彼气貴气武，三軍徙舍，三軍不相睹。”“下上气亂，此擊銳之道也。”其中的“气”都讀為“既”。典籍中也有“气”、“既”相通的例子，如《論語·鄉黨》“不使勝食气”，《說文》引“气”作“既”，又《說文》“气”或作“𠂔”。^⑩《曹沫之陳》的“圪”字與“气”相比，祇多了一土旁，但仍從“气”得聲（“乞”、“气”古本一字），所以，把“圪”讀

① 李零：《曹沫之陳》釋文考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41—285頁。

② 郭霽春主編：《黃帝內經素問校注》，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793—794頁。

③ 蘇建洲：《〈上博（四）曹沫之陳〉三則補議》，簡帛研究網站，2005年3月10日，<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sujianzhou003.htm>；又見蘇建洲《〈上博竹簡（四）〉考釋三則》，《出土文獻語言研究》第一輯，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56—66頁。

④ “重”字從李守奎先生釋，參看李守奎《〈曹沫之陳〉之隸定與古文字隸定方法初探》，《漢字研究》第一輯，學苑出版社，2005，492—499頁。

⑤ 李銳：《〈曹沫之陳〉釋文新編》，confucius2000網站，2005年2月22日，<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623>，已讀為“察”，但未論證。

⑥ 郭霽春主編：《黃帝內經素問校注》，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793—794頁。

⑦ 陳斯鵬：《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曹沫之陳〉釋文校理稿》，簡帛研究網站，2005年2月20日，<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328>。

⑧ 同上。

⑨ 李銳：《〈曹沫之陳〉釋文新編》，confucius2000網站，2005年2月22日，<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623>，已讀為“察”，但未論證。

⑩ 參看王輝《古文字通假釋例》，藝文印書館，1993，667頁。

爲“既”是沒有問題的。^①“圯”應與下一個“成”字連讀爲“圯（既）成”。我們看第二小句的“少”字與第三小句“少”相照應，則第二小句“多”字也應與第三小句的“既成”相照應。“多”義前文已論證是“以少當多”，從第二小句和第三小句相照應的角度考慮，並參以上下文^②，這裏的“既成”應同於《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之“既成”。

這樣，整句話可翻譯成：“士卒要少而能以少當多：（士卒）少則容易（被）按察，（士卒）已經排好陳列則容易（被）治理，（這樣）必然會勝利。”

二

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簡 19：

民之逆（？）美棄惡母歸。^③

第三字在簡文中看不清楚，似從“毛”從“辵”，這裏暫時寫作“逆”。不過無論什麼字，它都應與“棄惡”互文，有“迎”、“向”的含義。“母歸”之“母”，濮茅左先生把它釋爲“毋”，後來學者皆從之，不過“毋歸”在簡文裏頗覺不辭。我們考慮，“母”字有可能是“女”字的錯寫，二字的區別祇在於“女”字中間兩點的有無，容易相混。^④如“郭店”《成之聞之》簡 29 引《君奭》“毋有合才音”，今本作“汝有合哉言”，“毋”、“母”古爲一字，此爲“母”被寫成“女”而讀爲“汝”的例子；又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乙種》簡 117 “正月、七月朔日，以出母（女）、取婦，夫妻必有死者”的“母”即“女”之訛。^⑤

在典籍中，常有“如歸”之說，比如《左傳·昭公十三年》“故從亂如歸”，《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懷服如歸”，《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賓至如歸”，《管子·小匡》“鼓

① 值得注意的是，銀雀山竹簡出土地屬魯國範圍，而《曹沫之陳》故事的發生地也在魯國。看起來，“氣”和“既”相通，似乎是齊魯的一種語言習慣。

② 我們反復權衡各家意見，並參以己意，把此處的簡文排序如下：莊公或（又）問曰：“吾有所聞之：一【59 下】出言三軍皆懼（勸），一出言三軍皆往，有之乎？”答曰：“有。明【60 上】……不可不慎。不卒則不恒，不和則不輯，不兼畏【48 上】則不勝。卒欲少以多。少則易察，圯（既）成則易【46 下】治，果勝矣。親率勝，使人不親則不敦，不和則不輯，不義則不服。”（《曹沫之陳》的簡文排序詳另文）其中的“一出言三軍皆勸，一出言三軍皆往”，自與“既成列”、“既成陳”有關。

③ “美”字從季旭昇先生釋，參看季旭昇《上博五芻議（上）》，2006 年 2 月 18 日，簡帛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5；“歸”字從陳劍先生釋，參看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2006 年 2 月 19 日，簡帛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4。

④ 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爲把“女”寫成“母”是《季庚子問于孔子》抄手的個人用字習慣，不見得非得把它理解爲訛字。

⑤ 《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2001，241 頁。

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說苑·指武》“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卷五十九“望德如歸”，而戰國文字資料中“女”和“如”通用之例甚多，這樣看來，把“母歸”釋為“如歸”還是比較恰當的。

我們再看看《季庚子問於孔子》簡7：“君子敬成其德，小人母寐。”“母寐”，李天虹及陳偉兩先生皆讀為“晦昧”，認為有“懵懂”或“愚昧”義^①，在簡文中“母寐”和“敬成其德”連用，語法結構似應一致，如果理解為“晦昧”，是一個形容詞詞組作謂語，和“敬成其德”的語法結構就不太一樣了。現在看起來，這裏的“母”也可能是“女”的錯字，通“如”，“小人如寐”猶言小人對德行的表現像睡了一樣無動於衷。

三

上博（五）《融師有成氏》簡5：

融師有成，氏狀若生。有耳不聞，有口不鳴。有目不見，有足不趨。名則可畏，亨（實？）則可侮。^②

曹錦炎先生把此處斷為：“融師有成氏，狀若生有耳不聞，有口不鳴，有目不見，有足不趨。名則可畏，步則可柔”，並把篇題命名為《融師有成氏》。認為“融師有成氏”的意思是祝融的老師有仍氏。按，“成”與“仍”古音較遠，且古史傳說中祝融的時代也難和有仍氏聯繫起來。曹先生又引或說認為與“容成氏”有關，“容”和“有”的音韻相差更遠，就可以不討論了。

從《融師有成氏》全篇看，除簡5“我曰且吝乎”、簡6“我曰且喬（驕）乎”、簡7“昔融之是師”使用了一個虛字而五字一逗外，其它都是四字一逗。若把“融師有成氏”連讀，則“狀若生有耳不聞”七字一逗，於全篇體例頗為抵牾。所以，我們認為此十六字應斷為“融師有成，氏狀若生。有耳不聞，有口不鳴”^③。“氏”可通“是”，戰國文字其例甚繁。比如簡7的“昔融之氏師”就是“昔融之是師”。典籍中“是”和“其”在用作

① 李天虹：《讀〈季庚子問于孔子〉札記》，簡帛網站，2006年2月24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9；陳偉：《〈季庚子問於孔子〉零識（續）》，簡帛網站，2006年3月2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5。

② “實”從陳斯鵬先生釋，參看陳斯鵬《讀〈上博竹書（五）〉小記》，簡帛網站，2006年4月1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10；“侮”字從廖明春先生釋，參看廖名春《讀〈上博五·融師有成氏〉篇札記四則》，confucius2000網站，2006年2月19日，<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250>。

③ 廖名春先生已把“狀若生”和“有耳不聞”斷開，不過廖先生標點為“融師有成氏，狀若生，有耳不聞”，參看廖名春《讀〈上博五·融師有成氏〉篇札記四則》，confucius2000網站，2006年2月19日，<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250>。

代詞的時候，有相近的意思，如《說苑·善說》“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就是這種用法。我們從古書中“是”和“其”常常互用也可以看出這一點，比如《國語·齊語》“桓公擇是寡功而謫之”，《管子·小匡》作“擇其寡功者”，《韓詩外傳》卷四“無他，由是道故也”，《荀子·議兵》、《史記·禮書》並作“由其道故也”。^①所以“氏狀若生”猶“其狀若生”^②。這樣斷開後，這兩句的“成”、“生”、“鳴”屬耕部，下面兩句的“趨”、“侮”屬侯部，從文章韻脚看也是非常合適的。

“有成”在句中應是動詞詞組做謂語，“融師”做主語，簡 7 有“昔融之是師，訢尋夏邦”，“融”和“師”單獨使用，這個詞組既可能是偏正結構，也有可能是動賓結構，具體的意思，因為簡文有些殘缺，還有待進一步的探討（我們初步猜測《融師有成》或許是古代賦體的隱語，如果我們猜測不誤的話，這篇小文章的謎底有可能就是“筆”），不過我們現在知道，篇題應改名為《融師有成》。

① 參看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中華書局，1982，816—818 頁。

② 陳劍先生看過此文後指出：此處的“氏”或是“𠂔”字之誤，上博（一）《性情論》簡 19：“……集大命於氏身”，“郭店”《性自命出》簡 37“其集大命於𠂔身”，今本作“其集大命於𠂔躬”，上博（一）《孔子詩論》簡 16“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詩”，其“氏”亦疑“𠂔”字之誤。（參看裘錫圭《談談上博簡和郭店簡中的錯別字》，《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310 頁）這樣，把此句讀為“融師有成，氏狀若生”，甚為通順。

上博簡《昭王毀室》篇字詞補釋

廣州大學 禰健聰

內容提要 本文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睢》篇中“不幸”、“埏”、“博”、“至俑”、“介趣”等字詞進行了考釋，並對相關文句進行了疏釋。

關鍵詞 戰國楚簡 古文字 詞語 考釋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原題為《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睢》的楚簡材料，實際包含了前後兩個互相獨立的故事，簡1到簡5前半段為“昭王毀室”，簡5下半以後為“昭王與龔之睢”，兩篇之間有一個墨節隔開。本文討論“昭王毀室”故事簡3—5的幾個詞以及“昭王與龔之睢”故事的“介趣”一詞。


一

上博楚簡《昭王毀室》簡3—5記述了“君子”向昭王陳述喪服闋室的因由以及昭王的回應。簡文經過學者們的多番探討，文義已大致清楚，但其中亦尚有可議者。以下先寫出

釋文，再分別討論：^①

至【2】閏，卜命尹陳眚爲視日，告：“僕之母辱君王，不幸。僕之父之骨在於此室之階下，僕將琰亡老□□□【3】以僕之不得並僕之父母之骨么自塤。”卜命尹不爲之告。“君不爲僕告，僕將訖寇。”卜命尹爲之告。[王]【4】曰：“吾不知其爾墓。爾姑須，既落焉，從專（塤）。”王徙處於坪瀉，卒以（與）大夫飲酒于坪瀉。因命至俑毀室。

（1）僕之母辱君王，不幸。

“幸”字原簡寫作，整理者陳佩芬先生釋爲“逆”，指“不逆”爲君子謙稱。^②劉樂賢先生從整理者讀爲“逆”，指其用作動詞，“是料想、預料的意思”。董珊先生則釋爲“𡗗”，疑讀爲“佞”。

陳劍先生對此字作了詳細的分析，指出此字從倒矢從犬，可與秦漢簡帛“幸”字比照，釋之爲“幸”。陳先生又從整理者讀“母”爲“毋”，並將“不幸”屬下讀，指“僕之毋辱君王，不幸僕之父之骨在於此室之階下”，意爲“我不侮辱君王”，“不幸我的父親的屍骨在這宮室的臺階之下”。

按，“幸”字的認出，對文義的理解十分關鍵。但陳劍先生對文句的斷讀則仍有可商。首先，按陳文所斷讀，無論“我不侮辱君王”或是“我没有侮辱君王”，與此段的文義都是不盡貼切的，因爲，喪服闋室本身已經構成了對君王的冒犯，君子所要表達的應該是“我本不欲（或者本無意）冒犯君王”，但“僕之毋辱君王”顯然表達不出這一意思來。再者，這一斷讀還關聯到簡文前後文義的問題。劉樂賢先生指出：“從下文講到父骨之所在及不得並父母之骨等事看，此處應是講喪母，是故事的起因。因此，這裏的‘母’不必讀爲‘毋’。”確實，如果這裏未提及喪母之事，則下文所謂的“並父母之骨”就顯得不知所云。正因爲如此，劉樂賢先生才會懷疑此處有缺文。不存在竹簡缺失是陳劍先生始終堅持的，我們認爲也是可從的。那麼，矛盾的解決祇能回到簡文上來，重新審視。

我們認爲，“不幸”在這裏可能並不是“不幸運”的意思，而是代指“不幸死去”。《說文》：“口（幸），吉而免凶也。从𠂔、从夭。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口。”小徐本“故死謂之不口”作“故謂死爲不口”。《說文》一書在訓詁學上的價值絲毫不亞於其在文字學上的價值，字形的分析和字（詞）義的訓釋應該分別看待。雖然《說文》對“幸”字字形

① 釋文參考了以下論著的合理意見，下文徵引諸家說法，出處同此：孟蓬生：《上博竹書（四）問詁》，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5日；劉樂賢：《讀上博（四）札記》，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5日；董珊：《讀〈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四）〉雜記》，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20日；陳劍：《釋上博竹書〈昭王毀室〉的“幸”字》，《漢字研究》第1輯，學苑出版社，2005。

②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84—186頁。

的分析有問題，但其對“幸”與“不幸”詞義的訓釋卻是可信的。《戰國策·韓策二》：“前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漢書·蘇武傳》：“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顏師古注：“不幸亦謂死。”此外，這裏的“母”仍當如字讀；“辱”在這裏則用作謙詞，是古漢語的常見用法，並沒有實義。然則，此句當斷讀爲“僕之母辱君王，不幸”，意思是“我的母親有負君王，不幸亡故”。喪母這一故事起因在此已有交待，文意自足，可以不必再有缺文之疑。

（2）湊亡老

整理者讀“湊”爲“啖”，指簡文的“湊亡老”是爲亡父啖食，就是祭祀亡父之意。孟蓬生先生指“‘湊’，當讀爲‘禪’，除去喪服時舉行的祭祀。”，“簡文記該君子時著‘喪服’，是未除服也。故此云‘禪亡老’，正相應”。劉樂賢先生則“疑‘湊’當讀爲‘掩’或‘揜’，是掩埋的意思。《呂氏春秋·孟春紀》：‘揜骼羶骸。’亡老，指亡父亡母。又，‘僕將湊亡老’之後可能還有文字，此句大致是說擬將父母合葬”。董珊先生讀“湊”爲“殮”。

根據簡文所述，“君子”的父親骸骨原本已葬於“室之階下”，此時母親新喪，劉樂賢先生指“此句大致是說擬將父母合葬”，陳劍先生根據董珊先生所引《禮記》、《晏子春秋》的三個古書記載的類似故事，進一步證實了這一判斷，值得信從。可見，將新喪母親之骸骨並於既葬之父親之墓，是“君子”闔室的目的，也是這段話的焦點所在。

整段話的文意既明，可以回頭討論“湊”字的釋讀。我們認爲，將“湊”讀爲“禪”可能並不恰當，讀爲“掩”於簡文大致可通，但不若從董珊先生讀爲“殮”準確。“殮”字古音屬來母談部，與匣母談部的“湊”字聲近韻同，二字音通應該是有問題的。《禮記·喪服大記》“凡封”鄭注“棺之入坎爲殮”。又《禮記·檀弓下》“殮，般請以機封”鄭注“殮，下棺於槨”。又《釋名·釋喪制》“衣屍棺曰殮，殮者斂也，斂藏不復見也”。^①要之，殮就是給死人穿衣入棺。如上所述，“君子”的目標是葬母於父墓，其父早已入葬，無所謂殮或掩。因此，要“湊”的“亡老”，是母親而不是父母。母親新喪，故需入殮下葬，讀“湊”爲“殮”，正切合文義。不讀“湊”爲“掩”，還考慮到“搏”字的意義（詳下）。

（3）搏、專

“搏”，整理者釋“敷”，董珊先生釋爲“宅”。按，此字當讀爲“撫”。“搏”從“專”得聲，古音從“專”得聲之字聲多屬並、滂二母，韻不出魚、鐸二部，與古音屬明母鐸部的“撫”聲韻均近，二字可通。《說文》：“輔，輔也。從人甫聲。讀若撫。”可證。

^① 參宗福邦、陳世鏡、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商務印書館，2003，974頁。

《方言》卷十三：“凡葬而無墳謂之墓，所以墓謂之塋。”郭璞注：“塋謂規度墓地也。”正是因為“君子”之父葬而無墳，所以昭王才會“不知其爾墓”，築室於其上。也正是因為君王築室其上，所以“君子”才“不得”並父母之骨而“塋”之。

孟蓬生先生引《禮記·檀弓上》“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及“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句，指出“因為古代的墓沒有標誌，所以楚王的宮室雖然建在別人的墓上，但他自己並不知道”。正可與上引《方言》的說法對應。

專，整理者釋“事”，論者皆無異議。我們不妨對比一下：

《昭王毀室》簡 5 “專”

《昭王毀室》簡 4 “塋”

《曹沫之陳》簡 17 “事”

細審簡影，“專”字中部豎畫的墨迹雖稍有磨損，但仍清晰可見，形體結構與“塋”字右半毫無異致，而與“事”字判然有別，實為“專”字無疑。在簡文中亦當讀為“塋”。昭王是要“君子”姑且等“落”的儀式結束後再任由他“塋”，即命至俑毀室來配合。字若讀為“事”，則“從事”一詞在這裏無法讀通。董珊先生讀末句為“爾古（胡、何）須（待）既禘（落）安（焉）從事？”指“意謂‘你怎麼待到已經落祭才來呢？’含有輕微責怪的意思”，其實不然。

（4）至俑

楚王命至俑毀室。“俑”可讀為“甬”，《方言》卷三：“臧，甬，侮，獲，奴婢賤稱也。……自關而東陳魏宋楚之間保庸謂之甬。”郭注：“保，言可保信也。”“俑”當是楚王身邊的親信奴僕。“至”可讀為“致”，新蔡簡甲三 49：“口至（致）師于陳之歲。”“致甬”當與“致師”結構類似，“命至俑毀室”即命令派遣奴僕毀室。




二

上博《昭王與龔之睢》簡 6—7：

僕遇睢，將取車，被襦^①衣。睢介趣君王，不【6】獲寅頸之罪君王，至於定冬而被襦衣。

“介”字作，楊澤生先生認為字形有異，改釋為“示”，謂“與《說文》‘示’字古文相近，其下部三個豎畫都朝同一個方向彎曲，而差別祇是上部的橫畫是否寫平，所以

① 從陳斯鵬先生釋，見《初讀上博竹書（四）文字小記》，簡帛研究網，2005年3月6日。

應該釋爲‘示’”。^①按，此字雖形體稍異於一般的“介”字，但與楊文所舉的上博《柬大王泊旱》簡15“芥”字所從的“介”旁作比較，三豎畫也是朝同一個方向的，差別其實祇在於中間的“人”旁。楚簡“人”字既有作（包山簡95），又有作（郭店《性自命出》簡51），後者與上舉“介”字所從“人”旁相同。故此字仍當從整理者釋“介”。

“介趣”一詞，整理者謂：“‘介’，獨，孤獨。《左傳·昭公十四年》：‘養老疾，收介特。’‘趣’，通‘趨’。介趨，獨自駕御。”^②陳劍先生認爲“‘趣’讀爲‘騶’，指主管養馬並管駕車之人”。又說“由於‘介’字意不明，此‘騶’字也可能本是作動詞‘駕車’義用的”。^③按，“介”即“甲”，在簡文中指給戎車之馬披上馬甲。《左傳·成公二年》：“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杜注：“介，甲也。”考古發現戰國墓葬有馬胄馬甲的遺物，可見給戰車的馬匹套上防護裝備是戰國時代的事實。^④本簡上文說到“龔之睢馭王，將取車”，這裏說給戰馬套上馬甲，正合情理。“趣”當從陳劍先生後一讀法，義爲“駕車”。“介”與“趣”，即出行前給戰馬套上馬甲和行進時爲王駕車，是作爲御者的當然工作。“介趣”屬爲動用法，“介趣君王”即爲君王介趣。簡文中大尹說的“介趣君王”，是代指龔之睢作爲君王御者的身份。

① 楊澤生：《讀〈上博四〉札記》，簡帛研究網，2005年3月24日。

②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87頁。

③ 陳劍：《上博竹書〈昭王與龔之睢〉和〈柬大王泊旱〉讀後記》，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5日。

④ 汪少華：《駢與介馬考辨》，《語言研究》2005年1期。

《三德》研究四題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簡帛學研究所 曹峰

內容提要 本文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之《三德》篇所見四處簡文作了詮釋。這四處簡文是“毋爲角言，毋爲人倡”（簡 10）、“毋作大事，毋害常”（簡 10）、“毋揣深，毋度山”（簡 11）、“入墟毋樂，登丘毋歌”（簡 11—12）。這些詮釋將爲《三德》篇思想內容的進一步研究提供幫助。

關鍵詞 上博楚簡 《三德》 四處簡文考釋

《三德》是《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①中的一篇，原整理者爲李零先生。筆者對李零先生未加解讀或解讀存在問題的一些地方作了考釋，並指出其內容有許多地方可以和馬王堆漢墓帛書《黃帝四經》（不包括《道原》篇）對照^②，並對《三德》的簡文作了新的排序和分章^③。在筆者的分章中，以下這段話被列爲下篇第一節，其主要特徵是：以高

①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 請參照以下系列論文：《〈三德〉與〈黃帝四經〉對比研究札記（一）》（簡帛網，2006年3月22日）；《〈三德〉與〈黃帝四經〉對比研究札記（二）——兼論〈三德〉的竹簡編聯》（簡帛網，2006年4月3日）；《〈三德〉零釋》（簡帛網，2006年4月6日）；《〈三德〉零釋（二）》（簡帛網，2006年4月8日）；《〈三德〉零釋（三）》（簡帛網，2006年4月11日）。

③ 請參照《再談〈三德〉的編聯與分章》，簡帛網，2006年4月13日。改名爲《談〈三德〉的編聯與分章》的正式文本即將刊發於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新出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陽、皇后^①兩人發言的形式出現，多為為人處世方面警誡之語，內容相對獨立完整。常用兩個“毋……”（或“勿……”）構成對子，說明同一件事情。

為閱讀方便，對於沒有爭議的通假字或異體字，不再標注原文，一律使用通行字體，對有爭議的字，直接摹寫原文，並在（ ）中標出可能的假借字。

高陽曰：“毋凶服以享祀，毋錦衣綬袒係子，是謂忘神……”【第9號簡】^②皇后曰：“立。毋為角言，毋為人倡。毋作大事，毋剋（害）^③常。毋壅川，毋斷洿。毋滅宗，毋虛牀。^④毋〔改〕^⑤敵（圉？），毋變事。毋煩姑嫂，^⑥毋【第10號簡】恥父兄。毋羞貧，^⑦毋笑刑。毋揣深，毋度山。毋逸其身，而多其言。居毋惰，作毋荒。善勿滅，不祥勿為。入墟毋樂，登【第11號簡】丘毋歌，所以為天禮。”【第12號簡】

下面，就對其中四處簡文作詳細考釋。

一、“毋為角言，毋為人倡”

簡10有“毋為角言，毋為人倡”，李零先生作了如下考釋：

“角言”，疑指爭訟。“人昌”，即“人倡”，疑指先人而發。

筆者以為，李零先生對“人倡”的解釋是合理的，“角言”則不準確。我們發現，皇后和高陽的“毋……”都是兩句一組，成雙成對。即兩個“毋”，說的是相同或相通的一個道理。例如“毋壅川，毋斷洿”、“毋煩姑嫂，毋恥父兄”、“毋羞貧，毋笑刑”、“毋揣深，毋度山”、“毋逸其身，而多其言”、“居毋惰，作毋荒”、“善勿滅，不祥勿為”、“入墟毋樂，登丘毋歌”。其它暫時無法解釋的“毋……”，也一定遵循這一規則。

“角言”，目前暫時找不到相近的用例，先來分析與“毋為人倡”相似的用例吧。

- ① “皇后”就是“黃帝”，參見拙文《〈三德〉所見“皇后”為“黃帝”考》，收入“新出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博簡卷，武漢大學，2006年6月26—28日。
- ② 參見拙文《關於上博楚簡〈三德〉9號簡文的釋讀》，“社會·歷史·文獻——傳統中國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研究所，2006年7月21—23日。
- ③ 該字隸作“剋”、讀為“害”，採用了季旭昇《上博五帛議（下）》（簡帛網，2006年2月18日）的觀點。
- ④ “毋滅宗，毋虛牀”，劉國勝《上博（五）零札（五則）》（收入“新出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博簡卷，武漢大學，2006年6月26—28日）讀為“毋滅崇，毋虛壯”，認為其意與“將興勿殺，將齊勿剋”相近。
- ⑤ 這個殘缺字，陳劍先生認為有可能是“改”，參見陳劍《三德竹簡編聯的一處補正》，簡帛網，2006年4月1日。
- ⑥ 原釋文作“毋焚古謨”，讀為“毋煩姑嫂”是採用了劉國勝《上博（五）零札（五則）》的觀點。
- ⑦ 何有祖：《上博五釋字二則》（收入“新出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博簡卷，武漢大學，2006年6月26—28日）讀“毋羞貧”為“毋憂貧”，意為“毋以財貨不足為憂”，就是說“憂”的對象是自己，但“毋笑刑”的對象顯然是別人，兩者不統一，此解恐不可取。趙平安《上博簡〈三德〉“毋鼻貧”解讀》（簡帛網，2007年1月1日）讀該字為“鼻”，意為“傲”，句意為“指不要輕視貧窮之人”。

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呂氏春秋·任數》）

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呂氏春秋·任數》）

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所謂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淮南子·原道》）

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淮南子·原道》）

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淮南子·詮言》）

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淮南子·詮言》）

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春秋繁露·離合根》）

〔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銀雀山漢簡《六韜》，又見今本《六韜·發啓》）

聖人不爲始。（馬王堆漢墓帛書《稱》）

時若可行，亟應勿言。〔時〕若未可，塗其門，毋見其端。（馬王堆漢墓帛書《稱》）

凡變之道，非益而損，非進而退。首變者凶。（馬王堆漢墓帛書《稱》）

從以上用例中可以看出，它們幾乎都是道家類的文獻，或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響。不先“倡（唱）”表現出不爭、不爲天下先的姿態，表達爲因循、因應的原理，希望達到以柔克剛、以弱勝強、後發制人的效果。

再來看“毋爲角言”，“角”如“角力”、“角逐”、“角勢”、“角抵”、“相角”等所示，雖然有“爭鬪”之意，但既然“毋爲角言”和“毋爲人倡”是相似的表述，那麼，“角言”就不應該是“爭訟”，而是一種先於他人之“言”，“角”在這裏意爲“冠角”，是突出之意。“言”和“倡（唱）”意思完全相同，兩句話都是不先“倡（唱）”的意思。

二、“毋作大事，毋害常”

簡 10 有“毋作大事，毋剋（害）常”。關於“大事”，李零先生解釋爲“祭祀、兵戎等重大事情”，這個考釋無法解釋爲何不能做“祭祀、兵戎等重大事情”。還是先來分析“毋害常”的意思，“常”應該就是“天之常”（簡 1）、“天常”（簡 2）的“常”，或

“故常不利，邦失幹常”（簡5）及“變常易禮”（簡5）的“常”，指那些不可更易的準則、規範。《黃帝四經》有“天地之恒常，四時、晦明、生殺、柔剛。萬民之恒事，男農，女工。貴賤之恒位，賢不肖不相妨。畜臣之恒道，任能毋過其所長。使民之恒道，去私而立公”（《經法·道法》）。這裏的“恒事”、“恒位”、“恒道”是“恒常”的另一種表達方式而已。《三德》的“毋害常”就是不要輕易去破壞這些準則、規範，如果破壞了，就會有“小邦則剗，大邦過傷”、“土地乃坼，民乃夭死”（簡5）的結果。借用《黃帝四經》的話說，就是“變故亂常，擅制更爽。心欲是行，身危有〔殃，是〕謂過極失當”（《經法·國次》），“不循天常，不節民力，周遷而无功”（《經法·論約》），“若夫人事則无常。過極失當，變故易常。德則无有，措刑不當。居則无法，動作爽名。是以受其刑”（《十六經·姓爭》）。既然“害常”是危及國家社稷的事，那麼“毋作大事”也當同樣理解。如下所示，我們發現先秦、秦漢文獻中的“毋作大事”幾乎都與時令相關。

仲春之月……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必備。無作大事，以妨農功。（《呂氏春秋·仲春》）^①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禮記·禮器》）

可見，“大事”主要指的是妨害農時的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仲春》：“大事，兵戈征伐也。”鄭玄注《禮記·月令》：“大事，兵役之屬。”其實“大事”不光指兵事，還應包括“土功”，即修築城郭宮室等大型工程。兵事和土功不是不做，但要依時而做，不然就危及國本。總之，不按時令“作大事”和“害常”是有害國家的兩件事情。

三、“毋揣深，毋度山”

簡11有“毋揣深，毋度山”。李零先生指出“揣”、“度”互文，未做進一步解釋。“揣深”、“度山”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當時真的有誰會去測量揣度自然界的高深嗎？所以，這祇能是一個比喻，提醒人們不要做不自量力之事。

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管子·九守》）^②

天道玄默，无容无則，天不可極，深不可測。（《淮南子·主術》）

① 重點號所示內容與《淮南子·時則》完全相同，《禮記·月令》作“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② 《六韜·大禮》有相同內容。此外，《六韜·上賢》有“夫王者之道……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

在道家系統文獻中，“道”或得道者也往往用“不可極”、“不可測”形容，如“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呂氏春秋·論人》），“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淮南子·原道》），但這就和本篇關係不大了。

四、“入墟毋樂，登丘毋歌”

簡 11—簡 12 有“入墟毋樂^①，登丘毋歌。”在考釋之前，首先來看看與“歌”相關的一條簡。簡 1 有“平旦毋哭，晦毋歌”^②，晏昌貴先生作了如下解釋：

睡簡《日書》甲種 155 背：“墨（晦）日，利壞垣、徹室、出寄者，毋歌。朔日，利入室，毋哭。望，利爲困倉。”《顏氏家訓·風操》：“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喪家朔望，哀感彌深，甯當惜壽，又不哭也。”《抱樸子·微旨》亦以“晦歌朔哭”爲不吉之事，與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偽雜真、採取奸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灶諸事並列，謂犯之則司命奪其紀算，說與《顏氏家訓》略同。^③

這是解釋“毋哭”、“毋歌”時很有說服力的例證，那麼“入墟毋樂，登丘毋歌”是否也可以從陰陽禁忌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呢。同爲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27 正貳有“弦、望及五辰不可以興樂口”，^④這裏言及“興樂”。另外，《日書》中還有一些允許或不允許“歌”、“樂”的記載。在此僅引二例。

秀，是謂重光，……利祠、飲食、歌樂。（甲種 32 正）

徹，是謂六甲相逆……不可祠祀、歌樂。（甲種 44 正）^⑤

但是，筆者以爲，這些資料雖然也涉及“歌樂”方面的禁忌，但對“入墟毋樂，登丘毋歌”的解釋沒有參考價值。理由有二：一、“平旦毋哭，晦毋歌”中“平旦”和“晦”、“哭”和“歌”都是陰陽相對的，“入墟毋樂，登丘毋歌”中，“墟”和“丘”一爲低處，一爲高處，正好相對而言，但“歌”和“樂”卻不相對立，《日書》也是“歌樂”並列的；二、“入墟毋樂，登丘毋歌”前面所有的“毋……”或“勿……”都是爲人處世方面的準則，唯獨此處出現陰陽禁忌，於理不通。從前文談的全部是爲人處世看，這兩句話也一定

① 原文作“虛”，讀爲“墟”，採用了晏昌貴《〈三德〉四札》（簡帛網，2006 年 3 月 7 日）的觀點。

② “晦”字，李零先生作“明”，隸作“晦”，採用了晏昌貴《〈三德〉四札》的觀點。

③ 晏昌貴：《〈三德〉四札》，簡帛網，2006 年 3 月 7 日。

④ 劉樂賢先生將甲種 155 背和 27 正貳放在一起，歸爲“朔望弦晦篇”，見氏著《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66 頁。

⑤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雲夢睡虎地秦簡》，文物出版社，1990，184、185 頁。

不會例外。

《禮記·曲禮上》中有這樣一些記載：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①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如文末“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所言，這是提醒君子在何時何地可以歌、可以笑，可以歡樂的問題上不要失禮失態，這是與“禮”相關的問題。所以“入墟毋樂，登丘毋歌”也當作禮節來理解，“樂”指的是音樂。“墟”和“丘”在這裏並非專指自然界之低處和高處，而是泛指被因戰爭等人為原因或因天災等自然原因破壞了的廢墟。例如《經法·國次》說：“禁伐當罪當亡，必墟其國。”就是說在討伐有罪之國時，一定要斬草除根，使其成為廢墟，不得翻身。《呂氏春秋·重言》有“太宰嚭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為墟。成公賈之讒，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淮南子·人間》有“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這裏的“為墟”就是成為“廢墟”之意。有時，“墟”和“丘”連用，意思仍為“廢墟”。

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而不聽，故吳為邱墟，禍及闔廬。（《呂氏春秋·知化》）

呂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為丘墟，身為刑戮，吾未知其為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

（《呂氏春秋·禁塞》）

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管子·八觀》）

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史記·李斯列傳》）

因此，《三德》“入……登……”祇是一種修飾手法，並無強調高處和低處之意，如同“臨喪不笑”、“望柩不歌”、“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一樣，在已淪為廢墟之地，一定要作哀傷、悲痛狀，不能隨意歌唱作樂。不然，必有報應。

① 《論語·述而》有“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從睡虎地秦簡《游士律》說到漢初的游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陳君

內容提要 睡虎地秦簡《游士律》反映出秦國對外來游士的嚴格管理，是秦國法治傳統的見證。《游士律》對外來“游士”區分為亡符和有符兩種情形，亡符的要懲罰，有符的滿一年要核實身份；對幫助“故秦人”外逃或脫離戶籍的，則根據其爵位各有相應的處罰。西漢初年，仕宦諸侯王的游士對中央政權構成威脅，與此相應，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亡律》也有對“舍亡人”和“匿罪人”的懲罰規定。到武帝時期，中央政府在與諸侯王爭奪游士的鬥爭中獲得了最終的勝利，游士階層趨於消歇。

關鍵詞 睡虎地秦簡 游士律 漢初游士

一、睡虎地秦簡《游士律》及其歷史背景

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11號秦墓發現了大批竹簡。竹簡中有一部分是墓主為學習或其它需要而抄錄的《秦律》，整理小組定名為《秦律雜抄》。^①其中有一篇《游士律》，律文內容如下：

游士在，亡符，居縣貲一甲；卒歲，責之。有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為鬼薪，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

公士以下刑爲城旦。

由於墓主在抄錄時根據個人需要對律文作了簡括、取捨或刪節，造成了今人解讀的困難。對於律文中“游士”一詞的理解，學界意見不一。整理小組認爲是“專門從事游說的人”^①；裘錫圭先生將其理解爲“外來的，沒有固定戶籍的人士”^②；高敏先生認爲“是指無固定住址的游食之士”^③；楊寬先生認爲是“別國游士”^④；荷蘭學者何四維（A. F. P. Hulswé）先生則認爲游士或者“是指游蕩的士人”，或者“是指別國來的兵士”。^⑤

筆者認爲楊寬先生的意見較爲合理，“游士”應該是指來自東方國家的游宦之士。根據整理小組的意見，《睡虎地秦墓竹簡》寫成於戰國末期到秦統一六國前後^⑥，包括《游士律》在內的《秦律》的頒布和施行，應在同時或此前不久。這段時間正是秦國向東方六國發動兼並戰爭、統一天下的時期。同時，秦國在用人政策尤其是在任用東方六國的客卿、游士方面，經歷了一些波折。

戰國時期，隨著世卿世祿制的解體，士的階層崛起。他們往來各國，游宦諸侯，其中不乏學問之士，如齊國的稷下學宮就聚集了不少游士，戰國四公子也都有養士的風尚。游士對各諸侯國的政治、軍事、文化影響重大，甚至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所謂“得士者強，失士者亡”^⑦。秦國也不例外，久有任用他國游士以爲客卿的傳統。春秋時代，“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⑧，戰國時代秦國所用外國之士，如張儀、范雎爲魏人，商鞅、呂不韋爲衛人。這些游士對秦國政局的影響不可輕視，如秦昭襄王一聞范雎之言，即“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⑨。到戰國晚期，秦國國力強大，秦相呂不韋更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並天下”^⑩。但秦王政即位前後，韓國水工鄭國間諜案暴露，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⑪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80 頁。

② 裘錫圭：《讀簡帛文字資料札記》，《簡帛研究》第 1 輯，湖南出版社，1993。

③ 高敏：《秦漢史探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59 頁。

④ 楊寬認爲：“《游士律》講的是別國游士來居住而無符（護照）的要受罰。”見楊著《戰國史》（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33 頁。

⑤ 何四維：《1975 年湖北發現的秦文書》，載《通報》第 65 卷，4—5 頁。轉引自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133 頁。

⑥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出版說明，1—2 頁。

⑦ 《史記》卷一二六《滑稽列傳》，中華書局校點本，1959，3206 頁。

⑧ 《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2541—2542 頁。

⑨ 《史記》卷七九《范雎列傳》，2412 頁。

⑩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223 頁。

⑪ 《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始皇元年（前 246：“作鄭國渠。”其事見《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及《史記》卷二九《河渠書》。

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①秦王採納了這些意見，準備驅逐來自諸侯國的士人。楚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他於是上書秦始皇，歷數有大功於秦的外國士人，又以物產、音樂等舉例論證“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②，陳述用士當不拘國別，才能成就帝業，這就是著名的《諫逐客書》。秦國最終收回了逐客令，繼續重用來自東方六國的客卿、游士。可以說，不拘一格的用人政策是秦國日益強大、並最終統一天下的重要原因。

當然，戰國時代的游士在間諜活動中確實扮演了重要角色，鄭國案的暴露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例子。《六韜》卷三《龍韜·王翼第十八》有這樣的内容：“游士八人，主伺奸候變，開合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③這顯然是間諜以游士的身份作掩蓋，到敵國去刺探情報，行離間之計。秦國亦不例外，秦王嬴政曾採納李斯的建議，“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際，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④。對身份、背景可疑的外來士人，包括秦國在內的諸侯各國必然有相關的措施，以防止他們在本國從事間諜或其它非法活動。或許這就是《游士律》產生的歷史背景。《游士律》關於游士的詳細規定，以及其中透露出來的秦國對外來游士的嚴格管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秦國法治傳統的見證。

至於《游士律》施行的時代，在統一前還是統一後，或者是先後施用於兩個時期，這不太容易確定。從律文不難看出，《游士律》適用於統一之前的歷史環境。而秦國統一東方六國之後，以函谷關爲界的關中與關東仍有十分明顯的地區差異，筆者相信這種差異依然需要《游士律》發揮作用。

二、《游士律》釋義及相關問題

上文我們分析了《游士律》產生的歷史背景，下面來看律文的具體規定。

律文的前半部分說：“游士在，亡符，居縣貲一甲；卒歲，責之。”律文中所出現的

① 《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2545 頁。

② 《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2545 頁。

③ 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兵家類”，1983 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72 年 4 月，考古工作者從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和二號漢墓裏發掘出大批竹簡，其中有《六韜》殘本，這證明了《六韜》本是先秦古籍。整理小組的意見認爲，儘管今本《六韜》在編排上與《漢書·藝文志》所記不同，文字亦與簡本有很大出入，但是它們和以銀雀山簡本爲代表的西漢古本的淵源關係是顯而易見的，《六韜》既然在西漢前期已經流傳開來，其寫成年代大概不會晚於戰國。見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編輯說明，文物出版社，1985，10 頁。

④ 《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2540—2541 頁。

“符”，是以竹片或木片製成的有齒的身份證明，供出入津關和居留外地時查驗身份使用。它一般一式兩份，分別稱為左符和右符，一件由行為人持有，一件保存在官府。其格式大致是：在兩塊簡牘上都寫上文字，記錄有關事項，並留下可以吻合的刻齒，以供合符時驗證。^①《游士律》中的“亡符”，有兩種理解，一是“亡”作無解，“亡符”是沒有身份證明的意思；二是“亡”作丟失解，“亡符”即是丟失了身份證明。筆者認為後一種理解較好。我們可以想象，外來“游士”在西行入秦之時，秦國必然發給他相關的身份證明，後來因為不慎遺失才被處罰。而對於沒有身份證明、頗有間諜嫌疑的“游士”，秦政府恐怕不會僅僅施以交納一甲的處罰。^②對於“居縣貲一甲”一句，整理小組的譯文是：“游士居留而無憑證，所在的縣罰一甲”^③。也就是說，“游士”丟失憑證，被地方政府發現，於是罰游士一甲。

接下來的律文是“卒歲，責之”，對於這四個字，整理小組的譯文是：“居留滿一年者，應加誅責。”^④“責”字在這裏作“督責”講似乎更好一些。這段話是與前面“游士亡符”的情形相對而言的——前面講“亡符”怎麼辦，這裏講有符怎麼辦。所謂“卒歲”，是指居留滿一年。“責之”，應當理解為地方政府對游士的居留目的和行為加以督察和審核。《史記》卷七十六《平原君列傳》中公孫龍的一段話，可以作為我們的參考。時“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對平原君說：“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無聽也。”這裏的“責”同樣是督責的意思。正如司馬貞《索隱》所說：“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⑤此外，《老子·七十九章》云“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史記》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載蘇代謂陳軫“公常執左券，以責于秦、韓”，也都是相同的用法。^⑥

再看律文的第二部分，律文寫道：“有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為鬼薪，公士以下刑為城旦。”整理小組譯為：“有幫助秦人出境，或除去名籍的，上造以上罰為鬼薪，公士以下刑為城旦。”^⑦對此，高敏先生最初認為這是指：“凡屬秦國人之逃亡出國境的，要削去其戶籍上的名字，即不再承認其為秦國人；如果外逃不成，原有上造爵以上的判為

① 本文關於“符”之形制的描述，參考了陳直、李均明、胡平生等先生的意見。分別見陳直《〈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第2版，349—350頁；李均明《漢簡所見出入符、傳與出入名籍》，載《文史》第十九輯；胡平生《木簡出入取予券書制度考》，載《文史》第三十六輯。

② 高敏先生認為，所謂“貲一盾”、“貲一甲”，即罰款，這種罰款表面上用盾、甲等軍器計算，實際上可能用相當於一副軍盾或一副軍甲的金錢交付，因為盾和甲的製作有精粗之分，價格也有高低之別，無法以盾、甲作為罰款的定準。被罰者一旦完成了交納罰款的任務，他的罪也就消除了。見高著《雲夢秦簡初探》（增訂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2版，256—257頁。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80頁。

④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80頁。

⑤ 以上兩條引文見《史記》，2369—2370頁。

⑥ 參見胡平生《木簡出入取予券書制度考》中的有關論述，載《文史》第三十六輯，153頁。

⑦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80頁。

鬼薪刑徒，有公士爵以下的則要刑爲城旦刑徒。”^①後來對上述看法又有所更正，認爲意即“凡幫助秦人越出國境者，要在戶籍上除名，如果其人有‘上造’以上爵位，則罰爲鬼薪，如果只有‘公士’以下爵位，則要刑爲城旦”^②。筆者認爲，整理小組的意見是可取的。因爲這是關於“游士”的法律，不應該在其中將對“故秦人”的規定包括進來。所謂“故秦人”，是指“秦國範圍的老居民”^③，而對於來自東方諸國的人口，《秦律》中稱爲“臣邦人”。另外，游士可能本來就沒有名籍，而且“削籍”^④對“游士”也不是什麼處罰，他們本來就是游宦之士。

如果上面的推測能夠成立，我們可以看到秦律對於“游士”的規定相當細緻。首先，它對外來的“游士”區分爲亡符和有符兩種情形，亡符的要懲罰，有符的滿一年要核實身份。其次，對那些幫助“故秦人”外逃或脫離戶籍的，根據他們的爵位各有相應的處罰。

還有兩個與《游士律》密切相關的問題需要說明一下。

一是函谷關特殊的地位。《游士律》所謂“爲故秦人出”中的“出”應該理解爲東出函谷關。函谷關最初是秦國和東方諸侯國的分界綫，正如賈誼《過秦論》所言諸侯合縱之師“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⑤。在戰國時代，隨著秦國向東方擴張，函谷關逐漸成爲“故秦”和秦國新佔領土的分界，如秦昭襄王八年，孟嘗君入秦爲相，後謀歸齊，乃“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⑥，秦昭襄王“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⑦，後來昭襄王欲爲范雎報仇，誘騙平原君入秦，並要挾他：“范君之仇（指魏齊）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⑧後來得到魏齊的人頭之後，才“出平原君歸趙”。^⑨結合1983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縣（今荆州市荊州區）張家山247號漢墓出土的呂后《二年律令》中的《津關令》^⑩來看，秦國應該也有對交通要道、關塞尤其是函谷關的管理規定。史書裏也有例證，如穰侯被逐歸陶，“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⑪。這些都說明了函谷關的特殊地位。

二是“游士”在秦國可以取得合法身份，甚至獲得爵位。秦國有嚴格的戶籍制度，限

① 見高敏《雲夢秦簡初探》（增訂本），224—225頁。

② 見高敏《秦漢史探討》，159頁。

③ 關於“故秦人”和“臣邦人”的解釋，見高敏《雲夢秦簡初探》（增訂本），223—224頁。

④ 《商君書·去強》：“舉民衆口數，生者著、死者削。”又《商君書·境內》：“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見高亨《〈商君書〉注譯》，中華書局，1974，48、146頁。

⑤ 《文選》卷五一。

⑥ 《史記》卷七五《孟嘗君列傳》，2355頁。

⑦ 《史記》卷七九《范雎列傳》，2412頁。

⑧ ⑨ 《史記》卷七九《范雎列傳》，2416頁。

⑩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205—210頁。

⑪ 《史記》卷七九《范雎列傳》，2412頁。

制人口的自由流動。^①但游士可以取得秦國的戶籍，成為歸化人，也可以通過立功獲得秦國的爵位，如“秦王拜（李）斯為客卿”^②。史書有時稱他們的爵位，有時則直接稱為客卿，如司馬錯在秦昭襄王十六年為左更，《史記》或稱“左更錯”^③，或稱“客卿錯”^④。又如《史記》卷五《秦本紀》載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客卿胡陽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⑤，而三十八年則稱為“中更胡陽”^⑥。

三、漢初游士的興衰

暴政和酷刑最終導致了秦朝統治的土崩瓦解。在秦末農民起義中，各地豪傑揭竿而起，儒生文士也風馳雨集、追隨其後，以求尺土之封。正如張良為劉邦分析的那樣：“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陞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⑦在風雨飄搖之中，《游士律》當然無法發揮作用了。漢高祖統一天下後，由於行政管理的需要和歷史條件的限制，仍然不允許隨意的人口流動。但與秦律有所區別的是，漢初主要是控制關中人向諸侯國的逃亡，《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第三條引以比勘的案例就提供了這樣的事實：“人婢清助趙邯鄲城，已即亡，從兄趙地，以亡之諸侯論。”^⑧

其中當然也包括了對游士的限制。賈誼在給文帝的建議中，就有“禁游宦諸侯”^⑨的話，《史記》載文帝的舅舅薄昭曾向淮南王劉長進諫：“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⑩前兩句說的“亡之諸侯，游宦事人”，應該就是指從關中出逃到諸侯國的游士。漢初，諸侯國有一定的自治權，《史記》卷五一《鄒陽傳》就記載：“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⑪所謂聘賢，就不僅包括本地士人，也有來自其它諸侯國的士人。這實際上是戰國時代各國諸侯、封君招致賓客和亡人情景的重演。當時，士人在各地流動頻繁，如眾所周知的吳王劉濞門下的鄒陽、枚乘等，梁孝王門下的羊勝、公孫詭、鄒陽、枚乘、嚴忌、司馬相如等（鄒陽和枚乘先游吳、後游梁）。其中，羊勝、公孫詭和鄒陽來自齊地，嚴忌和枚乘來自吳地，司馬相如來自蜀地。為了吸納人才，一些諸侯國還實行了優待措施，如“淮

① 關於秦國的戶口版籍之制，參見高敏《秦漢史探討》，156—164頁。

② 《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2541頁。

③ 《史記》卷五《秦本紀》：“（昭襄王）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212頁。

④ 《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昭襄王）十八年（前289），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739頁。

⑤⑥ 兩條引文見《史記》卷五《秦本紀》，213頁。

⑦ 《史記》卷五五《留侯世家》，2041頁。

⑧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214頁。

⑨ 《新書·壹通篇》，見董治安主編《兩漢全書》，第一冊，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312頁。

⑩ 《漢書》卷四四《淮南衡山濟北王傳》，中華書局校點本，1962，2139頁。

⑪ 《漢書》卷五一《鄒陽列傳》，2338頁。

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①。這些游士大部分應該是有合法身份的，但一些諸侯王為某種政治目的而招納的亡命士人則未必具有合法身份，如淮南王長“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②。這些士人往往為了政治利益和諸侯王勾結在一起，對抗中央政府，如淮南王劉安門下的游士“妄作妖言阿諛王”^③，慫恿劉安背叛中央。

仕宦諸侯王的游士對中央政權具有潛在的威脅，漢朝當然不會置若罔聞，於是制定了“舍匿法”。所謂“舍匿法”，就是中央政府對那些犯有藏匿罪或逃亡者的人的處罰，其約束對象包括諸侯王。薄昭給淮南王濞的信中所說的“舍匿者，論皆有法”，就是針對這種情形而言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亡律》也有對“舍亡人”和“匿罪人”的懲罰規定^④。

漢律關於游士的管理和限制，是由漢初特定的歷史條件決定的。^⑤漢初實行郡國並行制，在削奪異姓王之後，在東方分封了許多同姓王，但是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關中地區與東方諸侯的關係十分微妙。劉邦死後，呂后執政，重用呂姓宗親，東方劉姓諸侯對諸呂有高度的戒心，反之亦然。這種情況，在諸呂之亂平定後也沒有完全好轉。賈誼向文帝上書建議“眾建諸侯而少其力”^⑥，但文帝沒有採納他的意見。景帝時採用晁錯“削藩”的建議，引發了吳楚“七國之亂”。漢朝平亂之後，即剝奪了諸侯國的置吏權。到了漢武帝時期，採用了主父偃的建議，頒佈“推恩令”，逐步削弱諸侯王的封國，使他們沒有能力也沒有權力來吸引游士。同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⑦。郡國士人逐步被吸納到中央來，如梁孝王門下的文人司馬相如、武將韓安國等就先後來到長安做官。漢初中央政府和諸侯王對士人的爭奪，最終以中央政府的勝利告終。這個變化的過程，與漢朝中央集權的加強以及諸侯王勢力的衰微是同步的。^⑧

在戰國秦漢的歷史變局之中，游士階層的興衰是一道獨特的風景。從戰國時代的游士縱橫，中間經歷了漢初中央政府與諸侯國對游士的爭奪和鬥爭，游士階層在漢武帝時期趨於消歇。睡虎地秦簡《游士律》作為這段歷史的見證，在兩千多年之後，仍以其鮮明的印迹，為我們探究這一現象留下了尋覓的線索。

① 《漢書》卷二二下《地理志》，1668頁。

② 《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3077頁。

③ 《史記》卷一一八《淮南王長附子安傳》，3082頁。

④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155—156頁。

⑤ 關於郡國並行制形成的過程和背景、文帝以前王國可能不用漢法、漢初王國“自拊循其民”等問題，陳蘇鎮先生作過詳細的探討。見氏著《漢代政治與〈春秋〉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67—98頁。

⑥ 《新書·藩強篇》，見董治安主編《兩漢全書》第一冊，286頁。

⑦ 《漢書》卷六《武帝紀》班固“贊”語，212頁。

⑧ 于迎春先生論述過漢初游士之風由盛轉衰的過程及其與諸侯王勢力衰微的同步性。見氏著《秦漢士史》第二章“漢初社會由武向文的轉化及諸侯—游士時代的真正結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33—60頁。

里耶秦簡所見戍卒索隱^①

吉首大學文學院 王煥林

內容提要 見於里耶秦簡 J1(9)1—J1(9)12 中的 12 名陽陵籍士兵應是戍邊之卒。里耶古城一直都是秦王朝控制西南蠻夷的邊防重鎮，此可補秦代歷史地理之闕。陽陵戍卒之從軍遷陵，帶有明顯的雇傭性，這種集兵方式與東漢普遍推行的募兵制並無不同，作為募兵制的濫觴，此可補秦漢軍制之闕。

關鍵詞 秦簡 戍卒 募兵 邊防

里耶秦簡中，J1(9)1—J1(9)12 等十二件木牘特別引人注目：作為官府追討貲錢、贖錢的文書，其債權方是遠在關中的陽陵縣，而債務人都是從軍於遷陵縣（今里耶）的陽陵籍普通民衆，這十二件木牘編號連續，其形制、措辭、紀年亦非常接近。就公開發表的三十餘枚里耶秦簡而言，上述十二件木牘的文字總量即已分佔了 50% 強，這麼多同涉一事的文章，為我們瞭解秦代的兵制沿革、邊防事務、地方軍政、財經法規都提供了極為難得的材料。

^① 本文屬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里耶秦簡校詁——探尋湘西失落的文明》（05BYY024）的階段性成果。

一、戍卒身份的確立

秦末漢初，始有“戍卒”之稱。《史記》引秦二世語“楚戍卒攻蕪入陳”，即以“戍卒”稱陳涉之徒。賈誼《過秦論》“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同此。又，晁錯《守邊勸農疏》“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亦足資參證。《說文》：“戍，守邊也，從人持戈。”結合充斥於居延漢簡、敦煌漢簡中的戍卒名籍、日迹、稟給記錄，兩漢時期，“戍卒”專指邊境屯戍候望者，殆毋庸置疑。東漢極少數泛稱京畿“衛士”爲“戍卒”的現象，只能算是例外。如《漢書·叔孫通傳》：“漢七年，長樂宮成……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又，《漢書·魏相傳》“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似亦傾向於此。

不過，自春秋戰國以迄秦統一前後，各國雖皆有邊境屯戍候望之實，但文獻中似乎還未見“戍卒”之名，與之相應的稱呼是“戍人”及“戍者”。例如《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又，昭公三十二年：“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又，僖公二十五年：“秦取析矣，戍人反矣。”又，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戍律》：“戍者城及補城，令姑（嫪）堵一歲……令戍者勉補繕城，署勿令爲它事。”^①

中古以降，“戍卒”雖多指邊境屯戍候望之兵，但亦用指藩鎮守禦、京畿衛戍、州縣警備、關隘駐防之兵。例如《舊唐書》列傳第九十四：“寧州戍卒數百人，縱掠而叛。”《舊唐書》列傳第八十三：“（李愬）將襲蔡州。……至賊境，曰張柴砦，盡殺其戍卒。”《金史》本紀第十六：“分京畿戍卒萬二千，河中民兵八千，以許州元帥紇石烈鶴壽將之，屯潼關西。”《金史》列傳第九：“命有司運米五萬石於廣寧，給南京、潤州戍卒。”

辯正戍卒的名實源流，旨在確立這一結論：秦漢時期，戍卒即守邊之兵。這是我們探究遷陵邊防沿革、秦楚疆域界劃的重要前提。

基於上述討論，再回到里耶秦簡，顯然，我們完全可以把上述從軍於洞庭郡遷陵縣的十二名陽陵籍民衆稱爲“戍卒”。然而，他們就是秦末漢初狹義的“戍卒”——守邊之兵麼？我們認爲，這也不成問題。茲先將這十二人的名籍、爵位、債務諸情況列表於下，再作闡發。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90頁。

簡牘編號	人 名	籍 貫	爵 位	債 務
J1(9)1	毋死	陽陵宜居	無爵（士伍）	貲餘錢 1640
J1(9)2	不狄	陽陵仁陽	無爵（士伍）	貲錢 836
J1(9)3	不識	陽陵下里	無爵（士伍）	貲餘錢 728
J1(9)4	衷	陽陵孝里	無爵（士伍）	貲錢 1344
J1(9)5	鹽	陽陵下里	無爵（士伍）	貲錢 384
J1(9)6	徐	陽陵禔陽	上造（秦 20 級爵位之次低級）	貲錢 2688
J1(9)7	小效	陽陵禔陽	無爵（士伍）	貲錢 11211
J1(9)8	越人	陽陵逆都	無爵（士伍）	貲錢 1344
J1(9)9	頽	陽陵仁陽	無爵（士伍）	贖錢 7680
J1(9)10	勝日	陽陵叔作	無爵（士伍）	貲錢 1344
J1(9)11	不採	陽陵谿里	無爵（士伍）	貲餘錢 852
J1(9)12	廣	陽陵□□	無爵（公卒）	貲錢 1344

上表所列毋死等十二人，與睡虎地秦簡中的“居貲贖債”者（即以勞役抵償罰款、贖金、債務之人）容易混淆。又，《漢書》中多見“外徭”一詞，雖然如淳、孟康等古代學者大多以爲“外徭”即戍邊之役，但也有“外地徭役”（即不在其籍貫所屬郡縣服役）一說（如顏師古）。^①顯然，毋死等人的情況，似乎也很像後一種“外徭”。但我們認爲，毋死等十二人，既不是真正的“居貲贖債”者，也不是遠離家鄉的普通勞役人員——他們是守衛邊境的“戍卒”，試舉證如下。

1. 簡牘文書中的本證

上述十二件木牘，每一件都明確記有“（某某）戍洞庭郡不知何縣、署”、“乃移戍所”、“陽陵卒署遷陵”這三句公文。由此看來，這十二名千里迢迢從軍於遷陵縣的陽陵籍民衆（一名士伍，一名公卒，一名上造），其共同任務是“戍”，其共同名份爲“卒”。“戍卒”之稱，實已呼之欲出。

當然，必須指出，雖然毋死等十二人均身負“貲、贖”之債，但他們卻又不是真正的“居貲贖債”者。其中隱情，頗爲複雜，且事關秦代募兵制度，故留待下文詳考，這裏，僅拈取兩個反證來說明問題。其一，上述十二件木牘，每一件均記有陽陵司空“已訾責其家”或“已訾其家”的討債記錄。假設債務人被遠遣他郡服役是爲了抵債，依秦律，陽陵司空再去當事人家裏作威作福，豈不是非法行徑？唯一的解釋是：戍卒們臨行之前，並沒有以兵役抵償債務的相關協定。其二，債權方是陽陵縣，債務人倘以勞役抵償罰款、贖金，

① 參高敏《秦漢史探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28 頁。

其服役地點，例在本縣本郡，幾乎沒有將債務人遠遣他郡充軍的可能。^①

2. 歷史典籍中的旁證

賈誼稱陳勝“舊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衆所周知，陳勝、吳廣等九百“閭左”是秦末最典型的一批“戍卒”。兩相對照，上述十二名陽陵“卒”與這批“閭左”似幾無不同。其一，都出身貧民。按，“閭左”身份卑微、家徒四壁的貧賤形象，學界早有共識。同樣，里耶秦簡中的十二名陽陵“卒”，每人都欠有官府的債務：多者 11211 錢（J1⑨7 簡），少者 384 錢（J1⑨5 簡）。所以，當陽陵司空分別向這十二人的家屬追討債務時，其結果一律都是“家貧弗能入”。^②此外，這十二位多以“阿狗阿貓”爲名的陽陵“卒”，絕大多數即秦之“黔首”。具體而言，十二人中，無爵的“士伍”及“公卒”即佔了十一人，其餘一名“上造”，也不過是秦二十等爵位中的次低者。其二，都來自內郡。按，陽陵在關中咸陽附近^③，且 J1⑨3、J1⑨9 二簡均明言陽陵縣與遷陵縣之間路途遙遠^④，所以，兩縣不屬一郡，殆可徵信。顯然，與謫戍邊郡漁陽的陳勝、吳廣之輩一樣，上述十二名陽陵“卒”，亦可稱千里赴戍的“遷徙之徒”。

3. 睡虎地秦簡中的旁證

前引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戍律》有如下條文：“戍者城及補城，令姑（嫪）堵一歲，所城有壞者，縣司空署君子將者，貲各一甲；縣司空佐主將者，貲一盾。令戍者勉補繕城，署勿令爲它事；已補，乃令增塞埤塞。”這裏，“署”當理解爲屯守候望的崗位、哨所，抑或戍卒的基層編制單位。《墨子·號令》“城禁……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守必自課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皆斷”足資參證。

漢簡中的戍卒，同樣也在“署”的管轄之下。戍卒堅守候、燧，漢簡稱之爲“在署”、“居署”、“見署”；戍卒擅離候、燧，則稱之爲“離署”、“去署”、“不在署”。例如：居延漢簡 127·27：“候長湯敢言之：主吏七人、卒十八人，其十一人省作校，更相伐不離署，堠上不乏人，敢言之。”又 194·17：“第二燧長景褒不在署，謹驗問。”

基於此，反觀里耶秦簡，可以斷言，遷陵縣所轄戍卒的核心編制單位也是“署”。因爲，這種編制單位在上述十二件木牘的每一件中均出現了四次^④：

（1）戍洞庭郡不智（知）何縣、署

（2）付署計年爲報

① 參高敏《秦漢史探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28 頁。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 年第 1 期。

③ 參拙文《里耶秦簡叢考》，《吉首大學學報》2005 年第 4 期。

④ 《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 年第 1 期。

(3) 報署主責發

(4) 報署金布發

綜上所述，見於里耶秦簡中的十二名“陽陵卒”，當是戍邊之卒。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並力求無懈可擊地來確證這一史實，其目的在於：清晰、補充並完善秦楚時代的歷史地圖。——衆所周知，自嬴政二十四年（前 223）滅楚，迄二世三年（前 207）亡國，其間，秦與“西南夷”東北部的疆域界劃並不十分清楚，學術界更無人敢肯定，地處西水上游、轄歸洞庭郡的遷陵縣，竟然一直都是秦王朝控制百濮、群蠻的邊防重鎮。不言而喻，在此之前，遷陵必然也曾是楚國對付巴蜀、夜郎甚至西越的戰略要地。發明珠於煙塵，淘金屑於恒沙，珍貴的里耶秦簡喚醒了遠古的跫音。爲了不至於擾亂戍卒討論的連續性，有關遷陵的邊防沿革，留待最後探究。

二、徭戍、謫戍、貲戍與募兵

募兵制是古代重要的軍事制度。研究其緣起、嬗變，有助於我們全面認識古代兵制以及它對中國封建社會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史家言募兵制，向來以爲：始於西漢，至東漢，廢徵兵而全面實行募兵。秦簡的出土，要求我們必須改寫這一“定讞”。茲先從秦代戍卒的來源談起。

秦民十七歲傅籍之後，均有服兵役的義務。《漢書·食貨志》記董仲舒論秦徭役制度云：“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按，“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就是建立在編戶齊民基礎之上的徵兵制，它是秦代兵制的主體。秦的戍卒，絕大部分也來源於這種義務“屯戍”的民衆。在睡虎地秦簡中，由徵兵制所招攬的戍卒，謂之“徭戍”。此見睡虎地秦簡《除吏律》：“駕驪除四歲，不能駕御，貲教者一盾；免，償四歲徭戍。”所謂“償四歲徭戍”，意即補服四年戍邊之役。又，《司空律》：“居貲贖債者，或欲藉人與並居之，許之，毋除徭戍。”這是說，以勞役抵償罰款、贖金或債務者，如果要別人協助他一同服役，可以允許，但被借用者不能免除自己的戍邊義務。漢律因之，亦將法定的戍邊之役稱爲“徭戍”。《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前 77）詔曰：“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注引如淳曰：“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徭戍也。”

實際上，在並吞六國的進程中，秦的疆域也在不斷拓展，單純的徵兵戍邊，自然會越來越不敷用，所以，在“徭戍”之外，又出現了“謫戍”及“貲戍”。雖然“謫戍”與“貲戍”者的身份有時並不容易確定，但它們的性質差別卻仍然可以區分出來。

所謂“謫戍”，即強迫罪犯、賤民及奴隸戍邊。傳世文獻中關於“謫戍”的明確記載，

首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謫遣戍。”故論者每以爲“謫戍”始於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其實，在此之前，秦業已推行了“謫戍”。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律》記載：“百姓有母及同姓（生）爲隸妾，非謫罪毆（也），而欲爲冗邊五歲，毋嘗（償）興日。”既云“非謫罪”，則必有“謫罪”，顯然，謫而冗邊，即爲“謫戍”。我們知道，睡虎地秦簡成文於商鞅變法至秦始皇三十年（前 217）之間，這說明秦行“謫戍”，由來已久。

所謂“貲戍”，即懲罰有过失的官吏、民衆戍邊。按，“貲戍”之名，不見於正史，獨見於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徒食、敦（屯）長、仆射弗告，貲戍一歲。……軍人買（賣）稟稟所及過縣，貲戍二歲”。秦簡中的“貲”，都是罰的意思，罰錢款謂之“貲布”，罰武裝謂之“貲盾”、“貲甲”，罰勞役謂之“貲徭”。顯然，罰戍邊自當謂之“貲戍”。這是睡虎地秦簡對秦代兵制的補充。

必須強調，徭戍、謫戍、貲戍均爲無償兵役。——這是我們辨析戍卒構成的依據之一。

接下來的問題是：里耶秦簡中的陽陵戍卒，到底屬於徭戍、謫戍、貲戍之中的哪一類呢？我們發現，這批陽陵戍卒不在上述任何一種集兵方式之列。他們均是通过招募而來，因爲，他們的千里從戎確實帶有雇傭性質。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繼睡虎地秦簡之後，里耶秦簡對秦代兵制又予以了更爲重要的補充：至少在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之前，秦即已推行了募兵制。試論說如下。

不言而喻，我們首先應當落實陽陵戍卒從軍遷陵的雇傭性質。

前文已列舉兩個反證，說明十二名陽陵戍卒並不是普通的“居貲贖債者”。其一，倘若戍卒們被遠遣他郡從軍是爲了抵債，陽陵司空不當“訾其家”再行追討。其二，以勞役抵償貲贖錢，其服役地點，例在本縣、本郡，債權方陽陵縣沒有將債務人遠遣他郡的可能。這裏，有必要再深入分析一下十二名陽陵戍卒的債務情況，一方面補充論證上述判斷，另一方面，亦藉以說明陽陵戍卒的雇傭性質。

睡虎地秦簡《司空律》：“有罪以貲贖及有責（債）於公，以其今日問之，其弗能入及賞（償），以今日居之，日居八錢；公食者，日居六錢。”^①按，這是法律規定的勞役抵償標準：勿需官府提供伙食者，每日勞役可抵償八錢；需要官府提供伙食者，每日勞役可抵償六錢。日本學者堀毅所著《秦漢法制史論考》曾經以“日居八錢”的標準推算過勞役人員一年勞役的抵償金額（他扣除了《司空律》“居貲贖責者歸田農，種時、治苗時各二旬”的幾十天時間，認爲一年的勞役日數實爲 325 天）： $325 \times 8 = 2600$ 錢。按，陽陵戍卒從軍於千里之外的遷陵縣，自然不可能享有這種“農忙假”，所以，即使以“日居六錢”的最低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51 頁。

標準計算，一年的時間，至少應該可以抵償 $365 \times 6 = 2190$ 錢。

據此，細讀里耶秦簡，我們注意到：J1(9)5 號木牘所記陽陵下里一個名“鹽”的士伍，其所欠罰款只不过區區 384 錢。顯然，按照上述標準，不出三月，他即可全部還清貲錢。而實際上，這個陽陵士伍跟他的十一位同鄉均在遷陵縣至少戍守了兩年。^① $2190 \times 2 = 4380$ （錢），——質言之，十二名陽陵戍卒中，除了欠罰款較多的小欽（11211 錢）和穎（7680 錢）而外，其餘十人早就已經沒有債務了。

實際上，這是一種最為保守的計算方法。因為，背井離鄉的外地兵役與本縣本郡的勞役並不能同日而語，其折算標準差別極大。從西漢初期的法律中，即看得非常清楚。《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前 77）詔“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注引如淳曰：“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徭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按，依如淳所說，去邊境做戍卒，每年三日，不去者須繳納 300 錢給官府，由官府發給戍者。由於大多數人並不親身赴邊，而是繳納 300 錢的代役金，這筆代役金就成了一種賦稅，稱“過更”，又稱“更賦”。漢承秦制，顯然，秦代非義務戍邊的報酬標準當與此相差不遠。參照這一標準，可以斷言，上述在洞庭郡遷陵縣至少戍守了兩年的十二名陽陵籍士兵，應該一律早已還清了債務而可以返鄉了。但是，從上述十二件木牘文書中，我們看不到這些戍卒有退役的跡象，相反，他們似乎還要繼續在遷陵戍守下去。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如果簡單地歸咎於秦始皇連年征戰而不恤民力的暴虐統治，抑或其無度徵發且任意延期的徭役制度，恐怕都難以令人信服。

實際上，木牘文書本身就隱藏著一條至今還沒有引起學者們關注的重要線索：這批陽陵戍卒來遷陵從軍均帶有明顯的雇傭性。如下推論，足以為證。其一，倘若戍卒們不是因雇傭而來，那麼，要求他們在軍中還債，就根本不合邏輯，因為義務兵役是不可能有報酬的。其二，即使他們都是代人服役而獲取報酬的戍卒，這筆代役金也應當由陽陵縣發放。如此，陽陵縣司空要求遷陵縣戍所將戍卒們的服役時間“計年為報”以核算成錢，也實在無法理解。

所以，我們認為，這十二名戍卒應當都是招募而來的“雇傭兵”。唯其如此，他們才有可能獲得一定的報酬，進而被陽陵司空追債於千里之外。同時，著眼於這種雇傭性，上述其它疑滯與矛盾，自然也就渙然冰釋了，此不贅。

需要說明的是，就集兵方式的沿革而言，秦的招募與春秋戰國時代的選募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吳子·圖國》“古之明王……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殆為選募之始。此外，魏之“武卒”、吳之“大力”、韓之“超足”、越之“習流”、齊

① 《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 年第 1 期。

之“技擊”也都是通過“招延募選”而來。按，以選募方式而招集的士兵，戰鬥素質較高，非“民之秀者”難以遂願，所以，這種職業化的軍人，其政治、經濟待遇也頗為特殊。典型如魏之“武卒”，其選拔考試相當嚴格。《荀子·議兵》：“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糧，日中則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所謂“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說一旦中選入武，不但可以免除全家的賦稅，而且還可以得到土地、房屋的優待。但是，我們看到，里耶秦簡中通過招募而來的戍卒，卻與此相差甚遠。例如，J1(9)5 號木牘所記陽陵下里一個名“鹽”的士伍，其所欠罰款只不过區區 384 錢（大致相當於兩個月的勞役），而政府部門並沒有對其予以免除。舉一反三，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批從軍於洞庭郡遷陵縣的陽陵籍戍卒，本身都是身無長技的普通民衆，他們的千里從戎，並沒有通過嚴格的考試與選拔，所以只能稱之為招募。他們從軍的目的，不過就是為了獲取那點低廉的雇傭金。在這個意義上，里耶秦簡所反映的這種集兵方式，與東漢普遍推行的募兵制並無不同。

討論秦代的募兵制，並非祇有里耶秦簡所提供的孤證。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敦（屯）表律》：“冗募歸，辭曰日已備。致未來，不如辭。貲日四月居邊。”按，冗募，整理者謂“意即衆募，指募集的軍士”，可從。本條律令的大意是說：應募的軍士回鄉，聲稱服役期限已滿，但是相關證明文書未到，後經驗證，日期與本人所說不符，每缺少一天予以戍邊四個月的處罰。由此看來，秦民應募當兵，雖然可以獲取一定的報酬，但可能要跟政府簽訂某種性質的“合同”，事先規定服役期限。如果未到“合同”規定的日期而擅自離軍返鄉，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前已述及，睡虎地秦簡成文於商鞅變法至始皇三十年（前 217）之間，結合里耶秦簡所見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募兵的史實，我們推斷：至遲不晚於始皇時代，秦即實行了募兵制。按，史家言募兵制率以漢武帝為始，秦簡的出土，要求我們必須改寫這一“定讞”。

三、遷陵的邊防沿革

酉水素稱“蜀楚通津”，扼守其咽喉要地的里耶，古來即為兵家逐鹿、商賈雲集之地。但是，由於文獻闕如，對先秦時期的里耶，地方史志所及甚少。而今，里耶古城遺址的發掘、里耶秦代簡牘的出土，幾乎復活了一段湮沒的歷史。這裏，試就其邊防沿革略作探討，並兼及某些歷史地理問題。

上文已經論證：里耶秦簡中的“陽陵卒”乃是狹義的戍邊之卒。毫無疑問，戍卒們所屯守的遷陵縣一定也就是秦王朝的邊境縣。這對我們瞭解秦對西南夷的經略，提供了新的信息。

戰國時代，納入秦國版圖的西南夷部族很少。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繼續以巴蜀為根據地開拓西南夷，其中之高潮即遣“常頰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按，“五尺道”始於四川宜賓達乎雲南曲靖，它是李冰任蜀郡太守期間所鑿“焚道”的延伸。顯然，就史籍記載而言，我們對秦經略西南夷的瞭解，不能逸出金沙江流域之外。質言之，那種據滇北金沙江流域“頗置吏焉”進而認為黔東烏江流域也“秦時常通為郡縣”的觀點顯然是靠不住的。

那麼，黔東烏江流域的西南夷與秦王朝的關係究竟怎樣呢？里耶秦簡告訴我們，自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迄秦亡（前 207），黔東及至酉水西岸的夜郎、且蘭、百濮、群蠻諸部族確乎一直都未歸服王化。否則，瀕臨酉水的洞庭郡遷陵縣，哪有成為秦帝國邊防重鎮的資格？其實，據文獻記載，遷陵的邊防地位，在漢武帝建元六年（前 135）派唐蒙招降夜郎侯多同，且歸其地入犍為郡之前，並未有所動搖。換言之，晚至西漢，瀕臨酉水的里耶古城，才徹底完成了其邊防重鎮的歷史使命而成為內郡縣邑。

追溯遷陵的邊防沿革，我們還可以從楚黔中郡西翼的地域伸縮獲得一些新的認識。按，戰國時代，黔中郡是兵家必爭之地，它對秦、楚、巴、蜀、西南夷的戰略意義至關重要。關於秦楚二國在黔中郡的拉鋸戰，史料有如下記載：《史記·秦本紀》：“（昭王）二十七年，（司馬）錯攻楚。……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按，秦昭王二十七年為公元前 280 年，本年，黔中郡首度被秦攻取。後三年，即前 277 年，《史記·楚世家》載：“秦復拔我巫、黔中郡。”又次年，《史記·楚世家》載：“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史記·秦本紀》“楚人反我江南”殆亦指此。由於黔中郡曾經三失三復，故其西翼地域的伸縮自不可免。據貴州各縣方志記載，今黔東沿河——思南——鎮遠——凱里——榕江一綫以東（包括銅仁地區和黔東南部分縣市）都曾經轄歸楚國的黔中郡。但是，質諸里耶秦簡，我們看到，地處酉水上游的洞庭郡遷陵縣，確實又擔負著秦帝國控制西南夷的邊防重任，由此，可以肯定，戰國末期，楚黔中郡西翼的地域已經東縮了不少。換言之，趁秦楚兩國在黔中郡曠日持久的拉鋸戰之際，西南夷便開始了向黔東的推進，在東北，其勢力範圍已經到達了酉水的西岸。同時，我們也可以斷言，先秦時代，幾度位居楚國邊境的遷陵縣，一定也曾長期擔負著楚國的邊防重任。里耶戰國—秦漢古城遺址的發掘，充分證實了上述判斷。按，據發掘報告，里耶古城的建築和使用年代，分兩個階段：第一期為戰國中期至秦代，第二期為西漢。這就表明，戰國中期，楚黔中郡的西翼可能就已經收縮到了里耶地區，此後，下及漢武帝招降夜郎，這座古城一直都是秦漢王朝的邊防重鎮，當然，其防禦對象，已經不再是巴蜀，而是以夜郎為首，即《後漢書》所謂“散在溪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的西南夷。由於秦楚兩國的黔中郡都遭遇過頻繁的地域變動，所以，秦滅楚以後，棄其舊名不用而另置洞庭郡，也不足為奇。

讀簡帛《周易》札記五則

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 蕭從禮

內容提要 傳世本《周易》中的“无”字在先秦及秦漢時期的簡帛《周易》出土文獻中作不同的字；傳世文獻《周易》乾卦中的“用九”和坤卦中的“用六”在馬王堆帛書中分別作“迴九”和“迴六”，“用”和“迴”均非本字，本字應為“同”；解《易》者將“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理解為“君子日則黽勉，夕則惕懼，雖處危境，亦可无咎”，或“君子日則黽勉，夕則安閒休息，雖處危境，亦可无咎”均非確解。“夕惕”應是一個聯綿詞，其義為安閒自得貌。不應將“夕惕”一詞析作二詞。

關鍵詞 《周易》 無 无 迴 夕惕

一、亡

亡，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作“亡”（前二·一五·五）^①或“𠄎”（大保簋）。從字形來看，此為甲骨文“𠄎（有）”（甲一二八九）字的右边或左边部分。“有”失去了一部分，故為“亡”。如甲骨卜辭“甲午卜𠄎咎，甲午卜𠄎咎”。（《乙編》六三九〇）有，是一種存在，亡是有的失去，故有、亡相對。又如《中庸》：“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②“亡”与

① 徐中舒主編：《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484 頁。後文中的甲骨文、金文字，如未注明出處則均出於是書。

②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27 頁。

“存”亦相對而言。甲骨文“亡”字字形乃是據“有”字字形而來，這點也可從今天粵語中的“冇（音 mao）”字的造字原理中得到旁證。從字形來看，“冇”字正是“有”字的缺失，故“冇”之義同於“亡”字。

傳世本《周易》^①中的“亡”字，均為失去義。如《中孚》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旅》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等。傳世本《周易》中的“亡”字，在上博簡《周易》^②的《夬》（傳世本《恒》）九二、《睽》（傳世本《睽》）六五、《夬》九四、《革》、《艮》六五、《漸》（傳世本《渙》）九二等卦爻辭中作“亡”字；在《睽》（傳世本《睽》）初九爻辭中作“亡”字。“亡”字書中不見，但審其字形，該字從九從入，其造字之理和“亡”字有相似之處，或為“亡”字的異形，推測其音和“亡”字當相近，也作失去義講。傳世本《周易》中的“亡”字，在馬王堆帛書《周易》^③中均作“亡”字，也用其本義。

在傳世本《周易》中和“亡”字同義的還有一個“喪”字。《說文》：“喪，亡也。”喪，古音屬心母陽韻，亡，古音屬明母陽韻，喪、亡二字古音聲母並不相通。故王力在《同源字典》^④中並未將“亡”、“喪”視為同源字。但從其文字的構造上看，喪字的“亾”當為義符，亾之本義為失去，故喪之本義亦當為失去義講。段注認為“喪”之本義為死亡義，喪失為其引申義。這恐怕並不準確。傳世本《周易》中的“喪”字，均作失去義講。如《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睽》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等。在阜陽漢簡《周易》^⑤中已經出現“喪”字（如《睽》初九）。“喪”字在帛書《周易》卦辭中均作“亡”字。傳世本《周易》中的“喪”字，在上博簡《周易》中亦寫作“亡”字[如《睽》（傳世本《睽》）初九]。

此外，在傳世本《周易》中和“亡”字同義的還有一個“罔”字。傳世本《周易》中《大壯》九三爻辭“小人用壯，君子用罔”之“罔”字在帛書《周易》中作“亡”字。亡、罔二字古音都是明母，韻部魚陽對轉。都有否定義，作“有無”之“無”義。

二、無

無，帛書《周易》中數見。如《損》卦辭：“有復（孚）。元吉，無（无）咎。”《辰》

① 朱熹：《周易本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②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③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④ 王力：《同源字典》，商務印書館，1982。

⑤ 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傳世本《震》）六三爻辭：“辰（震）疏（蘇）疏（蘇），辰（震）行無（无）省（眚）。”

廖名春先生釋“無”作“𦰩”字^①。無、𦰩實同爲一字，但就帛書原文而言，廖名春先生釋作“𦰩”字無疑是最爲符合帛書原義的。

𦰩的本字爲甲骨文“𦰩”（《粹》一三一二）。“𦰩”像人兩手執牛尾而舞，《呂氏春秋·適音》：“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②據字形，可以猜想此或爲先民在某種重要活動（如狩獵、戰爭等）開始之前（或結束之後）所進行的一種與神靈溝通以求得神靈庇佑的儀式，這種儀式是通過舞蹈的形式來實現的。通過這種舞蹈的形式以求得無處無時不在的神靈的庇佑。先民相信，有了神靈的庇佑，既可避免猛獸的傷害，又可獲得豐富的獵物。“𦰩”的本義爲舞蹈，後用“舞”字表示。《說文》：“舞，樂也。”“舞”的目的之一在於能與神靈溝通，在神靈的庇佑下獲得豐盛的食物。故“𦰩”字又引申出“豐、大”之義，用“𦰩”字表示。此“𦰩”字即《說文》中的“𦰩”字。《說文》：“𦰩，豐也。”段注：“此蕃𦰩字也，𦰩變爲無，遂借爲有𦰩字。而蕃無乃借廡或借蕪爲之矣。”許慎釋“𦰩”爲“豐也”是對的，祇是所釋爲其引申義而非本義。段注誤認爲“𦰩”才是表“有無”義之“無”字。段注之誤在於不知“𦰩”字即爲“有無”之“無”。而“𦰩”字應是一個後起字。吳大澂認爲：“古‘無’字不從‘亾’。”^③“𦰩”字的“亾”爲義符，其義同於“亡”字。上古時能和神靈相通的人稱作“巫”。《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神靈雖無形，但又無處不在。面對著無法感知的神靈，人們甚是敬畏。後來人們就用“𦰩”字來表示這個“無形”。

𦰩和亡在意義上頗有相通之處，二字的古音又相近，所以人們將二字混用。在金文辭中可見𦰩和亡混用的例子。如《兮甲盤》中“休，亡湣”和“萬年𦰩疆”等。後來人們乾脆用“𦰩”字取代“有亡”義之“亡”字，以至於“亡”的本義反被人所遺忘。《說文》：“亾（亡），逃也。”段注云：“亡之本義爲逃，今人但謂亡爲死，非也。引申之則謂失爲亡，亦謂死爲亡。”《說文》所釋爲“亡”的引申義，而段注之誤，正將“亡”字的本義和引申義說反。

由此看來，《說文》中的“舞”、“𦰩”二字，實皆同源於甲骨文“𦰩”字。帛書《周易》中的“𦰩”字，實取“亡”之“有亡”義。秦漢以降，人們將“𦰩”字的兩木變作四點，而成爲“無”字。

① 廖名春：《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易學集成》，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

② 《呂氏春秋·適音》，《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643頁。

③ 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中華書局，1988，51頁。

三、无

就出土文獻而言，秦以前的出土文獻中還未發現有“无”字。在銀雀山漢簡、馬王堆帛書和阜陽漢簡中則出現了“无”字。《說文》：“无，奇字無也。通於元者，虛无道也。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許慎所謂的“通於元者，虛无道也”，指元字的一撇貫通上部便達於虛无之道了。如阜陽漢簡中的“无”字作“无”，其字正可用來理解“通於元者，虛无道也”，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個“虛无之道”是絕對的“无”。元爲始，未有始之前則爲虛无。從元、无二字的字形來看，許慎的解釋還是有道理的。“无”和“有無”的“無”是不同的概念，“無”是相對於“有”而言，故“無”是相對的“無”。這就是《墨子》中所說的“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後無；天無陷，則無之而無”^①中的“無”和“无”。前者是相對的，後者是絕對的。傳世本《周易》中的《屯》六三爻辭“即鹿无虞”之“无”字，在馬王堆帛書《周易》中作“毋”字。“无”、“無”和“毋”相混用的現象在馬王堆帛書中多見，茲不贅述。銀雀山漢墓竹簡中的“无”字亦和無、毋混用。如“軍毋輜重糧食則亡无委積則亡”、“无法之賞無正之令”等^②。

這樣看來，奇字“无”出現後並非爲《周易》所獨有。在漢熹平石經中，奇字“无”才完全爲《周易》所專有。

四、迴

《周易》六十四卦中每卦六爻，而《乾》卦多一條“用九”，《坤》卦多一條“用六”。關於“用九”和“用六”的“用”，王弼注“用九”：“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群龍’之義焉。”^③朱熹注“用九”、“用六”：“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用六，言凡筮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④可見，王弼注和朱熹注均將“用”理解爲“使用”之義，後來的解《易》者多沿襲此種說法。

通行本中“用九”、“用六”的“用”，在馬王堆帛書《周易》中，均作“迴”。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認爲“用”爲本字，“迴”爲假借字；鄧球柏先生認爲“迴”爲本

① 墨翟：《墨子》卷一〇，《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60頁。

② 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85。

③ [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華書局，1994，34頁。

④ 朱熹：《周易本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6頁。

字，依《廣韻》釋爲“過”之義。“迴”，含有“通過”、“超越”等意義。“迴九”即“超越了陽爻”便變成了陰爻；^①張立文先生也以“迴”爲本字，認爲“迴”有“通達”、“同”之義，“迴（用）九”，猶通達九或同爲九；^②廖名春先生則認爲“用”、“迴”均非本字，“通”當爲本字。^③論據主要有三：其一，通行本《繫辭》中的“通”在帛書《繫辭》中作“迴”，故帛書《繫辭》“迴”的本字都作“通”，帛書《易經》（包括《帛書易傳》）中的“迴九”、“迴六”之“迴”的本字亦當作“通”。其二，古甬、用二字形近音同，故常可通用，如《曾姬無恤壺》和《江小仲鼎》中的“甬”讀爲用。甬可讀爲用，通也可寫作用。故今本《周易》“用九”、“用六”之“用”，本字亦當作通。其三，“用九”、“用六”之“用”，義爲全、皆。《孟子·告子上》：“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其“通”之用法與此同。《乾》卦六爻筮數全爲九，故稱“通九”；《坤》卦六爻筮數全爲六，故稱“通六”。

上述四家之說中，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未說明“用”爲本字、“迴”爲假借字的理由。鄧球柏先生之說於義未妥。張立文先生之說可備一說，惜言之未詳。廖名春先生論說最爲詳盡，其說最近本義，但筆者以爲廖名春先生之說似還有剩義可尋。概言之，其一，由古甬、用二字形近音同，故常可通用。甬可讀爲用之例，似並不能得出“通也可寫作用”的結論。其二，說“用九”、“用六”之“用”，義爲全、皆，於理無據。

筆者以爲，通行本《易經》中“用九”、“用六”的“用”和帛書《易經》中“迴九”、“迴六”的“迴”二字，皆非本字，其本字當爲“同”字。

用，古音屬喻母東部；同，古音屬定母東部。用、同二字古音疊韻准旁紐，是以“用”可通假爲“同”。文獻中亦可見用、同相通假之例，如《墨子》“故當尚同之爲說也”之“同”畢本作“用”，又該書“上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之“用”畢本作“同”。^④此外，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用、同二字的字形相似，如同字作“𠂔”（後下一零·二）、用字作“𠂔”（前四·六·四）。故在傳抄過程中也有可能因形近而致訛。

迴、同二字古音均是定母東部，是以“迴”可通假爲“同”。帛書《老子》（甲）、（乙）“和其光，同其塵”之“同”字^⑤在《郭店楚墓竹簡·老子》（甲）中作“迴”^⑥。

《乾》卦六爻筮數同爲九，故稱“同九”；《坤》卦六爻筮數同爲六，故稱“同六”。

① 鄧球柏：《帛書周易校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76頁。

② 張立文：《帛書周易注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11頁。

③ 廖名春：《〈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齊魯書社，2001，9頁。

④ 吳毓江：《墨子校注》，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124頁。

⑤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中華書局，1996，98頁。

⑥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112頁。

五、夕惕

传世本《周易·乾》九三爻辭“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在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周易》中作：“君子終日鍵（乾）鍵（乾），夕泥（惕）若厲，无咎。”

鍵、乾二字古音同在群母元部，故鍵、乾二字可通。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認為“鍵”假借為“乾”，以“乾”為本字。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認為“泥”假借為“惕”，以“惕”為本字。廖名春先生據帛書改釋文“泥”為“沂”。他認為：

驗諸字形，從帛書《六十四卦》到帛書《二三子》、《衷》，此字皆從水從斤，不能隸定作“泥”，同時“泥”今本何以作“惕”，難以回答。從字形上看，兩字形體相距太遠；從字音上看，“泥”古音屬脂部泥母，“惕”屬錫部透母，不存在通借的可能性。而“沂”字古音屬微部疑母，從“斤”之字如析、浙、晰、薪、蜥與從“易”之字錫、惕古音皆為錫部心母。^①

廖名春先生認為就字的形、音而言，惕、泥二字字形不同、二字在古音上也不可通借。據此，改釋文“泥”為“沂”。

筆者以為，無論是釋作“泥”還是釋作“沂”，皆非確詁。該字可徑釋為“易”字。

《說文》：“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易”即蜥蜴之“蜴”的本字。“易”為象形字，如甲骨文“𩇛”（前七·四·一）、金文“𩇛”（毛公鼎）、“𩇛”《三體石經·君奭》，皆突出蜥蜴的頭部。細較帛書^②，該字右邊部分不太清晰，右下角的一點似為污點。據此，該字形應作“𩇛”，此字形和金文“易”字作“𩇛”（耳尊）甚為相似。所以，認為帛書中該字從水從斤（或從尼）之說並不可從。易，古音喻母錫部；惕，古音透母錫部，喻透准旁紐，是以易、惕音近而通。

《周易·乾》九三爻辭“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歷來為解易者所注意。對該爻辭的斷句，歧義甚大，對該爻辭辭義的理解，也是見解紛呈。影響較大者當如孔穎達《正義》的解說，《正義》云：

以陽居三位，故稱“九三”；以居不得中，故不稱“大人”；陽而得位，故稱“君子”；在憂危之地，故“終日乾乾”，言每恒終竟此日，健健自強，勉力不有止息；“夕惕”者，謂終竟此日後至向夕之時，猶懷憂惕。“若厲”者，若，如也；厲，危也。言

① 廖名春：《〈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齊魯書社，2001，5頁。

② 陳松長主編：《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

尋常憂懼恒如傾危，乃得无咎。謂既能如此戒慎，則无罪咎；如其不然，則有咎。^①

後世解《易》諸家，對《周易·乾》九三爻辭雖多所闡發，然皆無出《正義》之說。近世如高亨釋該爻辭為“君子日則黽勉，夕則惕懼，雖處危境，亦可无咎”^②，即主《正義》之說。

廖名春先生則利用帛書《周易》材料，提出了不同於傳統的新見解。廖名春先生認為，帛書中的“夕沂若”之“沂”即“析（慙）”，由解除引申為安閑休息。他認為《乾》卦九三爻辭並非是說“君子日則黽勉，夕則惕懼，雖處危境，亦可无咎”，而是說“君子日則黽勉，夕則安閑休息，雖處危境，亦可无咎”。據此，他認為這條爻辭講的就是“因時而動、因時而止的道理”，“因其時而乾乾，因其時而止息，是動靜的辯證觀”。^③

廖名春先生對該爻辭的理解較之傳統的理解更接近爻辭本義。但筆者以為廖名春先生的理解還可以討論。事實上，通行本的“夕惕”是聯綿詞，和帛書本的“夕易”同屬一詞。該詞的另一個寫法為《淮南子·人間訓》“翱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④之“析惕”一詞。析，古音屬錫部心母；夕，古音屬鐸部邪母。錫、鐸旁轉，心邪旁紐，是以析、夕古音可通。

《淮南子·人間訓》中“析惕”一詞，各本亦作“徜徉”。“徜徉”亦作“彷徨”。這為我們探尋“析惕”一詞的含義提供了綫索。“徜徉”一詞有安閑自得貌，《廣雅·釋訓》：“徜徉，戲蕩也。”唐韓愈《送李願歸盤穀序》：“終吾身以徜徉。”《廣雅·釋訓》：“徘徊，便旋也。”《說文》：“翱，翱翔也。”段注認為，“翱翔”即“彷徨”。“翱翔”和“徜徉”為對文，“翱翔”和“徜徉”二詞均有安閑自得之義，又“翱翔”和“徜徉”均為聯綿詞，據此，可推斷“析惕”一詞亦當為聯綿詞，也有安閑自得之義。

從語源學的角度而言，“析（夕）惕”一詞和犀、犀遲、棲遲、遲遲等詞是同族詞。所謂同族詞，是指“詞族中單個的詞”^⑤。從古音而言，犀、遲、棲三字古音均在脂部心母；析，古音屬錫部心母；惕，古音屬錫部透母。脂、錫通轉，心、透鄰紐，所以“析惕”一詞和犀、犀遲、棲遲、遲遲等詞的上古音可相通。從詞義而言，“犀”有安閑之義。如上博楚竹簡《詩論》第二簡“元樂安而犀”之“犀”字。^⑥《說文》：“犀，犀遲也。”《玉篇》“犀”作“棲”。《詩·陳風·衡門》：“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毛傳曰：“棲遲，遊息也。”《詩·邶風·穀風》“行道遲遲”，《毛傳》“遲遲，舒行貌”。又《牆盤》銘

① 孔穎達：《周易正義》卷二，《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73頁。

② 高亨：《周易古經今注》（重訂本），中華書局，1984，163頁。

③ 廖名春：《〈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齊魯書社，2001，5—8頁。

④ 《淮南子》，《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293頁。

⑤ 任繼昉：《漢語語源學》，重慶出版社，2004，146頁。

⑥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文：“害犀文考乙公遽爽。”秦永龍認為：“害犀，當讀為舒遲，是雙聲聯綿詞，閑雅舒適的樣子。”^①

如上所述，析惕、夕易、夕惕三詞實為同一個詞的不同寫法而已，其義為安閑自得貌。解《易》者將“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之“夕”字釋為和“日（白天）”相對的“夜”，這都是因為不知“夕惕”實為聯綿字之故。

《說文》：“乾，上出也。”“乾”字從軌聲，軌字從𠂔聲。《說文》：“𠂔，旌旗之遊，𠂔蹇之貌。古人名𠂔字子遊。”從聲訓來看，乾，𠂔二字同屬元部，聲母為鄰紐。“𠂔”有游動貌，“乾”因聲而得義，故“乾”之本義當有游動貌。“乾乾”亦有游動之義。

帛書《易傳·衷》傳“君子終日鍵（乾）鍵（乾），夕沂若，厲，无咎”說：

子曰：……“君子冬日鍵鍵”，用也；“夕沂若，厲无咎”，息也。《易》曰：“君子冬日鍵鍵，夕沂若，厲无咎。”子曰：知息也，何咎之有？人不淵為躍。則不見□□□□□□反居元□□^②

上述傳中“‘君子冬日鍵鍵’，用也。”言君子因動而用，這是從動的方面而言。“‘夕沂若，厲无咎’，息也。”言君子因靜而息，則是從靜的方面而言。所謂“知息也，何咎之有？”是說作為君子，只要懂得因時而作、因時而止的道理，則不會有什麼咎害。可見，帛書《易傳》中並沒有將“夕”字釋為“夜”。較之傳統的解《易》諸家，則帛書《易傳》更為準確。

① 秦永龍：《西周金文選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84頁。

② 廖名春：《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衷》，《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31—32頁。

張家山漢簡“去（盍）”字補釋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孟蓬生

內容提要 張家山漢簡中有“去臥”、“去伏”、“去立”等說法，前人多不得其解。本文同意陳斯鵬先生將“去”字讀為“盍”的意見，並在此基礎上對“去（盍）”的意義做了進一步的探討。文章認為，“去（盍）臥”、“去（盍）伏”、“去（盍）立”中的“去（盍）”應訓為“面朝下”。“去（盍）臥”就是傳世典籍中的“合臥”，與“仰臥”相對；“去伏”則是先“合”後“伏”，為“去臥，端伏”的省略說法；而“去（盍）立”當指“兩腿相闔（合）”，與“夸足”（兩腿張開）相對。

關鍵詞 訓詁 張家山漢簡 去臥 去伏 去立

《張家山漢墓竹簡·引書》中有“去臥”或“去伏”的說法：^①

（1）□，因昫（响）之三十，去臥，據則（側）精庠（呼）之三十，精昫（响）之三十，精炊（吹）三十，端談（俛），吸精氣而咽之，臍少腹，以力引陰，三而已。
（簡 62，294 頁）

^①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文物出版社，2001。例句後加注簡號和頁碼。本文以下凡引此書祇注簡號和頁碼。

（2）去臥，端俛，加兩手枕上，加頭手上，兩足距壁，而賈（固）箸（著）少（小）腹及股𦵏（膝）于席，三而已。去臥而尻壁，舉兩股，兩手鈎（鉤）兩股而力引，極之，三而已。（簡 75-76，295 頁）

（3）因去伏，足距壁，固箸（著）少（小）腹及股𦵏（膝）于席。（簡 72-73，295 頁）

這幾例中“去”字十分費解，學者多從蓋闕。陳斯鵬先生曾撰文對該字的意義進行探討，以為“去”字實際上是“盍”字所從的聲符，當讀為“啟闔”的“闔”字：

漢字中有兩個來源不同的“去”字，古音一在魚部，即來去的“去”，一屬葉部，像器皿上有蓋之形，即“盍”之本字，二者因形近而混同。裘錫圭先生對此曾有詳細論證，可以參閱。竊疑上舉《引書》幾處“去”字都應是葉部的“去”，而非魚部的“去”，讀為“啟闔”的“闔”，驗諸文例，無不適通。例（1）、例（2）的“去（闔）臥”意即緊著床席而臥，簡文所謂“固著小腹及股膝于席”云云可證。例（3）的“去（闔）伏”指的是緊著床席而伏。證如前。^①

陳先生對字形的分析可謂鑿破混沌，但關於該字的意義似乎還有進一步推敲的餘地。我們以為這個字與“合”字相通（同源通用），其意義已由“閉闔”引申為“面朝下”。試為補證如下：從聲音上看，合聲在緝部，盍聲在盍部，音近可通。《戰國策·秦策三》：“意者，臣愚而不闔于王心耶？”鮑彪注：“闔、合同。”《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君正》：“號令闔于民心，則民聽令。”“闔于民心”就是“合于民心”。

從用例上看，後世醫書有“合臥”的說法，與“仰臥”相對，指俯臥。明朱橚《普濟方》：“心熱者，視其睡，口中氣溫，或合面睡及上竄咬牙，皆心熱也，導赤散主之。心氣熱，則心胸亦熱，欲言不能而有就冷之意，故合面睡。心氣實，則氣上不行，澁。合臥則氣不得通，故喜仰臥則氣得上下通也，瀉心湯主之。”

成語有“前合後仰”一語，“合”與“仰”相對，亦取“面朝下”之義。元無名氏《醉寫赤壁賦》第一折：“可惜玉山頹，儘教恁金波漾，拚了個前合後仰。”《明太祖文集·題趙千里江山圖》：“觀斯畫景，則有前合後仰，動靜盤桓。”

作“面朝下”講的“合”字還見於“合面”、“合撲”（合仆）等組合中。《元典章·刑部四·戲殺》：“（陳豬狗）用右拳於（趙羊頭）後心打了一拳，本人合面倒地身死。”據此可知上文《普濟方》中的“合面睡”就是“合臥”之義。元關漢卿《救風塵》第一折：“忽地便喫了一箇合撲地，那時節睁着眼怨他誰！”“合撲地”指“臉朝下仆倒於地”，

① 陳斯鵬：《張家山漢簡〈引書〉補釋》，《江漢考古》2004年第1期。

但在例句中作名詞用。元馬致遠《還牢末》第二折：“把僧住支殺的拖將去，連賽娘合撲的帶了一交。”《漢語大詞典》訓“合撲”為“臉朝下仆倒”^①，其實核諸文例，“合撲”祇是“臉朝下”的意思。“合撲”的這兩種用法在現代漢語方言中均有保留，祇是字寫作“合仆”。章炳麟《新方言·釋言》：“《說文》：‘仆，頓也。’江南運河而東至浙江，謂墜地俛者為合仆。”此例中“合仆”指“臉朝下仆倒”。上海崇明歌謠：“朝天困，滿天星；合仆困，被絮筋。朝西望，牽牛人；朝北望，上鎮人。”此例中“合仆”祇是“臉朝下”的意思。

現在回頭對文章開頭簡文做一個詳細的解釋。所謂“去臥”指身體面朝下取臥位，這是身體的起始姿勢。“端俛”就是“把頭正著抬起來”，而“端”則是“把頭正著低下去”。例（3）的“合伏”當是先“合”後“伏”，其實就是例（2）“去臥，端伏”的省略說法。例（2）中第二个“去臥”當是“去立”之誤。因為如果是取臥位（不管是仰臥還是俯臥）的話，是不可能“尻壁”（臀部貼近牆壁）的。

問題似乎解決得很完滿，但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以上我們用作證明材料的語例時代偏晚（我們目前檢得的“合臥”的最早語例是元代）。大家知道，用後代的語料證明前代的字義，如果時間跨度太大，就不免讓人生疑。其實我們以上所舉的語料都是與人體相關的，如果我們把範圍擴大，就會發現一些時代較早的用例。就目前來看，我們檢得的例子可以追溯到北魏。以下是《齊民要術》抄出的幾例：^②

（4）《齊民要術·種韭》：“種法：以升盞合地為處，布子於園內。”（203頁）

（5）《齊民要術·塗甕》：“塗法：掘地為小圓坑，生炭火於坑中，合甕口於坑上而熏之。”（477頁）

（6）《齊民要術·造神麴並酒》：“淘米須極淨，水清乃上炊為饌，下著空甕中。以釜中炊湯及熱沃之，令饌上水，水深一寸餘便止。以盆合頭，良久水盡，饌極熟軟，便於席上攤之使冷。”（497頁）

（7）《齊民要術·煮膠》：“膠盆向滿，舁著空靜處屋中，仰頭令凝。凌旦，合盆於席上。”（680頁）

例（4）、例（5）的“合”指將升盞或甕等器皿“正面朝下覆蓋”或“倒扣”之義。例（6）“合頭”與例（7）的“仰頭”相對，指“頭朝下”或“正面朝下”。

北魏去漢已近，相信隨著古籍的電子化，將會有更早更多的同類例證被發現。

① 《漢語大詞典》第3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5，158頁。

② 繆啟愉：《齊民要術校釋》，第2版，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例句後加注簡號和頁碼。

除了“去臥”、“去伏”的說法外，《張家山漢墓竹簡·引書》中還有“去起”、“去立”的說法，其中“去”的意義也有待進一步探討。

（8）去立，夸足，以俛（俛）據地，極之，三而已。（簡 84，296 頁）

（9）是以必治八經之引，炊（吹）昉（响）庠（呼）吸天地之精氣，信（伸）複（腹）折要（腰），力信（伸）手足，輶踵曲指，去起寬亶，偃治鉅引，以與相求也，故能毋病。（簡 104—105，298 頁）

關於以上兩例，陳斯鵬先生說：例（4）的“去（盍）立”當指屈膝而立，成下盍之勢。簡文他處數見“端立”，則是指直立，與“去（盍）立”相對。例（5），《高注》云：“去起，不解，疑為釋為臥，起。亶，大。……寬亶，即寬大。度量寬大，能容人。或可釋為‘寬袒’”。疑“去”之義為“臥”，稍近之。按，細分之有“去（盍）臥”、“去（盍）伏”，總括言之則稱“去（盍）”，此與“起”相對而言。“寬亶”讀為“寬袒”，可從。^①

我們覺得從《引書》簡文來看，似乎不足以證明“去（盍）立”跟“端立”存在相對關係。我們的印象是，“去立”指“兩腿相盍（合）”，與“夸足”（兩腿張開）相對。“去臥”和“去伏”的關係我們在上文已經作了分析，“去”指“面朝下”，“俛（俛）”（陳文隸為“伏”）指低頭，“臥”指身體與席面（或床面、地面等）平行，三者相關但絕不可以相混。例（9）中“去起”與“偃治”似乎是相對而言的。如此推測不誤，則“去”仍以訓“面朝下”為是，與“偃”訓“面朝上”相對。由於這兩例中上下文的詞句的含義都不甚清楚，我們對“去”字用法的解釋還祇是一個初步的看法，有待今後進一步論證。

① 陳斯鵬：《張家山漢簡〈引書〉補釋》，《江漢考古》2004 年第 1 期。

漢簡長安至河西的驛道

甘肅省博物館 初世賓

內容提要 居延、敦煌分別出土的漢代驛置道里簡牘，可以相互模擬、參證、互補，復原出從長安赴敦煌的驛道驛站里程。其中，途經固原和景泰的“高平道”為北路，是漢代交通國際的“第一號國道”，亦即絲綢之路中國段的主幹綫。本文對其開創、路綫，以及南路、河西道等諸多相關問題，重予審視，作了新的探討研究。

關鍵詞 簡牘 模擬復原 長安至敦煌 驛置交通

1990—1992 年發掘的敦煌懸泉置遺址，曾是漢代專職郵驛交通的一座“置”站。這裏出土了大量關於中西交通、置傳制度、西域外交等方面的簡牘文物。^①其中，有一枚木牘（II. 90DX. T0214①:130）上下共三欄，羅列出武威、張掖、酒泉三個郡的部分驛置的名稱、次第、里數，有的郡還作了驛置、里數的小計。這顯然是一份行路里程的索引和指南。

無獨有偶，早在 1974 年在額濟納旗發掘破城子時，也發現過一枚相似的木牘（EPT59:582），內容是從長安到河西張掖郡的驛路置站名稱、里數。^②

①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發掘簡報》、《敦煌懸泉漢簡內容概述》、《敦煌懸泉漢簡釋文選》，均見《文物》2000 年第 5 期，1—45 頁；圖二：4。

②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等：《居延新簡》，文物出版社，1990，395 頁；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等：《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中華書局，1994，圖版 389。

這兩枚木牘本身文字皆無缺損，但從所應記的內容分析，各缺少了約一半以上的內容，故推斷這兩份文書至少各包括二枚木牘，但這絲毫無損於它的歷史地理學的重要價值。非常僥倖和有趣的是，在兩種路程之中，有一段路是共有而重合的，而各自所缺失的，恰好又被對方所保存。因此，早有學者指出二者可相互參補。現利用這一有利因素，作一點簡牘的整理復原工作，以提高其資料價值，並就相關問題談點看法。

一、模擬復原及說明

根據簡牘文書整理的一般規律和方法，按照此二牘提供的書式、內容，並參考《漢書·地理志》等記載，試類比模擬補出其缺失的部分，力圖恢復其大致原貌。（見圖 1、2）

需要指出，這種內容的拼合互補，形式的模仿，並不是隨意的，還必須具備以下條件。一是時代相同，不同時代（甚至不同時期）不可這樣做。據出土層位、共存紀年簡等，此二牘時代屬於西漢晚期或東漢初年，但其中不包括新莽，因為二木牘的地名均未受到王莽改制的影響。二是其文書性質、功能及書式、文例完全一致，皆屬官文書，進行拼合、模擬復原是可行的。

但是，這樣做的當中亦不無問題。

懸泉驛置牘（例 1），文字自上而下分三欄，每欄自右而左讀，共四行。牘下部殘缺約 4.5 釐米，殘斷處無文字墨迹，推測這缺失部分本無文字。按此牘左旁的另一牘已散失，其書式同此牘，書寫閱讀時，右承此牘第一欄末“顯美”，左讀至現存牘第二欄開頭的“氏池”，其總次序是自右而左先橫讀，讀畢再轉欄。根據這一規律，現存牘第一欄最末的武威郡姑臧至張掖郡顯美，當是武威郡里程的最後一站，再向張掖郡氏池之間，除引用破城子驛置牘（例 2）的有關部分刪丹至氏池共五站，又仿照現存牘有酒泉郡小計，武威郡也作小計，另顯美、刪丹之間需補“番和”一站。這樣，復原出的缺失牘第一欄，至少需安排七行內容。用同樣辦法，可補出其第二欄內容。其中，首先需有張掖郡小計。其次，表是為酒泉郡最東一縣。據地理志，酒泉郡共九縣，如果減去位置偏北、不在大道上的會水縣，還必須增加三個置站，才符合“•右酒泉郡縣、置十一”的小計數。這樣，要做到與現存牘相銜接，缺失牘的第二欄，起碼必須安排九行內容。此缺失牘第一欄七行，較寬；第二欄更寬，需寫九行，這不大符合漢簡的書寫格式和習慣。這便是可疑之處。故由此推測缺失牘可能是兩枚。三個置站，以 A、B、C 代表，不知名稱。其位置選定在公認距離較遠的兩縣之間，但不知是否準確？這是可疑之二。又現存牘的第三欄，止於酒泉郡小計。那麼缺失牘兩枚的第三欄，可能列出敦煌郡的驛置里程，但也可能不列。地理志敦煌郡共六縣，

據懸泉新出簡牘，效穀縣不在大道綫上，驛置東起淵泉、冥安、廣至、魚離、懸泉、遮要，止於郡府所在地敦煌縣共七站。但交通綫還可延續至西南方臨近陽關的龍勒縣，總爲八站。這樣，加上敦煌郡的小計，需安排九行內容，與第二欄相同，也是九行。這裏有沒有敦煌郡的內容呢？此爲可疑之三。

破城子的驛置里程牘完整無缺，上下共四欄，每欄四行。其左側缺佚牘亦與之相仿，第一欄爲現存牘“義置”至“月氏”之間的縣置，我們安排了四站。這段路，顯然是沿涇河上溯向西北通蕭關的大道，必經漆縣（右扶風）、陰槃、臨涇、月氏（安定郡）等地，故直接補出。但第二欄“高平”、“媼圍”之間，直綫距離約 210 公里，合漢里 500 多里（每漢里約 415.8 公尺），此外如果按第一欄的格式也安排四站程，每程平均 126 漢里，似乎太遠了，但安排五站（行）也不大可能。此點頗令人懷疑不決。第三欄，小張掖至刪丹，參照例 1，恰好四站，無問題。第四欄，參照例 1，氏池至鱒得一站，適可而止。其後最多有一行小計，即長安至張掖郡府所在的縣置、里程總數。如果再繼續下去，此缺佚牘可將張掖郡鱒得以西全部縣置列完，但這種可能性也不大。又此缺佚牘中不知名之地點，分別以 D、E、F 代表。

以上所作模擬式復原，儘管還有令人疑惑不解之處，但畢竟離真實更近一步，這便於進行綜合的和類比的分析。

二、書名、書式和道路名稱

在敦煌、居延漢簡中，有少量記錄某部、隧所轄之塞防如天田、杙柱、懸索的長度、數量，或者二隧之間距離，或者本部幾個隧的總長度等等。此類簡牘，稱“亭隧道里簿”，其距離、長度均以“里”、“步”爲單位計算。准此，本文二牘，按文書分類，可定名爲《驛置道里簿》或《驛置道里集簿》。木牘，適合於寫文字較多、又需分項的內容，一般爲簿記之類。江蘇連雲港市尹灣漢簡，有《東海郡上計集簿》、《元始四年武庫兵器簿》等，乃是東海郡太守上呈中央的計簿副本。木牘較寬，字跡細小嚴整，正反面書寫，一書僅一牘。後者上下共六欄，每欄有多至二十五行的。所謂集簿，有集合編撰的意思，比一般單一內容的簿書高一檔次。漢代的交通，每段較短的路途，應有里程簿，而長途應包括許多短路段，則需編爲綜合性的里程集簿。

如前所述，例 1 簿三枚牘，祇寫三欄文字，第四欄爲空白。例 2 簿二枚牘，寫四欄文字。它們原來是編聯成冊的，共三編。材質爲松木，製作、書寫均規範嚴謹，與前述尹灣牘簿相同，並遺有長期使用痕跡。

文書格式爲條目式，兩簿完全相同，文字極簡明扼要。每一條目，寫出相鄰二驛置名稱及其間距里數。驛置名稱，一種稱置，如茯置、義置、居延置、鈞著置、祁連置等。一種不稱，不稱的多爲縣名，而實際所指爲該縣之置，應在該縣治的廓下，當通衢大道口，總之距縣城不遠。但也有一部分並非縣名而是兩縣治所之間的置站，如例 2 之里等。二置站相去的里數，從數字看，是實測的，如 99、61 里等等，並非約數。漢簡記邊塞界止、道里和戍務勞作的“里”、“步”，一漢里爲三百步，每步（爲中人之步二步）約 1.4 米，故一里約爲 416 米。例如除沙一里十五步，巡視天田三里百八十步等。簡牘所記郵書、物品傳送、驛置車馬往來，對路線、速度，有律令章程作出規定要求。例如，人力步行送郵書每時須行十里，晝夜十六時，行百六十里。烽火傳遞敵訊每時須行百里，晝夜行千六百里。

《漢舊儀》：驛馬“三騎，晝夜行千里爲程”，平均每時約行 62.5 漢里。這種規定，是根據道里的遠近和交通形式制定的，故道里簿中的里程具有法令性質。又驛置的次第，標誌着道路方向、綫路，尤爲重要，也不得顛倒打亂。此二簿一件出敦煌、一件出額濟納旗，二者本無關係，但形式、內容卻如此相似，足證其必有所本，其來源應是政府統一的規定、程式之類律令。

兩簿也有小差異。如例 1 酒泉郡的置、里有統計數。據此我們對武威、張掖郡也作了復原，而例 2 沒有。小計的縣，是指縣治城廓的驛置；里數，則是該郡轄區道路的總長度。關於兩個置站及其間距里數，此二簿中無一例重合者，所以無法核對二者的里數是否相同。又二簿地名相重者，祇有小張掖、氏池二地。

此二簿中的驛置間距有 27 個資料。茂陵至茯置 35 漢里，路程最短，屬特殊情況。其它，50-59 里區間有七例，其中 50 里者五例。60-69 里之間亦七例，其中 60、61、62 里共五例。70-75 里共五例，80-87 里三例，90-99 里四例。前文分析高平至媼圍段驛置間距可能平均爲 125 漢里，也屬於特殊情況。看來，驛置間距以 50-75 漢里爲多，76-100 漢里者較少。清代習慣將二驛站之間距稱作“一程”、“一站”。漢代相距較遠的站距，大約相當短程的二倍即二程左右的里數。當然，這樣間距的驛置並不多。

例 1 第二欄“饒得去昭武六十二里”的下方，有小注“府下”二字。府，或解爲張掖太守府，治饒得縣（今張掖西北 20 公里左右）。府下，謂府所在。但繫於此條而不繫於前條之下，表明治所在饒得以西之地。但是，同簿之姑臧，乃武威郡府治所，卻無“府下”之注，故當求它解。按東漢涼州刺史，《後漢書·郡國志》云治所爲漢陽郡隴城，又一說治同郡冀縣，西漢則治無定所，故疑此“府下”或指涼州刺史（涼州牧）治所。又東漢建武初年，據居延破城子新出簡，竇融任河西五郡大將軍、涼州刺史、張掖屬國都尉，其治所亦當在饒得一帶。

漢時命名道路，所見有兩種情況。一是依照大的方位走向而定名，如匈奴道、羌中道、

蜀道（見《漢書·張騫傳》）、西南夷道（《司馬相如傳》）、西域南道、北道、新道（《西域傳》）之類。另一種是以所經具體地點命名，如居延道、高平道、回中道、褒斜道、陰平道、井陘道等，不一一贅舉。

例 1 簿之道路，東西貫通河西四郡，其地原為匈奴右部。《史》《漢》張騫傳云，其首次“鑿空”，“道必更匈奴中”，即指此路，故初名為“匈奴道”。後被漢朝收復，“築令居以西”，“列四郡，據兩關”，又加金城郡為五郡，均在黃河以西，故又可稱“河西道”。

例 2 之簿自長安出發，方向直指河西道的武威郡。1973 年發掘甘肅金塔縣漢肩水金關遺址，獲一枚“郵書刺”木簡，即過往郵書的扼要記錄，有宣帝地節紀年，文曰：“皇帝璽書一封，馳詣居延千人，從高平道。”此例可證，漢時重要公務為了快捷，往往會選擇限定傳送路線。在居延收到從京師經高平道傳來的文書，其傳送路線，即此簿所列，先經高平傳武威郡接河西道，再從鶼得向北方居延繼續傳送。很明顯，從長安到河西是有多條驛路的。否則，勿需贅言從何道路而行。所以，例 2 簿的前半段道路，可稱為“高平道”無疑。

至此，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恢復這兩枚木牘文書的原名稱，稱例 1 為《河西道驛置道里簿》，例 2 為《高平道驛置道里簿》。

三、關於高平道

漢唐自長安赴河西、通西域的大道，從清代對西北史地的特別關注以來，到近年的研究絲綢之路熱，可謂眾說紛紜，蔚為大觀。但在發現例 2《高平道驛置道里簿》之前，甚至以後，由長安而固原再武威的道路，似乎並未引起學界的足夠注意和重視。高平道的發現，其重要意義在於：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東端以中國的長安為起點，經高平（固原）、媼圍（景泰縣蘆陽、五佛一帶）抵達武威，復連接河西而去西域、西亞的路線，從此可以確定下來。而其它從長安出發的或不從長安出發的路線，一般說不屬於干道主綫。從這份驛置道里簿中應當得到的啟示是，至少在漢代，高平道是中央政府交通西域外國的“第一號國道”。

這條路之所以是第一選擇，主要因為它的路綫、里程最近。如果在地圖上將長安、固原連一直綫並延長，這條直綫恰好可以連接武威、張掖、酒泉、玉門鎮，在疏勒河拐彎轉向西流之處，繼續向西北連接柳園而直指哈密。西漢時期，絲路是從疏勒河拐彎處偏西南行至敦煌，才出兩關的。而兩漢之際開始，為避開羅布泊、白龍堆的險惡，原西域北道逐

漸北移，通向哈密。到唐代，從今安西以東處即改變了方向向西北行，也就是今日蘭新鐵路、公路的路綫，這當然也是最近捷方便的路綫。

高平道的重要，從史籍記載亦可見其一斑。《史記·始皇本紀》：廿七年“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道”。《漢書·武帝紀》元鼎五年幸雍、踰隴、登崆峒，“西臨祖厲河而還”。又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北出蕭關。按，雞頭又曰笄頭，乃崆峒山俗稱；又說指六盤山，即大隴山。《始皇紀》之隴西，當泛指隴山以西地。武帝元鼎巡狩，夾雜著祭祀，開始先赴雍（鳳翔、寶雞），沿汧水上溯，從隴縣越小隴山（隴阪、隴坻、關山），入涇河流域而向崆峒，再從高平（固原）赴靖遠、景泰境內的黃河一帶。“祖厲河”，當解作安定郡祖厲縣所臨黃河。元封之行的回中道與《秦紀》同，《史》《漢》二書應劭、孟康、如淳三家注解各異，而顏師古肯定應說的回中、蕭關在安定、高平。回中道，實即今日陝西隴縣—甘肅安口鎮—平涼四十里鋪的路，是涇、渭二水間最短的通道。相當於今寶（雞）—中（寧）鐵路的南段。四十里鋪在平涼、涇川之間，涇川即漢安定縣，現存回中山、西王母瑤池等史迹。又宣帝神爵元年征羌，後將軍趙充國自長安“馳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渡黃河進入湟水流域。其奔赴金城的路綫不明，但其子右曹中郎將趙卬“將期門、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以及強弩將軍許延壽所帥“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數萬大軍，則可能由高平道而轉向河西和令居方向。又《後漢書·竇融傳》，建武初年，隗囂據天水攻安定。七年，竇融自張掖郡進至姑臧，欲與劉秀合擊之，未果。八年，融復率河西五郡兵馬及羌胡小月氏步騎數萬，輜車五千輛，與劉秀大軍會於高平，隗囂大敗潰。劉秀進擊高平，除了消滅隗囂之外，亦有陳兵威攝河西之意。建武十三年，竇融及其勢力徹底脫離河西，其官員賓客親屬等“駕乘千余兩，馬牛羊被野”，東歸洛陽。所經之路依然是高平道。

欲通河西首選高平道的原因，除前述綫路近捷以外，此道又避開了六盤山、關山（大小隴阪）、華家嶺、烏峭嶺等險惡難行路段。秦始皇和漢武帝之西行巡狩，不可能翻越六盤山。另外，高平道的開創、經營較早，它可能是在征匈奴的戰爭中逐漸形成和完備的。詳見後文。其路綫雖近北方，但有黃河、長城等護衛，仍比較安全。

此道北段，復原時祇安排 D—E—F 三個未知地點，當然還可以多一些。其地域約屬安定郡範圍。據《漢書·地理志》及《中國歷史地圖集·秦漢分冊》，安定郡有複累、安俾、鹵三縣地望無考，而圖中高平至揅次間，基本屬於空白。鹵，澇碱之地，其縣約近黃河低灣處。總之，這一區域在漢魏地志文獻的記載絕少，惟企望將來靠出土文物資料來彌補。

此一綫接近漢媼圍的今靖遠北灘鄉，曾出土公元 3—4 世紀的羅馬鑲金銀盤^①，表明在以後的歲月裏，這裏仍然是絲綢之路的大道。

四、媼圍一綫的問題

西漢武威郡之媼圍，《水經注》卷二云：河水“東北達武威媼圍縣南”，當在黃河左岸。但此處有錯簡。河水依次過金城郡允吾、榆中、天水郡北界、勇士，然後才過媼圍、安定麥田山，故所記媼圍的一段話，當置於天水郡勇士之後，而今本《水經注》卻正相反。^②又《水經》不記祖厲，酈道元注文關於今靖遠縣（祖厲）至中寧（高平川口）的一大段文字，均置於安定麥田山之下。據其注，麥田山等地俱在今中寧西側，約中衛一帶。正因如此，後來地理書始將媼圍地望置於祖厲以南的榆中附近。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考媼圍不取《水經注》，而據《晉書》等史料，推定在中衛西南、萬斛堆附近。顧氏言“晉咸寧五年，馬隆討涼州鮮卑，度媼圍水是也。顧氏曰：媼圍水東北即萬斛堆”。又：“義熙三年，赫連勃勃擊儋檀至枝陽，大獲而還，儋檀追之。其臣焦朗曰：勃勃未可輕也。不如從媼圍北渡，趨萬斛堆，阻水結營，扼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不從，果為勃勃所敗。”又：“宋元嘉十六年，魏主燾議伐涼州，李順等謂自媼圍水以西至姑臧。”趨萬斛堆，即今中衛以西沙坡頭地方的沙山，媼圍在其西南。高平道簡牘的發現，證明顧氏推斷之大方位正確，並對媼圍地望方位的探索給予指南。近人學者據此一啟示，參照靖遠石門鄉小口子黃河有渡口、西岸遺存明代索橋堡、蘆陽吊溝古城址等情況，推測蘆陽一帶為漢媼圍故址^③，其說可信，但需考古發掘證實。黃河中衛、靖遠段有一大彎流，即今景泰五佛寺以東、靖遠北部諸鄉。《元和郡縣志》、《讀史方輿紀要》云其地為漢安定郡富平縣地，北周為會州、鳴沙鎮，隋為環州、鳴沙縣，唐仍之，後為吐蕃、西夏所據，元復立為鳴沙州。該地古城遺址甚多而密集，甘肅省博物館曾於其地發掘唐墓，主人為唐會州烏蘭縣尉。前文靖遠北灘鄉出土羅馬鑲金銀盤即在此範圍。又東晉乞伏鮮卑氏族即沿此一綫由北方陰山而南遷，遺存勇士、苑川諸古城址。靖遠的法泉寺、劉家寺、朝陽寺，景泰的五佛寺諸石窟，現仍存十六國至隋唐時期佛教藝術遺迹。可見高平至媼圍一路，漢代以後的經濟文化、交通往來仍然是相當活躍興盛的。

媼圍以西之地，例 2 媼圍—居延置—鶻裏—搆次—小張掖……此一段路程，至搆次 270

① 初世賓：《東羅馬神人紋鑲金銀盤考略》，《文物》1987 年第 4 期。此銀盤時代和製造地，國內外均有多種推斷。

② 即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武英殿本乾隆三十九年戴震校《水經注》。見陳橋驛注釋《水經注》，全國古籍整理出版領導小組資助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③ 李並成：《河西走廊歷史地理》，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49 頁。

漢里，合 112 公里（直綫距）。今有蘆陽、寺灘、裴家營、大靖、西靖、土門、泗水一串戈壁綠洲，其北橫騰格里沙漠，沙漠的南緣是蜿蜒的明長城，南部橫列祁連山東麓的馬雅、毛毛等雪山，西與武威盆地連接，而東接黃河，可以說是“東段的河西走廊”。今天甘塘至武威的鐵路，在明長城北側東西貫穿而過。

其中，揓次的地望，李並成以為在土門西三公里，該處有一古城址。^①蘆陽至土門直綫距 109.5 公里，約合 264 漢里，從上述古城計算，至蘆陽約 271 漢里，頗符合高平道簿所記里程。總之，說在土門、泗水附近是可信的，但具體地點仍需考古調查發掘印證。《漢書》地理志說，松峽水（古浪河）出南山，北至揓次入海。今土門、泗水等，正位於古浪河下游沖積扇上。不過，《水經注》則作另說，認為是長泉水即今洪水河出揓次，而不是古浪河。這可能是對《漢書》的修正。不知《漢書》、《水經注》二者誰是？如果後一說可靠，古揓次還應在土門稍東一些。

𪚩裏，為此道里簿首見。其位置，如果將蘆陽—揓次的距離三等分（每份皆 90 漢里），𪚩裏約在大靖附近。𪚩，依《廣韻》為𪚩，即承帶鉤之帶鼻環，醜例切，去聲；或醜列切，入聲。《隋書·禮儀志》云，天子革帶玉鉤、𪚩。𪚩裏作地名，係民族語言音譯，音近漢時匈奴語“撐梨”、“車梨”，即“天”的意思，見《漢書·匈奴傳》。裏，衣服之內襯層，不可以作“里”，甚至解作某縣鄉如漢之樸剗縣之里，更不妥。

五、從居延置說霍去病征河西路綫

居延置，從名稱、位置看均令人費解。其位置如依前述𪚩裏之例，當在大靖、蘆陽二地之中，約當今新堡子、白茨水的地方。以縣名作驛置名，而又遠離縣址（漢張掖郡居延縣在今額濟納河下游索果淖爾海東南）一千多里，這不外乎兩種可能：一是該地即名居延，為與張掖郡居延縣區別，加一“置”字；另一是漢代在居延曾發生著名戰役，以之命名作紀念。我以為兩種可能性都存在。

按漢武帝元狩二年春夏，漢將霍去病兩次征河西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大捷。秋，復渡黃河迎接昆邪王來降，設河南五屬國，始建武威、酒泉二郡。這次重大戰役的行軍路綫和地點，《史記》、《漢書》的霍將軍傳、匈奴傳和帝紀多有記載。但其中所引漢武帝制詔的記述，無疑是最真實可靠的，現據之將兩次出征歷程綜合於下：

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踰烏盩，討遼濮，涉狐奴，歷五個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合短兵鏖皋蘭山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

① 李並成：《河西走廊歷史地理》，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42 頁。

都尉，斬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得休屠祭天金人。

夏，霍去病、公孫敖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公孫敖迷路。霍去病敢深入，涉鈞耆，濟居延，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威於鱒得，得單桓苗塗王，及相國、都尉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

關於霍去病春夏進軍河西的具體路線，學界頗有分歧。一種看法是循今蘭新鐵路、312國道的綫路，自蘭州（皋蘭）西北行，翻越烏峭嶺（沿莊浪河，即漢烏亭逆水，相當於烏戾），進入河西。^①另一種看法，從隴西郡治狄道（臨洮）出發，過今夏河自治縣（漢白石縣、皋蘭）進入青海省，沿湟水上溯大通河，翻越扁都口進入河西。^②我前曾為小文^③，指出是張騫首開通河西記錄，而霍去病步其後塵的。現在看來，出隴西乃是泛指，即隴山以西。霍去病春天征河西之路，應即高平道驛置道里簿所列路線。這條路，是經秦始皇、漢武帝、張騫、霍去病等歷代的探索實踐積累而成。烏峭嶺的路較晚，約兩漢之際始開通。在春天翻越高寒積雪的烏峭嶺也是不可想象的。扁都口道更不可能，路線不僅過於迂迴曲折，而且把匈奴西部的五個附屬小王國也從北方搬到了青海境內，違背了西漢前期西北區域漢、羌、胡的基本分野規律，本身就是方向的錯誤。這裏需指出，《漢書·武帝紀》有元狩二年春“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一語，極易產生誤導。班書因霍將軍傳、匈奴傳均已詳述，故此處從簡。不過，把如此複雜的出征歷程，僅概括為六個字，也未免太簡單草率了。扁都口道一說，正是拘泥於此才導致誤解。本傳所引武帝諸制詔均未言出隴西，而鏖戰皋蘭山下，是過了焉耆山（燕支、胭脂山，山丹東南）以後發生的。此皋蘭山如果不在山丹以西，則當在另一方向或返回的路上。因此，探索出征路線應依據武帝表揚霍將軍的諸詔書，而不當輕從《漢書·武帝紀》的六字記載。

夏天之戰，《史》、《漢》匈奴傳全同，皆言“出隴西、北地”，而本傳強調“俱出北地，異道”。過去總以為，“北地”為郡治所馬嶺（今慶陽西北）。實際上，高平道約是秦和漢初北地、隴西二郡之分界，也是北出北地郡的樞紐。霍去病與公孫敖“異道”，後者可能因路線偏北而迷路，最終不知究竟。而霍去病出軍路線則可能偏南，接近於春天時出征，約從中寧、中衛一帶渡黃河，直趨武威、民勤綠洲，再奔額濟納流域和鱒得、黑水流域、祁連山麓。從武帝褒獎春、夏兩次出征的詔書看，其中有些內容是共同的。例如春天討伐

① 王宗維：《漢代祁連山路考述》，《西北師院學報》1983年第3期。王宗維：《論霍去病在祁連山之戰》，《西北大學學報》（社科版）1982年第3期。

② 吳初驤：《也說羌中道》，《敦煌學輯刊》1984年第2期。

③ 初世賓：《絲路羌中道小議》，《西北師院學報》1982年第2期。吳初驤：《絲路羌中道再議》，《隴右文博》1996年第2期（總2期）。初世賓：《絲路羌中道的開闢》，《十世紀前的絲綢之路東西文化交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編，1990。

遼濮，歷五王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夏天則又獲單桓酋塗王及五王國王母等。又據《史》《漢》兩書霍去病傳引武帝詔，趙破奴從霍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得王、王母各一，王子以下四十一人；高不識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皆封侯。可見春夏出發地點雖不同而所趨方向、地方卻相近，都經過了“五王國”的土地牧區。居延、鱧得、祁連以東，俱屬五王國範圍，它們是：遼濮、折蘭、盧侯、單桓酋塗、稽且等。其中稽且，且讀如祖，稽祖疑即高平道簿之鈞著、武帝詔書之鈞耆，至少鈞著、鈞耆二者是一，為異譯或異寫。又天漢二年李陵與匈奴單于激戰於居延以北之浚稽山，其語音與鈞耆有關。古代地名，常隨民族和姓氏的遷徙而流布各地，例如居延，有姑衍（《漢書》霍去病傳）、車延惡師（《漢書》西域傳）、胸衍（《漢書》地理志）等名。今河西中部語音，仍讀居為姑。顏師古注張掖郡居延為安置居延人之地，漢簡有“居延屬國”，足證其為少數民族。但居延命名似另有“安居延水”之義。據漢簡，居延都尉屬下有“延水丞”，縣級建置，專司水利。居延都尉最大的甲渠塞防，境內有一鉅型人工水道，直通東北方，疑為“延水”的主干道。此推測如不誤，居延的命名倒是胡、漢相通了。

夏天出軍路線的最大可疑處，在於過去學術界多認為出北地向西北方直達額濟納之居延，然後南下攻小月氏、鱧得、祁連山。這樣，等於說霍去病渡黃河後，要連續穿越騰格里、烏蘭布和巴丹吉林等沙漠。這當然極不可能。據詔書的行程，涉鈞耆—濟居延—小月氏—祁連山，鈞耆和居延祇是越渡的兩條河流或是所經兩處民族地名（《史記》本傳曰：踰居延），該處似未發生戰役。如果鈞耆或鈞著在張掖、武威之間偏西，由其地向正北赴居延，再反向南返回走廊，這又太兀突反常了。因此，詔書的居延是否在額濟納河下游？鈞耆是否在東而居延在西？就頗值得再考慮了。

同年秋，霍去病率大軍迎渾邪王來降，降者號稱十萬，迎會地點也在黃河渡口。去病渡河擊斬逃遁不降者八千人，先安排渾邪王乘傳（四馬輶車）詣長安，然後再監護其大眾返回。武帝嘉獎之曰：“十萬之眾，畢懷集服”，“爰及河塞，庶幾亡患”，表明這次武力招降活動十分順利、成功。從渾邪王（約在張掖、酒泉）殺休屠王（在武威）來歸，和西北邊塞的交通情況看，這一次迎會、渡河的地點，亦當在媼圍之地，回歸長安的路線仍然是高平大道。

總之，高平道的最終開通與霍去病征河西有關，元狩二年春、夏、秋，霍的三次出征路線約以高平道的方向、路線為主軸。居延置約因地而得名，不過當地的居延人，據顏師古之說已遷到後來的居延海，其設置，既因其地名“居延”，又含有紀念河西戰役之意。霍去病平生祇此三次赴河西。元狩四年復征漠北，六年不幸病卒。武帝悼惜他，為築陪陵之塚像祁連山。霍的赫赫戰功，驛置命名居延，亦不為過。

此外，西漢武威郡又有樸剽縣，《中國歷史地圖集》置於今大靖鎮；李並成經踏察認為

在大靖北一公里的古城頭古城址，在北魏乃魏安郡城，後周爲白山縣，亦即《唐書·地理志》所謂昌松東北百五十里之白山戍^①。按樸剌在高平道簿上不當大道，而且必距大道較遠，這是不言自明的。即使不以鰈裏在大靖作標準，按李氏之說，鰈裏爲樸剌縣的一個鄉里，而且位於所謂樸剌的城廓之內，那麼，當道的驛置，絕對不可能置於鰈裏，而棄樸剌。故其樸剌城的結論頗可置疑。又依《唐書》地理志道里考之，唐里較漢里大，大靖至古浪（即唐昌松）直綫距 48 公里，合 115.7 漢里，距 150 唐里（約 80 公里）相去甚遠。所以，歷史地圖集和李氏所考之樸剌位置可疑。至於漢樸剌縣的位置何在，尚有待繼續探索。

六、烏峭嶺的道路與蒼松

蒼松得以列爲河西道簿之首，蓋因它是武威郡東南方向的界縣，一如顯美之於張掖，表是之於酒泉，淵泉之於敦煌，一方面是以縣作郡界，另一方面又與它郡道路相接。此處蒼松當與南側的金城郡爲界，但有否道路相通，具體綫路如何，此簿恰恰不載，尚需探索。

首先，蒼松的位置頗存異議。郝樹聲認爲，蒼松之南有路，一如今日溯古浪河、翻烏峭嶺沿莊浪河之蘭新公路（312 國道），可南抵漢金城郡與今蘭州。他同意陳澧《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的意見，說蒼松在今天祝縣安遠鎮，並以道里計算支持其說。^②按安遠位於烏峭嶺北麓，海拔兩千余米以上。漢時不可能在如此高山陡坡上設縣治（少數民族地區除外），該地一度曾作天祝藏族自治縣治，後遷走。如果以道里計算，河西道簿姑臧至蒼松四縣三程 192 漢里，合 79 公里。地圖上武威、安遠之間直綫距 76.5 公里，二者雖然相近，但古浪和烏峭嶺的這段路多山道、峽谷，是出名的險道，今天的公路猶反復盤回曲折，更何況漢代？所以，蒼松不會在烏峭嶺上的安遠，其位置據里程當在安遠以北的烏峭嶺下。

李並成經踏察，考定漢蒼松爲今古浪北 7 公里小橋堡一帶^③。古浪、武威直綫距離 55 公里，而今公路 58 公里，乃因地勢平坦、道路直暢之故。如果減除至小橋堡的距離，餘 51 公里合漢里 123 里，僅約相當於姑臧至鸞鳥（127 漢里）的距離。所以郝樹聲認爲在古浪附近的是鸞鳥，看來是正確的。^④既然蒼松不在安遠或古浪附近，當另求其所在。

我以爲蒼松故址有兩種可能。一是在烏峭嶺北坡下、古浪河上游的黑松驛，又名黑松堡，南、北分別距安遠、古浪各 30 里，地當古浪峽南口。《方輿紀要》云：“晉義熙四年，後秦姚興遣其子弼等襲禿發傉檀於姑臧，自金城濟河，進至漠口。地形志：漠口縣屬昌松

① 李並成：《河西走廊歷史地理》，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46 頁。

② 郝樹聲：《敦煌懸泉里程簡地理考述》，載《敦煌懸泉漢簡釋粹》（胡平生、張德芳編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19 頁。

③ 李並成：《河西走廊歷史地理》，50 頁。

④ 郝樹聲：《敦煌懸泉里程簡地理考述》。

郡，謂之昌松、漠口，並為險要。”黑松驛地處要衝，該地又多漢墓群，上世紀 50 年代初曾出土著名的東漢建武十一年大司農頒造的官平銅斛。此類高級度量衡器，當出於縣官所在地。故疑其地為晉昌松或漠口兩縣中之一。另一可能是向古浪東部尋找，即前述走廊東端小張掖到媼圍一綫的南側。因為，古浪以西也是祁連山區，而漢蒼松縣與金城郡的交通，不一定必須經過南方的烏峭嶺。

近讀《敦煌懸泉漢簡釋粹》^①，其中披露的六一號簡，記錄了懸泉置至各地的里程，對解決這一疑竇和武威郡南通金城郡的道路問題，非常有啟示。先引簡文如下：

張掖[郡]，千二百七十五[里]。冥安，二百十七[里]。武威[郡]，千七百二[里]。安定[郡]高平，三千一百五十一里。……（A）

金城[郡]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東南。天水[郡]平襄，二千八百卅[里]，東南。東南去刺史□三□……□八十里……長安，四千八十……（B） V.T1611③：39

按此簡也屬於《驛置道里簿》一類，是更高層次的里程統計，或者是包括多種道里簿的目錄索引，帶有《集簿》性質。其內容分五類：一是至本郡內縣的里程；二是至河西各郡的里程；三是至其它各郡郡治（高平、允吾、平襄）的里程；四是至刺史治所的里程；五是至京師長安的里程。其中[]內的字，是作者根據本簡體例補出的。另外，至天水平襄的里數，反比至金城允吾的里數少一些，這不可能，簡文釋文或許有誤。又“去刺史□三□……”，可補為百三十……[里]，指平襄東南 130 多里，為涼州刺史治所。《後漢書·郡國志》漢陽郡隴（縣）在水郡。據此簡，平襄的東南方是隴（縣），方向大致不錯，但 130 多里似不足。又後面“□八十里”，可能也與刺史治所有關。

此簿提供的最重要信息是注語“東南”。簡的正面去張掖、武威，甚至安定、高平皆無注，背面至允吾、平襄的末尾卻皆有“東南”二字注。實際上，高平道也是向東南的，但不加注語。這種區別，意味着高平道是眾所周知的一條路，而去金城、天水的是另一條道。所以，注語不是為指明方向，而是標注應當走哪條道路的。

根據這一啟示，可以認為簡背所記的，正是西漢稍晚些時候開通的，西連武威蒼松，中經金城、天水郡，東入司隸部、直達長安的另一條大道，暫稱之為“南道”^②。從簡文看，既然經過刺史治所“隴”（今隴城鎮），向東就必須翻越隴山（隴阪、關山），沿汧、渭而下，經今陝西隴縣、鳳翔，抵達咸陽、西安。前文引秦始皇、漢武帝數次度隴北巡，這裏則是由長安出發，越隴山而西行天水、金城，再進入河西走廊。這正是由長安出發的絲綢

① 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② 楊建新、盧葦：《絲綢之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1），較早論述過本文所謂的高平道、南道，認為前者的前半段經回中、六盤山；稱後者為隴關道，與本文不同。該書作者當時不知高平道里程簿等文物資料，所論路線有不足在所難免。

之路的南大道。簡文記敦煌或由懸泉置起程，行南道至長安 4080 多漢里，行高平道至高平 3151 漢里。高平至長安，據《元和郡縣圖志》為 800 唐里，合漢里 1037 里，則高平道至長安共 4188 漢里。此演算如不誤，南道倒比高平道近一些，但要翻越幾座高山。很遺憾，我們目前還不知道此道所過司隸部、天水郡、金城郡的具體路線，如縣置名稱、次第、里程等，需繼續探索、發現。奇怪的是，簡文不記隴西郡，大約漢隴西郡不當此大道。過去研究絲綢之路，有所謂南道逾隴後，沿渭水上溯至洮河流域，從臨洮赴蘭州之說。現在看來，沿渭水、經臨洮等，與此簡不合，都可能是時代較晚的交通建置。

需要指出，南道通河西沒有高平道早。而且前文已提及，武威郡南通金城郡，不一定非經烏峭嶺，尤其在早期。至少昭帝始元六年置金城郡之前，不存在金城郡赴武威郡的交通，也不會有溯莊浪河、翻烏峭嶺的道路。假如元狩二年霍去病即已打通烏峭嶺，漢王朝就不會晚到四十年以後才設置金城郡！至於從昭、宣朝到兩漢之交，究竟有沒有烏峭嶺路？還是個有待研究的謎。因為在兩漢之際之前，我們始終沒有見到有明顯記載金城、武威之間通過烏峭嶺相互交通的文獻資料。但是從蒼松到金城郡，從後來的一些驛路來看，完全有可能先向東繞行，避開高寒嚴峻的烏峭嶺，然後南下，到達金城郡的令居、枝陽、允吾等地。《辛卯侍行記》附載明清時期平番縣（今永登，漢令居）東北方向驛站大道，經坪城、松山、寬溝、三眼井、營盤水，可與晉、陝大道相接。這條南北向的驛置大路，既與蒼松相接，又與媼圍綫交叉。宣帝神爵時羌亂，趙充國由前述之南道馳至金城，沿湟水西擊。同時，其子趙卬率八校尉配合主力為輔軍，約是從媼圍方面南下進攻令居的。

約兩漢之際，史籍始有開通烏峭嶺的跡象。《後漢書·竇融傳》建武六年，河西五郡大將軍竇融率軍從武威進剿金城郡叛羌，“斬首千餘級，並河揚威武”。九年，朝廷任牛邯為護羌校尉，治令居。烏峭嶺，本是河西、金城之間羌胡往來的捷徑通道，這時逐漸變成戰爭進退之路。整個東漢一代，羌亂頻仍，政府軍和羌人在河湟、河西展開激烈拉鋸式爭奪。此道時通時絕，護羌校尉治所多次遷徙。安帝元初二年，校尉龐參“始還居令居，通河西道”。建光二年，校尉馬賢與燒當羌麻奴戰於牧苑（今榆中）兵敗，“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兵於令居，因脅迫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漢令居為金城郡最北一縣，在今永登一帶，地扼羌胡進出、串通之要害。通河西道、緣山西行，皆指從令居越烏峭嶺，與武威郡之蒼松、鸞鳥相接，即可連接河西道驛置里程簿諸站。此後魏晉南北朝隋唐初，南道日漸興盛，烏峭嶺路發揮了積極作用。如玄奘、岑參即過此路赴河西、西域。但這一時期分裂多而統一少，三秦五涼、南北朝及地方割據勢力，時或紛爭互鬥，烏峭嶺戰火不斷，行旅鮮至。如法顯、宋雲西行，皆因涼州戰亂而改道湟水、青海。中唐以後至西夏，又被少數民族佔領。元代以後，烏峭嶺路復蘇，尤其明代，修築萬里長城，又相繼於古媼圍一綫築新舊邊牆，設驛置、屯戍之兵，南道又

成爲通河西、西域之官道主干。

七、河西官道驛路的樞紐——小張掖

高平道和河西道二簿交會點的小張掖，北距姑臧 67 漢里，東距揶次 60 漢里。郝樹聲借用此二條資料加以合成，認爲在武威南謝河鎮一帶，其結論當是正確的。^①謝河附近，今尚有地名曰古城、上古城、校尉的。漢代姑臧、張掖的分界，約在雜木河干流。過去發掘該河的西岸磨咀子漢墓群，出土銘旌有“姑臧渠門里”、“姑臧西鄉”、“姑臧北鄉西夜里”等鄉里名稱，而隔河相望的東岸五壩山漢晉墓群，則出土“張掖西鄉定武里……”的冥傳過所木牘。謝河在雜木河以南，應屬張掖縣地域。以前認爲漢張掖縣在今武威南部黃羊河上游的張義堡，理由是其地有古城堡，又義、掖一音之轉。但該地距武威直綫距 45 公里，合 108 漢里，與此簿相校，當然不取張義堡之說。同時也表明，考證古地名使用語音分析法時應當特別的慎重。

與小張掖同例，居延漢簡中居延縣又名“小居延”，與居延都尉有別。古代地理、行政建置，往往有州郡府縣同名者，加了“小”字，易於識別，今後還會發現小敦煌、小武威之類。但是，小張掖不在張掖郡，而在武威郡，這種情形，恐怕祇此一例，其中必有原因。拙以爲張掖郡先置，包括今武威郡地。後張掖郡東部分置出武威郡，西部猶保持原名，張掖縣留存於武威郡中。果如此，則張掖建郡當早於武威。張掖之義，當以《漢書》地理志應劭注“張國臂掖”爲是。也可能像有的同志推測的：張掖郡，原治張掖縣，後遷樂得。^②但張掖不可能是“涿邪”、“處月”、“濳野”的音轉。^③

小張掖所以重要，因其地處漢代三條大道（河西、高平、南道）的交匯路口。這一地理、交通優勢，或可以“張國掖臂”視之。漢張掖縣的位置在今武威盆地南部，該盆地四條河流依其水量排次爲：①西營河；②雜木河；③金塔河；④黃羊河。此四水乃是武威綠洲灌溉農業、水草畜牧的命脈，向北匯總、潛流而形成石羊河（古代谷水），又滋養下游的民勤綠洲。漢代的姑臧、休屠二縣地處盆地北部，正當①③二水，爲政治、軍事中心。小張掖則當②④二水，今天仍是農牧發達地區，作爲交通中心（這裏今天也是交通樞紐），也有對其經濟優勢的考慮。

① 郝樹聲：《敦煌懸泉里程簡地理考述》，載《敦煌懸泉漢簡釋粹》，胡平生、張德芳編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19 頁。

② 王宗維：《漢代河西四郡始設年代問題》，《西北史地》1986 年第 3 期。

③ 見王宗維《秦漢之際河西地區的民族及其分佈》，《蘭州大學學報》（社科版）1985 年第 3 期。

八、官道支綫——不當道的軍事區和縣

武威郡樸剗前文已述，又張掖郡之驪軒、酒泉郡之會水、敦煌郡之效穀等縣，位置均不在大道上，故此二簿縣置驛站中不載。但不當大道不等於沒有交通郵驛之事。估計在大道某置站處，有支綫可以連通才符合實際。河西地區廣袤，但人口相對集中而呈東西綫形分佈，古今亦然。所以，一條東西大道便能將大多數縣串連，內郡卻難以做到，還要靠一些支綫連成網絡。

河西又屬邊郡和長期的對敵前綫，有許多不當道的軍事區域，包括邊防之縣，也需要支綫連通。

在武威郡石羊河（谷水）流域，有不當大道的休屠、宣威、武威三縣，及休屠、北部二都尉。從郡治姑臧向北，沿谷水當有支綫道路、塞防北抵休屠澤。武帝太初二年，配合貳師將軍伐大宛，曾修築居延、休屠塞防，以防匈奴南襲河西，可見休屠塞、武威塞也相當重要。唐代於其地置白亭軍。五代時期，後晉使臣高居誨出使于闐國，自靈州（靈武）渡黃河向西橫穿騰格里沙漠南緣，抵白亭海和武威，走的是元狩二年夏霍去病出征的老路。但是，我們今天對此處的史地、塞防、交通，還畫不出清晰的輪廓。今後應加強這裏的考古調查發掘工作。

張掖郡不當道的是居延塞防。居延縣遠距額濟納河下游及居延澤，在中游有肩水縣，即《鹽鐵論》所謂“扇水”縣，漢志失載。另外，南北還有居延、肩水二都尉、張掖農都尉等建置，有嚴密、發達的烽燧防禦體系，及郵驛交通、倉儲、屯田、水利等網絡，殘存城廓十六個、烽台一百六十餘座。以上僅就漢代而言，其它時代遺迹尚不計。居延因緯度最北，為河西軍防的觸角，是最重要的敏感部位。由於多次調查發掘，出土簡牘等資料翔實詳盡。例如，已知居延都尉有四段塞防，其中之一的甲渠塞分為十部，有五部當道，五部不當道。不當道的在周邊，保護內部的城鄉、田畝、道路。當道的五部既是五個防衛組織，又是五個驛站，每部下屬六至七個亭隧，組成一個專司郵驛交通公務的綫路，稱道上塞。所謂道上，就是從張掖太守府治驪得分出的、向北直達居延的支綫道路。不論是文書、車馬還是烽火，從居延均可暢通無阻地直馳長安。高平道簿，從長安起，到張掖太守府（或一度為涼州刺史治所，大將軍府）治驪得止，正是居延塞與河西、長安關係密切的明證。

酒泉郡不當道的軍事區有會水縣和酒泉北部、東部都尉防地。位於今金塔縣鼎新鎮，為北大河（呼蠶水）、黑河（羌谷水）合流處，地理志所謂“眾水所會”。《中國歷史地圖集》將會水置於高臺縣正義峽口。該處無水可會，現存的烽隧塢壁防綫也屬於張掖郡。鼎

新，在河以西，其烽隧城廓，斯坦因曾踏察過，定爲酒泉郡東部都尉塞。從酒泉郡治祿福縣（今酒泉市），沿北大河向金塔，再東北抵鼎新，有古道、烽隧塞防，這是從祿福向北的支綫道路。到會水縣，此路與居延支綫合一。北大河、黑河二水相會的河谷地帶，是河西走廊出漠北、蒙古的咽喉，也是匈奴南侵的通途。所以從河西大道上分出的兩條支綫，由張掖、酒泉二郡的三個都尉、三個縣負責駐守，列爲禁區。其南、北二處還設置肩水金關、居延索關兩道關隘，管理進出交通、郵政和關禁。

關於敦煌郡境大道驛置道里，據所知從東至西爲：淵泉、冥安、廣至、魚離置、懸泉置、遮要置、敦煌、龍勒共八座縣置。其中，敦煌至遮要至懸泉，今距多爲 30 公里左右。效穀縣不當大道，約在懸泉以北，從懸泉置應有支綫道路通往該縣置。又宜禾都尉塞防在淵泉、冥安、廣至縣以北；中部、玉門都尉塞防，在敦煌以北、西北；陽關都尉塞防，在龍勒西南；皆不當大道。這些軍事區，均應有支綫道路通達，其詳情，我想新出土的懸泉簡牘將會有所反映。

我們對這些軍事區域內的交通、郵政、警戒體系的軍事化性質，業已清楚。但對河西大道沿途的驛置和警戒體系是否純屬民政性質，目前尚不甚了了，也有待懸泉簡牘披露新的資料或綫索。

現在專門談一談張掖郡的驪軒縣。

驪軒縣不當河西干道，此視兩份道里簿復原即明。關於它的位置，學術界傾向於在今山丹、永昌以南。記得 1973 年我在金關發掘、釋讀簡牘時，簡中即記載漢代河西有驪軒苑等三個養馬場，苑中設置官吏機構，蓄養官奴；又驪軒縣多出騎士，有些驪軒籍的騎士、民眾，姓名純屬音譯，故疑該縣多少數民族，且與養馬有關。河西之馬苑，不在景帝“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數目以內。其中驪軒苑，便可定在今山丹軍馬場範圍之內。同理，驪軒縣也應在那裏，大致在古焉支山以南，不當大道，但也應有支綫道路通達。其位置，當距漢山丹近而距番和遠，支綫當接於山丹縣處。驪軒南境，直當扁都口（隋、唐的大斗拔谷），和青海大通河上游俄博一帶，爲著名的扁都口道，可以徑至漢金城郡、南入羌中各地。十六國時期，此道交通較頻繁^①，尤其在河西道梗阻不暢和五涼諸國戰爭互鬥之時。河西自古盛產良馬，而以山丹馬最爲著名。據馬學專家崔培溪先生研究，山丹馬爲中亞大宛

^① 扁都口之路，也是古代祁連山兩側民族遷徙往來的便道之一，自然條件差，行旅不便，歷史上多用於軍事奔襲遁逸之用。但特殊情況下，在河西道、羌中道之間起調劑作用。不過，這種作用有時被過分誇大了。

“天馬”與蒙古馬混血之完美結合，乃是在河西長期培育的結果。^①山丹軍馬場歷史悠久，據說其總場大馬營原曾立有隋開皇年碑刻，惜今已不存。該場一直是中國最大官馬場之一，其前身應即漢代驪軒苑。又關於驪軒是“亞利山大利亞”（大秦）的音寫，驪軒縣乃是安置被俘羅馬、敘利亞士兵所設等說法，近年來，學術界頗多討論駁正。驪軒一名，可能與其地原居民匈奴部“犁汗”族人有關，安置羅馬俘兵純屬無據揣測。^②西漢時翻譯之事始興，羅馬城市名和匈奴部族名偶而譯成同一語音，也在情理之中，二者之間並無必然關係。

九、關於祁連置

河西道簿張掖郡最後一站為祁連置，在昭武之西，酒泉郡表是以東。此置名亦令人聯想到元狩二年霍去病攻祁連山的戰役。和居延置一樣，這顯然也帶有紀念色彩。居延的金關簡中有“祁連置”，但不明其位置，現知界於漢表是、昭武縣之間，乃張掖、酒泉二郡

- ① 崔埏溪（？—2002），中國農科院蘭州畜牧獸醫研究所研究員，養馬學著名學者，曾參與山丹軍馬的選育工作，著述等身，此不贅引。我為解釋雷台銅奔馬，自70年代初親向聆教，後再結文字交數十年，受益匪淺。不意去秋從楊詩興先生處得悉崔老已不幸病逝，謹志於此，寄託哀悼之情——作者。
- ② 據《史記》、《漢書》之《大宛傳》、《西域傳》、《匈奴傳》、《張騫傳》，當時中國所知西方之最西，有黎軒（犁軒、犂軒、犁汗）之國。至《後漢書·西域傳》，始稱犁軒為大秦，指羅馬或敘利亞。《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又有驪軒縣。東漢服虔注《漢書·張騫傳》犂軒，曰“張掖[郡]縣名”，唐顏師古則云：“犂軒，即大秦國也。張掖驪軒縣，蓋取此國為名”。及至近代，王先謙《補注》曰，《漢書·地理志》驪軒或作麗軒、犂軒、黎軒、犁汗，“音同通用，犂軒即大秦國，蓋以其降人置縣”。法國伯希和1915年提出，黎軒是羅馬最大的國際城市亞利山大利亞（Alexandria, 埃及北部）的音譯[“Li-Kien, autre nom du Ta-Tsin (Orient Meditteraneeen)” (Ta-Chhin). TP.1915, 16, p.690]。而美國德效騫（H.H.Dubs）多年注意並研究《漢書·陳湯傳》關於元帝時期西域都護甘延壽、陳湯征北匈奴郅支單于、攻克郅支城的記載，認為所謂“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陣，講習用兵”，是羅馬軍團雇傭兵，正在操練一種用大盾排列的龜甲陣形。而這些羅馬或敘利亞的士兵，又是公元前54年在西亞卡爾雷地方，羅馬三鉅頭之一克拉蘇東征，被波斯人大敗而俘獲去的降軍。1943年他進而提出，他們在郅支城戰役中又被漢軍俘獲，被朝廷安排在張掖郡驪軒縣，在中國娶妻生子渡過一生。而據他的語音研究，驪軒正是亞歷山大利亞之誤譯。Alexandria, 中古音 k 可以代替 x, 而首尾音輟可省，可讀為“lekand”。（“A Roman Influence on Chinese Painting”, CR, 1943, 38, 13）。從前述基本脈絡看，《史》《漢》的時代對犂軒、驪軒和犁汗等，尚無同音互通之說，對其意義之別也不甚了了。東漢服虔各家讀音不一。唐代顏師古，祇注釋了驪軒乃取大秦之名以名縣。晚近王先謙等又進而發明以大秦降人置縣。以上皆屬學術探討，並無確證。德效騫也沒有找到證據。據出土漢簡，宣帝神爵二年（前60），河西已經建置驪軒縣、苑。昭帝元鳳三年（前78），張掖屬國都尉所轄千長義渠王將士射殺入侵之匈奴右部名王犁汗王，“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見《漢書·匈奴傳》）。劉光華說，張掖屬國部下，有匈奴人犁汗部落。犁汗人是河西走廊原居民之一，就是後來的驪軒。其說最確。德效騫安置俘虜之說，據《陳湯傳》：“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所謂虜乃指“閼氏、太子、名王以下”的郅支單于親屬大臣，降虜則主要是匈奴、康居人，而“單于城上立五採幡幟，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陣，講習用兵”，即使是羅馬敘利亞軍團戰陣，傳中已明言，其被俘者已就地賜給了西域發兵諸國，故安置羅馬、敘利亞人於驪軒之說實屬臆斷。此例為近代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史因失誤產生誤導的典型例子。此外，英國李約瑟（Joseph Needham）受其影響，也曾懷疑《史》《漢》匈奴、大宛傳之“秦人”為羅馬人。[《中國科學技術史》，科學出版社，1975，第一卷總論，第七章，中國和歐洲之間傳播科學思想與各種技術的情況，十二節總的觀察，（5）潮汐的觀察者和“秦人”]。他於1943年11月路過甘肅永昌（傳為漢驪軒縣），還特別注意到“永昌山區居民的臉頰特紅”。我曾寫小文《秦人·秦胡蠡測》（《考古》1983年3期），指出秦人是久居西域且已“胡化”了的漢人，與大秦無涉。但該文對驪軒安置羅馬戰俘說祇是提出質疑，未及深究。時隔二十餘年，問題依然存在爭議和疑竇。謹為述補如上，供批評指正。

之分界。祁連屬匈奴語，匈奴歌諺：“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學界或以祁連同撐黎，謂祁連山、天山是一，非是。問題出在祁連並不是撐黎的又音。漢代人的地域觀念並不模糊泛泛。南山，指西域或河西東西綿亙的山脈，有時分別稱以西域南山、河西南山。昆侖、祁連，則謂其中具體的高峰。關於祁連置的位置，分析推測較難。河西道的張掖、酒泉郡段，由於缺乏確鑿無疑的已知地點作座標（例如有文獻記載、考古依據和道里簿這樣的文字文物作證），尚存在許多闕疑。不同時代的地志記錄，因歷史變遷，不僅失准，甚至誤導，故引用時應謹慎。我們姑且假設張掖西北 40 里的黑水國遺址為漢麟得縣，據河西道簿，西去昭武 62 漢里，合 25—26 公里，可抵臨澤縣北黑河邊鴨暖、蓼泉二地之間。再前一程 61 漢里到祁連置，當 25.3 公里，假設繼續沿黑河西行，祁連置約在今高臺縣東境與臨澤鄰近。再前一程至酒泉郡表是 70 漢里，合 29 公里，正是著名的駱駝城遺址（東晉十六國時期建康郡城）。按從此處道路有分叉。明清時期西行乃向西北，沿黑河經宣化、黑城、鹽池（即明長城）一綫進入酒泉臨水，一路皆有驛鋪。漢晉道路則應沿駱駝城的方向向西。以上的祁連置祇是假設。再向西，酒泉郡諸縣置次第里數皆無，暫無法假設模擬。陶保廉《辛卯侍行記》云，唐有祁連戍，地當酒泉東之清水。李並成著作認為，唐祁連戍在今高臺南之紅崖鄉東大村，其地有漢唐古城，南距祁連山僅 4 公里，扼踞擺通河之水關峽口，該處可通祁連山深處與青海省。按其說甚勝於陶氏，但這裏高寒偏僻，不可能是漢代當東西大道的漢祁連置故址。李氏推定漢昭武在臨澤蓼泉、鴨暖鄉頗中肯。測該處至高臺紅崖鄉直綫距離 71.25 公里，合漢里 171.68 里，而道里簿昭武至祁連置僅 61 漢里。漢、唐之置、戍顯然不是一地。但這一點卻提示我們，漢祁連置處，也可能有支綫道路南通祁連山。宣帝神爵時西羌叛亂，宣帝命令破羌將軍、酒泉太守辛武賢將酒泉、敦煌兵，強弩將軍許延壽將三輔及武威等兵……數道南下（入青海省），聚擊罕開羌於青海湖西北，詳見趙充國傳。我過去討論河西道通青海翻越祁連山的道路不祇扁都口道一途。這裏，從漢祁連置向南也應有一條道路。這些南下的，或北向的道路，對河西大道而言，都是支綫。它們在大道上有驛置接點。例如，從祁連置的分叉，可通祁連山麓之張掖屬國諸羌胡住地，或再通羌中（青海）。

十、縣置次第和長安至敦煌示意圖

這兩份道里簿提供的縣、置次序，表明了它們的相對方位和關係，毫無疑義，應該說是符合歷史真實情況的。但我們發現有多處，與權威性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不同。以下摘要錄出，並作對比和說明。■代表木簡道里簿；●代表《圖集》；→是行路方向，均按東

→西排列。□□代表空缺。

①安定郡界中：

■月氏→烏氏→涇陽→平林置→高平（東南→西北）

●涇陽→烏氏→□□→朝那→高平
 |
 月氏

②張掖郡界中：

■番和→刪丹→日勒→鈞著→屋蘭→氐池→麟得→昭武→祁連置→表是（東→西）

●番和→日勒→刪丹→□□→屋蘭→□□→麟得→昭武→□□□→表是
 |
 氐池

③酒泉郡界中：

■玉門→沙頭→乾齊→淵泉（東→西）

●玉門→乾齊→沙頭→淵泉

以上對比，安定郡的月氏、涇陽，在道里簿和《圖集》中的位置正相顛倒。簡簿的月氏在最東，而《圖集》月氏卻在烏氏的西側較遠，已脫離烏氏至高平間的綫路上。當然，道路會有曲折。但道里簿月氏至高平共五站四程 230 漢里，合 95.63 公里。而今天地圖此段直綫距離與漢道里數相差無幾，可知漢時的道路非常筆直，幾乎是沒有迂回彎曲的。又張掖郡的刪丹、日勒二縣位置方向，屋蘭、氐池二縣的位置方向，在道里簿和《圖集》都是相反的。《圖集》將氐池置於今民樂，北距刪丹（山丹）、屋蘭（今張掖東）較遠，經過氐池的道路，從北方將向南方繞一大彎，再回到北方，這當然令人費解。又酒泉郡段，則是沙頭、乾齊二縣方位完全顛倒。

以上僅排列指出其中的問題所在。驛置道里簿漢簡，是漢代郵驛政務行路的依據，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它的真實性、權威性。看來，過去對漢代河西歷史地理作出的一些結論，應當根據這兩份簡牘文書——《高平道驛置道里簿》和《河西道驛置道里簿》，重新進行衡量、驗證、反思和修正。

由於河西是漢武帝時期開拓的新疆土，故河西後來歷代地理建置均與漢代的史地建置有關，可以說是它們的藍圖與奠基石。因此，這兩份道里簿的發現，對河西走廊整個歷史時期地理建置的研究，都有着重要指導意義。我始終認為，我們對它的認識和研究還相當地不足。它的價值，包括明顯的和潛在的，似乎尚未全部揭示出來。這正是寫此文的出發點和目的。參加高平道簿的發掘整理已三十多年了，近來看到懸泉置河西道簿的材料，這真是一把解讀秘密的鑰匙，才得以重作探索，了卻心願。

根據二枚道里簿，我們可以排出漢代從長安出發經高平、河西二道到達敦煌的正確的官道驛置綫路示意圖。（圖3）

當然，其中仍不無問題。比如：

1. 據高平道、河西道、南道三簿道里，來比較地圖的直綫距離，發現有些路段，二者相差不多，這意味該段道路筆直，無多曲折迂回。例如媼圍—小張掖，直綫距 135 公里，合 324.5 漢里，道里簿爲 330 漢里，道路應是直綫。又表是（駱駝城）—淵泉（四道溝），直綫距 270 公里，合 649 漢里，道里簿爲 694 漢里，略有曲折。再淵泉—敦煌，直綫距 183 公里，合 440 漢里，而道里簿爲 451 漢里（見後文考證）。這些路段，一是戈壁平野多，城鎮、人口稀少，道路容易取直；二是所考地點位置較準，無多疑議。在有些地段則不然。如姑臧—鱒得，直綫距 235 公里，合 565 漢里，道里簿則爲 506 漢里（詳見後文考證），道里簿里數反而比直綫距離少得多，而姑臧、鱒得之地望考證似無問題。高平道也有類似現象，例如示意圖月氏—高平一段，直綫距 105 公里，合 252 漢里，道里簿則爲 240 里。實際里數小而直綫距離大，這種反常現象表明，某些路段的驛置數、道里數仍可質疑，尚需深入探討。

2. 據示意圖，從長安經南道至小張掖，似比高平道迂回路遠，然而道里簿里數中，南道反而近一些。其中也涉及所過地點的具體位置。例如金城郡治允吾，《中國歷史地圖集》置於大通河（浩亶河）入湟處東側。《漢書·地理志》、《水經注》記金城郡水系有不少錯誤。如地理志云允吾的逆水從枝陽入湟，浩亶水於允吾入湟等都是錯的。《水經注》云湟水經允吾北鄭伯津與澗水合，又東流枝陽與逆水合，也是錯的，一是把黃河當成湟水，二是鄭伯津處會澗水爲允吾，於史無證。從示意圖看，《地圖集》允吾的位置對南道而言非常别扭，應當在湟水入黃河的交會處。又烏峭嶺道漢代究竟幾程，也是疑問。

3. 從安定郡高平—媼圍，是否僅有四程，中經三站，這段路直綫距 217.5 公里，合 523 漢里，安排四程，每程 131 漢里，站距太遠，爲一大可疑，這牽涉缺佚簡的復原是否準確等，作者亦不敢專斷，故附此以備同仁商榷。

十一、關於諸驛置道里的測算

河西道、高平道二簿的拼合，加上南道里程集簿的一些數字，使我們有條件和可能對整個河西走廊官道驛置的里程作較精確的計算和推測。

南道集簿的里程，起點約爲敦煌的懸泉置，理由是該置址位於現地名甜水井道班之南側，據出土簡，東有魚離置，在老斯兔附近，距懸泉 30 公里左右。西與敦煌 60 公里的中

間，有遮要置，地當疙瘩井附近。因此，魚離—懸泉—遮要—敦煌四地之間，皆 30 公里左右，合漢里 72 里。而南道集簿，至冥安 217 漢里，當是冥安—廣至—魚離—懸泉的里程，按平均值恰好每程為 72 漢里。依此類推，懸泉—遮要—敦煌三站二程距離亦 72 漢里左右。敦煌向龍勒縣（壽昌城址附近）65 公里左右，合 156 漢里。約為二程，但不知中間有無驛置。以東，廣至縣約在安西踏實鄉的破城子，冥安縣約在安西橋子鄉附近，而淵泉縣當在四道溝。其中淵泉、冥安之間距較遠，先假設為 90 漢里。這樣，從敦煌起始至淵泉，其總里程 $144+217+90=451$ 漢里。以上為敦煌郡界，可補進河西道簿。

淵泉向東至表是，依河西道簿為“縣、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其中，已知淵泉—乾齊—沙頭—玉門三站三程共 242 漢里，則玉門—C—天依—B—祿福—綏彌—樂涓—A—表是共八站八程為 452 漢里，平均每程約 56.5 漢里，置站較密集。

表是以東為張掖郡界，共十個縣、置，但其中缺少刪丹—番和—顯美的站程，我們按其折中數假設各為 70 漢里，再依高平道、河西道兩簿互補，可知張掖郡從顯美到表是，即表是—祁連置—昭武—鱒得—氏池—屋蘭—鈞著置—日勒—刪丹—番和—顯美共十站十程 624 漢里。

武威郡共涉及四縣置四程，總道里為 267 漢里，亦可補入小計之中。

以上，我們基本補齊了河西道簿，遺憾的是，唯獨缺失表是至玉門各縣置之里數；又所補三置 A、B、C，位置是否正確？這些祇能付諸闕如，留待將來解決了。

至此，我們將這些已知或推算出的道里數列出，並可以利用它們再作進一步的推算，擴大其潛在的價值。同時，在演算中鈎距參伍，驗證其準確程度。

1. 關於河西道的里程及推算：

(1) 武威郡（接高平道）段：媼圍—顯美，經四縣二置共六程，472 漢里。

(2) 武威郡（接南道）段：蒼松—顯美，經四縣四程，267 漢里。

(3) 張掖郡段：顯美—表是，八縣二置共十程，624 漢里。

(4) 酒泉郡段：表是—淵泉，八縣三置共十一程，694 漢里。

(5) 敦煌郡段：

(5.1) 淵泉—懸泉，307 漢里。

(5.2) 淵泉—敦煌，451 漢里。

(5.3) 淵泉—龍勒，五縣三置七程，607 漢里，至陽關 616 漢里。

(6) 河西道（接高平道）：媼圍—陽關，總長 2406 漢里，經縣二十五，置十，共 35 站。

(7) 河西道（接南道）：蒼松—陽關，總長 2201 漢里，經縣二十五，置八，共 33 站。

依上述基礎進一步推算：

(8) 懸泉—鱒得 $[(5.1)+(4)+70+61+62]$ ，爲 1194 漢里。

(9) 懸泉—姑臧 $[(5.1)+(4)+(3)+75]$ ，爲 1700 漢里。

(10) 鱒得—姑臧 $[(9)-(8)]$ ，爲 506 漢里。

(11) 姑臧—媼圍，397 漢里。

(12) 姑臧—蒼松，192 漢里。

(13) 鱒得—祿福，按酒泉郡 694 漢里，已知玉門—淵泉 242 漢里，所餘路程 452 漢里而祿福居中，約當表是以西 226 漢里左右。據此推算鱒得、祿福二地距離約 419 漢里。

(14) 祿福—敦煌，同前方法推算爲 918 漢里。

(15) 懸泉—蒼松 $[(5.1)+(4)+(3)+(2)]$ ，1892 漢里。

(16) 懸泉—媼圍 $[(5.1)+(4)+(3)+(1)]$ ，爲 2097 漢里。

2. 關於南道集簿的里程和推算：

(17) 懸泉—冥安，217 漢里。

(18) 懸泉—張掖[郡]治，1275 漢里。

(19) 懸泉—姑臧，1702 漢里。

(20) 懸泉—高平，3151 漢里。※又見後 (33)

(21) 懸泉—允吾，2880 漢里。※又見後 (37)

(22) 懸泉—平襄，2830 漢里。

(23) 平襄—隴城，139 漢里。

(24) 懸泉—允吾—長安，4080 漢里。

根據以上資料再推算：

(25) 高平—長安，按《元和郡縣圖志》記載爲 800 唐里，合爲 1037 漢里。

(26) 懸泉—高平—長安 $[(20)+(25)]$ ，爲 4188 漢里。※又見 (36)

(27) 鱒得—姑臧 $[(19)-(18)]$ ，爲 427 漢里。

(28) 姑臧—高平 $[(20)-(19)]$ ，爲 1449 漢里。※又見 (34)

(29) 媼圍—高平 $[(28)-(11)]$ ，爲 1052 漢里。※又見 (35)

(30) 姑臧—允吾 $[(21)-(19)]$ ，爲 1178 漢里。※又見 (38)

(31) 蒼松—允吾 $[(21)-(19)-(12)]$ ，爲 986 漢里。※又見 (39)

(32) 平襄—長安 $[(24)-(22)]$ ，爲 1250 漢里。

以上僅屬可推算的一部分，還可以繼續下去。由於發現其中某些資料有誤，爲了省便，到此爲止，留待糾正後再補出。

3. 對某些推算的驗證：

驗證一：懸泉至姑臧的距離

高平、河西道二簿參補合成後，據郡、縣、置道里累計，懸泉—姑臧爲 1700 漢里，見（9）。而南道集簿，（19）爲 1702 漢里。二者幾乎相等。兩份不同資料的結果如此吻合，表明河西道簿姑臧至懸泉間驛置里程的推測，大致是不錯的。

驗證二：鱣得的位置爲何移動？

河西道懸泉—鱣得爲 1194 漢里，見（8）；集簿（18）則爲 1275 漢里，後者較前者多 81 漢里。

又河西道（10）鱣得一姑臧爲 506 漢里；而集簿（27）則爲 427 漢里，前者較後者多 79 漢里。

以上兩種演算表明，懸泉—姑臧的總道里未變，而鱣得、張掖郡治二者似非一地。這種可能不是沒有。集簿“張掖[郡]，千二百七十五[里]”，並未明言是到郡治鱣得。而河西道簿鱣得一昭武之下注“府下”。前已考述，此“府”或指涼州刺史府、河西五郡大將軍府，張掖郡治可能移往它處，並不在鱣得，才出現里程的不一。

驗證三：姑臧、媼圍至高平的里程

河西道媼圍以西，高平道高平至長安這兩段道里比較可靠，唯媼圍—高平的道里十分重要，需要證實。據集簿（19）、（20）、（28）、（29），媼圍—高平 1052 漢里，而中間祇能安排三站（D、E、F），合共四程，合 436.6 公里。平均每程 109 公里，263 漢里，這絕無可能。又二地直綫距約 217.5 公里。鳥道（直綫距）一般說會比實際道里少一些，而此處實際道里竟爲鳥道之二倍，可知其中某個資料肯定出了問題。

懸泉到姑臧再至媼圍，有河西、高平道簿的依據，以及集簿的驗證，毋庸置疑。問題當在懸泉—高平即（20）的“三千一百五十一[里]”上，其釋文可能有誤。

按此段道路，按鳥道計實際道路當在 230—240 公里左右，合漢里約 552—577 里。3151 里可能是 2651—2551 之誤。姑臧—高平爲 949 漢里，媼圍—高平爲 552—577 漢里。因此，集簿（20）3151 漢里這個數字肯定有誤（以※號標注，供參考，下同），並予糾正爲：

（33）懸泉—高平，2651—2551 漢里左右。

以上糾正如不誤，則下列數字均經糾正：

（34）姑臧—高平〔（33）-（19）〕，爲 949—975 漢里。

（35）媼圍—高平〔（33）-（19）-（11）〕，爲 552—577 漢里。

（36）懸泉—高平—長安〔（33）+（25）〕，爲 3688—3713 漢里。

驗證四：媼圍至龍勒的不同計算：

$(5.3) + (4) + (3) + 75 + (11) = 2397$ 漢里；

$(19) + (11) + 156 + 144 = 2399$ 漢里。

以上二者相差無幾，再次證明其中的資料是可信的。

驗證五：懸泉至金城郡允吾的道里

集簿(21)懸泉—允吾爲 2880 漢里，此數據頗有疑義。一是前文已辨，懸泉至允吾 2880 之數，不可能比懸泉至平襄的 2830 漢里還大。從地圖觀測，平襄至長安，與高平至長安相比較，前者距離較遠，路程地形亦複雜得多，高平至長安據(25)爲 1037 漢里，平襄至長安當更遠一些，據(32)爲 1250 漢里，故 2880、2830 二資料中，肯定是 2880 有誤。其二，如果以(21)2880 爲准，減去(19)，則姑臧—允吾 $[(21)-(19)]$ 爲 1178 漢里，即(30)，約合 488.8 公里。而其二地間直綫距爲 204 公里，僅合 491.5 漢里。這段路程盡管曲折，起伏厲害，但實際路程也絕不至爲烏道之近 2.5 倍。所以集簿 2880 漢里之數，釋文顯然也有錯誤。

現姑且假設蒼松到允吾按烏道計，實際道路當在 250 公里即 600 漢里左右。故 2880 漢里爲“二千二百八十”之誤。姑臧至允吾爲 578 漢里，而不是(30)的 1178 漢里，蒼松至允吾爲 386 漢里，而不是(31)的 986 漢里，分別合 240 公里和 160 公里。地圖允吾至姑臧與允吾至平襄（今通渭）直綫距大致相等，約爲 204 公里。兩相比較，實際道里比後者的烏道長一些，數字較接近。可見 2880 即(21)確是有問題的，最大可能是釋文不確。因此，需對前述(21)、(30)、(31)三個數字予以校正：

(37) 懸泉—允吾，糾正爲 2280 漢里。

(38) 姑臧—允吾 $[(37)-(19)]$ ，爲 578 漢里。

(39) 蒼松—允吾 $[(37)-(19)-(12)]$ ，爲 386 漢里。由此並推補出五個數據：

(40) 允吾—平襄 $[(22)-(37)]$ ，爲 550 漢里。

(41) 平襄—隴城（涼州刺史治所），集簿原文爲“（平襄）東南去刺史□三□……”，地圖平襄至隴城（今秦安縣隴城鎮）直綫距 67.5 公里，合 162 漢里。簡文可補“百三十……”。按一般規律實際道里應大於 162 漢里，因此，“三”字是否準確也需考慮。

(42) 高平道長安至懸泉，比南道長安至懸泉近，即近(24)–(36)爲 392 漢里，約合 162.5 公里。前文據集簿有問題的數字，認爲南道去河西比從高平去河西還近些，即(26)4188—(24)4080 爲 108 漢里。實際上，南道既迂曲又艱險，而高平道近捷方便。

(43) 長安—高平—敦煌 $[(36)+144]$ 爲 3832 漢里，合 1590 公里左右。再去龍勒、陽關 $[3832 漢里+156+9]$ 爲 3997 漢里。

(44) 長安—蒼松—敦煌 $[(24)+144]$ 爲 4224 漢里，合 1753 公里左右。再去龍勒、陽關 $[4224+156+9]$ 爲 4389 漢里。

最後聲明一點，以上諸推算資料，除了簡牘提供的以外，其餘均屬於推測演算的近似值。

十二、河西縣置地名淵源

河西地區由於大地域環境、民族成分與歷史原因，古代和今天都存在不少民族語言音譯的地名。僅此兩份道里簿，可定為民族語言音譯的就有：月氏、烏氏、婼圍、居延、鱓裏、捐次、姑臧、顯美、刪丹、日勒、鈞著、屋蘭、氏池、鱓得、昭武、祁連、表是、乾齊等。復原的部分和《漢書·地理志》中還有：樸剽、休屠、番和、驪軒、樂涇、綏彌、祿福、天依、龍勒等。其中，顯美、番和、昭武、祿福，容易被誤解為漢語言。可以比較肯定的漢語地名不多，即：蒼松、鸞鳥、張掖、武威、宣威、酒泉、會水、玉門、沙頭、淵泉、冥安、廣至、效穀、敦煌等，約佔三分之一。這還祇是就本簡簿的縣置名稱而言，不包括其它的地理概念如山水湖澤、民族部落之類。民族語言地名，一部分是與民族、部落有關的，如月氏、驪軒、鱓得、休屠，其它不詳。漢語言地名，同漢地名命名習慣，從古、從地、從姓氏、從人、從事、從物……可以據文解義。例如，河西、河東的幾個郡名，多與漢武帝征伐匈奴、斥境拓土之事有關。

按《漢書》應劭注，金城、酒泉的命名屬一種類型，安定、武威、張掖、敦煌屬另一種類型，後世史家多從其說。武威為宣揚軍威，張掖乃張國掖臂。唯敦煌，有學者以為乃民族語言譯音。《水經注》卷二引《山海經》云西域有“敦薨”之山、水、渚、浦、藪，最終入鹽澤（羅布泊），以為敦薨即敦煌的語源。按上述所指，為今新疆天山中部東南，開都河、博斯騰湖與孔雀河上流，即漢西域焉耆、尉犁、渠犂、危須國之地。按文獻，該地漢時無敦薨之說。酈道元注水經河源出西域，這一部分頗有迷離失實。而《山海經》神怪駁雜，其中又有秦漢時的增刪，不足盡信。《漢書》應劭注敦煌曰：“敦，大也；煌，盛也”，與安定、武威、張掖同例。應劭為東漢人，去西京未遠，不會不知道河西乃至邊疆地區有民族語言譯音的問題。應氏凡遇到這種情況，一般皆直注其音，或言係某國云云。此其一。其次，西漢郡國共一百零三個，其名稱絕大多數為漢式，祇有犍為、元（玄）菟、樂浪三郡名例外，屬民族語言譯音，可見漢時不以異言名郡國，縣、道則無所謂。又敦煌郡從酒泉郡分出，自不應再以民族語言命名。敦煌郡六縣，淵泉因多泉；冥安因冥澤、冥水；廣至因其地處藉端水，可南通羌中；效穀因屯田致穀，皆漢式命名。唯有龍勒，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征漠北匈奴單于庭，過龍勒水，當屬匈奴或羌胡語。所以，敦煌不是敦薨，也不是少數民族語言音譯。

十三、玉門、陽關和關外十字路口

自敦煌而西，去玉門爲支綫而赴陽關爲大道，蓋因陽關重於玉門。《漢書·西域傳》述西域兩道，先陽關南道而後玉門北道，此其一。鄭吉使西域，先護鄯善以西的南道諸國，後護北道稱都護，此其二。衡量諸國道里，以長安、陽關爲准而不言玉門，此其三。懸泉簡當驛置大道有龍勒無玉門，此其四。西域北道之國亦進出陽關，如簡（I 0309③：20）“烏孫、莎車王使者四人、貴人十七”同簿進出。簡（II 0114③：522）甘露三年十月烏孫公主歸漢，入陽關過龍勒，此其五。由歷代過兩關之記載，過玉門者少，且多軍旅，過陽關者多，多政治文化交流，此其六。魏晉以後，行玉門者更稀少，漸移至安西—伊吾，主要因爲玉門之路艱難險惡；西域北道地近匈奴，多戰爭；又由吐魯番、焉耆可南下且末、若羌而入陽關。《西域傳》載若羌去陽關 1800 漢里，去長安 6300 里；鄯善去陽關 1600 里，去長安 6100 里。此二例減算，長安至陽關皆 4500 漢里。例 3 長安至懸泉 4080 漢里，加至敦煌 144 漢里，敦煌至陽關遺址 68 公里，合 165 漢里，則長安至陽關爲 4389 漢里，接近 4500 之數。亦可知《西域傳》之長安至陽關道里乃是依南道里程計算。

漢代列四郡據兩關，隔絕羌胡，但羌胡之間仍可由兩關以外而來往。昭帝始元六年已置金城郡。《趙充國傳》記宣帝元康末匈奴使者入羌中聯盟抗漢，“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值”。羌人、小月氏亦入匈奴藉兵，欲擊敦煌、鄯善，斷漢道。匈奴當從漠北即沙陰西出鹽澤羅布淖南下，長阬當指柴達木盆地，窮水塞爲張掖黑水南部防羌人之塞防，此處屬國指張掖或金城屬國一帶，故能與先零羌接觸。神爵二年匈奴右地乖亂，日逐王數萬騎來降，護南道諸國使者鄭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兵迎之，日逐王數萬隨吉至河曲，有逃亡者，吉追斬之，將其眾歸京師。日逐王在伊吾、蒲類之北，河曲在青海貴德，時匈奴單于將數萬騎旁塞欲寇，漢遣趙充國將四萬騎屯沿邊九郡，河西前哨緊急，故鄭吉、日逐王南下羌中，入青海省，經河湟而赴長安。以上見《漢書》《匈奴傳》、《趙充國傳》、《鄭吉傳》等。懸泉簡（I. 0309③：167—168）有送日逐王之車夫稟食廣至的文書記錄，故推斷廣至縣所在向南，有南下入羌中的驛路支綫。廣至，義若可至各處。懸泉簡有廣校候官、益廣候官均在南塞，時當神爵元年，廣校候、益廣候向敦煌太守府報告羌人自南藉端水（疏勒河上游昌馬河）、淵泉欲爲寇敦煌。亦即《趙充國傳》所謂青海之罕開羌人欲進攻酒泉、敦煌，二者是一。故淵泉、冥安、廣至縣之南方，也必有通羌中（青海）之路。鄭吉、日逐王極可能是沿這些道路進入今青海省再東赴長安的。《趙充國傳》載充國上書言屯田十二利，屯墾浩亶至臨羌，漕穀河湟，繕鄉亭，浚溝渠，治湟峽以西道路橋樑，“令可至鮮水（青海湖），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趙充國征羌的這一戰略安排，給神爵二年底三年初日逐王自羌中歸赴長安，創造了良好條件。

例 1 《河西道驛置道里簿》

B. 模擬復原補出缺失部分，[]地點、里數不明
C.

图 3

長安至茂陵七十里	月氏至烏氏五十里	媼園至居延置九十里	刪井至白勃八十里
茂陵至茂置卅五里	烏氏至涇陽五十里	居延置至縣裏九里	白勃至鈞着置五十里
茂置至好止七十里	涇陽至平林置六十里	縣裏至堵次九十里	鈞着置至屋蘭五十里
好止至義置七十里	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	堵次至小張掖六十里	屋蘭至盛池五十里
義置至漆置()里	高平至()里	小張掖至姑臧六十里	盛池至縣得五十里
漆置至陰槃()里	()里	姑臧至顯美七十里	()里
陰槃至臨涇()里	()里	顯美至番和七十里	()里
臨涇至月氏()里	()里	番和至刪井七十里	()里

(B)

(A)

例3 道里集簿簡
(V.T1611③: 39)
A.B, 正背

例2 《高平道驛置道里簿》

A. 原簡 (74.EP.T59: 582)

B. 模擬復原補出缺佚部分, []地點、里數不明

图 3

敦煌懸泉漢簡所見人名綜述（三）

——以敦煌郡太守人名爲中心的考察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張俊民

內容提要 本文通過對懸泉漢簡中所能見到的與敦煌太守一職相關人名簡文（近 160 條）的歸納整理，檢討西漢敦煌太守一職人名的變化，藉助簡牘的紀年，建立敦煌太守人名編年，爲其它出現敦煌太守人名的簡牘確定比較合理的年代。在此基礎之上，並就有關社會問題進行簡單探討，瞭解漢代敦煌郡的吏制和社會狀況，對於西北史地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 懸泉漢簡 敦煌太守 人名 編年

“敦煌懸泉漢簡”以及“效穀懸泉置”等定名，體現了懸泉漢簡與漢代敦煌郡以及敦煌太守的關係。作爲敦煌郡下轄九個重要的“置”之一，因其所處的地位決定了敦煌太守與之的關係。主要體現在：懸泉置作爲敦煌郡下轄的機構，以敦煌太守名義傳行的政令文書、下行的管理文書，均要傳達到懸泉置；以敦煌太守名義簽發的“傳”文書，東行者須經過懸泉置，並以抄件形式保存下來。因之，在懸泉漢簡中可以見到許多敦煌太守的記錄，特別是太守的名字。以現有披露的資料可以見到 33 位敦煌太守的名字。^①本文將這些資料進行歸類整理，對這些人名進行排列，並就與之相關的問題進行簡單的分析，以此體現漢代敦煌郡太守人名的變更與漢代郡太守的管理方式和方法。妥否，請方家賜教。

^① 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6 頁。

一、有明確紀年的敦煌太守人名

在懸泉漢簡中，與敦煌太守人名相關的簡文約有二百二十條，其中有明確紀年的簡文約八十條。按照年代，由早至晚排列下來，就會得到敦煌太守的人名編年。在以紀年排列簡牘之後，又將與紀年簡中出現相同的人名進行排列。因為簡牘中出現的敦煌太守人名有名無姓，似有些不完美。在所有存在紀年的簡文中最早的是本始三年簡，即：

1. 本始三年二月辛巳朔癸巳敦煌太守登行縣謂淵泉縣以次爲〔駕〕當舍傳舍如律〔令〕 VT1412③: 77^①

本簡紅柳，完整，長 19.4、寬 1 釐米。本始三年，即公元前 71 年。查陳垣《二十史朔閏表》（下作《朔閏表》）本年二月辛巳初一，相符，癸巳爲十三日。“太守”漢簡中均作“太守”。本年敦煌太守的名字叫“登”。“行縣”即巡視諸縣，檢查事務。後面的文字應是“傳”文書文字，不過除文字有脫漏外，與一般所說的“傳”文書也有一些區別。因為從簡文字面來看，是敦煌太守直接給淵泉縣發文。標明其巡視的第一站就是淵泉縣，而淵泉縣地處敦煌郡東部。另外關於“登”的簡文尚有一條，即：

2. ……月庚戌朔丁□敦煌太守登候充國行丞事謂縣官領南□□卿史龍前移書令縣官爲

……亭作……令史望來行縣轅□縣堅木以作立□軸□敕令 A

…… / 掾…… B I T0209⑤: 19AB

本簡紅柳，完整，長 23.2、寬 1.65 釐米。從釋文本身來看，原簡保存不太理想，許多文字不可釋讀，所以才有省略號。“月庚戌朔”查《朔閏表》，元鳳至地節年間，庚戌朔者有二：一是元鳳五年二月，一是本始三年三月。按照簡文文義，本始三年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權定爲本始三年。根據簡文，應該是敦煌太守登與行丞事的候充國下發的政令，要求屬縣“堅木以作”什麼什麼。“行丞事”即代行丞事，“候”不太好理解。懸泉漢簡中有“敦煌候”，不知是否是一人。敦煌候簡見：

3. 東合檄一敦煌候印 詣冥安 三月辛亥日桑榆時受□ II T0114③: 277

4. 遮要置亭次行□ A

印曰敦煌候印 十一月己丑日下舖時亭卒樂以來□ B II T0314②: 304

① 本簡編號作 V92DXT1412③:77，其中“V”代表分區，“92”爲發掘年度，“DX”是敦煌懸泉置中文拼音的縮寫。因簡號太長，省略發掘年度和“DX”。下同。

簡 3、簡 4 爲郵書刺，記錄郵書傳遞的相關信息。“敦煌候”，《史記》、《漢書》、《後漢書》均缺載。^①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所記爲漢代初年事，其中提到郡有“候”，秩俸六百石，簡記：“中候，郡候，騎千人，衛將軍候，衛候，秩各六百石。”^②由此可見，在漢代郡是設有“候”一職官員的。

在有紀年記載的敦煌太守人名中，按照紀年時間僅次於“登”者是神爵二年的“快”，即：

5. 神爵二年三月丙午朔甲戌敦煌太守快長史佈施承德謂縣郡庫太守行縣歸傳車被具多

敝坐爲論易□□□□遣吏迎受輸敝被具郡庫相與校計如律令

A

掾堅來守屬敝給事令史廣意佐富昌 B

I T0309③: 236AB

6. 敦煌太守快使守屬充國送牢羌斥候羌候 人十二

琅何羌□君彌藏奉獻詣

行在所以令爲駕二乘傳 十一月辛未皆罷 (以上爲第一欄)

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

爲駕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以上爲第二欄)

I T0210③: 6

簡 5，胡楊，完整，長 22.7、寬 1.7 釐米。神爵二年即公元前 60 年，三月丙午朔與《朔閏表》相符，甲戌二十九日。本簡是敦煌太守快與“長史佈施、承德”三人聯名下發的文書，要求各地將破損的傳車“被具”（零部件、備用品）上報郡庫核銷。此令可見漢代郵驛系統中車輛管理的一個方面。B 面的署名是郡太守一級的屬官，共有“掾堅來、守屬敝、給事令史廣意、佐富昌”等。其中掾、守屬、給事令史、佐爲官名，堅來、敝、廣意與富昌是人名。

簡 6，紅柳，完整，長 22.75、寬 1.7 釐米。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與《朔閏表》相符。文書格式屬於“傳”文書。是敦煌太守快發給“守屬充國”的“傳”，守屬充國護送羌人“牢羌”、“琅何羌”等到長安奉獻。體現了當時漢與少數民族之間的交往方式與方法。敦煌郡要派人專門沿途護送這些使者到長安。

敦煌太守快是唯一見於《漢書》記載的敦煌太守。即卷六九《趙充國傳》：“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將婁、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齋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

① 本文史書文獻通過《漢籍全文檢索系統》幫助檢索。

②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釋文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71 頁。

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①”相關的簡文還有：

7. 神爵三年三月辛丑朔丁卯大守快丞□謂效穀長□□□□□都□

責遮要乃十一月以來吏□□□□□具□□□□□□□

I T0309③: 280

8. 神爵四年正月丙寅朔壬辰敦煌大守快庫丞何兼行丞事告領縣泉置史光寫移書到驗問審

如倚相言爲逐責遣吏將禹詣府毋留如律令

II T0215③: 3A

9. □神爵四年正月丙寅朔己卯敦煌大守快章丞

II T0214②: 583

10. 神爵四年六月癸巳朔甲寅敦煌大守快庫丞何兼行丞事謂縣廣至

東魚澤亭長安世案縣置見器少前遣小府佐廣成將徒復作□□ A

掾□國守屬敞廣利助府佐慶…… B

I T0309③: 86AB

11. 神爵四年八月己卯敦煌大守快長史佈施千人充行丞事謂小府縣官官案徒復作官奴婢各有數□□□□□ A

如律令 / 九月丙寅效穀丞光謂遮要縣泉置嗇夫吏寫移檄到輒移見徒復作名籍會□ B

…… 移解何□□□移見徒復作□□□□□□□毋忽如律令

C

II T0314②: 306ABC

12. 敦煌千人充以近次行大守事□□□定上

大守快印綬小史以令爲駕二封輶傳…… （以上爲第一欄）

神爵四年十月辛卯朔己酉敦煌千人充以近次行大守事□□

者如律令…… （以上爲第二欄）

I T0309③: 112

這些是有紀年的關於“敦煌太守快”的一些簡文。其中簡7、簡9因爲文字問題，文義不太明瞭。簡7，神爵三年（前59）三月辛丑朔與《朔閏表》相符，丁卯二十七日；簡9，神爵四年（前58）正月丙寅朔與《朔閏表》相符，己卯十四日，“章丞”可能是“丞章”。

簡8，紅柳，完整，長23.5、寬1.9釐米。壬辰爲二十六日。本簡是敦煌太守快與郡庫丞何發給“領縣泉置史光”的文書，因爲“禹”與“倚相”的債務糾紛，要求將“禹”送到太守府處理。此簡反映出，當時懸泉置有一名太守府委派的“史”，監領懸泉置的事務，“禹”與“倚相”的債務糾紛由太守府親自出面處理。“倚相”是人名，不太常見，不過有簡文可證是人名，即簡：

13. 元康二年閏月戊戌朔己酉縣泉廢佐弘敢言之爰書廢御委粟里孫倚相告曰所葆

① 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83，2980頁。

養傳馬一

匹駟駁乘決左鼻左剽取右後一齒十五歲高五尺七寸名曰野浞疾中飲食不盡
度日加益篤今死即與嗇夫賀佐何雜診馬都吏宜時前身完毋兵刃木索跡疾死審它

如爰書

敢言之

VT1309④: 26

本簡屬於懸泉置《傳馬病死爰書》。通過文書記錄的方式與方法，我們可以考察漢代郵驛系統中傳馬疾病與死亡的管理制度。廐佐弘的爰書包括廐御的籍貫、人名，所葆養傳馬的顏色、特徵、身高、年齡，疾病特徵、治療情況，傳馬病死時且有嗇夫賀、佐何與都吏宜時三人在前，同時驗證傳馬身上確實“毋兵刃木索跡”。在這些程式之後，才能用正規的爰書上報郡府。本簡是漢代馬匹管理制度嚴密的最好佐證。

簡 10，紅柳，下殘，長 22.7、寬 1.5 釐米。神爵四年六月癸巳朔與《朔閏表》相符，甲寅二十二日。本簡是敦煌太守快與郡庫丞何代行丞事發給諸縣的文書，原因是廣至縣東魚澤的亭長安世在調查郡務的過程中，發現郵驛系統“置”中的器物都比以前的少，郡委派叫廣成的小府佐帶領囚徒到“置”製作器物，以補充各置日常運作所需的器物。

簡 11，紅柳，觚，下殘，長 33.5、寬 1.5 釐米。神爵四年八月壬辰朔，無己卯日。“己卯”釋文可以存疑。從整個簡文來看，是當時對官徒與官奴婢管理的文書。A 面是敦煌太守快、長史佈施與行丞事的敦煌千人充依制言官徒與官奴婢應該都有“數”，可能是要求進行登記，即 B 面的名籍；B 面則是效穀縣接到郡府文書後，由丞光下發給懸泉置的文書。

簡 12，胡楊，完整，長 23.2、寬 1.6 釐米。神爵四年十月辛卯朔與《朔閏表》相符，己酉十九日。本簡是敦煌千人充代行太守事，以太守府名義簽發的“傳”文書。“傳”文書的內容與敦煌太守快有關係。充派人將原來太守快的身份象徵“印綬”送往長安。可見神爵四年十月時，敦煌太守快被免職了。當然也可以看作是“快”任敦煌太守的最終年限。

“印綬小史”可能釋文有問題，因為漢代的制度是應該把印綬送到“御史”或“御史府”。除著名的《永光五年案驗失亡傳信冊》外（簡 II T0216②: 867—869），還有它簡可證。如：

14. 上印綬謹牒書印章謂上御史府請為更刻移中二千□

相佈告屬縣官毋聽亡印如律令敢言之

VT1311③: 294

15. 敦煌太守遣守屬馮充國上伊循城都尉□印綬御史

以令為駕二封軺傳 七月庚午食時□□ （以上為第一欄）

五鳳元年五月戊午朔戊寅敦煌太守常樂丞□謂部□

□□□駕當舍傳舍如律令 （以上為第二欄）

I T0309③: 193

16. ☐☐☐☐☐所亡傳同封第者輒捕系上傳信御史府如律令 I T0309③: 255
17. ☒令史周生宗上印綬御史府從者一人凡二人人再食食三升東☐

II T0115③: 318

印綬，是官位與身份的象徵。漢代在御史府有人專管符璽、印綬，這些簡文又告訴了我們當時一些具體的細節與制度。隨著太守任職人名的變更，印綬也要更換。

與敦煌太守快相關的簡文還有一些沒有紀年的簡文。如：

18. 二月癸亥敦煌太守快長史佈施謁 ☒
光寫重出入廿二日至今不報解何 ☐ ☒ II T0215②: 148

19. 七月甲申敦煌太守快長史佈施騎千人定舜行丞事敢告部都尉卒人謂縣督盜賊
史□世□□寫移書到令載部吏遮泄求捕部界中得以書言毋有令吏民爰書相辜

20. 六月庚午敦煌太守快長史奉憲倉長廣☐兼行丞事……☒
☐寫移書到如刺史書律令 / 掾何☐☐助府令史赦之佐☐☐☒ VT1510②: 40

21. 二月甲寅敦煌太守快倉長定君兼行丞事下部縣官承書從事
如詔書 屬光書佐光

22. 危須王遣副使趙疏□□□□□……

奉獻橐它言事詣

行在所以令爲駕一封傳 …… (以上爲第一欄)

……敦煌大守快長史佈施丞漢德謂

敦煌以次爲駕當舍傳舍如律令 (以上爲第二欄) IT0310③: 13

23. 御史中丞臣彊守侍御史少史臣忠味死言尚書奉御史大夫吉奏丞相相上酒泉大
守武賢敦煌大守

快書言二事其一事武賢前書穰麥皮芒厚以廩當食者小石三石少不足丞相請都當食廩穰麥者石加

I T0309③: 221

24. 十月己卯敦煌太守快丞漢德敢告部都尉卒人謂縣督盜賊史吉光刑世寫移今□
□□□□

部督趣書到各益部吏遮泄來捕部界中明白大編書鄉亭市里顯見令吏民盡知□□
□□□□ I T0309③: 222

25. 七月庚午敦煌大守快長史佈施丞廣德敢告部都尉卒人寫移書到縣……

□府益調吏□□□□□□□□□□白報如律令敢告卒人 / 守卒史□□

..... I T0210④: 14

26. 六月庚申敦煌太守快丞□□敢告□

入令長丞與三老孝弟力田明白扁□

II T0114S: 165

27. 敦煌太守快守卒史捐□□軍□郡中

爲駕一封軺傳 (以上爲第一欄)

甘露四年九月□□□□敦煌□□□□□□

玉門□□□□以次爲駕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以上爲第二欄)

II T0114③: 456

上述簡 18—27 共十簡，均是與敦煌太守快相關的簡文。其中除簡 27 外，都可以按照敦煌太守快的紀年確定簡牘的大體時間。簡 22 屬於“傳”文書，反映了在“快”任敦煌太守的時期，危須王曾派人到長安奉獻。提供了漢與西域交往的信息。簡 27，時間是甘露四年（前 50）。前面已經注意到，敦煌太守快的最後任期是神爵四年十月以前（簡 12），爲什麼會在甘露四年又出現一名“快”的敦煌太守呢？

簡 27，胡楊，完整，長 22.8、寬 1.6 釐米。從保存狀況來看，簡牘形狀上完整，但是品像上卻不理想。因爲簡牘釋文中許多“□”告訴我們，簡牘上面的字跡保存不好，文字很難辨識。從文書格式分析，簡 27 屬於“傳”文書。按照文書格式，在第一欄不會出現有敦煌太守的人名，如前引簡 15。又因爲後面出現的簡文表明，在甘露與初元之簡任敦煌太守的人名是千秋。所以，簡 27 的“快”可能是“使”字。且“□軍□郡中”，按照其它簡文記錄，似乎應是“趣軍食郡中”，在郡中督辦糧草。

神爵四年之後，從目前所見簡文分析，任敦煌太守一職的人變更較大。五鳳元年（前 57）五、六月任敦煌太守者是“常樂”，五鳳元年十二月是“千秋”，五鳳二年（前 56）九月又是“常樂”，五鳳三、四年是“步”，五鳳五年（即甘露元年，前 53）二月是“少”，七月又是“步”，而後又是“千秋”。如不是簡牘釋文有問題，那麼此時人員變更之大，又說明些什麼呢？具體簡文是：

28. 敦煌太守遣守屬馮充國上伊循城都尉□印綬御史

以令爲駕二封軺傳 七月庚午食時□□ (以上爲第一欄)

五鳳元年五月戊午朔戊寅敦煌太守常樂丞□謂部□

□□□駕當舍傳舍如律令 (以上爲第二欄)

I T0309③: 193

29. 敦煌太守遣守屬唐宮明收蕉郡中

以令爲駕二封軺傳 · 六月甲寅過東 (以上爲第一欄)

五鳳元年六月戊子朔甲寅敦煌太守常樂丞賢

謂敦煌以次爲駕當舍傳舍如律令 (以上爲第二欄)

I T0309③: 252

30. 五鳳元年十二月乙酉朔戊申敦煌大守千秋長史奉憲庫丞捐之兼行丞事謂過所河津

遣□史詣道上書乘用馬一匹當舍傳舍如律令 正月甲寅過西 VT1312③: 38

31. ☒尉候千人令史王時

☒誠

☐ (以上為第一欄)

五鳳二年九月庚辰朔壬辰敦

煌大守常樂丞賀謂敦煌□□

為駕承書從事如律令 (以上為第二欄) 87—89DXC: 15A

32. ☒夫田弘 五鳳三年七月甲辰朔癸酉敦煌大守步長史奉憲丞

賢謂敦煌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 I T0114②: 7

33. 五鳳四年十一月戊辰朔戊申敦煌大守步敦煌令延壽行丞事謂效穀言縣泉置傳馬三匹其一匹騮駃騠齒十八

歲高五尺六寸錮病傷要一匹騮駃騠齒十四歲高五尺六寸一匹騮駃騠病狂醫治不能偷日益篤

I T0116②: 43

34. 五鳳五年二月丁酉朔庚申敦煌大守少長史奉憲庫丞捐之兼行丞事謂過所置龍勒左

尉張義為郡逐材酒泉郡中乘用馬二匹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七月乙卯一食東

VI T1222②: 2

35. 敦煌大守丞破胡行縣塞蓬隧

以令為駕一乘傳 七月戊申過往來再食□ (以上為第一欄)

甘露元年七月甲午朔甲辰敦煌大守步長史奉憲丞破胡謂敦煌

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 (以上為第二欄) II T0113③: 121

上引簡 28—35，共八簡，其中的簡 28 在前面說明上印綬御史府時曾引用，即簡 15。在這八簡中，除簡 33 外，均屬於“傳”文書。

簡 28，紅柳，完整，長 23.5、寬 1.3 釐米。“傳”文書簽發時間是五月戊午朔的戊寅日，即二十一日。第一欄中的“七月庚午食時□□”，傳文書簽發後，不可能用這麼長的時間才到懸泉置，應是從長安回來的時間。《朔閏表》七月丁巳朔，庚午十四日。“□□”可以釋為“過西”二字。

簡 29，胡楊，完整，長 22.9、寬 1.5 釐米。“傳”文書由甲寅二十七日簽發，第一欄

中的“甲寅過東”，表明當日經過懸泉置，可見行動速度較快。

簡 32，紅柳，右、上殘，長 13.3、寬 1.1 釐米。“五鳳三年七月甲辰朔”與《朔閏表》不符，五鳳三年十月甲辰朔，癸酉三十日。簡牘上文字“七”、“十”區別不大易淆，釋文可能是“十月”。

簡 33、34 和 35 三簡，從五鳳四年十一月到甘露元年七月，前後共九個月，敦煌太守人名由“步”變成“少”，再變成“步”，釋文可能有問題。如果“步”字太潦草的話，有可能就成了“少”字。所以，可以斷定簡 34 中的敦煌太守“少”乃“步”字之誤。簡 34 的時間也有問題，二月簽署的文書，七月才過懸泉置，怕也是釋文問題引起的。

簡 35，紅柳，完整，長 23.3、寬 1.5 釐米。記錄敦煌郡丞破胡行縣塞，即視察邊塞防務。甲辰簽發的“傳”文書，四日後（戊申）往東經過懸泉置。

與上述“常樂”、“步”相關的簡文還有：

36. □□□壬午敦煌太守常樂騎千人禹行長史事倉長廣漢兼行丞事謂效穀廣至寫

□□書到如護部使者書如律令 / 掾德守屬廣利助府佐廣意富昌

I T0309③: 88

37. 以請詔擇天水郡傳馬付移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太守詔書擇天水郡置傳馬八十匹付敦煌郡置縣次傳牽馬卒□ A

得如律令 七月丙子敦煌太守步長奉憲丞破胡謂縣泉移檄到□□使□ B

遮要縣泉置寫移檄到毋令使檄到不辨如律令 C II T0112②: 157ABC(觚)

38. 四月乙丑敦煌太守步丞賢謂縣寫移書到白報會五月廿日如相府書律令

掾卒置史當書佐竟

II T0215③: 117

此三簡，因為有可以比附的太守人名，可以大體斷定時間。

簡 36，松木，兩行，上殘，長 23.1、寬 1.6 釐米。屬於敦煌太守轉發下行的公文，簡後的署名應是太守府的屬吏，分別是掾德、守屬廣利與助府佐廣意、富昌。

簡 37，紅柳，上、下殘，觚，長 32.9、寬 0.9 釐米。簡文以詔書形式反映了敦煌郡的傳馬來源問題，從天水郡挑選八十匹傳馬給敦煌郡，沿途要求小心呵護等事項，即 A 面文字。B 面是敦煌郡所發相關公文的抄錄，C 面是效穀縣下發至懸泉置的公文。

簡 38，紅柳，完整，觚，長 22.8、寬 1.5 釐米。屬於敦煌太守轉發的公文文書，要求將相關事項在下月廿日報上來。

在所有敦煌太守的人名中，出現最多的是“千秋”，共有五十二條簡文。其中有明確紀年者三十一簡，沒有紀年的簡文有二十一條。最早的紀年是五鳳元年（前 57）十二月，最晚者是建昭四年（前 35）九月。這其中並不是千秋一人任太守，如：黃龍元年（前 49）

十一月敦煌太守是如意，初元二年（前 47）是恭，建昭二年（前 37）是彊，等等。除前引簡 30 外，具體簡文還有：

39. 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太守千秋庫令賀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
罷軍候丞趙千秋上書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貴人十人從者
九匹驢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戌申入玉門關已閣□ A
其一封遂侯上書
東書三封 一封敦煌太守書 甘露二年正
一封玉門上書 報從御□□ B II T0213③: 6AB
40. 甘露二年三月庚寅朔庚戌敦煌太守千秋丞破胡□□□
二匹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 掾禹助府佐□ □ II T0115③: 204
41. 甘露二年三月庚寅朔甲寅敦煌太守千秋丞破胡謂縣置案官縣□
為傳馬運芟各有數太守行縣膚脫牛皆羸瘦遣人以書□ II T0115③: 74
42. 甘露二年三月辛卯朔壬辰敦煌太守千秋謂縣遣守屬李眾逐事敦煌當舍傳舍從
者
如律令 II T0213③: 25
43. 甘露二年七月戊子朔壬寅敦煌太守千秋長史憲丞破胡謂縣律曰諸乘置其傳不
為急及乘傳者驛駕□
令葆馬三日三日中死負之郡當西域空道案廩置九所傳馬員三百六十匹計以來
死者 II T0115③: 80
44. 甘露二年七月戊子朔辛丑敦煌太守千秋長史奉憲丞破胡謂效穀書言甘井驛馬
一匹病狂縣泉
驛馬一匹傷膏不可用行軍書有書到擇騎馬厚輕者二匹補傷敦煌養食毋令羸瘦
遣 II T0115③: 79
45. 甘露二年七月戊子朔乙卯敦煌太守千秋長史奉憲丞破胡謂效穀
廣至西都水官前省卒助置芟今省罷各如牒書到自省卒徒芟如律令
II T0114③: 521
46. □…… □□□□□□□郡中
以令為駕一封輶傳 （以上為第一欄）
甘露二年十二月丙辰朔己卯敦煌太守千秋謂淵泉
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 （以上為第二欄） II T0215③: 198
47. 甘露三年十一月辛巳朔乙巳敦煌太守千秋長史奉憲丞破胡謂過所縣河津遣助

府佐

楊永視事上甘露三年計最丞相御史府乘用馬一匹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十一
月丙辰東 II T0213②: 139

48. □……露四年閏月己卯朔庚寅敦煌大守千秋長□□

……守部候賢行丞事謂……當傳舍如律令 □ II T0313②: 9

49. 甘露四年六月丁丑朔丁丑敦煌大守千秋長史奉憲謂縣遣助府佐敞罷卒郡中

以令爲駕…… 如律令 六月□□西 VT1410④: 1

50. 敦煌大守使守屬呂輔趣軍食郡中

以令爲駕一封軺傳 二月丁亥東丙申西（以上爲第一欄）

甘露五年□□□酉朔甲申敦煌大守千秋長史

奉憲謂□□以次爲駕當舍傳舍如律令（以上爲第二欄） VT1412③: 1

51. 黃龍元年三月癸卯朔壬戌敦煌大守千秋長史奉憲謂過所河津關□

肥市藥安定郡中乘用馬二匹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十月辛丑□

II T0115③: 346A

52. 黃龍元年十一月己亥朔己亥敦煌大守如意庫令□倉長史祖厲長弘行丞事謂過
所遣敦煌令史□□以

詔書……詣敦煌……將 作治渠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十月己巳東

VT1311③: 125

以上是漢宣帝時的簡文，從簡 39 至 52 共十四條。根據文書性質大體可分爲兩大類：
一類是“傳”文書，十簡；一類是敦煌太守下發的行政文書，祇有四簡。

簡 39，松木，下殘，長 15.2、寬 2.8 釐米。A 面記錄了甘露二年正月敦煌太守簽發的
“傳”文書，從中可見，此次的西域康居小國與漢王朝的交往規模頗大。B 面是郵書刺，應
該是在 A 面使用後，再次利用此牘，況且時間相當。

簡 42，紅柳，完整，長 23、寬 1 釐米。釋文作“甘露二年三月辛卯朔壬辰”與《朔閏
表》不合。甘露二年正月是辛卯朔，三月爲庚寅朔。釋文中的“三”似爲“正”字之誤。

簡 43，紅柳，完整，長 23.1、寬 1.5 釐米。本簡與簡 II T0115③: 81、82 組成一冊書。
總體是敦煌太守要求所屬諸“置”精心養護馬匹的文書，其中提到了漢代的律令，即“律
曰：諸乘置，其傳不爲急及乘傳者驛駕□令葆馬三日，三日中死負之”。規定使用馬匹的
人員如果不是緊急公事使用馬匹，要葆馬三日，三日中馬匹死亡者屬於使用者的責任。本
簡更重要的是，通過簡文記載，可以看到，漢代敦煌郡類似懸泉置的“廄置”有九所，馬
匹定員三百六十，平均每處有馬四十匹。對於我們認識漢代敦煌郡的郵驛設置具有重要參

考意義。

簡 47，紅柳，完整，長 23.55、寬 1.1 釐米。本簡通過對記述敦煌郡上計吏“傳”文書的抄錄，反映出敦煌郡上報計最的時間。因為漢代以十月為歲首，每年各地的計最要在八月底報到太守府，再由太守府匯總上報中央。本簡記錄，甘露三年敦煌郡上計的時間是十一月，上計吏即報送人是助府佐楊永，簽發時間是當月的二十五日。後面的十一月丙辰過東，是楊永經過懸泉置的時間。但是，因為十一月辛巳朔，月中不當有丙辰日，丙辰為十二月七日。釋文存在問題。“傳”文書簽署到經過懸泉置時間有十餘日，可見此次行程較慢。

簡 50，紅柳，左殘，長 23.1、寬 2.2 釐米。是敦煌太守發給守屬到敦煌郡各地督辦軍糧的“傳”文書。第二欄的“甘露五年□□□酉朔”，即史書中的黃龍元年。史書與簡牘紀年的差異，論者較多，近者可見《懸泉漢簡中若干紀年問題考證》。^①查《朔閏表》本年祇有二月是“癸酉”朔，簡牘釋文可以例補充。“謂□□”也應該是“謂敦煌”。本“傳”文書二月二日簽署，丁亥五日由懸泉置東行，二十四日又由東向西經過懸泉置。與上述簡 47 相比，顯然出行時的速度要比簡 47 中的快得多。

簡 51，黃龍元年三月敦煌太守是“千秋”，到簡 52 的黃龍元年十一月變成了“如意”。二簡人名的不同，反映了太守人名的變更。但是到了初元年正月，敦煌太守仍然是“千秋”。簡文是：

53. 黃龍二年正月戊戌朔癸卯敦煌太守千秋長史奉憲守部千人車行丞事謂過所河津遣

廣至長唐充國送詔獄囚長安乘用馬二匹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正月戊申東

VT1310③: 213

54. 初元年五月丙申朔戊申敦煌太守千秋丞破胡謂縣遣

II T0214③: 328 A

55. □□□□ (以上為第一欄)

□□輶傳□ 七月乙卯東

初元年七月乙亥朔甲辰敦煌太守千秋……

當舍傳舍如律令 (以上為第二欄)

II T0314③: 63

56. 初元年十月甲子朔庚午敦煌太守千秋長史黨……效穀縣泉置□

□時……

IV T0517③: 27

57. 初元年閏月癸巳朔丙申敦煌太守千秋長史奉憲丞破胡謂過所縣津遣淵泉亭長韓長逐命三

① 張德芳文，見《簡牘學研究》第四輯，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

輔隴西上郡西河郡乘用馬二匹當舍傳舍郡邸從者如律令 三月癸亥西

II T0213②: 140

58. 初元年閏月癸巳朔乙卯敦煌太守千秋長史奉憲丞□□謂過所河津遣敦煌□丞

□

傳送□□河東弘農郡乘用馬二匹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掾安世守屬段守書佐敞

II T0213③: 126

59. 初元年十一月癸亥朔庚辰敦煌太守千秋守部千人章行長史事丞破胡謂過所河津遣守卒史

……上獄計最邊縣□乘用馬二匹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正月癸丑東

II T0213③: 114

60. 初元二年正月壬戌朔丁卯敦煌太守千秋謂縣遣重候丞□□□縣鄉中當舍傳舍從者如律

令

正月丁亥西

II T0213②: 138

61. 初元二年四月庚寅朔乙未敦煌太守千秋長史奉憲守部候脩仁行丞事謂縣遣司馬丞禹案

事郡中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四月乙巳東 J P

II T0213②: 136

62. 初元二年四月庚寅朔癸丑敦煌太守千秋長史奉憲丞破胡謂縣遣守屬□□昌行

□□□

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五月壬戌西

II T0313①: 5

簡 53 到 62 共十簡，除簡 56 文字意思不太明白外，其它都是“傳”文書。簡 53，黃龍二年即初元年。簡 55，初元年七月乙亥朔，與《朔閏表》不合，“乙亥”應是“乙未”。釋文存疑。簡 53，初元年正月敦煌長史是“奉憲”，簡 56，初元年十月是“黨”，而到閏十月又是“奉憲”。如簡 56 釋文沒有問題，則屬於長史人名變更所致。簡 62 記初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敦煌太守是千秋，到同年九月敦煌太守變成了“恭”，直到初元四年正月恭又被“憲”取代，初元五年敦煌太守名字叫“眾”。接初元紀年是永光，從永光元年三月始，直到永光四年七月，敦煌太守的名字還是“千秋”。具體記載這些變化的簡文是：

63. 初元二年九月戊午朔庚辰敦煌太守恭守部候脩仁行長史□

□□□□□□效穀郵書死□領校諸事當舍傳舍從者如律□

VT1211③: 18

64. 初元二年十一月丁巳朔甲戌敦煌太守恭守部候脩仁行長□

呂安移簿使者涼州刺史治所乘用馬二匹當舍傳舍從者如□

VT1311③: 37

65. 初元三年三月乙卯丙辰敦煌太守恭守部候脩仁長史事謂過所河津遣卒史常光

- 辟事大□乘用馬二匹當舍 A
從者如律令 B VT1411②: 59AB
66. 初元四年正月辛亥朔丙寅敦煌太守憲……
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VT1510②: 90
67. 敦煌太守臣眾上書一封 初元五年七月乙亥…… VT1311③: 87
68. 永光元年三月戊子敦煌太守千秋□
三人關未敢內今入處待報
到各□吏御記到令亡覺部界中 A
周生駁名曰□鷹
宋氏駁名曰驚鳥 B VT1411②: 9AB
69. 使大月氏副右將軍史柏聖忠將大月氏雙靡
翎候使者萬若山副使蘇贛皆奉獻言事詣
在所以令爲駕一乘傳 （以上爲第一欄）
永光元年四月壬寅朔壬寅敦煌太守千秋長史章倉
長光兼行丞事謂敦煌以次爲駕當傳舍
如律令 四月丙午過東 （以上爲第二欄） VT1210③: 132A
70. 永光元年十月丁亥敦煌太守千秋長史章倉長光行丞 VT1211③: 24
71. 永光二年二月癸巳朔庚子敦煌太守千秋長史章守部候脩仁行丞事謂縣遣守屬
張充辦軍食
郡中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VT1510②: 84
72. 永光三年正月丁亥朔癸丑敦煌太守千秋□
屬陳孝辟詔獄囚單武證大三輔大常界乘用馬二□□ VT1309③: 17
73. 永光四年七月己卯朔甲午敦煌太守千秋長史意守部候脩仁行丞□
令以詔書買騎補如牒書到□□□食毋令□□□□如律令 II T0215②: 433 A

上述十一簡，除簡 67 與簡 68 均屬於“傳”文書。簡 67 是郵書刺，記錄敦煌太守上書經過懸泉置的時間，祇是簡殘，具體時間與經手人不明；簡 68A 面是追捕罪人的文書，按照文書格式爲“毋令亡匿部界中”，B 面爲傳馬名。

永光五年三月始，敦煌太守名爲“弘”；建昭初期名“彊”，建昭四年九月名“千秋”，竟寧元年名“山都”。簡文是：

74. 永光五年三月甲辰朔癸酉敦煌太守弘長史章守部候脩仁行丞事謂縣遣守許常有覆問郡中 II T0115③: 39

75. 建昭元年□□辛卯朔癸巳敦煌……
使者
行在所
令爲駕 (以上爲第一欄)
敦煌大守通丞義……當舍傳□ (以上爲第二欄) VT1712②: 42A
76. 建昭二……煌大守彊長史□謂□縣□□□□□□□□
移簿刺史治所乘用馬二匹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II T0216②: 208
77. 建昭二年二月甲子朔辛卯敦煌大守彊守部候脩仁行丞事告督郵史眾 V 欣主羌
史江曾主水
史眾遷謂縣聞往者府掾史書佐往來繇案事公與賓客所知善飲酒傳舍請寄長丞
食或數 II T0216②: 246
78. 建昭二年三月癸巳朔丁酉敦煌大守彊長史章守部脩仁行丞事告
史敞謂效穀今調史監置如牒書到聽與從事如律令 II T0216②: 243
79. □□□遣守候李□送自來大月氏休密合候
□□□國貴人□□國貴人□□□□□彌勒彌□……
□□□□□烏孫國客皆奉獻詣
…… 三月戊申東 (以上爲第一欄)
建昭二年三月癸巳朔辛丑敦煌大守彊長史□
守部候脩仁行丞事謂敦煌以次爲駕如律令 (以上爲第二欄)
II T0216②: 702
80. 建昭二年五月壬辰朔□申敦煌大守彊長史章丞敞告督郵史欣常謂縣前刺史從
事溫掾言縣置吏卒毋禮不肅敬
不□□□□積終至今未歸屬□□直□隨馬羸瘦弱吏□□□□吏卒□□□丙寅□
今祠地動
使者□史君行故令丞□ II T0115③: 92A
81. 建昭三年三月丁巳朔癸亥敦煌大守彊守部騎千人雲行丞事謂縣案所移十月盡
十二月傳馬簿出馬病死斥賣移爰書賈
直校錢不入效穀出遮要傳馬十七匹病死賈或三百或二百傳馬皆食穀賈賤疑非實
方遣吏案校今移舉各如牒書到 II T0214②: 550
82. 建昭三年五月丙辰朔癸未敦煌大守彊長史淵丞敞謂敦煌效穀廣至今調私財物
馬官
馬補騎馬傳馬如牒書到同月相付受毋令繆如律令 II T0216②: 650

83. 建昭三年七月乙卯朔丁巳敦煌太守彊長史淵丞敞告守部司馬千人司馬丞假司馬千人

謂縣詔書候者數言有虜兵氣其驚烽火遠候望察動靜謹推辟已前下方秋旁

I T0116②: 54

84. 建昭四年二月壬午朔乙酉敦煌太守彊長史淵丞敞謂過所縣道河津遣冥安令史樂護爲郡治傳

車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五月己亥西

II T0216②: 622

85. 三百八十六匹直二百七十五建昭四年九月己酉敦煌太守千秋長史

II T0216②: 263

86. 竟寧元年十月丙申朔辛亥敦煌太守山都守部騎千人雲行丞事敢告部都尉卒人謂小府

II T0216②: 605

簡 74 至簡 86 共十三簡，其中“傳”文書簡五，即簡 74、75、76、79 與簡 84，其它簡屬於敦煌郡下發的管理文書。這些簡文記錄了漢元帝后期敦煌太守人名的變更情況。此外，因爲本文主要檢討敦煌太守一職，忽略了長史、丞的變化。從簡 70、71 的永光元年、二年的長史“章”，到簡 73 永光四年的長史“意”，再到簡 74、78、80 的長史“章”，不難發現，如果不是簡牘釋文有問題，則屬於長史一職人名的變更。但是考慮到“章”與“意”的寫法，二字有可能混淆。這一問題，暫存疑。

簡 75，胡楊，下殘，長 19.7、寬 2.45 釐米。簡文所記“建昭元年□□辛卯朔”與《朔閏表》不符，建昭本年無辛卯朔，可能是建始元年，“昭”、“始”二字在部分簡牘上區分不明顯。所以將本簡的“通”暫歸建始之時敦煌太守。

簡 78，紅柳，完整，長 22.8、寬 1.8 釐米。爲建昭二年《調史監遮要置冊》^①裏面的一條簡文，整個文書記錄敦煌太守派守屬以史的身份“監”遮要置及與其相關的一些事項。由此可見當時的管理制度與吏員的任命形式。

簡 80，紅柳，完整，長 23.4、寬 1.5 釐米。從釋文來看，簡牘上字跡保存不好，多不可釋讀。但是從斷斷續續的文字行間，似乎可以讀出：刺史從事溫掾告郡，所屬縣置裏面的吏員不懂禮數，擅離職守，馬匹多羸瘦不任用，管理不力。因爲有祠地動的使者來敦煌，或經過敦煌郡所屬的縣置，敦煌太守專門下發文書，要求各地嚴查、嚴辦，改變縣置管理不力的局面。“祠地動”的使者來敦煌，反映出在此前，敦煌曾有地震之事發生。

簡 81，紅柳，完整，長 23、寬 1.6 釐米。簡文反映了當時的馬匹管理方式與制度，馬匹病死除有病死爰書記錄詳細情況外，還要體現斥賣馬匹骨肉錢的收入情況。遮要置傳馬

① 前揭《敦煌懸泉漢簡釋粹》，69 頁。

十七匹，或三百錢，或二百錢，恐“賈賤，疑非實”，郡府特派吏檢查此事。

簡 82，紅柳，完整，長 23、寬 1.7 釐米。簡文反映出當時驛站所用的馬匹不足，要求效穀、廣至二縣徵調私人馬匹與其它官馬補充。

簡 83，紅柳，完整，長 23.2、寬 0.8 釐米。皇帝的詔書竟然引用佔卜者的言辭，要求邊塞加強防務，“驚烽火、遠候望、察動靜”。因為“候者數言有虜兵氣”，不可掉以輕心。可見當時社會風俗一斑。

87. 建始二年八月丙辰朔壬申敦煌太守延守部候彊行長史事丞義謂縣□□

言胡客數遣在道馬穀使外國今少恐乏調給有書大司農□□□□□

II T0114②: 291

本簡紅柳，下殘，長 20、寬 1.5 釐米。屬於敦煌太守延、守部候彊行長史事與丞義三人連署下發的行政公文。因為有太多的胡客與使者需要招待，供應使者使用的馬匹與糧食可能出現短缺，大司農特別徵調備用。使者給沿途地方造成的供應問題，史書有載，且與簡牘時間大致相當，均是漢成帝時。二者可以互校旁證。《漢書》西域都護郭舜曾上書稱：“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①

88. 建始四年閏月癸酉朔丁丑榆中守長允街尉守丞賀□

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界中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A

□ 太守賢長史福丞憲□

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 掾登屬元助譚 B

II T0314②: 220AB

89. 河平元年八月戊辰朔壬午敦煌太守賢丞信德謂過所縣道遣廣至司空

嗇夫尹猛收流民東海泰山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八月庚寅過東

II T0315②: 36A

90. □河平元年十一月丁未朔己未敦煌太守賢守部騎千人愛行丞事□

□友上計丞相府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六升（“六升”二字後書）

II T0313②: 1、10

91. 河平二年十月壬戌朔辛巳敦煌太守賢長史福敦煌長章行丞事謂過所遣效穀□

左尉廣詣酒泉界中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十月戊子過東

II T0314①: 29

92. 河平二年十月壬辰朔庚辰敦煌太守賢長史福守部騎人慶行丞事謂過所遣冥安

亭長楊忠讎

令淵泉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淵泉亭長校未央

II T0112②: 78

① 班固：《漢書》，卷九六上，1983、3893 頁。

93. 河平四年十一月庚戌朔癸酉敦煌太守賢長史譚丞信德謂過所遣冥安庫佐馮慶
治傳車長安當舍傳舍如律令 I T0207④: 5

94. 敦煌太守守屬張博 陽朔二年閏月甲戌太守賢守部司馬丞意行丞事博逐賊
命漢中蜀郡三輔 I T0110①:6

95. 敦煌太守守卒史李鳳 陽朔二年閏月甲戌太守賢守部司馬丞意行丞事□
I T0110①:7

96. 陽朔二年十一月丁卯遣行丞事守部候彊

奉上陽朔元年計最行在所以令爲駕乘傳奏卒史所奉上者 五月□□（以上爲第一欄）

敦煌太守賢長史譚□

以次爲駕如律令 （以上爲第二欄） II T0112②: 108

簡 88 至簡 96 共九簡，所記敦煌太守人名是“賢”，從文書性質上說均屬於“傳”文書，記錄持傳往來人員的時間、人名與任務。對於認識漢代的行政管理制度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如簡 88，A 面是榆中縣簽署的“傳”文書，B 面才是敦煌太守簽署的“傳”文書。當年閏十月。簡 89，敦煌郡派廣至縣的司空到東海郡、泰山郡收流民，招徠流民至敦煌郡進行安置，不正體現了漢代流民安置的制度與措施嗎？簡 90、簡 96 與前述簡 47、簡 59 記錄上計最的時間均是每年的十一月，不正好說明了地方上計最的時間嗎？簡 92，敦煌太守竟然會派冥安縣的亭長去淵泉縣校核律令，爲什麼呢？簡 93，敦煌郡造傳車還要派專人到長安，來回不知需要花費多少時間與經費。這些細節，在傳統的史書中是很難看到的。

簡 91 與簡 92，同樣是河平二年十月，一個是壬戌朔，一個是壬辰朔，自然有一個是錯誤的。《朔閏表》當月是壬戌朔，可見簡 92 釋文文字有誤。若不是釋文有誤，也應該是原本書寫有誤。

簡 96，松木，下殘，長 21.2、寬 1 釐米。作爲上計最的“傳”文書，其中的時間值得玩味。先是“陽朔二年十一月丁卯”與《朔閏表》不合，《朔閏表》當月是戊辰朔，不當有丁卯日；二年上報元年的計最，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時間上差了整整一年，與漢代嚴格的管理制度不合。又因爲漢代是以十月爲歲首，是不是這裏的二年十一月實際上是元年的十一月呢，這種可能參照簡 47 是不會出現的，那麼祇有考慮釋文的問題了。“二”可能是“元”之誤，元年十一月甲辰朔，丁卯是二十四日。

從陽朔二年到永始元年之間，沒有發現有明確記載敦煌太守的簡文。永始元年敦煌太守名“吉”。簡文是：

97. 永始元年十二月丁巳朔癸未敦煌太守吉守部千人喜行長史事庫令勳行丞事謂

過所遣守庫令

I T0111②: 29

98. 永始二年七月癸丑朔癸丑敦煌太守大吉告丞忠謂過所使守屬李勳賦縣

候囊他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七月甲寅過東

II T0115③: 202

簡 97, 紅柳, 完整, 長 23.3、寬 1 釐米; 簡 98, 紅柳, 完整, 長 23.4、寬 1.8 釐米。均屬於“傳”文書。敦煌太守人名一作“吉”, 一作“大吉”, 孰是? 根據另外一條簡牘的記載, 可能是“吉”比較準確, 且又有“丞忠”可以旁證。即:

99. □敦煌太守吉長史昌丞忠謂□

□□□爲□當舍傳舍如律□

IV T0317③: 76

100. 元延四年十一月丁丑朔戊寅敦煌太守寬長史昌部千人遷行丞事移過所遣淵泉守

92DXH12: 5

101. 建平二年十一月甲申朔壬子敦煌太守永長史臨丞涉謂過所使龍勒少內嗇夫泛政與守部千人古成遷市繕兵物長安

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二人

I T0114①: 50

簡 100 與簡 101 是在紀年簡中最晚的兩條簡文, 分別記錄西漢成帝晚期元延四年(前 9)的敦煌太守是“寬”、漢平帝建平二年(前 5)敦煌太守是“永”。文書性質均屬於“傳”文書。簡 101, 敦煌郡派人到長安購買修繕兵器的材料, 是說明管理之嚴, 抑或是敦煌郡之缺呢? 值得探討。

爲方便使用, 將有關上述敦煌太守人名的簡文(沒有明確紀年者)附列於後, 除“千秋”一名時間難判斷外, 其它均可比附。這些簡文是:

102. □□□□□□□朔己丑敦煌太守千秋長史奉憲丞破胡謂過所河津遣守卒史蓋延壽奉上捕亡乘用

…… 乘馬二匹當舍傳舍郡邸從者如律令

四月丁巳西

II T0213③: 120

103. □□□年□月庚戌朔□□敦煌太守千秋守部千人章行長史事守部候脩仁行丞事謂縣遣□

□□□光陳廣徙民田當□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二月丙午西

II T0213③: 121

104. 六月庚申朔戊子敦煌太守千秋

(削衣)

91DXF12③: 1

105. 八月乙卯敦煌太守千秋長史章守部候脩仁行丞事下部都尉官縣承書從

事下用者如詔書

/ 掾慶屬武守書佐敞

II T0214②: 558

106. 九月癸卯敦煌太守千秋□

II T0215②: 476

107. □□□□ 朔癸亥敦煌太守千秋長史奉憲……

- …… 二月甲子□□ II T0216②: 845
108. 三月甲寅敦煌大守千秋長史奉憲丞賢謂□□□□□□
尉卒人謂縣官寫移書到如報如律令 府令史孔卒史楊掾□佐義
II T0216③: 105
109. □朔戊戌敦煌大守千秋長史章丞賢 II T0313②: 28
110. □□朔壬寅敦煌大守千秋長史
□丞事謂敦煌以次 A
□舍如律令 B VT1210③: 50AB
111. □□朔己巳敦煌大守千秋縣泉置次日（習字簡） VT1311③: 136
112. 82/ □ 大守千秋長史奉憲謂□
□舍如律令 ……□ V92DXT1311③: 181
113. 七月乙丑敦煌大守千秋長史奉憲守部候脩仁行丞事下當用者小府伊循城都尉
守部司馬司馬官候移縣置廣校廣
校候郡庫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 / 掾平卒史敞府佐壽宗 VT1312③: 44
114. □大守千秋長史奉憲守部□
□□乘用馬二匹 舍□ VT1510②: 29
115. □□戌酒泉大守慶忌長史丞賞敢告敦煌大守千秋□□寫移書到自
□旁郡如律令敢告卒人 ……史宗書佐順 VT1611③: 253
116. □□往年遣種人十八人之唐菰國行地可居不今年其八人還言唐菰地水□□
（殘觚） A
□煌大守千秋長史章中部□……□□□酒泉大□ B
□送 C 92DXC: 71ABC
117. 二月壬午敦煌大守千秋□
將以畀長言如律令 I T0114③: 140
118. □敦煌大守千秋長史昌丞忠謂敦煌
□次爲駕……傳舍郡邸如律令三 A
廣校候印
六月丙子寺門徒旁以來 B II T0111①: 461AB
119. 閏月辛未敦煌大守千秋長史奉憲敢告中部宜禾都尉卒人謂郡庫守部千人縣寫
移書到亟召遣
吏將日夜馳詣御史在所敦煌傳舍物故白報如律令敢告卒人/掾禹守卒史尊書佐
義助佐敞 II T0114③: 465

120.朔己未敦煌太守千秋守部候脩仁□□□丞破胡謂□

與守丞俱上永光三年計丞相府乘用馬二匹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掾光書佐順

二月甲□□

II T0115③: 205

121. □二百五十持錢詣置到遮□ A

□敦煌太守千秋□□□□□

□再拜言謹賣牛三門入置□ B

II T0115④: 63AB

122. □□六月□庚寅敦煌太守千□ (削衣)

VT1311③: 45

以上簡 102 至 122 共二十簡，敦煌太守的名字均是“千秋”，因為“千秋”的任期比較亂，一時很難確定具體時間。但是我們也可以通過一些信息與辦法，借助旁證給一些簡文確定時間，最直接的就是借助與太守一同出現的長史名。如：

簡 102，胡楊，完整，長 23.5、寬 1.3 釐米。從釋文本身來看，簡牘頂端文字字跡保存不好，許多字無法釋讀。文書內容屬於“傳”文書，其中與“千秋”一並出現的長史“奉憲”、丞“破胡”對於判斷簡牘的具體年代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在前面提到簡 44、45、47 與簡 57、簡 62 均有三人一並署名的情況，具體紀年是甘露二年七月初到初元二年之簡。所以本簡的具體年代應在此範圍。同樣道理，簡 103，“敦煌太守千秋守部千人章行長史事”在前面初元年十一月的簡 59 也有出現，時間不會相差太多。在這一年的前後，共有兩個月份是庚戌朔，一個是甘露三年的十二月，一個是初元四年三月。又因為簡 103 有“□月庚戌朔”與“二月丙午西”，即說明本簡的時間要在二月之前，不可能是三月，有可能是十二月。所以本簡極有可能是甘露三年。甘露三年敦煌太守是“千秋”，它簡可以證明，不會出現衝突。

簡 104，簡牘形制雖然是削衣，但是因為在所有敦煌太守千秋任職的時間內祇有永光二年六月是庚申朔，所以本簡也可以定為永光二年。

簡 118，上殘，A 面所書為“傳”文書。其中出現的敦煌太守千秋、長史昌與丞忠三人連署的形式，值得注意。長史昌、丞忠二人與太守連署的公文又見前述簡 99，太守名字是“吉”，時間是永始年間。但是目前尚沒有千秋任太守時間晚到這一時間的簡文，不知道是不是釋文有問題。

簡 120，紅柳，左、下殘，長 9.4、寬 1.4 釐米。文書內容屬於上計最的“傳”文書，上計的年度是永光三年。按照前面所述敦煌郡上計的一般時間是每年的十一月，所以本簡的具體時間可以定為永光三年。在確定具體年代以後，釋文存在的問題，又通過前面所提到的簡 71 與簡 73、簡 74 體現出來。因為永光二年到永光四年“守部候脩仁”多是以行丞事的身分出現。本簡後面有“丞破胡”，那麼“守部候脩仁”在本簡中根據其它簡祇能是

“行長史事”。釋文可能有問題，存疑。

123. 七月壬子敦煌大守弘長守部候脩仁行丞事下部都尉官縣承書從事下當用□

如詔書 / 掾登屬禹守書佐宣備

II T0214②: 563

124. 七月庚申敦煌大守弘長史章守部候脩仁行丞事敢告部都尉卒人謂縣官官寫移書到如律令 / 掾登屬建佐政光

II T0216②: 869

125. 七月庚申敦煌大守弘長史章守部候脩仁行丞事謂縣寫移使者稱縣置謹敬

莊事甚有意毋以謁勞書到務稱毋解隨如律令 / 掾登屬建書佐政

II T0216②: 876

126. 七月庚申敦煌大守弘長史章守部候脩仁行丞事謂縣寫移書到具移康居蘇蠶王使者檀伯刀

等獻橐佗食用穀數會月廿五日如律令

/ 掾登屬建書佐政光

II T0216②: 882

127. □敦煌大守弘長史守部候脩□

□書到相付受同月移簿毋□

VT1812②: 187

128. □敦煌大守弘長史章守部候脩仁行丞事告□

II T0115③: 179

以上六簡，相對於前述永光五年的簡 74 一條從數量上說是多了些。僅從文字分析，這七簡有許多相同之處。如“長史章”、“守部候脩仁行丞事”、“掾登、屬建、書佐政”等等。均表明時代相近。特別是簡 124、簡 125 與簡 126 本文是單獨出現，而實際上在整個懸泉漢簡中是以冊書的形式出現的。作為完整冊書的一部分，冊書本身的時間自然也就限定了它的時間。如簡 124，屬於《永光五年案驗失亡傳信冊》，本冊有二簡表明是永光五年；簡 125（II T0216②: 876），與簡 II T0216②: 870—875 六簡合為一冊書，與《永光五年案驗康居王使者獻橐佗冊》捆在一起，雖然自身沒有紀年，但是屬於永光五年是不會有問題的；簡 125（II T0216②: 882）與簡 II T0216②: 877—881、883 為一冊書，組成著名《永光五年案驗康居王使者獻橐佗冊》，時間也是永光五年。另外三簡的時間也應該大體相當。反過來再看簡牘釋文，釋文中明顯存在脫漏字的現象。如簡 123 的“長”可能就是“長史章”，簡 127 祇有“長史”沒有“章”字。

129. □□月丙戌朔戊子敦煌大守通丞□□

□□□□輪柔敝盡縣□□

VT1611③: 310

130. 三月乙亥敦煌大守通丞義下部都尉南塞候縣承書從事

下當用者如詔書 / 掾聖卒史曾書佐登

VT1813②: 7

太守“通”見前述簡 75，因為朔閏不合，簡文的建昭元年，我們認為應該是建始元年（前 32）。簡 129 記“□月丙戌朔”，查《朔閏表》時間最為接近的是建始二年七月，所以，簡 129 可以定為是建始二年（前 31）。簡 75 “敦煌大守通、丞義”與簡 130 相同。前述簡 87 時間是建始二年八月，比簡 129 晚一個月，“丞義”人名沒有變化，太守名“延”。這裏出現的敦煌太守人名不同是什麼原因呢？是真的人名變更，或是釋文問題，值得注意。“延”、“通”二字在釋文過程中，因為字跡不清楚，易混淆。本文暫作“延”為“通”之誤處理。關於二字混淆這一點，還可以聯想到史書記載中出現的一例，即《漢書·趙充國傳》出現一個叫“通年”的長史。^①

因為在目前出土的漢簡中常見的人名是“延年”，“延年”、“益壽”，取吉利之義為名，這是漢代人取名的一個原則。檢索《漢書》名“通年”者僅此一見。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金石簡帛檢索庫中，沒有一例名“通年”者，祇有名“通”的人年齡是多少，斷句為“某通，年若干”。在懸泉漢簡中也沒有一例名“通年”人名的記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懷疑簡 87 記錄的敦煌太守人名“延”應該是“通”的原因。

131. ☒ 癸未敦煌大守彊長史淵丞敞謂過所☒

☒ 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II T0216②: 637

132. ☒ 敦煌大守彊☒

VT1510②: 52

133. 敦煌大守彊長史淵丞敞謂☐☒

VT1611③: 29

134. 五月壬辰敦煌大守彊長史章丞敞下使都護西域騎都尉將田車師戊巳校尉部都尉小府官縣承書從事下

當用者書到白大扁書鄉亭市里高顯處令亡人命者盡知之上赦者人數大守府別之如詔書

II T0115②: 16

太守“彊”有紀年的簡時間範圍是建昭二年到建昭四年，相當於公元前 37 年到公元前 35 年。前引四簡時間大體接近。與“彊”一同出現的丞沒有變化，即“丞敞”，長史或作“淵”，或作“章”。體現了敦煌郡吏員的變更。這種變化，在有更多資料可比的情況也是可以找出先後的。將敦煌郡長史一職人名變化排列出來也許能解決這一問題。這裏先提出來，留待以後解決。

135. ☒ 煌大守山都☐長史☐☐☐☒

V 1510②: 167

136. ☒ 敦煌大守山都守部千人雲行丞事☒

☒ 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II T0213 S: 44

^① 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83，2978 頁。

137. ☒大守賢長史譚丞信德謂☒☒
☒令 ☒十 ☒ II T0214②: 499
138. ☒敦煌大守賢長史 ☒ II T0214③: 144
139. ☒……☒月己未朔戊辰敦煌大守賢長史奉憲敦煌倉長廣漢兼行丞事謂效穀移
☒傳馬病死爰書縣泉傳馬一匹驄牡齒十二歲高五尺九寸送☒將軍司馬令史劉
承明 II T0214③: 292
140. ☒敦煌大守賢庫令☒行 92DXH12: 18
141. 八月丙申敦煌大守賢長史譚丞信德謂縣寫移書到明察始使者 I T0110①: 26
142. 敦煌大守賢☒☒☒☒ ☒
有死官牛☒與☒ A
候廿四又年一又十七又十四又卅七又☒☒
夏四廷又四又二又二又又一又☒ B I T0210①: 15AB
143. 三月丁未敦煌大守賢長史福丞☒☒
者如詔書 II T0111①: 320
144. ☒大守賢丞信謂敦煌以次
☒舍如律令 II T0213②: 30
145. ☒☒己巳庚午敦煌大守寬長臨☒ VT1812②: 312
146. 五月壬戌敦煌大守寬長史臨丞涉謂縣寫移書到務如州牧書律 II T0112②: 34
147. ☒寅朔丁亥敦煌太守永庫令奉德兼行丞事謂過所使守卒史馬晏辟巴免奴婢酒
泉 ☒傳舍從者如律令 重 十月辛亥過西 II T0214②: 55
148. ☒敦煌大守永長史☒守部千人宣☒ A
☒☒☒☒☒
☒☒☒☒☒☒☒☒☒ B I T0112②: 45AB
149. ☒戊辰效穀嗇夫譚敢☒ A
☒寅敦煌大守永長史臨謂☒☒
☒☒十二月戊辰過東一食丞移☒ B I T0114①: 3AB

二、無明確紀年的敦煌太守人名

在懸泉漢簡中出現的另外一些敦煌太守的名字，因為資料限制，目前尚不知道具體的年代。這些簡文相對而言比較少，我們暫歸為無明確紀年的敦煌太守人名。這些簡文是：

150. ☒敦煌太守宏以月八日☐☐☐道置用乘車六乘馬廿四匹敝車冊☒
☒☐務約省尉以下謹備列毋令道督留物故界中事當奏聞☒
☒☐掾崇守卒史相助府佐譚
☒掾尊嗇夫並 (牘) I T0109S: 116
151. ☒庚辰敦煌太守武☒
☒二匹當舍傳舍☒ II T0114①: 125
152. ☒太守咸謂過所☒ I T0111S: 17
153. ☒敦煌太守憲丞普謂縣
☐☐☐ ☐☐☐☐☐ I T0205②: 25
154. ☒煌太守憲長史臨丞☒ II T0111①: 465
155. ……☐卯朔壬申敦煌太守忠守部候脩仁行長史事丞破胡謂縣遣守部千人許章
 以詔書
 ……冥安淵泉下貧卒欲乘其塞者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五月甲寅東
 II T0213②: 104
156. ☒申敦煌太守宗長史譚移部都尉謂官☒ (殘觚) A
☒☐兵_繼夷爭僞難知唯府驚當備者敢☒ (殘觚) B
☒年☒ (殘觚) C II T0215②: 112ABC
157. 五月戊戌敦煌太守宗長史譚上……☒
 鄉亭市里門顯見處…… II T0216①: 9
158. 十月己酉敦煌太守宗長☒
 書律令 I T0209S: 3
159. ☒卯 敦煌太守馮博等五人皆☐上☐☐☐☐ ☐ II T0111②: 192

以上十簡，是懸泉漢簡中有關敦煌太守人名沒有明確紀年的簡文。總體而言，這些簡文多數是因為簡牘殘缺較甚，文字太少，而無法知道太多的信息，如簡 151、152、153 與簡 154 等。

這些簡牘本身雖沒有紀年，也許一些信息，對於認識這些簡牘的年代也是有幫助的。我們可以借助與太守一並出現的長史人名，對一些簡文進行推測。如簡 154，與敦煌太守“憲”一同出現的長史人名是“臨”。僅就懸泉漢簡而言，其它有關長史“臨”簡文的年代，無疑是我們判斷年代的依據和參考。前文已述的簡文中，長史“臨”一同出現的太守人名是“永”和“寬”，即簡 101、146 和 149。又簡 100 所載元延四年（前 9）十一月，與太守“寬”一同出現的長史是“昌”；簡 101 所載是建平二年（前 5）太守是“永”、長

史仍是“臨”。這樣，就可以推測，長史“臨”的前任人名是“昌”，“臨”在建平二年仍是長史，可見長史“臨”任職時間應該在這一段時間內。那麼，若釋文沒有問題，太守“憲”任職時間也就大體可以確定了。

簡 155，與太守“忠”一同出現的官名有行長史事的守部候“脩仁”、丞“破胡”。“丞破胡”較多，時間多在甘露、初元年間。如前述簡 35（甘露元年）、簡 62（初元二年）和簡 120（永光三年）。懸泉漢簡中“守部候脩仁”行長史事的情況是在“恭”任敦煌太守的時間，前述簡 63、簡 64 和簡 65。具體紀年是初元二、三年。這樣的話，“忠”任職時間也就大體可以確定在元帝初年。

簡 156、簡 157 與敦煌太守“宗”一同出現的長史名是“譚”。查“譚”任職長史有確切紀年的簡文是河平四年十一月（簡 93）、陽朔二年十一月（簡 96），二簡中出現的太守人名是“賢”。這樣就可以確定，太守“宗”任職年限應在太守“賢”前後。時間是成帝初年。

簡 159，雖有“敦煌太守馮博”字樣，但是考慮到漢代的文書格式，太守人名一般不會有姓氏，如前面所列的眾多簡文，僅有名，不見姓。而簡 159，本身存在問題，許多字無法釋讀，表明字跡不清楚。“馮博”不能看作是敦煌太守的人名。

以上是通過懸泉漢簡中近一百六十條與敦煌太守人名相關簡文進行的排列和簡單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在懸泉漢簡中所有敦煌太守人名的簡文，有確切紀年的佔絕大部分，祇有極少數人名沒有紀年可查。詳見附表《敦煌太守人名編年》

本文共述及敦煌太守二十六人，除去其中釋文可疑者尚有二十三人。裏面排除的三人分別是“少”，可能是“步”字之誤；“馮博”不應該看作是敦煌太守的人名；“吉”與“大吉”應是一個人。二十三人之中，最常見的是“千秋”，一共有 51 簡，任期時間之長，可能不是一個人。因為沒有確切資料能夠證明是不是一個人，在此祇好存疑。

文中簡單地涉及到了官名、人名互見問題，限於本文以太守一職為主，敦煌郡的其它官名、人名未作過多解述。同樣道理，在本文的基礎上，也可以列出長史、丞等人名的編年。

在得出敦煌太守的人名編年後，對一些紀年不是十分清楚的簡牘，我們就可以通過得到的編年，解決這一問題。就可以大大提高簡牘自身的史學價值。如敦·1368^①是 1981 年在酥油土出土的一枚漢簡，簡牘本身並沒有紀年，簡文是“七月庚子，將屯敦煌太守登敢告部都尉、卒人、謂縣官：戍卒起郡□”。因為有敦煌太守“登”（簡 1），可以證明本簡的年代應比較早，在漢宣帝初年。1998 年玉門都尉府小方盤城南出土的一批簡牘中有一枚

① 吳初驤等：《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991，271 頁。

記錄有敦煌太守恭的簡文，因為有本文完成的編年，可以推知其時間是在初元三年。簡文是：“三月戊寅，敦煌太守恭、長史褒、守部候脩仁行丞事，敢告玉門都尉卒人，寫移播題歸持弓櫝丸入關，合籍。語言雲何已封，賫去一宿，乃遣吏逐奪留，以何？請令。”^①本文所引簡 62 初元二年四月敦煌太守名“千秋”，簡 66 又記 初元四年名“憲”，所以“恭”任職的三月祇有是初元三年的三月。

附表：

本文簡號	簡文年號	公元紀年	人名	懸泉漢簡編號
簡 1	本始三年二月辛巳朔癸巳	前 71	登	VT1412③: 77
簡 5	神爵二年三月丙午朔甲戌	前 60	快	I T0309③: 236AB
簡 6	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	前 60	快	I T0210③: 6 ³
簡 7	神爵三年三月辛丑朔丁卯	前 59	快	I T0309③: 280
簡 8	神爵四年正月丙寅朔壬辰	前 58	快	II T0215③: 3A
簡 9	神爵四年正月丙寅朔己卯	前 58	快	II T0214②: 583
簡 10	神爵四年六月癸巳朔甲寅	前 58	快	I T0309③: 86AB
簡 11	神爵四年八月己卯	前 58	快	II T0314②: 306ABC
簡 12	神爵四年十月辛卯朔己酉	前 58	快	I T0309③: 112
簡 28	五鳳元年五月戊午朔戊寅	前 57	常樂	I T0309③: 193
簡 29	五鳳元年六月戊子朔甲寅	前 57	常樂	I T0309③: 252
簡 30	五鳳元年十二月乙酉朔戊申	前 57	千秋	VT1312③: 38
簡 31	五鳳二年九月庚辰朔壬辰	前 56	常樂	87—89DXC: 15A
簡 32	五鳳三年七月甲辰朔癸酉	前 55	步	I T0114②: 7
簡 33	五鳳四年十一月戊辰朔戊申	前 54	步	I T0116②: 43
簡 34	五鳳五年二月丁酉朔庚申	前 54	步	VI T1222②: 2
簡 35	甘露元年七月甲午朔甲辰	前 53	步	II T0113③: 121
簡 39	甘露二年正月庚戌	前 52	千秋	II T0213③: 6AB
簡 40	甘露二年三月庚寅朔庚戌	前 52	千秋	II T0115③: 204
簡 41	甘露二年三月庚寅朔甲寅	前 52	千秋	II T0115③: 74

① 簡文見李岩雲、傅立誠《漢代玉門關址考》，《敦煌研究》2006 年第 4 期，71 頁。原釋文存在問題較多，參見張俊民《〈漢代玉門關址考〉所引簡牘釋文商榷》，簡帛網，2006 年 11 月 29 日。

本文簡號	簡文年號	公元紀年	人名	懸泉漢簡編號
簡 42	甘露二年三月辛卯朔壬辰	前 52	千秋	Ⅱ T0213③: 25
簡 43	甘露二年七月戊子朔壬寅	前 52	千秋	Ⅱ T0115③: 80
簡 44	甘露二年七月戊子朔辛丑	前 52	千秋	Ⅱ T0115③: 79
簡 45	甘露二年七月戊子朔乙卯	前 52	千秋	Ⅱ T0114③: 521
簡 46	甘露二年十二月丙辰朔己卯	前 52	千秋	Ⅱ T0215③: 198
簡 47	甘露三年十一月辛巳朔乙巳	前 51	千秋	Ⅱ T0213②: 139
簡 48	…露四年閏月己卯朔庚寅	前 50	千秋	Ⅱ T0313②: 9
簡 49	甘露四年六月丁丑朔丁丑	前 50	千秋	V T1410④: 1
簡 50	甘露五年□□□酉朔甲申	前 49	千秋	V T1412③: 1
簡 51	黃龍元年三月癸卯朔壬戌	前 49	千秋	Ⅱ T0115③: 346A
簡 52	黃龍元年十一月己亥朔己亥	前 49	如意	V T1311③: 125
簡 53	黃龍二年正月戊戌朔癸卯	前 48	千秋	V T1310③: 213
簡 54	初元年五月丙申朔戊申	前 48	千秋	Ⅱ T0214③: 328 A
簡 55	初元年七月乙亥朔甲辰	前 48	千秋	Ⅱ T0314③: 63
簡 56	初元年十月甲子朔庚午	前 48	千秋	Ⅳ T0517③: 27
簡 57	初元年閏月癸巳朔丙申	前 48	千秋	Ⅱ T0213②: 140
簡 58	初元年閏月癸巳朔乙卯	前 48	千秋	Ⅱ T0213③: 126
簡 59	初元年十一月癸亥朔庚辰	前 48	千秋	Ⅱ T0213③: 114
簡 60	初元二年正月壬戌朔丁卯	前 47	千秋	Ⅱ T0213②: 138
簡 61	初元二年四月庚寅朔乙未	前 47	千秋	Ⅱ T0213②: 136
簡 62	初元二年四月庚寅朔癸丑	前 47	千秋	Ⅱ T0313①: 5
簡 63	初元二年九月戊午朔庚辰	前 47	恭	V T1211③: 18
簡 64	初元二年十一月丁巳朔甲戌	前 47	恭	V T1311③: 37
簡 65	初元三年三月乙卯丙辰	前 46	恭	V T1411②: 59AB
簡 66	初元四年正月辛亥朔丙寅	前 45	憲	V T1510②: 90
簡 67	初元五年七月乙亥	前 44	眾	V T1311③: 87
簡 68	永光元年三月戊子	前 43	千秋	V T1411②: 9AB
簡 69	永光元年四月壬寅朔壬寅	前 43	千秋	V T1210③: 132A
簡 70	永光元年十月丁亥	前 43	千秋	V T1211③: 24

本文簡號	簡文年號	公元紀年	人名	懸泉漢簡編號
簡 71	永光二年二月癸巳朔庚子	前 42	千秋	VT1510②: 84
簡 72	永光三年正月丁亥朔癸丑	前 41	千秋	VT1309③: 17
簡 73	永光四年七月己卯朔甲午	前 40	千秋	Ⅱ T0215②: 433 A
簡 74	永光五年三月甲辰朔癸酉	前 39	弘	Ⅱ T0115③: 39
簡 75	建始元年□□辛卯朔癸巳	前 32	通	VT1712②: 42A
簡 76	建昭二……	前 37	彊	Ⅱ T0216②: 208
簡 77	建昭二年二月甲子朔辛卯	前 37	彊	Ⅱ T0216②: 246
簡 78	建昭二年三月癸巳朔丁酉	前 37	彊	Ⅱ T0216②: 243
簡 79	建昭二年三月癸巳朔辛丑	前 37	彊	Ⅱ T0216②: 702
簡 80	建昭二年五月壬辰朔□申	前 37	彊	Ⅱ T0115③: 92A
簡 81	建昭三年三月丁巳朔癸亥	前 36	彊	Ⅱ T0214②: 550
簡 82	建昭三年五月丙辰朔癸未	前 36	彊	Ⅱ T0216②: 650
簡 83	建昭三年七月乙卯朔丁巳	前 36	彊	I T0116②: 54
簡 84	建昭四年二月壬午朔乙酉	前 35	彊	Ⅱ T0216②: 622
簡 85	建昭四年九月己酉	前 35	千秋	Ⅱ T0216②: 263
簡 86	竟寧元年十月丙申朔辛亥	前 33	山都	Ⅱ T0216②: 605
簡 87	建始二年八月丙辰朔壬申	前 31	延	Ⅱ T0114②: 291
簡 88	建始四年閏月癸酉朔丁丑	前 29	賢	Ⅱ T0314②: 220AB
簡 89	河平元年八月戊辰朔壬午	前 28	賢	Ⅱ T0315②: 36A
簡 90	河平元年十一月丁未朔己未	前 28	賢	Ⅱ T0313②: 1+10
簡 91	河平二年十月壬戌朔辛巳	前 27	賢	Ⅱ T0314①: 29
簡 92	河平二年十月壬辰朔庚辰	前 27	賢	Ⅱ T0112②: 78
簡 93	河平四年十一月庚戌朔癸酉	前 25	賢	I T0207④: 5
簡 94	陽朔二年閏月甲戌	前 23	賢	I T0110①: 6
簡 95	陽朔二年閏月甲戌	前 23	賢	I T0110①: 7
簡 96	陽朔二年十一月丁卯	前 23	賢	Ⅱ T0112②: 108
簡 97	永始元年十二月丁巳朔癸未	前 16	吉	I T0111②: 29
簡 98	永始二年七月癸丑朔癸丑	前 15	吉	Ⅱ T0115③: 202
簡 100	元延四年十一月丁丑朔戊寅	前 9	寬	92DXH12: 5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釋文校訂稿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研讀班

內容提要 本文主要根據《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一書所公佈的簡牘釋文和圖版，對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的釋文、句讀及斷簡綴合進行了考察，提出了一些校補訂正意見。

關鍵詞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 釋文 斷簡綴合

整理者按：我們整理的《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出版後，受到各方關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發起並主辦了“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研讀班”，對照所公佈的釋文和圖版，對這批簡牘進行了逐字逐句的校讀，提出了一些校補訂正意見。其中，有的意見是多數成員的共識，有的意見實際只代表個人的看法。他們向我們徵求意見。我們認為：最好“有聞必錄”，並以研讀班的名義一並刊出。這樣，既尊重了個人的勞動，又可以使後來的研究者開闊思路，多一種選擇。——王素、劉濤

本文僅為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釋文的校訂稿，對相關問題的深入探討參見研讀班成員的研究論文。研讀班成員（按姓氏筆畫為序）有：王子今、王素、王海、付娟、李迎春、李明和、牟萃、宋超、孟彥弘、馬怡、侯旭東、莊小霞、姜守誠、孫久鳳、孫正軍、孫聞博、陳爽、陳寧、崔建華、張榮強、曾磊、鄔文玲、趙寵亮、劉志平、韓樹峰、藤井聿之、羅新、黨超等。

簡二：

1 |||合 檄 一 封
2 臨 湘 |||東部勸農郵亭掾周安言事
3 廷以郵行 |||詣 如 署
4 |||光和六年正月廿四日乙亥申時□駟□亭

按：第1行“合檄”原作“右檢”，今據圖版及封檢書寫用例擬改。

簡三正：

1 |||合 檄 一 封
2 隱 □ |||左部勸農郵亭掾夏詳言事
3 □ □ |||
4 □郵□ |||詣 如 署
5 |||中平三年二月廿一日己亥言安定亭

按：第1行“合檄”原作“右檢”，今據圖版及封檢書寫用例擬改。

簡三背：

1 詳死罪白：掾馬玄前共安定亭令詳推男子蔡蒲、陳伯……比蒲、伯
2 □訊，辭：玄不處年中，備郵亭掾。本與玄有不平，恚□……□得寧
3 □。詳內無半言之助。在職二年，遭遇賊唐饒等□……□曹掾
4 □持兵上下皆見知。詳為劇，願乞備他役，不□……信。詳死
5 罪死罪。

按：第1行“推”原作“捱”。

第4行“兵”前之“持”原作“□”，未釋；“詳為劇，願乞備他役”，原讀作“詳為劇願，乞備他役”，據文義，“願”字當屬下讀。

簡五：

1 光和六年九月己酉朔十日戊午，監臨湘李永例督盜賊殷何叩頭死罪敢言之。
2 中部督郵掾治所檄曰：民大男李建自言大男精張、精昔等。母姪有田十三石，前置三歲，田稅禾當為百二下石。持喪葬皇宗
3 事以，張、昔今強奪取田八石；比曉，張、昔不還田。民自言，辭如牒。張、昔何緣強奪建田？檄到，監部吏役攝張、昔，實核田

4 所界。付彈處，罪法明，附證驗，正處言。何叩頭死罪死罪。奉檄輒徑到仇重亭部，考問張、昔，訊建父升，辭皆曰：

5 升羅，張、昔縣民。前不處年中，升婢(?)取張同產兄宗女姪爲妻，產女替，替弟建，建弟顏，顏女弟條。昔則張弟男。宗病物

6 故，喪尸在堂。後[姪]復物故。宗無男，有餘財，田八石種。替、建[皆]尚幼小。張、升、昔供喪，葬宗訖，升還羅，張、昔自墾食宗

7 田。首核張爲宗弟，建爲姪敵男，張、建自俱爲口，分田。以上广二石種與張，下六石悉畀還建。張、昔今年所[畀]

8 建田六石，當分稅。張、建、昔等自相和從，無復證調，盡力實核。辭有[後]情，續解復言。何誠惶[誠]

9 恐，叩頭死罪死罪敢言之。

10 監臨湘李永例督盜賊殷何言實核大男李建與精張爭田自相和從書 詣在所

11

九月 其廿六日若

按：第 1 行“監臨湘李永例督盜賊殷何叩頭死罪敢言之”，原讀作“監臨湘李永、例督盜賊殷何叩頭死罪敢言之”，是以“例督盜賊”爲殷何之官職，並注云“‘例督盜賊’，可能就是臨湘縣尉”，則本文書爲監臨湘李永與例督盜賊殷何兩人聯名署治。據文義，“例督盜賊”非爲職官，“督盜賊”才是官職，爲“門下督盜賊”之省稱。此處“例”通“列”，意爲行列、曹列、條列。本文書實際上是監臨湘即中部督郵李永所上督盜賊殷何實核大男李建與精張自相和從的案卷，並非二人聯名署治。^①故簡文當連讀。

第 4 行“界”，原作“畀”，屬下讀。據圖版及文義，其字似當作“界”，屬上讀爲“實核田所界”。

“付彈處，罪法明，附證驗，正處言。何叩頭死罪死罪。奉檄輒徑到仇重亭部，考問張、昔，訊建父升，辭皆曰”，原讀作“畀付彈處罪法，明附證驗，正處言。何叩頭死罪死罪。奉檄輒徑到仇重亭部，考問張、昔，訊建父升辭，皆曰”，今據文義改。

第 6 行“張、升、昔供喪，葬宗訖”，原讀作“張、升、昔供喪葬宗訖”，今據文義改。

第 7 行“張、建自俱爲口，分田”，原讀作“張、建自俱爲口分田”，今據文義改。

第 7—8 行“張、昔今年所畀建田六石，當分稅。張、建、昔等自相和從”，原讀作“張、昔今年所畀建田六石，當分稅張、建、昔等。自相和從”，今據文義改。

第 10 行“監臨湘李永例督盜賊殷何言實核大男李建與精張爭田自相和從書”，原讀作

① 侯旭東、羅新先生的意見，並參見莊小霞《“例督盜賊”商榷》，待刊。

“監臨湘李永、例督盜賊殷何言實核大男李建與精張諍田自相和從書”，今據文義改，詳見上文。

簡六：

- 1 ☒ 頭死罪敢言之。
- 2 ☒ 子默盜取文書，亡。桂 ☐ 則……☐ 亭長劉
- 3 ☒ 文檣雄並力精人兵詣☐ 覺所☐ 捕何人
- 4 ☒ 劉掾在前，與至廣樂亭止，桂在後☐ 日舖
- 5 ☒ ☐ 出盜取桂文書，筒二枚、錢二千、大刀一口。時長
- 6 ☒ 草 ☐ 於 ☐ 亭 ☐ 南 ☐ 苑二☐ 中 ☐ 得 ☐ 桂 ☐ ☐ ☐ ☐ ☐ ☐ 付

按：第3行“並力”之“並”，原作“弗”，據圖版，其字當作“並”。

第4行“劉掾在前”，原作“劉璠、左萌”，是以劉璠、左萌分別爲人名。據圖版，“劉璠”當作“劉掾”，其字形與簡七“劉掾”二字相同；“左萌”當作“在前”；“在後”原作“在治”，據圖版當作“在後”，正好與前文“在前”相呼應。

第5行“出”，原作“□”，未釋，今據圖版擬補。

第6行“亭南”之“亭”，原作“宮”，據圖版，其字形與第四行“廣樂亭”之“亭”相同，當作“亭”。“得”後之“桂”，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

簡七：

- 1 □□□□□□□□□□……□
- 2 不得實問。桂辭：隨府五官劉掾檐文書，當□□
- 3 時於長蘭亭北五里下留飲水，何人從草中□□
- 4 蘭亭長張姓，發民作亭顏，與進雄裘□□
- 5 劉掾從少胡久□長坂(?)驛卒番鍾隨踵□
- 6 一所昏寔疏紀長蘭山中，盡力游登，□□
- 7 無素，惶恐叩頭，死罪死罪敢言之。□
- 8 □知□□

按：第 7 行“無素，惶恐叩頭”，原讀作“無。素惶恐叩頭”，是以“素”爲人名，並將本文書命名爲“素上言盜取文書案卷”。“無素”當連讀，不宜斷開。此乃時人習用之辭。《後漢書》卷八四《列女傳·曹世叔妻》載班昭所著《女誡》之辭云：“吾性疏頑，教道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又《三國志》卷四七《吳書·吳主權》注引《魏略》曰：“權實在遠，不豫聞知，約敕無素，敢謝其罪。”“無素”與“無狀”意思相同，如簡八

“章□□□□無狀，惶恐叩頭，死罪死罪”。

簡六和簡七可以綴合，兩枚斷簡的木質和筆迹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銜接，記述的乃同一事件，係由一簡碎裂而成，簡六為右下部，簡七為左上部，裂痕雖然清晰，但因中部有缺失，無法完全銜接。經過綴合、校補以後，釋文應該讀作：

1 □頭死罪敢言之。

2 □子默盜取文書，亡。性則……亭長劉

3 □□□□□□□□□□……□文模雄並力精人兵詣覺所□捕何人

4 不得。實問，性辭：隨府五官劉掾檐文書，當□劉掾在前，與至廣樂亭止，性在后，□日鋪

5 時於長蘭亭北五里下留飲水，何人從草中□出盜取性文書，簡二枚、錢二千、大刀一口。時長

6 蘭亭長張姓，發民作亭顏，與進雄衰□草於亭南苑二□中得性□□□□□□付

7 劉掾從少胡久□長坂(?)驛卒番鍾隨踵□

8 一所昏寔疏紀長蘭山中，盡力游登，□□

9 無素，惶恐叩頭，死罪死罪敢言之。□

10 □知□□

簡六+簡七^①

簡八：

1 兼主錄掾黃章叩頭死罪白：章□□□□□□之……

2 明府下車，得備領列曹，□□不□，□□□□，□□□□，故不責細小。

3 章叩頭死罪死罪。□見□具□□□□遣□□□部疏□。緣又督□

4 □□□日久，曉習舊故，掌主□□□□□□□□□□到，文書稽留，□平

5 思，願乞備□缺□部差遣吏。章□□□□無狀，惶恐叩頭，死罪死罪。

6 掾願章□

7

十月廿一日□

按：第 5 行“願”原屬上讀，“願乞”通常連用，當屬下讀。“乞”後之“備”，原作“□”，未釋，據圖版，其字形與簡三背面第 4 行之“備”相近，可補作“備”。

第 7 行“廿一日”之“廿”，原作“十”，今據圖版改。

① 參見孫聞博、付娟《東牌樓漢簡〈素上言盜取文書案卷〉的綴合與考釋》，《四川文物》2007 年第 6 期。鄔文玲：《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斷簡綴合與研究》，本刊。

簡九正：

- 1 熹平五年二月癸巳朔六日戊戌，□騎吏……
- 2 □□□所。今月五日初，卒爲邪風所中，頭身□□……

按：第2行“邪風”之“邪”，原作“耶”，並注云應爲“邪”之通假，今據圖版其字似可徑作“邪”。

簡一一：

- 1 □死罪□□
- 2 □子輒錄得赦放同山□□□□□……
- 3 □□叩頭死罪死罪。
- 4 已 十月一日壬寅白

按：第1行“死罪”，原作“□非”，今據圖版改。第4行“已”原作“山”。

簡一二：

- 1 臨湘守令臣肅(?)上言：荆南頻遇軍寇，租蕝法賦，民不輸入，冀蒙赦令，云當虧除。連年長逋，倉空無米，庫無錢布。督課鄉
- 2 吏如舊。故自今雖有赦令，不宜復除。昭陵、連道尚有營守，小頗驚急，見職吏各便歸家，召喚不可復致，帙弩委矢。

按：第1行“租蕝”，原作“租芎”，注云“芎”乃“芰”之故，又有可能爲“蕝”之別體。今據圖版及文義改。

簡一六正：

- 1 □白：□□……
- 2 節長教，令□……

按：第2行“令”，原作“今”，據圖版，其字形與簡十五正面第3行之“令”相同，當作“令”。

簡二〇背：

- 1 □□□□□明叩曹史□□□□□曰……
- 2 □□□□□□□□□□十月，□□據東陽，郵史朱光去署□□
- 3 ……

按：第2行“郵史”之“郵”，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

簡二一正：

- 1 等十餘人至(?)，不合書朕□名□以爲羣，各齋□力，弓弩委進
- 2 □□□□□□十□二□月……

按：第1行簡首之“等”，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弓弩”原作“則□”。

簡二九背：

- 1 念在案獄，門下通□，道說前治，故簿侍吏
- 2 持府中經用不付，令曹文書更□。但□若此
- 3 □無異語，唯爲作便安通□之，如不可通，

按：第2行“持府中經用不付，令曹文書更□”，原作“持府丞徑用，不待令曹文書更□”，據圖版，“府”後二字分別當作“中”、“經”，“不”後之字當作“付”。

簡三〇背：

- 1 近會聞大夫從尹主簿相求賞，以是曹□
- 2 分□問知不？忽亡世往速探問，云言漢臺之
- 3 悲痛悲痛，以無宜自棄丘山當相爲
- 4 □屬財復告忌忿々因附表命。不具。惶恐
- 5 惶恐，頓首頓首。千萬語夫□人也。

按：第5行“千萬語夫□人也”，原作“千萬諸夫之也”，據圖版，“萬”後之字疑當作“語”，“夫”後之字疑當作“人”。

簡三一背：

不得留難，若□俸錢稽留，不□□

按：“若□俸錢稽留”，原作“若□□欲稽留”，據圖版，“稽”前兩字當爲“俸錢”。

簡三二正：

- 1 少告母□□往念□□□□□何用？小大故付，怒力相事。
- 2 家單，無所□以□□□□□□□□盡興告邏人
- 3 冀下見乃迷□□□又□得□財方留之□□□□

按：第1行“故付”之“故”，原作“敢”，今據圖版改。

簡三二背：

- 1 侯租米未畢罷，爲屬令至月□□六日使使因欲畢之。
- 2 今聞據宛，家處□未衛絕□□湘鄉人慈，非可與語也。
- 3 又□月廿二日，時屬憂蚤畢，感□過久，各當分予錢

按：第1行“使使因欲畢之”，原作“使□因欲果之”，據圖版，“使”後未釋之字當作“使”，“欲”後之“果”字當作“畢”，如此，則全句當作“使使因欲畢之”，且可與第一行“侯租米未畢罷”相呼應。

第3行“廿二日”之“廿”，原作“十”，今據圖版改；“各當分予錢”，原作“各當分□錢”，據圖版，“分□”當作“分予”，“各當分予錢”，文通意順。

簡三四正：

- 1 堂再拜白 餉食難得，人累□□□爲命今日，且日夕耗久，唯不多云冀見乃□□。堂再拜。
- 2 陳主簿侍前：夕日惹々，言不悉，不以身爲憂念，□

按：第1行第2欄“不多云冀見”之“冀”，原作“葵”，今據圖版及文例改，簡三五背面第3行有“將命冀見乃得公々”等語可資參證。

簡三五正：

- 1 客賤子侈頓首再拜
- 2 督郵侍前：別鬲易邁，忽爾【至】今，埶磨年朔，
- 3 不復相見。勤領衆職，起居官舍，遵貴皆遂，

按：第2行“別鬲易邁，忽爾【至】今，埶（軸）磨年朔”，原作“別亭易邁忽爾，令縲磨年朔”，據圖版，“別亭”之“亭”當作“鬲”，“令”當作“今”，“縲”當作“埶”，讀作“軸”^①。據文義，“忽爾”之後疑脫“至”字。

第3行“遵貴皆遂”之“遂”，原作“迷”，不確，據圖版及文義，當作“遂”。

簡三五背：

- 1 安善歡喜，幸々甚々。推昔分別縲磨，不數承直，區々
- 2 之念，欲相從談。談客處空貧，無緣自前，言之有慙。

① 參見馬怡《讀東牌樓漢簡〈侈與督郵書〉——漢代書信格式與形制的研究》，本刊。

3 財自空乏，將命冀見，乃得公々。賤子習逸公惶恐頓首。

按：第1行“不數承直”之“直”，原作“直”，今據圖版及文義改，“承直”意即當值。

第2行“欲相從談。談客處空貧”，原作“欲相從談讀(?)。客處空貧”，“談”後之字釋作“讀”而存疑。據圖版，其字當作“談”，通“嘆”；“言之有慙”之“之”，原作“不”，據圖版，其字當作“之”，“慙”讀作“慚”。

第3行“財自空乏”之“乏”，原作“祀”，據圖版，其字當作“乏”，疑爲“乏”字之異體，“空乏”意即空虛窮乏；“賤子習逸公惶恐頓首”，原作“賤子習逸么，惶恐頓首”，將“逸”後之字釋作“么”，並注云“‘么’通‘麼’，‘逸麼’，閒適貌”。據圖版，此字當作“公”，“逸公”爲寫信人“侈”的字，漢代人常以“某公”爲字，如杜延年字幼公，劉玄字聖公，袁安字邵公等。^①

簡三六正：

- 1 月廿五日舉頓首言 大恩□□□□□□□□□□□□□□馬駒
駕意屬々
- 2 掾□□侍前：煩務朝夕，起居寺舍，夫人自康，幸甚々々。善不忽
- 3 □□□□□□□□自佔□前得尔□相□□仍以非同罪，促資費

按：第2行“起居寺舍”，原作“□居□舍”，“起”、“寺”二字未釋，今據圖版補。

簡三六背：

- 1……
- 2 禮二百，鷄一雙，想達從。頃迷務繫念，未從黨照，不譏。今費送一千，到
- 3 後念務勿怪也。後月十間，必遣送餘。相親恃怙，唯不中道，內小大委。
- 4 屬各於曹取之，六月時領，並祇領付。來信步上，未得貢米粟不久
- 5 將至。內異何易，還信具戒，念々不悉。舉頓首再拜。

按：第4行“屬各於曹取之，六月時領，並祇領付”，原作“屬□於曹取三六月時領並祇領付”，據圖版，“屬”後未釋之“□”當作“各”，“三”當作“之”。

第4、5行“來信步上，未得貢米粟不久將至”，原讀作“來信步上未得。貢米粟不久將至”，今據文義改。

① 參見馬怡《讀東牌樓漢簡〈侈與督郵書〉——漢代書信研究之一》，本刊。

簡三七正：

1 死罪。昔惠書聞，意將何就(?)污縣□□

2 □□□上下□焉亦可縣□□方□當送

按：第2行“當送”之“送”，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

簡三九正：

1 □□□□□□勤□……

2 先進侍前：勤勞暑熱

按：本簡可與簡四〇正拼合，詳見下文。

簡三九背：

1 念區々昔往時爲客，不

2 □□以□□給卒士葛走無用相

按：本簡可與簡四〇背拼合，詳見下文。第2行“給卒士葛走無用相”，原作“給卒上芴徒無用相”。

簡四〇正：

1 諾白悉□賤子鄧應再拜白 □□

2 兼□□侍前……

按：第1行“悉”後之“□”，原作“袁”，疑非是，據圖版，其字雖書寫清楚，但不識，宜存疑。本簡可與簡三九正拼合，詳見下文。

簡四〇背：

1 ……

2 相益者可慙。前草次表書，不日

按：本簡可與簡三九背拼合，詳見下文。

簡三九和簡四〇可以綴合，兩簡材質、紋理和筆迹完全相同，係一簡縱裂而成，簡三九爲左半部，簡四〇爲右半部，裂痕清晰，綴合之後的釋文當讀作：

1 諾白 悉□。賤子鄧應再拜白 □□
兼復前侍者勤□……

2 ☒ ☐ ☐ 先進侍前：勤勞暑熱

簡三九正+簡四〇正

1 ☒ 念區々昔往時爲客，不

2 ☐ 白 ☐ 諾以貌身給卒士葛走無用相

3 相益者可慙。前草次表書，不日

簡三九背+簡四〇背^①

簡四一背：

☒ ☐ ☐ 因懷敬。張頌叩頭再拜。

按：“懷敬”之“懷”原作“旋”，今據圖版改。

簡四三正：

1 屬白：書不悉，送 ☐ 案解人名。

2 所教惓々，不盡(?)白。

按：第2行“所教惓々”之“教”，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

簡四三背：

1 ☐ 張景名爲採(?)安，分別受告，今送求

2 事對。☒ ☐ 小大委。蔡記白。

按：第2行“蔡記”之“記”，原作“汙(?)”，是釋作“汙”而存疑，今據圖版改。

簡四四：

1 紀白：屬求悉祿，吉自尚小，既加

2 功曹，衆白爲得，既亦求爲騎吏，意

按：第1—2行“既加功曹，衆白爲得”，原作“既加功，云衆白爲得”，據圖版，“云”當作“曹”，屬上讀，爲“既加功曹”。

簡四八正：

1 叩頭死罪々々。☒ 才質粗鹵，虛竊榮祿，歸命下流，寄

2 乐智術，污穢滋列。惶 ☐ 戰悸，兢々覆命，不知上聞。君叩頭々々，

3 死罪々々。☐ ☐ 小寇，造(?)爲不庭，侍者征討，☐ ☐ ☐ 露 ☒ 履(?) ☐ ☐

按：第1行“才質粗鹵”之“質”，原作“炎”，今據圖版及文義改。

第1—2行“寄乐智術”，原作“掌☐ ☐ 術”，據圖版，“掌”似可作“寄”，未釋之

^① 參見鄔文玲《東牌樓東漢簡牘斷簡綴合與研究》，本刊。

“□□”似可作“乐智”，如此，則全句似可作“寄乐智術”。

第2行“惶□戰悸，兢々覆命，不知上聞”，原讀作“惶□戰悸兢々，覆命不知上聞”，今據文義改。

第3行“□□小寇，造(?)爲不庭，侍者征討”，原作“□小寇造(?)爲不庭，侍□征討”，據圖版，“□小寇”之前還有一字不可識，當補作“□□小寇”；“侍□”當作“侍者”。

簡四九正：

- 1 原白：一日不悉，連復欲詣，會歲下
- 2 多務，不腹從願。頃復他異，又馬布

按：第2行“多務”之“多”，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

簡四九背：

- 1 障汙，他人有至此來求，今遣取以付之，小
- 2 大內敕告，既緣休使，乃盡愚趣。原白
- 3 □□□ 謝孝達、何起、新安

按：第1行“他人”原作“民人”，且屬上讀，今據圖版改，並屬下讀。

第2行“原白”之“白”，原作“惶”，今據圖版改。

簡五〇正：

- 1 津頓首：昨示悉，別念想。區々想內少異，
- 2 不審久人果解未？區々獨迫，君旦詣府門，寧

按：第2行“區々獨迫，君旦詣府門”，原作“迨々。獨迫君旦詣府門”，據圖版，“迨々”似當作“區々”，本句可重新句讀如上。

簡五〇背：

- 1 □□人示□，又在倉面報云，河置小用意求，報
- 2 政遣知，頃異小大。還具告。念々書不盡言。面乃再拜
- 3 、子約省。幸甚々々。

按：第1行“河置小用意求”之“置”，原作“宜”，今據圖版改。

第2行“頃異小大”之“頃”，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面乃再拜”之“再拜”，原作“□津”，今據圖版改。

簡五一正：

- 1 □□□須 是□知□□□□□
- 2 □□□出□米因□恐□□君□□

按：第 2 行“米”，原作“成(?)”，是釋作“成”而存疑，據圖版，其字當作“米”；“恐”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

簡五二背：

- 1 聞。惹々因反不永□□□
- 2 叩頭拜言。幸甚々々。

按：第 2 行“叩頭拜言。幸甚々々”，原作“論許玄(?)。香(?)頓(?)首(?)”，據圖版，“論許玄(?)”當作“叩頭拜言”，“香(?)頓(?)首(?)”當作“幸甚々々”。

簡五四正：

- 1 緣白：……胡□……
- 2 ……六七人爲民，謝 遷 遣□□□□□
- 3 ……文書何相……
- 4 ……舍 令……

按：第 2 行“遣”，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

第 3 行“相”，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

簡五五正：

- 1 頃不相見。樵母前曰，得昨怠極服藥，爲診之出，詔書
防其餘者耳。書不……
- 2 斷絕往來，聞言頓差。又有半在此，不知奈其何，人不可

按：第 1 行“樵母前曰，得昨怠極服藥，爲診之出，詔書”，原作“樵母前日得，昨怠極服藥，爲政之出，□□”，據圖版，“日”疑當作“曰”；“政”疑當作“診”；“□□”疑當作“詔書”；全句可重新句讀如上。

第 2 行“聞言頓差”之“頓”，原作“頗”，今據圖版改；“又有半在此”之“半”，原作“米”，今據圖版改；“不知奈其何，人不可”，原作“不知奈其人不□”，據圖版，“其”下有補書小字“何”，當補；未釋之字當作“可”，恰與背面第 1 行文首之“信”

連讀爲“人不可信”，則全句可重新句讀爲“又有半在此，不知奈其何，人不可信”。

簡五五背：

- 1 信，吾復來視之，毛有此言，明日當診，小大復告。聞張
- 2 堂婦已去，怒力禁小兒，勿使行虧。合作槩恩，藥曹又除，
- 3 吾復作足手。許十月中，非但疾者，故悉覽忿々下府縣中，

按：第 1 行“明日當診”之“診”，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聞”後之“張”，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

第 2 行簡首之“堂”，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恰與第 1 行文末之“張”連讀爲人名“張堂”。“怒力禁小兒”之“禁”，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合作槩恩”之“槩恩”，原作“□恩”，今據圖版校補，“槩恩”即“藥蔥”；“藥曹又除”之“除”，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

第 3 行“故悉覽忿々下府縣中”之“忿々”，原作“公以”，今據圖版改，“忿々”即“忽々”。

簡五七背：

- 1 ……胡□長(?)思□□□□□□□□□□……□
- 2 ……□□中龍葱以是可得數相見。吾冀爲仕□□中□
- 3 ……□□誰□所取侍者知以久誰□或想仁君想□復□□

按：第 3 行“侍者”之“侍”，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

簡五八背：

善元(?)々不忽，前別領中，恨語言不□

按：“前別領中”之“中”，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

簡五九：

□至邳(?)卿處惓々，謝比得□□

按：“卿”原作“鄉”，今據圖版改。

簡六〇背：

- 1 ……
- 2 黃既孝昆侍者，起居福履，安寧驩喜，幸甚！

按：第2行“昆”，原作“昆(?)”，是釋作“昆”而存疑，據圖版，其字似乎可釋作“昆”。

簡六二正：

1 適下意事々(?)教留內不出□閣主□

2 ……

按：本簡可與簡六五背拼合，詳見下文。

簡六二背：

1 ……

2 □□書事受人見不事……

3 日以至也。當有告語不？又□伍□

按：本簡可與簡六五正拼合，詳見下文。

簡六三背：

1 □……拜

2 □……慙又舍以得

按：第1行“□……拜”，原未錄寫，據圖版，背面當有兩行文字，第1行最末一字“拜”似乎可辨，其餘殘滅不可識，當補作“□……拜”。

簡六四正：

1 ……

2 書付松□及火興求次(?)付惹々易悉令蓄

按：本簡可與簡六八正拼合，詳見下文。

簡六四背：

賊曹子任，煩內他復改異，當何□耳？

按：本簡可與簡六八背拼合，詳見下文。“賊曹子任，煩內他復改異，當何□耳？”原作“各曹……”。

簡六五正：

1 □不復無伴愁々故付□□

2 叩頭頓首々々。昨日忿々，不悉元異□

按：本簡可與簡六二背拼合，詳見下文。

簡六五背：

1 □間人□曹家各左右責經用□

2 □□□□□得止悔，能可得□

按：本簡可與簡六二正拼合，詳見下文。

簡六二和簡六五可以綴合，兩枚斷簡的木質、筆迹完全相同，裂痕亦清晰吻合，乃是由一簡縱裂而成，簡六二爲左半部，簡六五爲右半部，經過綴合以後，釋文當讀作：

1 □不復無伴愁々故付□□

2 叩頭頓首々々。昨日忿々不悉，元異□

3 □□書事受人見不事

4 日以至也。當有告語不？又□□□

簡六二背+簡六五正

1 適下意事々(?)教留內不出□閣主□

2 中間人及曹家各左右責經用□

3 □□不悉，頃欲得止悔，能可得□

簡六二正+簡六五背^①

簡六七背：

1 □孝□□

2 如□□言，若不悉前□□□□

按：第2行“不悉”之“悉”，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

簡六八正：

1 酒可道乎？迫此身，微不能。是分了，愁々以仁。

2 賊曹當推取不？勉又言，明日當令言上□

按：本簡可與簡六四正拼合，詳見下文。

簡六八背：

賊曹子任，煩內他復改異，當何□耳？

按：本簡可與簡六四背拼合，詳見下文。“賊曹子任，煩內他復改異”，原作“賊曹

^① 參見鄔文玲《東牌樓東漢簡牘斷簡綴合與研究》，本刊。

子任煩內，他復設是”，據圖版及文義，“設是”當作“改異”，“煩內他復改異”與簡七〇“煩內他爲改異”當爲相類的用語。

簡六四和簡六八可以綴合，兩枚斷簡的木質、筆迹完全相同，乃是由一簡縱裂而成，簡六四爲左半部，簡六八爲右半部，裂痕清晰，經過綴合以後，釋文當讀作：

1 酒可道乎？迫此身，微不能，是分了，愁々以仁。

2 賊曹當推取不？勉又言，明日當令言上□

3 書付松□及火興求次付惹々易悉令齧

簡六四正+簡六八正

賊曹子任，煩內他復改異，當何□耳？

簡六四背+簡六八背^①

簡六九背：

1 □……□□今遣往□□

2 □……々□收。今墓之，

3 □……見。念々□□

按：第1行“今”，原作“念”，今據圖版改。

簡七〇正：

1、子約，頃不語言，煩內他爲改異。又前通檄，

2 白劉寔忍有北里中宅，意云曹白部，中部賊捕掾考

按：第1行“煩內他爲改異”之“他”，原作“代”，今據圖版改。

簡七三正：

□照□昨□相□見，語□言□不□熟□

按：“昨相見”之“昨”，原作“作”，今據圖版改。

簡七三背：

□□□□□前□白□

按：“前白”之“前”，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

簡七六正：

1 □□□收土受賞惠，會月廿四日……

2 □付案事史□土□□時□□曹史□

① 參見鄔文玲《東牌樓東漢簡牘斷簡綴合與研究》，本刊。

按：第2行“案事史”之“案”，原作“婁水”，今據圖版改。

簡七八正：

- 1 津史唐存、捕盜史黃敷、牛者趙周索取_錢_糧_狀。
- 2 _□_□人男子鄧還、鄧甫對鬪，皆_□從。
- 3 _□_□_□_□男子胡杲殺李_□妻妾_狀。

按：第1行文末之“狀”，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

第3行文末之“狀”，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

簡七九：

- 1 建寧四年_益成里戶人公乘其【年】卅九算卒篤_卒 子_公_乘_石……
- 2 _曹_其 · ……_卅_七_算_卒_篤_卒

按：第1行“公乘其”之“其”，原作“某”，今據圖版改，其，人名。按照文例，“卅九”之前脫“年”字。

第2行簡首“曹其”，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曹其”當是戶主姓名，即簡文第1行所云“益成里戶人公乘其”，戶主姓名通常居中大字書寫於簡上端。如此，則簡文當作：

_曹_其 建寧四年_益成里戶人公乘其【年】卅九算卒篤_卒 子_公_乘_石……
 ……_卅_七_算_卒_篤_卒 簡七九

簡八三：

右 五 戶 同 伍 _□_□

按：“右五戶同伍”之“伍”，原作“囟”，據圖版，其字當作“伍”。

簡八六正：

朱坏、平旦、米_禿、這_少、常抱

按：“平旦”之“平”，原作“□”，今據圖版補。

簡九〇：

- 1 _□_曹_掾_李_堅 _□
- 2 左賊曹掾張顯 _□

按：本簡可與簡九一拼合，詳見下文。

簡九一：

1 ☐

2 ☐ 獄史棓亭 凡九人

按：第 2 行“棓亭”之“棓”，原作“𣎵”，今據圖版改。“棓”，姓氏，爲“梅”之異體。本簡可與簡九〇拼合，詳見下文。

簡九〇和簡九一可以綴合。兩枚斷簡木質、筆迹完全相同，裂痕可以銜接，可見它們乃是由一簡橫斷而成。簡九〇爲上段，簡九一爲下段，經過綴合以後，釋文應讀作：

1 ☐曹 ☐掾 ☐李 ☐堅

2 左賊曹掾張顯 獄史棓亭 凡九人 簡九〇+簡九一^①

簡九六：

☐弟 ☐子 ☐長 ☐沙 ☐張(?)竟(?)☐☐

按：“長沙”原作“張少”，今據圖版及文義改。

簡一〇〇背：

十月當還。以手書爲信。 ☐同 ☐文☐

按：“以手書爲信”之“爲”，原作“券”，今據圖版改。

簡一〇二背：

1 ☐聽再☐

2 ☐錢 ☐不☐

按：第 2 行“不”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

簡一〇六背：

1 ☐臨 ☐湘 ☐縣 ☐賦 ☐本

2 事

按：背面第 2 行“事”，原作“……”，是以有字不可識別，今據圖版，其字當作

① 參見鄔文玲《東牌樓東漢簡牘斷簡綴合與研究》，本刊。

“事”。

簡一〇八正：

1 右 瀉鄉□□□

2 曹

3 賊 □□□□□

按：第1行“瀉”，原作“爲”，今據圖版改。

第2行“曹”，原作“□□”，據圖版，只有一字殘筆，當作“曹”字。

簡一〇八背：

1 右 鄧掾□□

2 曹□□

3 賊 □□□□

按：第2行“曹”，原作“□”，未釋，今據圖版補。

簡一〇九背：

右

曹

賊

按：“右賊曹”等字，原未錄，今據圖版補。

簡一一七正：

1 六月甲申朔廿二乙卯，謹遣小史潭超

2 喜 平 元 年

3 詣在所，到，亟問前後所犯爲無狀。家富(?)

按：第1行“潭超”之“潭”，原作“覃”，今據圖版改。^①

第3行“亟問”之“亟”，原作“敢”，今據圖版改。

簡一一七背：

1 有_如肥陽、玉角。所將隨從，_飲食易得。人主傷心_不易識。超到言

2 _如_律令故事。有侍者教首，書者員慳、李阿。六月廿二日白。

① 參見莊小霞《東牌樓人形木牘研究札記》，本刊。

按：第2行“如律令故事。有侍者教首，書者員慳、李阿”，原讀作“如律令。故事：有陳者，教首。書者員慳、李阿”，據文義，“故事”當與“律令”連讀；據圖版，“陳者”之“陳”當作“侍”。則全句可重新句讀如上。

簡一一八正：

何黑再拜待持本相與隨嫁事。慮(?)

按：“何黑再拜”，原作“何黑、謝立”，今據圖版改。

簡一一八背：

之故付意。何黑白。

按：“故”，原作“敢”，今據圖版改。

簡一四〇背：

……以郵行……本事

按：“……以郵行……本事”，原未錄，注釋說“背面有字跡，不可辨識，不錄”。據圖版，背面“以郵行”、“本事”等字似乎可辨，當補。

簡一四一正：

1 □□□……□

2 □中部□□□

3 督郵掾□□□

按：第2行“中部”，原作“比□”，今據圖版改。

(鄔文玲、趙寵亮執筆)

蔣席·皮席·蓐席

——長沙東牌樓簡牘研讀札記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王子今

內容提要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有涉及“蔣”、“蓐席”、“皮席”的內容。整理者對於簡文的理解有值得商榷之處。“蔣”應即“蔣”，指剖竹未去節所製席，屬於坐臥鋪墊用具。有關“蔣”、“蓐席”、“皮席”的資料，為我們認識當時“席”一類日常就坐之處的敷設品的形式提供了新的信息。

關鍵詞 席 日常用具 東牌樓漢簡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標號為一一〇者，整理者題名“槩等器物帳”，有說明文字：“木牘。左中下部有殘缺。此為正面，存文三行。背面無字。”對於簡文內容的理解，有討論的必要。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中，王素、劉濤先生的釋文作：

- | | | |
|---------|-------|-------|
| 1 蔣十五枚 | 蓐席一束 | 筓一寵 |
| 2 皮席一枚 | 平于一枚 | 馬汝按一雙 |
| 3 皮二席一枚 | 大酒于一枚 | 南山□□□ |

又有注釋：“‘蔣’應爲‘槳’之通假。”“‘蓆’應爲‘菅’之通假”。“‘苳’爲‘茅苳’省稱，又作‘茅苳’，即車前草，可入藥。”“‘于’即‘孟’”，“江陵鳳凰山一〇號漢墓出土簡牘有‘小于一具’，‘于’亦即‘孟’”^①。“湖北雲夢大墳頭漢墓出土簡牘有‘金小孟一’。”^②“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出土簡牘有‘孟四枚’、‘盆孟一枚’。”^③

從簡文內容看，羅列器物均爲室內日常服用器物，不當出現舟船推進工具“槳”。其數量多至“十五枚”，如果作爲實用的“槳”，在船兩側划水，數量也出現疑問。“‘蔣’應爲‘槳’之通假”的說法未可信從。

“蔣”或許即“簾”。《廣雅·釋器》：“簾，席也。”王念孫《廣雅疏證》：“簾，通作‘蔣’。”《說文·竹部》：“簾，剖竹未去節謂之簾。”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剖竹未去節謂之簾’者，‘未’當爲‘笨’，‘簾’所以爲席，如今織席先剖竹刮去其裏。”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說：“段借爲‘薦’。”“‘簾’‘薦’一聲之轉。”

《韓非子·十過》有關於“奢”與“儉”的討論：“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頗緣，觴酌有採，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

由余言及禹“彌侈”作爲例證之一的所謂“蔣席頗緣”，諸家注說於“蔣席”下皆寫道：“舊注：蔣，草名。”陳奇猷校注《韓非子集釋》引顧廣圻曰：“《今本》‘頗’作‘額’，誤。頗緣，謂其緣邪裂之。”^④在“蔣席”邊緣用漂亮的絲織品作細緻的裝飾。這種邊飾自然亦有增益其強度的作用，但這種加工形式的主要的作用，是追求奢華。漢代相關資料中還可以看到民間日常生活中“蔣席”的製作和使用。《四部叢刊》所收宋本王褒《僮約》列數“僮”這種身份承擔的多種勞作形式，其中有：“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箔。”

① 見長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第6期，41—61頁。

② 見湖北省博物館、孝感地區文教局、雲夢縣文化館漢墓發掘組《湖北雲夢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年第9期，23—36頁。

③ 見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整理小組《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第10期，31—37、50頁。

④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189頁。

原注：“蔣，……菰蒲草也。”《藝文類聚》卷三五引漢王褒《僮約》作“雨墮所無爲，當編將織薄”。《太平御覽》卷五九八引漢王褒《僮約》作“雨墮所無爲，當編蔣織薄”^①。

《太平御覽》卷七〇九引王隱晉書寫道：“陶侃字士行，親人過侃宿時，大雪無草，侃母湛撤床雜蔣，手剉給客牛馬。”原注：“《晉陽秋》云：‘蔣，薦也。’”在“大雪無草”的艱難情勢下，被迫拆散床上草席，以爲牛馬飼料。

顯然，簡文所見與“皮席”、“蓐席”並列的“蔣”，無論是草質還是竹質，都是指坐臥鋪墊用具，而與“槩”無關。

“皮席”應是皮質鋪墊物。《周禮·春官·司几筵》寫道：“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有關“席”使用的禮制秩序，包括“甸役，則設熊席”。《呂氏春秋·分職》：“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灶，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這裏也說到“熊席”。《太平御覽》卷七〇九引《西京雜記》也記載：“昭陽殿設綠熊席，毛皆長一尺餘。眠而擁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見也。坐則沒膝。其中雜薰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說郛》卷一一一《趙飛燕外傳》：“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爲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沈水香蓮心枕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匹，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羈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盞，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毒箸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語瓊拜上。’”其中，“含香綠毛狸藉一鋪”也是“皮席”。《初學記》卷二五引《晉東宮舊事》寫道：“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席、花席、經席。”《太平御覽》卷一〇《天文要集》也說，“北斗之傍有氣，往往而黑，狀如禽獸，大如皮席，不出三日必雨”，都明確說到“皮席”。

《說苑》卷一〇寫道：“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說明獵殺野生動物往往以其皮爲席。^②《釋名·釋牀帳》：“貂席，連貂皮以爲席也。”《後漢書·李恂傳》：“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可知羊皮席是價格較低、質量較次的“皮席”。

簡文說到“皮席一枚”，同時又說到“皮二席一枚”。那麼，什麼是“皮二席”呢？

所謂“皮二席”者，有可能是有關古人服用形式的文獻記錄中可以看到“重席”。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

① 《太平御覽》卷五〇〇引文無“薄”字。

② 這種情形歷代都相當普遍。《大金集禮》卷二二《別廟·孝成舊廟》說到使用“虎皮席”的制度。

繫之。”日本學者竹添進一郎《左氏會箋》：“臧紇以重席待悼子，明其爲卿之適，從卿禮也。”^①楊伯峻注：“重席，二層席。古代席地坐，席之層次，依其位之高低。《儀禮·鄉飲酒禮》云：‘公三重，大夫再重。’則重席，大夫之座。”《儀禮·鄉射禮》：“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鄭玄注：“‘辭’之者，謙不以己尊加賢者也；‘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一重席。”又《禮記·曲禮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對於所謂“客徹重席”，鄭玄解釋說：“‘徹’，去也；‘去重席’，謙也。”《尚書·顧命》：“狄設黼宸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又說到“重篋席”、“重底席”、“重豐席”、“重筍席”。

清代學者王夫之《詩經稗疏》卷三寫道：“按‘重席’者，席上加席，一筵而二席也。”元人敖繼公《儀禮集說》卷六解釋“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謂‘兼卷’，謂以兩席相重而並卷之也。其卷亦自末，執時兼卷，是設時亦兼布之矣。此固異於設加席之法，亦以其二席之長短同，故得由便爲之爾。”清人盛世佐《儀禮集編》卷一一解釋“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引張氏說：“‘重席’，但一種席重設之。”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呂氏春秋·先己》也有“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鍾鼓不修”這樣的文字。所謂“坐不重席”、“處不重席”，是自謙自儉的表現。《太平御覽》卷七〇九引《益部耆舊傳》曰：“張克爲州治中從事，刺史每自坐高床，爲從事設單席於地。”“單席”是與“重席”不同的待遇。“坐不重席”、“處不重席”，使用的應當是“單席”。

“重席”使用體現尊貴地位的實例，有《太平御覽》卷七〇九引謝承《後漢書》：“殷亮爲博士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重八九席。帝曰：‘學不當如是耶！’”又有《後漢書·儒林列傳上·戴憑》記錄的故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太平御覽》卷七〇九引《漢書儀》曰：“祭天紫壇紺席登地，用六彩席六重。”殷亮“重八九席”，戴憑“重坐五十餘席”，更是“重席”至於極端的例子。

簡文“蓺席一束”，“‘蓺’應爲‘菅’之通假”的解釋，應當說是可以成立的。《說文·艸部》：“蓺，艸，出吳林山。”《山海經·中山經》：“吳林之山，其中多蓺草。”郭璞注：“亦‘菅’字。”又有一種解釋，即“蓺”通“蘭”，是一種香草。唐玄應《一

① 《左氏會箋》卷一七，富山房，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版。

切經音義》卷二：“蓐，《字書》：‘與蘭同。’蓐，蘭也。《說文》：‘蓐，香草也。’”或據此釋“蓐”為“蘭草”。^①對於所謂“蓐，蘭也”，或讀作“蓐，蘭也”，並以爲《字書》引文。^②看來，“蓐席”應是編織原料比較特殊的席。《太平御覽》卷七〇九《范子計然》曰：“六尺蘭席出河東，上價七十。”^③亦反映了這種特製“席”的名貴。

爲什麼與“蔣十五枚”、“皮席一枚”、“皮二席一枚”以“枚”計量不同，“蓐席”卻稱“束”呢？

這一情形，很可能與這種“席”質料的輕薄精緻有某種關係。《太平御覽》卷七〇九引王子年《拾遺錄》形容“席”的質量，使用“溫柔”、“細軟”、“香”、“柔”、“方冬彌溫”諸語^④，又如：“方丈山有草名濡蓐，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軟可縈，海人織以爲薦席，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列丈。”“濡蓐”的“蓐”，其實就是“蓐席”的“蓐”字。

所謂“卷之不盈一手”，說明“席”在不使用的時候，通常都是“卷”起來放置。《詩·邶風》記錄了這樣的詩句：“我心匪席，不可卷也。”^⑤《釋名·釋牀帳》寫道：“席，釋也，可卷可釋也。”於是秦漢時人習用“席卷”之說。^⑥卷起來的“席”，據說可以持之“如橋衡”^⑦，以“束”稱之，是合理的。而馬王堆一號漢墓邊箱中出土的兩條竹席“原來卷成筒狀”，西邊箱中部出土的兩條草席“分別卷成筒狀，並束以絲帶”^⑧，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竹席標本北一八四“呈卷筒狀”^⑨，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蓐席一束”的大致情形。

“席”的計量單位又稱“領”。《太平御覽》卷七〇九引《東宮舊事》：“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花經席一領。”^⑩而出土資料所見“席”的統計，往往僅記錄數量，不言單位。如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遣策”所見“涓度席一續掾”（二八六），“滑辟席一廣四丈長丈

①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湖北辭書出版社，1993，1357頁。

② 宗邦福等主編：《故訓匯纂》，商務印書館，2003，1955頁。

③ 《太平御覽》卷七〇九引王子年《拾遺錄》：“軒皇使百辟羣臣受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

④ 如：“藁乘草高五尺，葉色如紺，葉形如半月之勢，亦曰半月草，花無實。其質溫柔，可以爲席。”“方丈山有草名濡蓐，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軟可縈，海人織以爲薦席。”“崑崙山有葭，紅色，可編爲席，溫柔如毯毳焉。”“瀛州南有金鸞之館，有青瑤几，覆以雲紈之素席，用香水柔莞。”“岱輿山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服，則焦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爲席，方冬彌溫。”

⑤ 《太平御覽》卷七〇九引文有注：“席雖平，尚可卷。”

⑥ 如“席卷三秦”（《漢書·敘傳下》），“席卷巴蜀”（《三國志·魏書·王朗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席卷交廣”（《三國志·吳書·孫皓傳》），“席卷三江”（《三國志·魏書·王朗傳》），“席卷千里”（《史記·魏豹彭越列傳》），“席卷北庭”（《後漢書·袁安傳》），“席卷漠北”（《後漢書·文苑列傳上·杜篤》），“席卷四海”（《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席卷天下”（《史記·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後漢書·馮衍傳》），“席卷宇內”（《三國志·吳書·陸抗傳》）等。

⑦ 《禮記·曲禮上》：“奉席如橋衡。”明人胡廣等《禮記大全》卷一的解釋是：“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乃奉席之儀也。”

⑧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1973，121頁。

⑨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文物出版社，2004，236頁。

⑩ 又《說郛》卷五九上《元嘉起居注》“菟白席”條：“元嘉中，劉禎爲御史中丞，奏風聞廣州刺史韋朗於州部作菟白席三百二十領，請以事追免朗官。”《太平御覽》卷七〇九引《宋起居注》作“白菟席”。

生繒掾”（二八七），“滑辟席一繒掾”（二八八），“莞席二其一青掾一錦掾”（二八九），“坐莞席三錦掾二青掾”（二九〇），“■右方席七其四莞”^①（二九一），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遣策”所見“滑辟席一廣四尺長丈生繒掾”（三〇六），“滑辟席一錦掾”（三〇七），“滑度席一繒掾”（三〇八），“莞席二其一繒掾一錦掾”（三〇九），“坐莞席二錦掾”^②（三一〇），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漢墓出土《從器志》（M1：161）中“簟席五十六繒緣”，“簟長席十”等。羅泊灣一號墓《從器志》記錄的“坐網一囊”也值得注意。發掘報告執筆者認為，“網亦作茵，《說文》‘車重席也。’《韓非子》有‘縵帛爲茵’語。坐網應爲坐墊”^③。

從簡文書寫順序看，“蔣十五枚”——“皮席一枚”——“皮二席一枚”——“蓺席一束”，大致貴重者置後。

東牌樓簡牘“苕一寵”，注釋：“‘苕’爲‘茅苕’省稱，又作‘茅苕’，即車前草，可入藥。”其實，可以與此對應的考古資料，可能如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所見“蕙一筭”（一五八），“蕙一筭”（一五九），“||右方土衡蕙三筭”（一六〇），馬王堆三號漢墓“遣策”所見“無夷一筭”（一八四），“蕙一鈞一筭”（一八五），“蕙一筭”（一八六），“蕙十四囊”（二〇五）。發掘報告執筆者認為，“蕙乃蕙字的訛別。《廣雅·釋草》：‘薰草，蕙草也。’”“蕙，即蕙。《漢晉西陲木簡匯編》有《急救章》句：‘蕙熏脂粉膏磔筭’，蕙作蕙可證。《說文·艸部》：‘蕙，雜香草’。”“土衡，即杜衡。《離騷》：‘雜杜衡與芳芷’，王逸注：‘杜衡似葵而香，葉似馬蹄，故俗云馬蹄香也。’《廣雅·釋草》：‘楚衡，杜衡也。’”又說：“本組皆爲香草。”^④簡文“苕一寵”的“苕”，也是有特殊功能的植物。《說文·艸部》：“苕，茅苕，一名馬舄。其實如李，令人宜子。”《洪武正韻》卷七：“蕙苕，又茅苕，亦作苕。”黃侃《說文段注小箋》卷上：“茅苕之苕古止作曰，已部曰，賈侍中說：‘意曰實也。’作苕者當爲借字。”段玉裁爲“蓄”字作注：“蕙苕。《本艸經·艸部》：上品有蕙苕人。陶隱居云：生交趾者子最大，彼土人呼爲蕙珠，馬援大取將還，人譏以爲珍珠也。按蕙與蕙雙聲。从艸音聲。於力切。一部。一曰蓄英。未詳。”我們目前對“苕一寵”的理解，也許祇能以“未詳”總結。

《周禮·天官·玉府》：“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晉書·石季龍載記》又說到“席庫”，可知“席”的放置有專門的秩序。而我們在簡文中看到“席”和“于”等器物的組合。“‘于’亦即‘盂’”的說法是正確的。此簡所見“平于”、“大

①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1973，152頁。

②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文物出版社，2004，68頁。

③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文物出版社，1988，81—82頁。

④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1973，142—143頁。

酒于”，可與此前出土漢簡資料所見“小子”、“盆孟”等對照理解。《太平御覽》卷七〇九《晏子》：“景公飲酒，移於晏子，晏子曰：夫鋪薦陳簠者，人臣不敢與焉。又移於司馬穰苴，曰：鋪薦席陳簠簋者，人臣不敢與焉。”《說苑》卷六：“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所謂“鋪薦席陳簠簋”，所謂“籩豆茵席”，都體現了飲食具和“席”的特殊關係，與簡文內容是一致的。

察看圖版，可知“馬汝𣎵𣎵雙”應為“馬汝𣎵𣎵雙”。“馬汝”其義未詳。下文“南山□□□”語義亦未知。但是也許我們應當注意“席”與“几”的密切關係，由這一思路認識“𣎵”在與“席”相聯係的服用器物中的作用。

讀東牌樓漢簡《侈與督郵書》

——漢代書信格式與形制的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馬怡

內容提要 《侈與督郵書》是長沙東牌樓東漢簡中的一件完整的書信。本文對《侈與督郵書》的文字重作釋讀，加以考證；對其所涉及的漢代書信的格式（如稱謂、平闕、敬辭、署名等）和形制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 東漢 東牌樓漢簡 漢代書信 書信格式 書信形制

《侈與督郵書》，2004年發現於湖南省長沙市東牌樓建築工地第七號古井，書寫在一枚木牘上，編號為簡三五（標本號1006），是東漢末期遺物。^① 2006年，《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一書（以下簡稱《東牌樓》）發表了《侈與督郵書》的照片圖版、整理者的釋文和簡注。^② 在此基礎上，筆者進行了研究，認為對《侈與督郵書》的釋文和所涉及的漢代書信的格式和形制等仍可作進一步的探討，故寫此文。

由圖版可知，這枚木牘雖有裂痕，但仍完整。墨迹清晰，兩面書寫，每面三行，行距較寬，無天頭地腳，字體為早期正書。正面存三十九字，背面存六十字（包括重文），共計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31頁。

② 整理者名之《侈致督郵某書信》。照片圖版見該書第25頁及彩版五，釋文見該書第88頁。其釋文是：“客賤子侈頓首再拜/督郵侍前：別亭易邁忽爾，令縲磨年朔，不復相見。勤領衆職，起居官舍，遵貴皆迷，安善歡喜，幸々甚々。推昔分別縲磨，不數承直，區々之念，欲相從談讀(?)。客處空貧，無緣自前，言不有慙。財自空祀，將命冀見，乃得公々。賤子習逸么。惶恐頓首。”

九十九字，幾字字可辨，書信的內容和格式得以原樣呈現。今釋讀如下：

正面：

[第一行]客賤子侈頓首再拜

[第二行]督郵侍前：別高（亭）易邁，忽尔今埤（軸）磨年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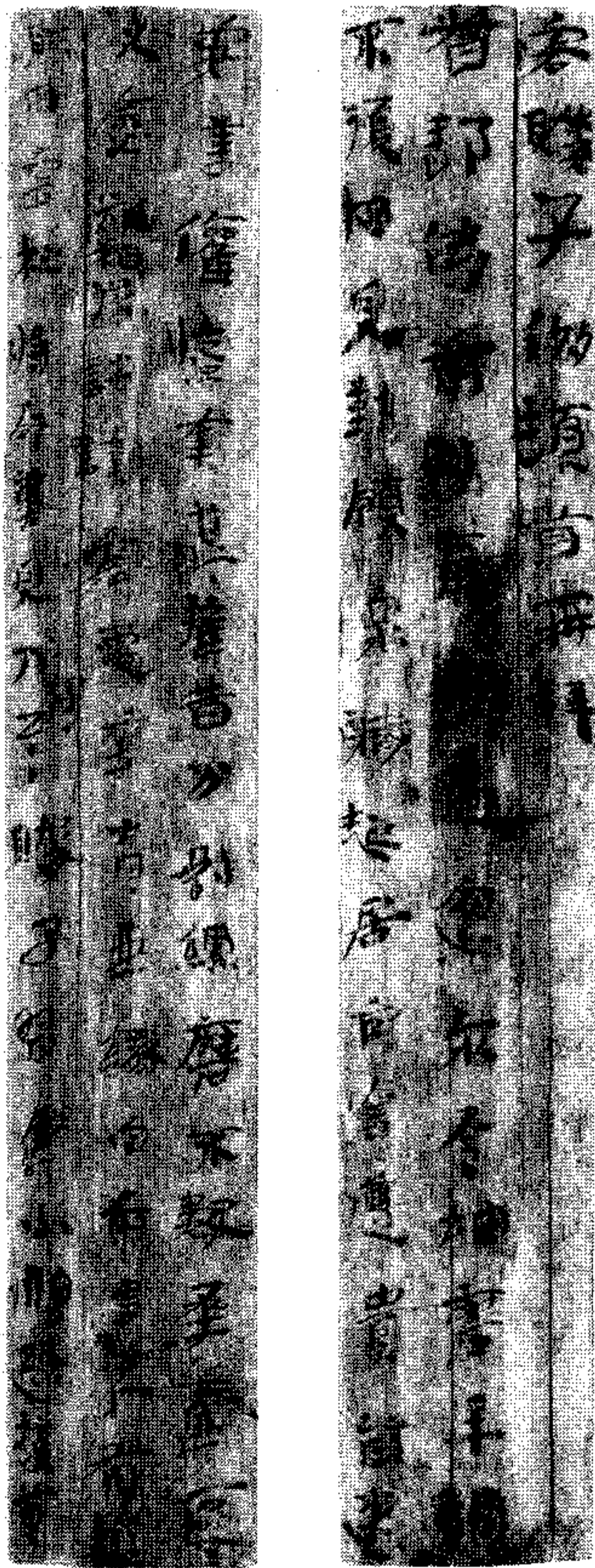
[第三行]不復相見。勤領衆職，起居官舍，遵（尊）貴皆遂，

背面：

[第一行]安善僦（歡）懽（喜），幸甚[幸甚]。推（惟）昔分別縲（累）磨，
不數承直（直），區[區]

[第二行]之念，欲相從談。諗（嘆）客處空貧，無緣自前，言之有慙。

[第三行]財自空乏（乏），將命冀見，乃得乙（一）[一]。賤子習逸公惶恐頓首。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簡三五

這是一件名爲“侈”的人寫給某位督郵的信。“客賤子”是侈的自稱。“客”，寄居，在外。《說文解字·宀部》釋“客”：“寄也。”“賤子”，自謙之詞。《東牌樓》的注釋說，“賤子”一詞“似爲子輩專用”，並引《漢書·游俠傳·樓護》及顏師古注爲據：“成

都侯（王）商子（邑）爲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顏師古注：“言以父禮事。”不過，顏師古所謂“以父禮事”，是指王邑“居樽下”，還是亦包括其自稱“賤子上壽”，從其文意看似似乎並不明確。

“賤子”大約本是無官職者自謙的稱謂。《通典》卷五八《禮十八·沿革十八·嘉禮三》記載：

東晉王堪六禮辭，並爲贊頌。儀云：“於版上各方書禮文、婿父名、媒人正版中，納採於版左方。裹以皂囊，白繩纏之，如封章，某官某君大門下封，某官甲乙白奏，無官言賤子。”^①

又《文選》卷二八《樂府下·鮑明遠〈東武吟〉》：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佔募到河源……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呂）向曰：“賤子，人之謙稱。”]^②

不過，在某些場合，有官職和身份的人特別要表示謙卑時也會自稱“賤子”，如前引《漢書·游俠傳·樓護》中王邑的例子。又《三國志》卷九《魏書·桓範傳》注引《魏末傳》：

（曹爽）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

其時曹爽被圍，恐宣王司馬懿加害，故書中語氣甚爲謙卑。

西北漢簡中屢見有關“賤子”的記載，但多因上下文字短缺而難以判斷確切的意義。較爲清楚的，是下面這一條：

賤子周恭字少仲再拜。

居延新簡 E.P.T59:29A^③

簡文中，“周恭字少仲”姓、名、字並具，“賤子”在這裏應當是向親屬以外的尊者表示自謙的稱謂。漢印文字中亦屢見“賤子”，如：

賤子毒印 賤子瞽印 賤子冬古 賤子始印
賤子娃印

《漢印文字徵》第六
《漢印文字徵》第十二^④

① 《通典》卷五八，中華書局，1988，1651 頁。

② [梁]蕭統編選、[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二八《詩·樂府》，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年影印本，509 頁。

③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文物出版社，1990，360 頁。

④ 羅福頤：《漢印文字徵》，文物出版社，1978，第六、第十二。

這些印章不像是專用於同父輩交際或是“以父禮事”的場合，大概只是普通的私人印章。在下文中，侈說自己“客處空貧”，“財自空乏”，可知他客居在外，處境貧窮，應是一個無官職的人，或因此而自稱“客賤子”。

“頓首再拜”：“頓首”，九拜之一。《周禮·春官宗伯·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賈公彥疏：“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是為空首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頓首者，為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一曰稽首，其稽，稽留之字。頭至地多時，則為稽首也。”^①可知“頓首”輕於“稽首”而重於“空首”。在漢代書信中，用作敬辭的“稽首”，僅見於給君王的上書。而在給君王以外的對象寫信時，往往以“頓首”、“叩頭”等為敬辭。“再拜”，拜兩次。

“督郵侍前”：“督郵”，官名，秩百石。為郡府掾吏，掌監屬縣，宣達教令。《漢官儀》曰：“督郵、功曹，郡之極位。”^②每郡有二至五部督郵，其權頗重。“侍前”，提稱語。《漢書》卷一《高帝紀》注引應劭曰：“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今稱殿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作信人將提稱語綴於受信人稱謂之下，可起到提高該稱謂的作用，以示尊敬和自謙。與“侍前”類似的提稱語還有“侍者”，二者皆屢見於漢晉書信。例如：

□堂再拜白

陳主簿侍前（下略）

東牌樓簡三四，正面

□□惶恐言

陳掾侍前（下略）

東牌樓簡三八，正面

□頓首白督郵侍者（下略）

東牌樓簡一四

十月四日具書，焉者玄頓首言

王督郵彥時、司馬君彥祖侍者（下略）

樓蘭文書 L.A. I .iv.2—沙紙 930^③

①《周禮注疏》卷二五，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810頁。

②[漢]應劭：《漢官儀》卷上，孫星衍校集《漢官六種》，四庫備要本。

③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88、90、78頁。侯燦、楊代欣：《樓蘭漢文簡紙文書集成》，天地出版社，1999，63頁。

這裏的“主簿”、“掾”、“督郵”皆地方官府屬吏，身份地位相近，提稱語亦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侈與督郵書》中，作信人侈將受信人稱謂及其提稱語“督郵侍前”提行另寫，使用了平闕之式中的“平出”，這也是對受信人表示尊敬。平闕之式或始于秦代。秦陽陵兵符曰：

甲兵之符，右才[在]

皇帝，左才[在]陽陵^①

王國維《秦陽陵虎符跋》：“行文平闕之式，古金文中無有也。惟琅邪台殘石，則遇‘始皇帝’、‘成功盛德’及‘制曰可’等字，皆頂格書，此為平闕之始。此符左右各十二字，分為二行，‘皇帝’二字適在第二行首，可知平闕之制自秦以來然矣。”^②不過，在當時平民的私人書信中，平闕之式的使用或尚不普遍。例如，湖北雲夢睡虎地四號秦墓曾出兩件木牘家書（M4：11 和 M4：6），均未見此式：^③

M4：11 正面：

[第一行]二月辛巳，黑夫、驚敢再拜問中：毋毋恙也？黑夫、驚毋恙也。前日黑夫與驚別，今復會矣。

[第二行]黑夫寄益就書曰：遺黑夫錢，毋操夏衣來。今書節到，毋視安陸絲布賤，可以為禪

[第三行]裙襦者，毋必為之，令與錢偕來。其絲布貴，徒操錢來，黑夫自以布此。

（以下二行及背面六行略）

M4：6 正面：

[第一行]驚敢大心問衷：毋得毋恙也？家室外內同□

[第二行]以衷毋力毋恙也？與從軍，與黑夫居，皆毋恙也。□

（以下四行及背面五行略）

在這兩件木牘中，受信人“中”、“衷”（“中”應即“衷”）均出現於正面第 1 行，無提稱語，亦未提行平出。而在漢代的私人書信中，用平闕之式將受信人稱謂及其提稱語提行平出已很常見。例如：

曹宣伏地叩頭白記

① 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秦陽陵兵符，見孫慰祖、徐谷富《秦漢金文彙編》（上編），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2 頁。

②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一八《秦陽陵虎符跋》，中華書局，1959，906 頁。

③ 湖北孝感地區第二期亦工亦農文物考古訓練班：《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座秦墓發掘簡報》，其附錄及圖版，《文物》1976 年第 9 期；湖北省博物館：《書寫歷史——戰國秦漢簡牘》，文物出版社，2007，75 頁。

董房馮孝卿坐前：萬年毋恙。頃者不相見。（下略）

居延漢簡 502.14A, 505.38A, 505.43A

忠頃伏地再拜請

尊長定足下：善毋恙。（下略）

居延新簡 E.P.T56:347A

貴且伏地再拜請

孺子孟馬足下：貴且賴厚德，到東郡，幸無恙。（下略）

安徽天長西漢墓簡牘 M19: 40—10A^①

在受信人稱謂及其提稱語之下，《侈與督郵書》的正文開始。“別鬲（亭）易邁，忽尔今埶磨年朔，不復相見”：“亭”，指亭傳，道路上的站點。《風俗通》：“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語有亭留、亭待，蓋行旅宿食之所館也。”^②漢人常以亭為送行分別之處。《後漢書》卷三九《趙咨傳》：“髡送至亭次，望塵不及。”“邁”，行，離去。《文選》嵇康《贈秀才入軍五首》之二：“輕車迅邁。”劉良注：“邁，行也。”^③“忽”，疾速。《左傳·莊公十一年》：“其亡也忽焉。”杜預注：“忽，速貌。”^④“尔”犹“然”。《東牌樓》“尔”作“爾”，將“忽尔”屬上句，作“別亭易邁忽爾”，疑未妥。“今”，《東牌樓》釋作“令”，非是。漢簡中“今”、“令”二字形近而易混，但此處的“今”作“令”，同東牌樓簡中多處“今”字的寫法一致，如簡五第三行的第五字、第七行的倒數第四字、簡一二第二行的第六字等。“埶”，《東牌樓》作“縲”，非是。^⑤按傳本《急就章》中，草字的“土”右下有“丶”，作“土”。《隸釋》及西北漢簡中，作部首的“土”亦往往如此寫。^⑥該字左為“𡗗”，應即“土”，右為“由”，故釋作“埶”。“埶”，讀為“軸”。《後漢書》卷十七《馮異傳》：“俱據機軸。”李賢注：“軸，車軸也。”“軸磨年朔”，形容經歷歲月如車輪碾磨。或說“鬲”當釋作“鬲”。東漢《祀三公山碑》有“鬲”字，與之相似，即“鬲”字。^⑦“鬲”通“隔”。《漢書》卷二七《五行志》：“鬲閉

①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600頁；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331頁；天長市文物管理所、天長市博物館：《安徽天長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11期。

② 《太平御覽》卷一九四《居處部》“亭”條引，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937頁。

③ [梁]蕭統編選、[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二四，428頁。

④ 《春秋左傳正義》卷九，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1770頁。

⑤ 查看照片圖版，該字同背面第一行“推昔分別縲磨”的“縲”字差別甚大。筆者曾向王素先生詢問，知釋文有排版之誤。並承賜教：該字當作“埶”，讀為“軸”。

⑥ 參陸錫興《漢代簡牘草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251、255頁；陳建貢、徐敏：《簡牘帛書字典》，上海書畫出版社，1991，174、180—183頁。

⑦ 參趙超《石刻古文字》，文物出版社，2006，16頁。在其它碑刻文字中，“隔”字的右旁亦多有與之形似者。秦公：《碑別字新編》，文物出版社，1985，272頁。

門戶。”顏師古注：“鬲與隔同。”“別隔”，分離，間隔。《三國志》卷五四《吳書·周瑜》注引《江表傳》：“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以上幾句敘別情。

“勤領衆職，起居官舍，遵（尊）貴皆遂，安善僦（歡）懽（喜），幸甚[幸甚]。”“遵”，通“尊”。“遂”，申達，遂意。《國語·晉語八》：“是遂威而遠權也。”韋昭注：“遂，申也。”^①《東牌樓》將此字釋作“迷”，非是。按該字的右上部爲二點、二橫、一撇，與馬王堆簡、居延簡中不少“遂”字的右上部的寫法相似。^②“安善”，平安佳善。此爲漢晉書信中常用語。如居延新簡 E. P. T54:31A：“□安善，闊別別□。”^③王羲之《八日帖》：“羲之頓首：多日不知君問，得一昨書，知君安善爲慰。”又《快雪時晴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④“僦”通“歡”。“懽”通“喜”。“幸甚[幸甚]”，原作“幸、甚、”，“、”在這裏是重文號。此亦書信中常用語。如居延漢簡 34·22：“充伏地再拜中卿足下：辱幸賜記教以屬，幸甚幸甚。”《敦煌漢簡釋文》1862：“□伏地再請中公足下：幸爲可取奉，願中公如予官計，可幸甚幸甚。”^⑤以上幾句爲問候和祝福，此下敘事。

“推（惟）昔分別縲（累）磨，不數承直（直），區[區]之念，欲相從談”：“推”，疑當讀爲“惟”。^⑥惟，思，念。《說文解字·心部》：“惟，凡思也。”又作語首助詞。“縲”通“累”，累積，多。《荀子·正名》：“其累百年之欲。”楊倞注：“累，積也。”^⑦“累磨”，多磨。“數”，頻數。《韓詩外傳》：“夏不數浴，非愛水也；冬不頻煬，非愛火也。”^⑧“承”，奉。“直”，《東牌樓》未釋出，疑此字當釋爲“直”^⑨，當值。蔡質《漢官典職儀式選用》：“尚書郎入直臺中。”^⑩“不數承直”，不能經常事奉。“區[區]”，小貌，可用爲自稱的謙辭。原作“區=”，“=”爲重文號。《後漢書》卷三十《郎顗傳》：“此誠臣顗區區之願。”

“諗（嘆）客處空貧，無緣自前，言之有慙”：“諗”，《東牌樓》釋爲“讀（？）”，並將該字屬上句，作“欲相從談讀（？）”。疑非是。查看照片圖版，該字左爲言旁，右爲“𠂔”，

① 徐元誥撰：《國語集解》《晉語八》，中華書局，2002，420頁。

② 參陳建貢、徐敏《簡牘帛書字典》，816頁。

③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303頁。

④ 《淳化閣帖》，《法帖第八·王羲之書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360—361頁；《晉王羲之尺牘》，上海書畫出版社，2001。

⑤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55頁；吳初驤、李永良、馬建華：《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196頁。

⑥ 這是羅新先生在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舉辦的“東牌樓漢簡研讀班”上提出的意見，可從。

⑦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一六，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1986，286頁。

⑧ [漢]韓嬰撰、許維遹校釋：《韓詩外傳》卷三第二十章，中華書局，1980，103頁。

⑨ 王素先生說：他在整理此木牘時也曾懷疑“直”是“直”，但由於“直”的俗別字未見此形，先秦漢魏史籍亦未見“承直”一詞，故以照描處理。後發現後世不僅有“承直”一詞，還有“承直”一官（例見《隋書·百官下》長秋監條、《舊唐書·職官二》尚書省兵部駕部郎中條），但書已開印，無法修改了。

⑩ [漢]蔡質：《漢官典職儀式選用》，孫星衍校集《漢官六種》，四部備要本。

疑爲“謨”字之訛寫。言旁可與口旁互換，故“謨”或即“嘆”。“之”，《東牌樓》作“𠂔”，非是。照片圖版顯示，此字與前文“區[區]之念”的“之”字寫法幾乎完全相同，故當釋作“之”。“慙”，即“慚”。

“財自空𠂔（乏），將命冀見，乃得乙（一）[一]”：“𠂔”，《東牌樓》釋作“祀”，非是。查看照片圖版，此字的左邊爲“𠂔”，右邊與居延簡中草體的“乏”字寫法相同，例見居延漢簡 33·22。^①疑“𠂔”爲“乏”之異體。“空乏”，空虛窮乏。《三國志》卷六五《吳書·華覈》：“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將命”，奉命，領命。《三國志》卷四五《蜀書·宗預》：“預將命使吳。”“冀”，希冀，希望。“乙”，同“一”。“乙=”即“乙乙”，同“一一”，逐一敘述，書信常用語。王羲之《諸賢帖》：“諸問想足下別具，不復乙乙。”“乙乙”，《右軍書記》中該帖作“一一”。^②《東牌樓》將此字釋作“公”，認爲“公”係“忝”之省寫，“忝”係“忽”之俗別，則“公=”即“忽忽”，又可作“匆匆”。此或可備一說。^③

“賤子習逸公惶恐頓首”：“公”，《東牌樓》釋作“么”，認爲“‘么’通‘麼’，‘逸麼’，閒適貌”，並在該字之下添加了句號。疑非是。查看照片圖版，此字除左右兩邊各有一“、”外，在中間的豎折旁亦有一“、”，漢簡中草體的“公”有如此寫者。例見居延簡 146·3、江蘇儀征浦胥 101 號漢墓所出“先令券書”等。^④故此字應釋作“公”。此外，將“習逸公”釋作“習逸麼”也似乎與全文文意不合。“習逸麼”，即“習慣於悠閒自得”，而侈在信中屢述其貧窮困窘，且“有慙”、“惶恐”，故不大可能說自己“習逸麼”。“習”應當是侈的姓，而“逸公”是他的字。漢代人常以“某公”爲字，例如杜延年字幼公，劉玄字聖公，袁安字邵公等。^⑤名與字往往在含義上有所關聯。“侈”，多，奢；“逸”，縱，超逸，二者皆有超逾尋常的含意。而作為姓、字的“習逸公”恰在“賤子”之後、“惶恐頓首”之前，從文法看，亦較順暢。

還應指出，按漢代的書信格式，作信人常在信的起首和結尾具名（或姓名）。也可以如《侈與督郵書》這樣，在信的起首具名，結尾具姓、字。如《漢書·匡衡傳》張晏注：“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

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甲乙編》上册，中華書局，1980，甲圖版 30，著錄號 235。並參陸錫興《漢代簡牘草字編》，323 頁。

② [晉]王羲之：《諸賢帖》，《淳化閣帖》法帖六，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270 頁；《右軍書記》，張彥遠《法帖要錄》卷一〇，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319 頁。查看《諸賢帖》，據其字形，釋作“乙乙”更爲確當。

③ 此字與下句中“賤子習逸公”的“公”字相比，差別較大。“匆匆”亦書信常用語。王羲之帖：“下官至匆匆，自力白。”（《法書要錄》卷一〇《右軍書記》，395—396 頁）王獻之帖：“弟甚頓，匆匆不具。”（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七《唐摹晉人帖·晉中書令憲侯獻之書》，《四庫全書·子部·書畫之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影印文淵閣本，813 冊，651 頁）

④ 參陸錫興《漢代簡牘草字編》，16 頁；陳建貢、徐敏：《簡牘帛書字典》，77 頁。

⑤ 見《漢書》卷六〇《杜周傳附杜延年》，《後漢書》卷一一《劉玄傳》，《後漢書》卷四五《袁安傳》。

鼎白’，知是字也。”^①又如居延漢簡《受與子麗書》：

A 面：

[第一行]受叩頭言

[第二行]子麗足下：□白過客五人□不□叩頭叩頭，謹因言：子麗幸許為賣材，至今未得蒙

[第三行]恩。受幸叩頭，材賈三百，唯子麗□□決賣之。今霍回又遷去，唯子麗□□□

B 面：

[第一行]必為急賣之。子麗校□□□□，必賜明教，叩頭幸甚幸甚。謹□□□

[第二行]奉錢，再拜子麗足下。錢當□節□。

張君長

居延漢簡 142.28A、B^②

這是一枚木牘。A 面的第一行，作信人在信的起首具名“受”；B 面的第二行，作信人在信的結尾具姓、字“張君長”。此格式在漢代名謁中更為常見，如“師饒名謁”：

A 面：

[第一行]進長安令

[第二行]兒 君

B 面：

[第一行]東海太守功曹史饒謹請吏奉謁再拜

[第二行]請

[第三行]威卿足下

師君兄

這件名謁出自江蘇連雲港尹灣六號西漢墓。A 面所書“長安令兒君”是進謁的對象。B 面起首所書“東海太守功曹史饒”是進謁者，其名“饒”，結尾所書“師君兄”是其姓、字。^③又如“西郭寶名謁”：

[第一行]東海太守寶再拜

[第二行]謁

[第三行]

西郭子筆

① 《漢書》卷八一《匡衡傳》，中華書局標點本，3331 頁。

② 該木牘的照片圖版，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上册，甲圖版 66，簡 796A、796B。釋文見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235—236 頁。

③ 此人即該墓墓主。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165 頁。圖版見 34 頁，釋文見 137 頁。

這件名謁出自連雲港陶灣黃石崖西漢墓。起首所書“東海大（太）守寶”是進謁者，其名寶。該墓中同出一枚銅印，印文作“西郭寶”，知此人為墓主，復姓西郭^①，名謁結尾所書“西郭子筆”是其姓、字^②。

“惶恐”，漢代文書常用語，見於寫給上級官府或尊長的文書。《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乙瑛碑）》：“（魯相）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③《敦煌漢簡釋文》2232：“時三日行部盡，佐□□惶恐叩頭死罪，敢言之。”^④“惶恐頓首”，此係作信人在該信中第二次“頓首”。這種在信的起首和結尾處具名（或姓名、姓字），並使用同樣的（或相似的）敬辭的格式，既可以示敬，又標出了正文的起訖，漢代書信中頗為常見。如居延新簡《葉宋乃始張佰丈與子翹子玉書》：

A 面：

[第一行]葉宋乃始張佰丈叩頭言

[第二行]子翹、子玉足下：善毋恙。間者久不相見，良苦迫塞上，甚邑邑。毋

[第三行]□已年時去□里□□□□□□□□子翹、子玉□□乃始□

B 面：

[第一行]……□□甚毋恙，皆叩頭請子翹、子玉，

[第二行]幸甚。願善視官吏，毋敢□出□不容愚。謹因甲渠官令史王卿致

[第三行]白□宛巍子翹、巍子玉坐前。葉宋乃始張佰丈記，叩頭。

（居延新簡 E.P.T50:42A、B）^⑤

該信書於木牘，起首和結尾的敬辭都是“叩頭”。又如帛書《信與次君君平書》、《初與丈人書》：

（前略）

[第四行]信伏地再拜多問

[第五行]次君君平足下：厚遺信，非自二，信幸甚。寒時，信願次君君平近衣，強酒食，察事，毋自易，信幸甚。薄禮

① 連雲港市博物館：《連雲港市陶灣黃石崖西漢西郭寶墓》，《東南文化》第三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20 頁、237 頁圖版 2。

② 在私人書信之結尾具姓、字（或具字），後代亦有此例。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三《自稱字》：“《東觀餘論》言：‘古人或有自稱字者。王右軍《敬謝帖》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云“范陽盧子先叩首”，柳少師《與弟帖》云“誠懸呈”。’唐權德輿《答楊湖南書》稱‘載之再拜’，柳冕《答鄭衢州書》稱‘敬叔頓首’，白居易《與元九書》稱‘樂天再拜’。”筆者按：以上《日知錄》所引作信人“自稱字”的例子，當見於書信之結尾。

③ [宋]洪适：《隸釋·隸續》卷一，中華書局，1986，18 頁。

④ 吳初驤、李永良、馬建華：《敦煌漢簡釋文》，242 頁。

⑤ 甘肅省文物考古所等：《居延新簡》，中華書局，1994，釋文 66 頁，圖版 132 頁。

[第六行]□絮一，信再拜進君平。來者數寄書，使信奉聞次君君平毋恙，信幸甚。

伏地再拜再拜

[第七行]次君君平足下。

●初叩頭多問

[第八行]丈人：寒時，初叩頭，願丈人近衣，強奉酒食，初叩頭，幸甚[幸]甚。初

寄□贛絺布二兩□□者。丈人數寄書，

[第九行]使初聞丈人毋恙。初叩頭，幸甚幸甚。丈人遺初手衣已到。

(居延漢簡乙附 51) ①

兩信寫在同一片帛上。從第四行至第七行，是《信與次君君平書》；從第七行“●”之後至第九行末，是《初與丈人書》。前者起首的敬辭是“伏地再拜”，結尾的敬辭是“幸甚，伏地再拜再拜”。後者起首的敬辭是“叩頭”，結尾的敬辭是“叩頭，幸甚幸甚”，其末句“丈人遺初手衣已到”或係補寫。

通覽《侈與督郵書》全文，可知作信人侈是某位督郵的舊相識，二人分別已久。督郵要侈前去會面，侈於是寫信給督郵，在敘舊和表示恭維之後，說自己願意前往，但客居在外，空乏貧窮，無法成行，感到羞慚惶恐。文中似乎隱含了希求資助的意思，語氣委婉而謙卑。從內容看，該信出自故舊同官員的私人來往，文中亦未見“敢言之”、“死罪”等公文用語，當是一件“私書”。

一件書信的格式，是作信人與受信人在該信中尊卑次序的體現。不同的格式，代表了不同的示敬級別。在敦煌吐魯番文書(P. 3442)杜友晉撰《吉凶書儀》中，有“四海吉書儀五首”，將書儀分為極尊、稍尊、平懷、稍卑、極卑五等。②司馬光在《書儀》中記載了“私書”之“上書”的格式：

上書：月日，具位，某頓首再拜上書某位執事。[注：此上尊官之儀也。稍尊云閣下，平交則云致書某位足下。]不宣，某頓首再拜某位執事……。[注：裴文有《四海吉書》分五等，以父之友、疏屬尊親、受業師為極尊，年紀高於己、或職掌稍高及姊夫、妻兄之屬為稍尊，齒爵相敵者為平懷，年小於己、官卑於己及妻弟、妹夫為稍卑，先曾服事及弟子之類為極卑。]③

又，喪儀中“降等書”之“復書”的格式：

某惶恐啓：伏承某人孝享祖考，欲廣其福，辱及賤子。過蒙恩私，不勝感戴之至。

① 該帛書的照片圖版，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上册，乙圖版 292；釋文見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677 頁。

② 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180—182 頁。

③ [宋]司馬光：《書儀》卷一，《四庫全書·經部·禮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影印文淵閣本，142 冊，462 頁。

某惶恐再拜某人執事。^①

是宋人寫信自稱“賤子”爲“降等”，表示其身份卑於受信人，不是平交。

漢代的書信格式也有等級。在《侈與督郵書》中，作信人侈自稱“客賤子”、“賤子”，對受信人稱其官名“督郵”而不稱其姓、字，提稱語爲“侍前”而非“足下”，敬辭用“惶恐頓首”等，都是將受信人放在尊位，表示自己與受信人不是平交。從此信的內容、格式以及侈之自稱“客賤子”來看，他或有可能做過該督郵的賓客。將《侈與督郵書》與本文所引述的另外幾件漢代書信《受與子麗書》、《葉宋乃始張佰丈與子翹子玉書》、《信與次君君平書》、《初與丈人書》等互作對照，可見其格式各有差異。這另外幾件書信的示敬程度，皆不及《侈與督郵書》。

2007年3月，筆者在湖南省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訪問時，蒙所方惠允，得親見《侈與督郵書》木牘實物。知其材質爲杉木，脫水後呈淺褐色，重12克。木牘表面平整，長24.6、寬3.9-4.0、厚0.2-0.3釐米。它的長度約相當於漢尺1尺（1漢尺約合23.1釐米），寬度接近同出的“兩行”簡，大致爲一般木簡（札）的三倍。^②該尺寸頗具代表性。在東牌樓漢簡中，寫在與之大小相仿的木牘上的書信很多，均用正背兩面。^③在其它地點出土的木牘書信的情況亦與此略同。如前引睡虎地秦簡家書M4: 11，長23.1、寬3.4、厚0.3釐米，尺寸接近《侈與督郵書》，亦兩面書寫。^④又出土於居延地區的《受與子麗書》和《葉宋乃始張佰丈與子翹子玉書》，前者長22.6、寬1.9釐米，後者長22.6、寬2.8釐米（左邊略有缺損）。這兩件木牘的長度均接近漢尺1尺，寬度則大於一般木簡（札），亦兩面書寫。^⑤它們與《侈與督郵書》的尺寸的差異，恐與地域、用材有關。上述這些木牘書信，從其形制和文字內容看，應當就是所謂“尺牘”。《漢書》卷九二《游俠傳·陳遵》：“（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此處的“尺牘”指書信，“主”指受信人。《顏氏家訓》卷七《雜藝》曰：“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⑥是以“尺牘書疏”作爲書信的代稱。

附帶還應提到，《侈與督郵書》雖首尾俱全，但作爲一件書信，它還缺少若干重要的相

① [宋]司馬光：《書儀》卷一〇，《四庫全書·經部·禮類》，142冊，526頁。

② 在東牌樓漢簡裏，簡一二應屬“兩行”，其形制規整，長23.9、寬3.2釐米，有兩行墨書，爲上行公文。東牌樓漢簡中條狀的木簡（札）數量很少，多已殘斷，其中簡一二七、簡一三〇的寬度爲1.3釐米，簡128的寬度爲1.1—1.2釐米。

③ 如東牌樓漢簡之簡一五、簡一六、簡二九、簡三二、簡三三、簡三六、簡四七、簡四八、簡五〇、簡五一、簡五五等。

④ 湖北孝感地區第二期亦工亦農文物考古訓練班：《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座秦墓發掘簡報》及圖版，《文物》1976年第9期。

⑤ 這兩件木牘的長度與寬度係依據圖版測得，未知其厚度。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上册，甲圖版66；甘肅省文物考古所等：《居延新簡》，132頁（圖版）。

⑥ [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卷七《雜藝第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07頁。

關信息，如作信日期，受信人的姓或地址，對寄交方式的說明等。故在此木牘之外，該書信還應伴有記載了相關信息的包裝之物，如封檢之類。書信的包裝不僅可以記載相關信息，且有維護私密的作用。由于書信多需長途傳遞，所用木牘又往往是兩面書寫，若不加以封閉，其安全就得不到保障。但《侈與督郵書》的包裝之物今已不存。

在與《侈與督郵書》同出的簡牘中，有幾枚私人書信的封檢，例如：

府朱掾家書

東牌樓簡二五

張義從家書

徵印信

東牌樓簡二六

東牌樓簡二五長 9.4、寬 3.6 釐米，東牌樓簡二六長 8.8、寬 3.5 釐米，皆墨書題署。封泥槽在兩封檢的下段，各有三道用來固定繫繩的凹槽，其中央無方形印窠。^①這兩枚家書封檢都提供了作信、受信雙方的信息（“家”和“府朱掾”、“張義從”），簡二六並寫明“徵印信”，要求用印驗證。在樓蘭文書中，也有一些書信封檢，例如：

白叔然、敬幸

從事王、石二君前

在樓蘭

樓蘭文書 L.A. II.ii—孔木 117

因王督致

西域長史張君坐前

元言疏

樓蘭文書 L.A. VI.ii.0200—沙木 751^②

這兩枚封檢亦墨書題署。孔木 117 長 6.5、寬 2.8 釐米，封泥槽在其中腰，有兩道凹槽，其中央為方形印窠；沙木 751 長 8.4、寬 4.2 釐米，封泥槽亦在中腰，有三道凹槽而無方形印窠。兩封檢所屬書信都是寫給官員的，此與《侈與督郵書》類似。封檢上均寫明了受信人的所在地（“在樓蘭”、“西域長史”府）、官名（“從事”、“西域長史”）和姓（或姓、字）。

王國維認為，因封泥上已加蓋印章，故封檢便不必再題署作信人。^③其說有一定道理，上引東牌樓簡二五、二六和孔木 117 當可為證。但似乎不應一概而論。在作信人特別要表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21 頁（圖版），83 頁（釋文）。這兩枚封檢的長度與寬度係據圖版測得，未知其厚度。

② 侯燦、楊代欣：《樓蘭漢文簡紙文書集成》，第一冊，144 頁；第二冊，438 頁。這兩枚封檢的長度與寬度係據圖版測得，未知其厚度。孔木 117 釋文“敬幸”原作“敬奉”，今據圖版改。“叔然”、“敬幸”，當分別為王、石兩位從事的字。

③ 王國維認為：“蓋有印璽，自不煩更題寄書之人，但題所予之人與所予之物足矣。”王國維：《簡牘檢署攷》，《雲窗叢刻》，羅振玉輯，仿古香齋本於日本京都影印本。

示鄭重和恭敬的時候，也會署名。例如沙木 751，該封簡所屬書信是“因王督致西域長史張君坐前”的，作信人“元”就署了名。

值得注意的是，將上述這些封檢同普通尺牘相比，二者的寬度相仿（或略有出入），而長度差別較大，前者尚不及後者的一半。由此或可推知，作為書信的尺牘，大約應套有書衣，題署相關信息的封檢則覆在書衣之外，繩子經過封泥槽，將包裹好的尺牘捆扎起來，然後填泥封閉，可在泥上抑印。^①《說文解字·木部》釋“檢”曰：“書署也。”徐鍇繫傳：“書函之蓋也，玉（三）刻其上，繩緘之，然後填以金泥，題書而印之也。”^②《修與督郵書》的封檢或應類此。

① 關於漢代文書的包裝方法，可參看拙文《皂囊與漢簡所見皂緯書》，《文史》2004年第4輯。

② [南唐]徐鍇：《說文解字繫傳》，中華書局，1987，117頁。

東牌樓東漢簡牘斷簡綴合與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鄔文玲

內容提要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中簡 6 與簡 7、簡 39 與簡 40、簡 62 與簡 65、簡 64 與簡 68、簡 90 與簡 91 等五組斷簡可以綴合，本文對這幾組斷簡的圖版作了拼接復原，對原釋文作了校補，並嘗試對部分簡文進行考釋。

關鍵詞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 斷簡 綴合

2004 年 4 月至 6 月，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市中心的古井群進行了考古發掘，在編號為 J7 的古井中清理出一批東漢簡牘，共四二六枚，其中有字簡二〇六枚，無字簡二二〇枚。均為木質簡牘，材質大多為杉木。二〇六枚有字簡多殘損，完整者只有二十餘枚。^①這些簡牘雖係隨意丟棄，但均置於同一口古井之中，且出土層位清楚，從理論上講，如果其中有拋入古井之後才斷裂殘損的簡牘，或者本為一簡的斷裂殘片碰巧被一同拋入古井，則其各部殘片均應存於井中，只要這些殘片能找到，就有可能綴合復原。^②因此，我在翻檢這批簡牘的圖版過程中，對那些筆迹、木質紋理相同、簡文內容相關的斷簡，比較留意其裂痕形態和斷裂處的殘留筆畫，發現除了整理者已經指出的簡 6 和簡 7 屬於同一件之外，還有幾枚斷簡可以綴合，今試一並列舉如下，以就教。

① 《長沙東牌樓七號古井發掘報告》，載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

② 此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馬怡先生的教示，她時常提點、敦促我留意這批簡牘的綴合，認為一定會有收穫。讀簡班的各位先生亦鼓勵有加。遂有所得。

- 1 □頭死罪敢言之。
- 2 □子默盜取文書，亡。性[則]……[亭]長劉
- 3 □文棣雄弗力精人兵詣[覺]所□捕何人
- 4 □ [劉璠]、左萌與至廣樂亭止，性[在][治]□日舖
- 5 □□盜取性文書，簡二枚、錢二千、大刀一口。時長
- 6 □ [草][於][宮][南][苑]二□[中得]□□□□□□[付]

簡 6

- 1 □□□□□□□□□□……□
- 2 不得實問。性辭：隨府五官劉掾檐文書，[當]□
- 3 時於長蘭亭北五里下留飲水，何人從草[中]□
- 4 蘭亭長張姓，發民作亭顏，與進雄[袁]□□
- 5 劉掾從少胡久□[長]坂(?)驛卒番鍾隨踵□
- 6 一所昏寔疏紀長蘭山中，盡力游登，□□
- 7 無。素惶恐叩頭，死罪死罪敢言之。□
- 8 □知□□

簡 7

簡 6 和簡 7 可以綴合^①，整理者已經指出，兩簡內容相關，應為同一件。^②兩枚斷簡的木質和筆迹完全相同，出土層位亦相同，均位於古井第二層，且部分簡文內容銜接，比如，簡 6 第 3 行句末之“捕何人”正好與簡 7 第 2 行句首之“不得”銜接為“捕何人，不得”的句式；簡 6 第 4 行句末之“日舖”正好與簡 7 第 3 行句首之“時”銜接為時稱“日舖時”；簡 6 第 5 行句末之“長”正好與簡 7 第 4 行句首之“蘭亭”銜接為地名“長蘭亭”，這一地名恰好在簡 7 第 3 行中提到過。

可見，兩簡記述的乃同一事件。按照常理，至此我們可以推斷，簡 6 和簡 7 乃是由一簡碎裂而成，簡 6 為右下部，簡 7 為左上部，裂痕雖然清晰，但因中部有缺失，無法完全銜接。不過在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調出這兩枚斷簡實物進行拼合試驗的時候，卻出現了

① 這兩枚斷簡的綴合方案，是由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孫聞博、付娟在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主辦的“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研讀班”上提出來的，其根據是兩枚斷簡的部分簡文內容可以銜接，比如，簡 6 第 3 行與簡 7 第 2 行、簡 6 第 4 行與簡 7 第 3 行、簡 6 第 5 行與簡 7 第 4 行的簡文均可銜接。參見孫聞博、付娟《東牌樓漢簡〈素上言盜取文書案卷〉的綴合與考釋》，《四川文物》2007 年第 6 期。

②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74 頁。

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情形：兩枚斷簡的厚度不一樣，而且相去甚遠。測量表明，簡 6 的厚度達 0.9 釐米，而簡 7 的厚度僅為 0.5-0.6 釐米（後翻檢《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一書，發現整理者在發掘報告部分的“長沙東牌樓七號古井出土簡牘統計表”中已經注明簡 6 厚 0.9 釐米，簡 7 厚 0.6 釐米）。面對這一結果，在場的諸位先生以及我本人，第一反應是這兩枚斷簡不是一件東西，無法綴合。後通過仔細審視、比較兩簡實物，我發現比較厚的簡 6 的正面、背面、右側面以及底部均光滑平整，頂部呈不規則斷裂狀，左側面則呈相對規則的縱向劈裂痕跡。比較薄的簡 7 的正面光滑平整，左側面、頂部和底部均呈不規則斷裂狀，右側面呈相對規則的縱向劈裂痕跡，尤為重要的是，其背面亦呈比較規則的縱向劈裂痕跡，顯係被完整地揭剝去了約三分之一厚度的材質。這一發現解決了兩簡厚度不一樣的疑問。因此，可以判定兩簡仍然屬於同一件，綴合後的情形，如附圖 1-1 所示。通過仔細對照圖版，我們發現有幾處釋文值得商榷：

簡 6 第 3 行“弗力”疑當作“並力”。第 4 行“劉璠”當作“劉掾”，其字形與簡 7 第 2 行和第 5 行“劉掾”相同；“左萌”當作“在前”；“在治”當作“在後”。如此，則“[劉璠]、左萌與至廣樂亭止，桂[在][治]”當讀作“劉掾在前，與至廣樂亭止，桂在後”。第 5 行“□”似可補作“出”。第 6 行“宮”疑當作“亭”；“得”後似可補“桂”字。如此，則“[草][於][宮][南][苑]二□[中得]□□□□□□[付]”當讀作“[草][於][亭][南][苑]二□[中得桂]□□□□□□[付]”。

簡 7 第 2 行“不得實問，桂辭”當讀作“不得。實問，桂辭”。第 7 行“無”與“素”疑當連讀，不宜斷開。如此，則“無。素惶恐叩頭，死罪死罪敢言之”當讀作“無素。惶恐叩頭，死罪死罪敢言之”。

據此，校補後的釋文應該讀作：

1 □頭死罪敢言之。

2 □子默盜取文書，亡。桂[則]……[亭]長劉

3 □□□□□□□□□□……□文棣雄並力精人兵詣[覺]所□捕何人

4 不得。實問，桂辭：隨府五官劉掾檐文書，[當]□[劉掾]在前，與至廣樂亭止，桂在后，□日鋪

5 時於長蘭亭北五里下留飲水，何人從草[中]□[出]盜取桂文書，^①簡二枚、錢二千、大刀一口。時長

6 蘭亭長張姓，發民作亭顏，與進雄[裘]□□[草][於][亭][南][苑]二□[中得桂]□□

① 或以為“文書”二字當與下文連讀，作“文書簡二枚”，可備一說。參見孫聞博、付娟《東牌樓漢簡〈素上言盜取文書案卷〉的綴合與考釋》，《四川文物》2007 年第 6 期。

□□□□[付]

7 劉掾從少胡久□[長]坂(?)驛卒番鍾隨踵□

8 一所昏寔疏紀長蘭山中，盡力游登，□□

9 無素。惶恐叩頭，死罪死罪敢言之。□

10 □知□□

簡 6+簡 7

此乃一件上呈文書，當是向上司呈報關於追查桂文書被盜之案的經過和結果。第 1 行“□頭死罪敢言之”，上呈文書起始用語，雖然其上部殘斷，但按照“叩頭死罪”之文書用語，可以推知“頭”前所缺之字為“叩”，因此，“□頭死罪敢言之”可補作“□（叩）頭死罪敢言之”。按照上呈文書的格式，可以推知殘斷部分還應包括文書呈報的日期（年、月、日）以及呈文人的官職和姓名。

第 2 行“子默”，有兩說：一為人名，簡 50、70 有“子約”，簡 154 有“子起”；一為男子默，姓氏不明。“亡”，逃跑。“桂”，人名，姓氏不明。“亭長”，職官名，主搜捕盜賊。“劉”，姓氏。

第 3 行“文”，疑為人名，姓氏不明。“楳雄”，姓名，姓楳名雄，“楳”為“梅”之異體。“並力”，合力，共同。“精人兵”，疑即精人、精兵，指精銳的人手和精良的兵器。“詣”，到，往。“覺所”，事發地。“捕”，抓捕。“何人”，不知名姓的某人，指盜取文書的嫌疑人。“不得”，未抓獲。“實問”，核實驗問。“辭”，答詞，供詞。“隨”，跟隨、隨同。“府”，郡府。“五官劉掾”，即五官掾劉某，五官掾為職官名，劉為姓氏。“檐”同“擔”。“廣樂亭”，地名。

第 4 行“日舖時”，時稱，日即白晝，與夜相對；舖時，申時，即午後三時至五時。《淮南子·天文》：“（日）至於悲谷，是謂舖時。”《太平御覽》引作“晡時”。《史記·呂后紀》：“日舖時，遂擊產。”

第 5 行“長蘭亭”，地名。“筒”，盛器。

第 6 行“張姓”，有兩說：一為姓名，姓張名姓；二為姓張的人。“發”，徵發、調集。“作”，修治。“亭顏”，顏有門楣、匾額的意思。《新唐書·馬燧傳》：“勒石起義堂，帝榜其顏而寵之。”^①亭顏即亭之牌匾。《宋詩紀事》元絳《題鼓山元公亭》詩：“誰書吾姓揭亭顏，棟宇飛騰氣象完。”《江南通志·輿地志》：“吳縣西南十三里，有橫塘橋，上有亭顏，曰橫塘古渡。”^②不過，從文義來看，亭顏作“亭之牌匾”解，仍有可商之處，因為小小的牌匾，似乎不至於興師動眾“發民”而作，故此處的“亭顏”疑即“亭檐”，指

① 參見孫聞博、付娟《東牌樓漢簡〈素上言盜取文書案卷〉的綴合與考釋》，《四川文物》2007 年第 6 期。

② 此係故宮博物院王素先生的教示。

亭之檐頂。“進雄”，姓名，姓進名雄。

第7行“驛卒”，在郵驛供職的士卒。“番鍾”，姓名，姓番名鍾，“番”同“潘”。按照文例，“驛卒”之前的“[長]阪(?)”，當為郵驛名，如居延新簡 E. P. T49:28 有“武彊驛卒馮斗”，E. P. T49:29 有“萬年驛卒徐訟”^①等。

第8行“昏”，日暮。“寔”同“置”，放置。“疏紀”即疏記，文書種類。“長蘭山”，地名。

第9行“無素”，時人習用之辭。《後漢書》卷八四《列女傳·曹世叔妻》載班昭所著《女誡》之辭云：“吾性疏頑，教道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注云：“素，先也。”又《三國志》卷四七《吳書·吳主權》注引《魏略》曰：“權實在遠，不豫聞知，約敕無素，敢謝其罪。”“惶恐叩頭，死罪死罪敢言之”，上呈文書習用結語。漢代文書有在這一結語之前具名的例子，如簡五“何誠惶[誠]恐，叩頭死罪死罪敢言之”，同時也有不在這一結語之前具名的例子，如簡八“章□□□□無狀，惶恐叩頭，死罪死罪”。

根據殘留的簡文，我們可以大致復原桂文書被盜之案的詳情：桂所攜帶的文書在路途中不慎被人盜走，便立即向有司報告。接到報告後，有司立即著手追查，首先派人到文書失竊的地點搜捕盜竊者。但没有抓到嫌疑人，於是向桂詢問文書失竊的詳情。桂陳述了文書失竊的經過：桂跟隨劉姓府五官掾擔著文書趕路，劉掾走在前面，兩人要一起到廣樂亭。桂走在後面，日鋪時分，桂在長蘭亭北五里處歇息飲水，有人從草叢中出來盜走了他所擔的文書以及二枚簡、二千錢和一口大刀。當時長蘭亭的亭長張姓，正在徵發民人修治亭顏，其與進雄在亭南苑附近（可能在草叢中）意外發現了桂所丟失的部分物品，估計是盜竊者把他認為不值錢、且容易暴露目標的東西比如文書等物丟棄於此。於是驛卒番鍾等人跟蹤追擊，後在長蘭山中發現了嫌疑人，最終將其拿獲歸案。審問得知盜竊文書的人名叫默，他盜取文書之後即逃走，日暮時，把疏紀等文書棄置於長蘭山中，在繼續往山上奔逃時被抓獲。

二

1 □□□□□□□[勤]□……

2 □□[先]進侍前：勤勞暑熱

簡 39 正

1 □念區々昔往時為客，不

①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中華書局，1994。

2 □□以□□[給卒上芻徒無用相]

簡 39 背

1 諾白悉袁賤子鄧應再拜白 □□

2 [兼]□□[侍前]……

簡 40 正

1 ……

2 相益者可慙。前草次表書，不日

簡 40 背

簡 39 和簡 40 可以綴合，兩枚斷簡材質、紋理和筆迹完全相同，出土層位亦相同，均位於古井第二層，而且簡 40 上面“諾白”兩字的殘留筆畫和簡 39 上面殘留的半個“言”字及一豎劃“|”，正好合成完整的“諾白”兩字。可見，簡 39 和簡 40 乃是一簡縱裂而成，簡 39 為左半部，簡 40 為右半部，裂痕清晰，經過綴合，如附圖 2-1、2-2 所示，除“諾白”兩字之外，正面的“兼復前使者勤”等字和背面的“白□諾以貌身給卒士葛走無用相”等字亦可完整合成，綴合之後的釋文當讀作：

1 諾白 悉□。賤子鄧應再拜白 □□
兼復前侍者勤□

2 □□[先]進侍前：勤勞暑熱

簡 39 正+簡 40 正

1 □念區々昔往時為客，不

2 □白□諾以貌身給卒士葛走無用相

3 相益者可慙。前草次表書，不日

簡 39 背+簡 40 背

此為名叫諾的人給某人的書信殘篇。正面第 1 行“諾”，人名。“白”，告訴、陳說，書信起始用語。“諾白”之下的兩行小字，“悉□賤子鄧應再拜白 □□”和“兼復前侍者勤□”，當為補字，其與大字所書內容之間的關係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對大字所書內容的接續和補充；二是追加的補白，類似今天的附言。因字數不多，為節省書寫材料，使用小字附記於空白處。這很可能是時人的慣常做法，比如簡 34、簡 36、簡 38 都採用了同樣的書寫形式：

1 堂再拜[白] 餉食難得，人累□□□為命今日，且日々耗久，唯
不多云冀^①[見乃]□□。堂再拜。

2 陳主簿侍前：々日惹々，言不悉，不以身為憂念，□

簡 34 正

① “冀”原釋文作“葵”，今據圖版及文例改，簡 35 背面第 3 行有“將命冀見乃得公々”等語。

- 1 得宿留，又言前令□張□□□□[具]□□[呼]問令
 2 張錢所在義理一日令君[給](?)[乃]人□□[相]荅[教言]□
 3[任]非知□□人來也。□得大息□□曹家白□在內

簡 34 背

- 大恩□□□□□□□□□□□□□□馬駒
 1 月[廿]五日舉頓首言 駕意屬々
 2 掾□□侍前：煩務[朝]夕，起居寺舍，夫人自康，幸甚々々。善不忽
 3□□□□□□□□[自佔]□前[得]尔□[相]□□[仍]以[非同罪]，促資費

簡 36 正

- 1
 2 禮二百，鷄一雙，想達從。頃迷務繫念，未從黨照，不譏。今費送一千，到
 3 後念務勿怪也。後月十間，必遣送餘。相親恃怙，唯不中道，內小大委。
 4 屬各於曹取之，六月時領，並祇領付。來信步上，未得貢米粟不久
 5 將至。內異何易，[還]信具戒，念々不悉。舉頓首再拜。

簡 36 背^①

- 1 □□惶恐言 □陳掾□□相[念]無有□
 □□□□□錢[一萬]□
 2 陳掾侍前：久不相見，中心常有[感]。小人居

簡 38 正

- 1 前聞道言當與亭長……之不
 中部亭長……
 2 府□□□□□義無……□
 3 □□得小人……

簡 38 背

上述諸簡均有漫漶不清之處，以簡 38 尤甚，但大字所書起首語之下補寫的雙行小字還是比較明晰的。其中簡 34 正面起首云“堂再拜白”，其下補寫的小字結尾亦署“堂再拜”，雖然因部分文字漫漶，無法將書信的內容完全厘清，但至少可以判斷，其雙行小字當是對大字所書內容的接續，小字結尾處具名“堂再拜”，亦標誌著本書信的完結。簡 36 的情形略有不同，正面起首云“舉頓首言”，背面結尾處署“舉頓首再拜”，表明大字所書內容本身即為一封完整的書信，補寫的雙行小字很可能是追加的補白或者附言。

若果真如此，則其正確的讀法，當是先讀正面和背面大字所書內容，最後再讀小字所

①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研讀班”對此簡釋文作了校補：正面第 2 行“起居寺舍”原釋文作“□居□舍”。背面第 4 行“屬”後之“各”原釋文作“□”，“取”後之“之”原釋文作“三”。第 4、5 行“屬各於曹取之，六月時領，並祇領付。來信步上，未得貢米粟不久將至”原釋文作“屬□於曹取三六月時領並祇領付。來信步上未得。貢米粟不久將至”。

書內容。前述綴合之後的簡文當讀作“諾白□□[先]進侍前：勤勞暑熱（以上正面）□念區々昔往時爲客，不□白□諾以貌身給卒士葛走無用相，相益者可慙。前草次表書，不日（以上背面）悉□。賤子鄧應再拜白 □□兼復前侍者勤□（以上正面小字）”。

而根據圖版來看，雙行小字自“白”以下筆迹明顯不同，且大部分文字如“前侍者勤”等的筆畫隨意疊加到左右的文字之上，很難想象這是致信人所爲，它們很可能是與書信內容無關的習字，比如“侍”、“勤”等字顯係模仿左邊相同的字而寫就。如果這一推斷不誤，則本件書信自“諾白”起首，至“賤子鄧應再拜白”處即完結，是一封比較完整的書信。

“悉□。賤子鄧應再拜”：“悉□”屬上讀，前接背面第3行“前草次表書，不日”，全句當讀作“前草次表書，不日悉□”。“悉”後之“□”，原釋文作“袁”，疑非是，不可遽定，從文義來看，很可能是“就”字。“賤子”，謙辭。“鄧應”，姓字。按照漢人的書寫習慣，通常在書信開頭具名，在結尾亦具名或者姓字。比如前引書信簡36開頭說“舉頓首言”，結尾云“舉頓首再拜”，這是在書信開頭和結尾均具名的例子；又如簡35開頭說“客賤子侈頓首再拜”，結尾云“賤子習逸公^①惶恐頓首”，這是在書信開頭具名，結尾具姓字的例子。據此，“鄧應”與致信人“諾”當爲同一人，此人姓鄧，名諾，字應。“諾”與“應”可以互釋。^②雖然漢人取字多用雙字，但也有用單字之例，如朱雲字“遊”^③，蕭咸字“仲”^④，李曇字“雲”^⑤等。

正面第2行“先進”，尊稱。“侍前”，提稱敬語。如簡34“陳主簿侍前”，簡38“陳掾侍前”等。

背面第1行“客”，賓客、門客。第2行“白”、“諾”，整理者已指出，均爲後補之字。當是先前漏寫，察覺後補書。“貌”同“藐”，“貌身”，即“藐身”，謙辭。^⑥“卒士”之“士”，簡文寫作“土”，漢簡中“士”通常寫作“土”。“卒士”一詞，漢簡及文獻中均有例可尋，比如居延漢簡308·19，308·5：“■右五人施刑卒士”^⑦。《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東撫東土，以省卒士”。《漢書》卷六四下《賈捐之傳》“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

① “公”，原釋文作“么”，馬怡先生改釋作“公”，並指出“習”是致信人的姓氏，“逸公”是他的字，“侈”是他的名。參見氏著《讀東牌樓漢簡〈侈與都郵書〉——漢代書信格式與形制的研究》，本刊。

② 此係王素先生的教示。

③ 《漢書》卷六七《朱雲傳》。

④ 《漢書》卷七八《蕭望之傳》。

⑤ 《後漢書》卷五三《徐穉傳》。

⑥ 北京大學的羅新先生在讀簡班上指出，“身”前之字釋作“貌”，“貌身”即藐身。可從。

⑦ 關於“卒士”一詞，《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作“屯士”，《居延漢簡甲乙編》作“卒士”，根據圖版來看，當以“卒士”爲是。

萬萬餘，尚未能盡降”。

“芻走”，疑即“芻走”，可能為當時習用謙辭。

芻：按照《辭源》的解釋，除了有割草、喂牲口的草、用草料喂牲口、殺牲口時用的稿薦等義項之外，也可引申為食草的牲口，如牛馬羊等。《孟子·告子上》：“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宋朱熹《集注》：“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也指供祭祀用的犧牲。《禮記·月令》季冬之月：“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注：“芻豢，猶犧牲。”《大戴禮·曾子天圓》：“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

走：可用作自稱的謙詞。自謙為趨走之仆。《文選》漢司馬子長（遷）《報任少卿書》：“太史公牛馬走。”自謂掌牛馬之仆夫。又張平子（衡）《東京賦》：“走雖不敏，庶斯達矣。”《後漢書》卷三〇上《蘇竟傳》：“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竊自依依，末由自遠。”注云：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猶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走”之類也。

故“芻走”很可能跟“牛馬走”的含義和用法相同。文獻中雖未見“芻走”一詞，但有“芻蕘”、“芻言”、“芻議”、“芻狗”等用法，可資參證^①。比如，“芻蕘”一詞在文獻中即通常引申為草野之人，《漢書》卷五一《賈山傳》：“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也。大雅板之詩曰‘詢於芻蕘’。”

第3行“前草次表書，不日（悉口）”：“草次”，匆促之間。猶造次、倉卒。《儀禮·聘禮》“飧不致”漢鄭玄注：“草次饌飧具輕。”《春秋》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於清”，晉杜預注：“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②

三

1 適下意事々(?)教留內不出□閣主□

2 ……

簡 62 正

1 ……

2 □□[書事]受人見不事……

3 日以至也。當有告語不？又□[伍]□

簡 62 背

① 此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侯旭東先生的教示，諸詞之含義及用例可參《辭源》中的相關條目。又，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張小鋒先生指出，“芻走”或可徑同“趨走”，此乃漢代常用之詞，亦可備一說。

② 參見《辭源》“草次”條。

1 □不復無伴愁々故付□□

2 叩頭頓首々々。昨日忿々，不悉元[異]□

簡 65 正

1 □[聞人]□[曹家]各左右責[經用]□

2 □□□□□得止悔，能可得□

簡 65 背

簡 62 和簡 65 可以綴合。兩枚斷簡的木質、筆迹完全相同，裂痕亦清晰吻合，且出土層位相同，均位於古井第四層，只是簡 62 的正、背面需要顛倒過來，如果沿用原標注，則需將簡 62 的背面與簡 65 的正面綴合，將簡 62 的正面與簡 65 的背面綴合。如此，則兩枚斷簡正面的殘留筆畫可以合成完整的“叩頭頓首々々昨日忿々不悉元異”以及“□□書事受人見不事”等字，背面的殘留筆畫可以合成完整的“中間人及曹家各左右責經用”等字。可見，簡 62 和簡 65 乃是由一簡縱裂而成，簡 62 爲左半部，簡 65 爲右半部，裂痕清晰，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 3-1、3-2 所示，釋文當讀作：

1 □不復無伴愁々故付□□

2 叩頭頓首々々。昨日忿々不悉，元[異] □

3 □□書事受人見不事

4 日以至也。當有告語不？又□□□

簡 62 背+簡 65 正

1 適下意事々(?)教留內不出□閣主□

2 中間人及曹家各左右責經用□

3 □□不悉，[頃][欲]得止悔，能可得□

簡 62 正+簡 65 背

此爲書信殘簡，正面第 1 行“□不復無伴愁々故付□□”和第 3 行“□□書事受人見不事”當爲補字。“愁々”疑爲時人習語，又見於簡 68 “迫此身微不能是分愁々以仁”。第 2 行“忿々”，爲“匆々”之俗別。^①

背面第 2 行“中間人”，疑意同“中人”、“任者”。“責”，《說文解字》：“責，求也。”《說文解字句讀》：“責，謂索求負家償物也。”此處疑指償付、分擔。“經用”，費用。《漢書》卷二四《食貨志》：“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

《後漢書》卷一〇《皇后紀·和熹鄧皇后》：“舊太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後漢書》卷四三《朱暉列傳》：“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後漢書》卷四八《翟酺列傳》：“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後漢書》卷五一《陳龜列傳》：“省息經用，歲以億計。”

①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第 86 頁整理者注。

四

1 ……

2 書付松□及火興求[次](?)付慙々易悉令鬻

簡 64 正

[各曹]……

簡 64 背

1 酒可道乎？迫此身，微不能。是分了，愁々以仁。

2 賊曹當[推]取不？勉又言，明日當令言上□

簡 68 正

賊曹子任煩內，他復設是，當何□[耳]？

簡 68 背

簡 64 和簡 68 可以綴合，兩枚斷簡的木質、筆迹完全相同，且出土層位鄰近，簡 64 位於古井第四層，簡 68 位於第五層。兩枚斷簡背面的殘留筆畫正好可以合成完整的“賊曹子任煩內他復改異當何”等字。可見簡 64 和簡 68 乃是由一簡縱裂而成，簡 64 為左半部，簡 68 為右半部，裂痕清晰，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 4-1、4-2 所示，釋文當讀作：

1 酒可道乎？迫此身，微不能。是分了，愁々以仁。

2 賊曹當[推]取不？勉又言，明日當令言上□

3 書付松□及火興求[報]付慙々易悉令鬻

簡 68 正+簡 64 正

賊曹子任，煩內他復改異，當何□[耳]？

簡 68 背+簡 64 背

此為書信殘篇，不過因缺乏背景資料，具體含義殊難明瞭。正面第 1 行“迫此身”，“此”疑當作“水”，理由有二：一是從字形來看，它與簡 49 背面第 1 行“至此”，簡 55 正面第 2 行“在此”，背面第 1 行“此言”等之“此”字不同，而與簡 7 第 3 行“飲水”之“水”相似；二是上文提及“酒”，而酒與水密切相關。“身”疑當作“耳”，其字形與簡 34 正面第 2 行“不以身為憂念”，以及綴合的簡 39、40 背面“以貌身給卒士”等之“身”字不同，很可能是句末語氣詞“耳”。如此，則“迫此身”疑當作“迫水耳”，疑意指酒不過是類似於水的東西罷了。“愁々以仁”疑當讀作“愁々，以仁”。“愁々”一詞，亦見於簡 65 正面第 1 行“□不復無伴愁々故付□□”，這行文字殘缺較多，無法準確句讀，不過按照通常的讀法，“故”多用於句首，當屬下讀，如此，則“愁々”當與之斷開，可讀作“□不復無伴，愁々，故付□□”。第 3 行“慙々”，同“匆々”。

背面“賊曹子任，煩內他復改異，當何□[耳]？”，原釋文作“賊曹子任煩內，他復

設是，當何□[耳]？”。“賊曹”，郡、縣列曹之一，專掌逐捕盜賊。^①“子任”，疑爲人名。簡 50、簡 70 有“子約”，簡 154 有“子起”，可資參證。“設是”於文義難通，疑當作“改異”，簡 70 有“煩內他^②爲改異”之語，其含義當與本簡“煩內他復改異”相類，很可能是當時人的一種習用語。

五

1 □[曹掾李堅] □

2 左賊曹掾張顯 □

簡 90

1 □

2 □ 獄史[嫫]亭 凡九人

簡 91

簡 90 和簡 91 可以綴合。兩枚斷簡木質、筆迹完全相同，裂痕可以銜接，且出土層位相同，均位於古井第四層，可見它們乃是由一簡橫斷而成。簡 90 爲上段，簡 91 爲下段，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 5-1 所示，釋文應讀作：

1 □[曹掾李堅]

2 左賊曹掾張顯 獄史[嫫]亭 凡九人

簡 90+簡 91

此爲名簿殘篇，可能是某縣屬吏之名簿。第 1 行“掾”，屬官。漢制，中央至地方縣（含候官等）級以上官府皆設諸曹，分置掾、史，《漢舊儀》：“丞相……聽事閣曰黃閣，無鍾鈴，掾有事當見者，主簿至曹請。”又據《續漢書·百官志》，太尉府有“掾、史、屬二十四人”。郡設曹掾，如《漢書》卷八三《薛宣傳》：“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百官志》亦云：郡國開府，“皆置諸曹掾、史。本注曰：諸曹略如公府曹，無東西曹。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掾一人……”《隸釋》所載中平五年《巴郡太守張納碑》見“主記掾、錄事掾、上計掾、文學主事掾、文學掾、尉曹掾、金曹掾、漕曹掾、法曹掾、集曹掾、兵曹掾、比曹掾、待事掾、監市掾”等。^③“李堅”，姓名。

第 2 行“左賊曹”，與“右賊曹”相對，簡 103、108 等有“右賊曹”。“張顯”，姓名。“獄史”，縣吏，專掌刑獄。《漢書》卷五一《路溫舒傳》：“爲（縣）獄小吏，因學

①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第 102 頁整理者注。

② “他”，整理者作“代”，今據圖版改。

③ 參見饒宗頤、李均明《新莽簡輯證》，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153 頁。

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①嚴耕望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中指出，秦世縣有獄掾史，漢世有掾有史，於縣則稱獄掾史，於郡則稱決曹掾史，一般縣獄史秩祿不及百石。^②根據尹灣漢墓簡牘《東海郡吏員簿》的記錄來看，縣及侯國均設獄史一職，人數不一，有一人、二人、三人、四人及五人者，在東海郡三十六個縣及侯國中，有五個設獄史一人，二十四個設獄史二人，有四個設獄史三人，有二個設獄史四人，有一個設獄史五人。^③“凡九人”，總計九人。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3月25至28日，我有幸跟隨王素先生和馬怡先生赴長沙，得以親見不少簡牘實物。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諸位先生根據我們的要求從庫房調出了本文所涉及的十枚斷簡，允許我們用原簡實物進行拼合核驗。雖然這些簡牘已經做過脫水處理，但較好地保持了原始的形態，仍然能夠進行拼接。試驗表明本文所涉及的五組斷簡的原簡實物均能成功拼合。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拼合之後的簡文仍然有許多難解之處，本文所嘗試的部分解讀，不乏臆測之處，非爲定論，只是提出來供大家參照，希望有更深入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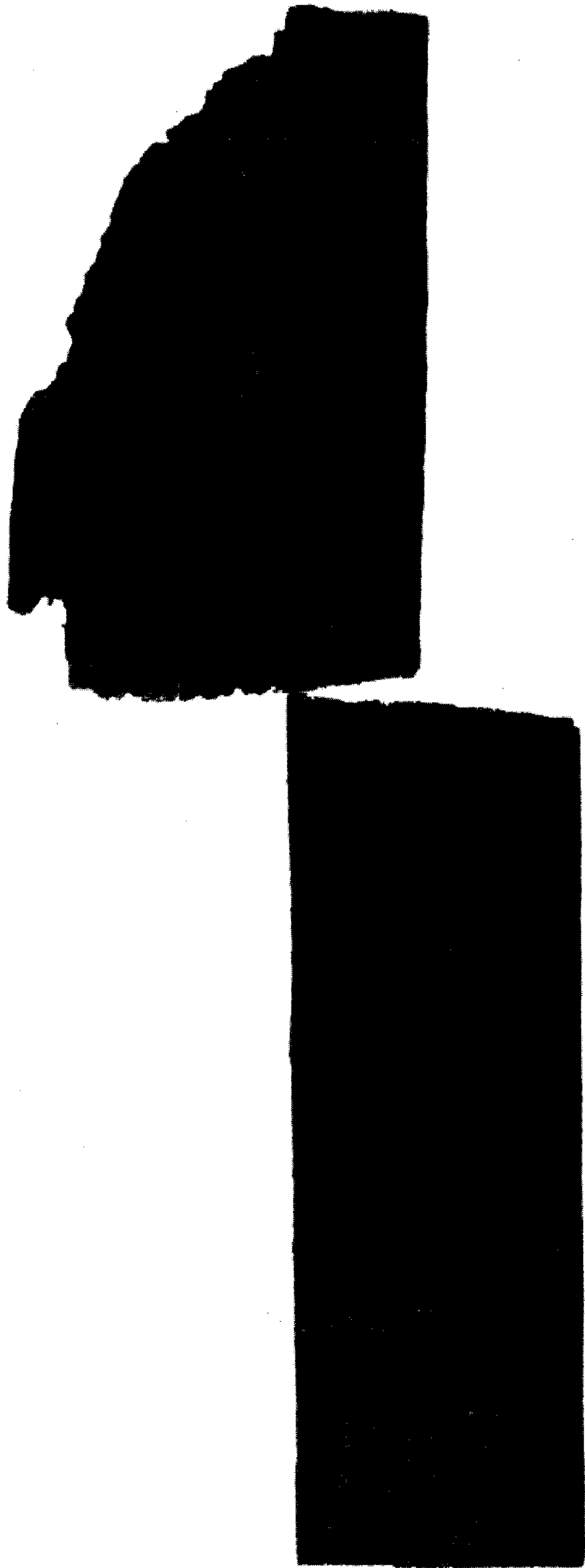
（附記：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曾蒙故宮博物院王素先生賜教；斷簡綴合的圖版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陳爽先生幫忙製作；部分簡文的校改意見係“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研讀班”成員提出，不一一注出，謹此一並致謝！

又本稿草成之後，蒙中村威也先生告知，日本埼玉大學初山明先生主持的“東牌樓東漢簡牘講讀會”諸成員也對東牌樓簡牘的斷簡進行了綴合，指出簡39與40、簡57與53、簡126與115、簡89與簡90及91可以綴合，部分意見與本文暗合。其中簡126與115的綴合本文未及，簡57與53的綴合我亦曾考慮過，後來請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蕭靜華、黎石生兩位先生再次調出實物核驗，證明簡126與115可以綴合，簡57與53則無法綴合。）

①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第110頁整理者注。

② 詳見嚴耕望《秦漢地方行政制度》第五章縣廷組織“獄掾史”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五》，233頁。

③ 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東海縣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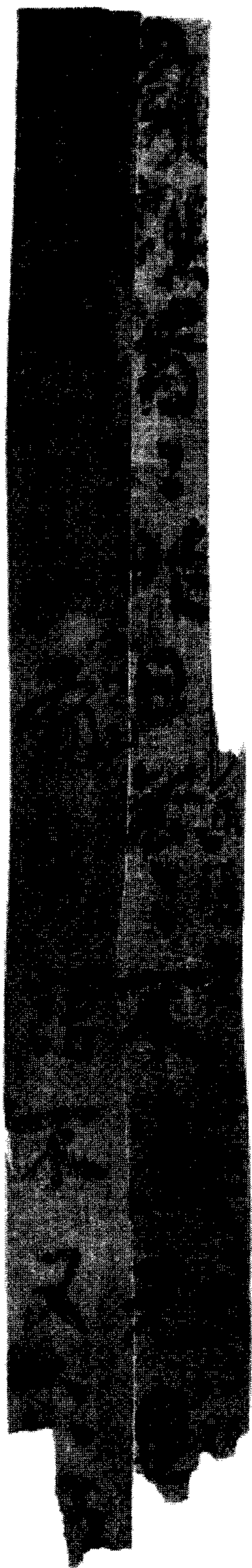
附圖 1-1：簡 6+簡 7，彩版 1070、1075，47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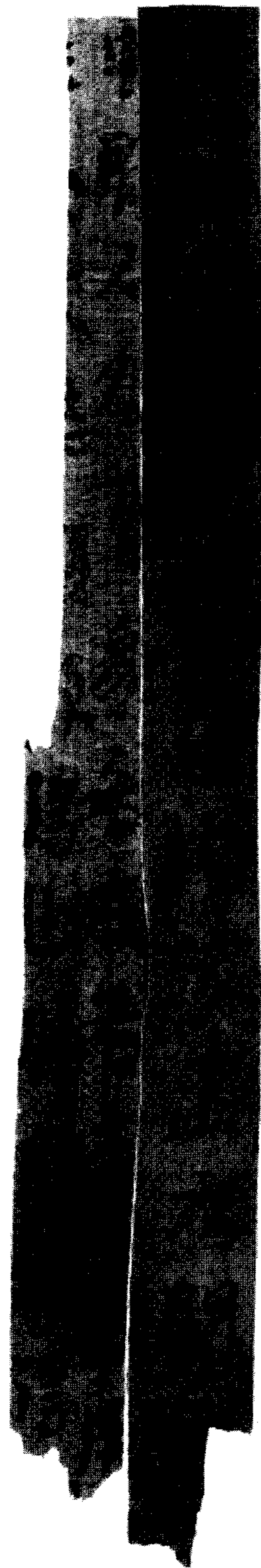
附圖 2-1：簡 39 正+簡 40 正，
彩版 1011、1025，38、40 頁



附圖 2-2：簡 39 背+簡 40 背，
彩版 1011、1025，38、40 頁



附圖 3-1：簡 62 背+簡 65 正，
彩版 1091、1126，49、52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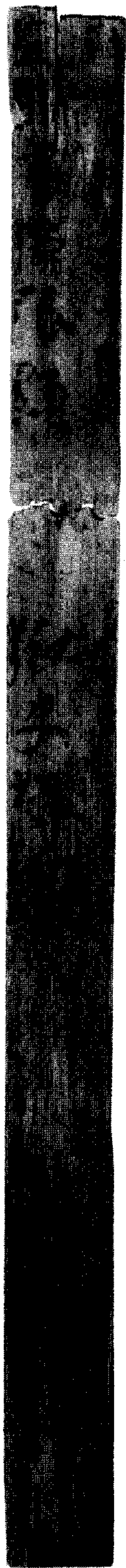
附圖 3-2：簡 62 正+簡 65 背，
彩版 1091、1126，49、52 頁



附圖 4-1：簡 68 正+簡 64 正，
彩版 1102、1152，50、62 頁



附圖 4-2：簡 68 背+簡 64 背，
彩版 1102、1152，50、62 頁



附圖 5-1：簡 90+簡 91，上下綴合

東牌樓人形木牘研究札記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莊小霞

內容提要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中被命名為《熹平元年（一七二年）覃超人形木牘》中的“覃超”，與東牌樓附近的走馬樓 J22 中出土的“主記史潭超省”竹簡中的“潭超”，應為同一人。東牌樓人形木牘應與當時社會的司命信仰有關。此外，走馬樓 J22 與東牌樓 J7 兩地出土的簡牘確實存在著相當密切的聯繫，故走馬樓 J22 中部分簡牘可能屬於東漢末年簡牘。

關鍵詞 人形木牘 走馬樓吳簡 司命 建安紀年

2004 年 4 月下旬至 6 月下旬，考古工作者在長沙市東牌樓建築工地第七號古井發掘出土一批東漢簡牘，這批簡牘整理為《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①，於 2006 年 4 月出版。其中編號 117 的木牘，整理者命名為《熹平元年（一七二年）覃超人形木牘》，釋文如下：

正面 1： 六月甲申朔廿二〔日〕乙卯【巳】，謹遣小史覃超

2：喜（熹）平元年

3： 詣在所，到，敢問前後所犯為無狀。家富（？）

背面 1：有如肥陽（羊）、玉角。所將隨從，飲食易得。人主傷心不易識。超到言

2：如律令。故事：有陳者，[為]教首，書者員慍、李阿。六月廿二日白。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

關於木牘中出現的人名“覃超”，黃人二先生在《長沙東牌樓東漢熹平元年覃超人形木牘試探》^①中認為：“‘覃超’之‘覃’，可能讀作‘譚’，東漢人常見之姓氏。”^②而筆者根據各種綫索，認為“覃超”應作“潭超”。

在東牌樓東漢簡牘發現之前，1996年東牌樓附近的走馬樓J22出土了十餘萬枚孫吳簡牘，此兩地相距甚近。筆者最初懷疑“覃超”應為“潭超”，是在《長沙走馬樓二十二號井發掘報告》中看到“主記史潭超省”竹簡（編號J22—2561）^③之後。於是筆者再對此件東牌樓人形木牘文字進行仔細辨認，發現其中的“覃”字左邊有墨迹隱約可見，而且如果考慮到字形結構的話，人形木牘中的“覃”字位置稍微偏右，令人懷疑是不是左邊還有偏旁。另外，如果做為姓氏的話，則左邊的偏旁最有可能就是言字旁或者三點水旁，即“潭”或者“譚”，但如果是言字旁的話，相比三點水旁，墨迹應該會更濃厚，所以左邊很有可能是三點水旁，即“潭”字。此外，在筆者所見長沙走馬樓簡牘《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荊》和《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④中，未見到“覃”或者“譚”姓，但是卻有“潭”姓：《嘉禾吏民田家荊》中有兩簡出現“潭”姓人名，分別為簡4125的“潭耀”和簡5680的“潭彈”。由此可知，長沙地區確實存在“潭”姓。所以此件人形木牘中出現“潭”姓也極有可能。綜合以上幾點，筆者故此大膽猜測人形木牘中的“覃超”應即為“潭超”，東牌樓簡中此件人形木牘的正確命名也應為《熹平元年（一七二年）潭超人形木牘》。

如果筆者以上的結論能夠成立的話，那麼這件長沙東牌樓J7出土的人形木牘與走馬樓J22出土的“主記史潭超省”木簡，都出現了“潭超”之人名，為兩件同人名簡牘，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這兩簡中的“潭超”是不是同一個人？同人名簡牘的研究對於判定簡牘中記錄的人物經歷、簡牘年代等都有重要意義。此前，在西北簡牘中發現了大量的同人名簡牘，一些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如日本學者森鹿三先生以人名為綫索整理居延漢簡，其在這方面的文章有《關嗇夫王光》、《令史弘に關する文書》^⑤，森鹿

① 黃人二：《長沙東牌樓東漢熹平元年覃超人形木牘試探》，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17。

② 黃人二：《長沙東牌樓東漢熹平元年覃超人形木牘試探》。

③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走馬樓二十二號井發掘報告》，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荊》，文物出版社，1999，圖版見第33頁，釋文見第34頁，另，書中釋文作“主記史譚超省”，實際應為“主記史潭超省”。

④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文物出版社，2003。

⑤ 《關嗇夫王光》，《東洋史研究》12卷3號，1953。《令史弘に關する文書》，《東洋史研究》14卷1、2號合刊，1955。均收入森鹿三：《東洋學研究——居延漢簡篇》，同朋舍，1975。其中《令史弘に關する文書》（《關於令史弘的文書》）由姜鎮慶譯，收入《簡牘研究譯叢》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三先生通過詳細類比，層層論證，從而復原了關嗇夫王光和令史弘兩人的活動。國內學者李振宏、孫英民所著的《居延漢簡人名編年》^①則彙集了大量同人名簡牘，並對大量同人名簡進行了判定，其中著者以“孫臨國”簡為例，舉出了四個判斷依據。^②筆者參考《居延漢簡人名編年》對同人名簡人物的判斷依據，對長沙東牌樓和走馬樓兩地出土的這兩枚同人名簡牘進行了判別^③：

(1) 就現在所能看到的近年長沙地區出土的簡牘，出現同名同姓的“潭超”簡僅此二枚，不排除即同一人的可能性。

(2) 出土人形木牘的東牌樓 J7 和出土“主記史潭超省”竹簡的走馬樓 J22 兩地相距非常近，“就相對位置而言，J7 北距走馬樓吳簡的 J22 為九五米”^④。

(3) 人形木牘中的潭超身份為“小史”，整理者解釋：“‘小史’，郡、縣門下屬吏之一。”^⑤黃人二先生對“小史”也有詳細考證，認為小史“地位極低下”^⑥。主記史在郡縣屬吏中的地位則非一般小吏可比，其位置在主簿之下，茲引用嚴耕望先生的考證如下：

主記室《續志》，郡國有“主記室史，主錄記書、催期會。”簡稱主記史，見《續與服志》、《倉頡廟碑陰》、《古文苑·桐柏廟碑》、《隸釋·熊君碑》；又簡稱記室史，見《袁宏傳》注引謝承《書》。而《張納碑》有主記掾，序次主簿。蓋通常有僅置史，有僅置掾者，有掾史並置者。其下有書佐，見《隸續》一九《鄭季宣碑陰》。^⑦

《後漢書》卷四五《張酺傳》記載太守張酺提拔小史王青成為屬吏中地位顯赫的功曹^⑧，當然這屬於特殊的超遷情況，但是由小史逐步做到主記史，也很有可能，因此潭超初為小史，之後做到主記史，符合情理。

(4) 因為長沙東牌樓 J7 出土的有字簡牘中出現了建寧、熹平、光和、中平四個年號，所以整理者將這批簡牘的時代大致定為東漢靈帝時期。^⑨人形木牘其正面書“熹平元年六月甲申朔廿二（日）乙卯【巳】”，所以該木牘有確切的紀年，即東漢晚期的靈帝熹平元年（172），“主記史潭超省”竹簡則沒有明確的紀年。關於走馬樓 J22 出土簡牘的年代，此前

① 李振宏、孫英民：《居延漢簡人名編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② 李振宏、孫英民：《居延漢簡人名編年》，16 頁。

③ 本文以下所用的判別辦法，參考了《居延漢簡人名編年》中的方法，特此致謝。

④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東牌樓七號古井發掘報告》，《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5 頁。

⑤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118 頁。

⑥ 黃人二：《長沙東牌樓東漢熹平元年覃超人形木牘試探》，簡帛網。

⑦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篇卷上，《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上册，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4，126 頁。引文以新式標點重新標點。

⑧ 班固：《後漢書》，中華書局，1965，1530 頁。

⑨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東牌樓七號古井發掘報告》，《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28 頁。

學者認為“簡牘的年號目前發現最早的為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最晚的為吳孫權嘉禾六年（237年）”^①。事實上，在已公佈的走馬樓 J22 出土簡牘中曾出現一枚“中平”年號的簡，編號為 9831^②，釋文為“入□□中平二年□□□”。中平二年（185）距熹平元年（172）只隔十三年，年代比較接近，當然並不能就確定地說“主記史譚超省”簡的年代一定就是在中平年間，但是走馬樓 J22 中既然出現了靈帝中平年號的簡，則同出土於一地的“主記史譚超省”簡也可能是在此前後。東牌樓東漢簡牘的整理者認為，“這批簡牘與同地出土的三國吳簡，時間上可以銜接（吳簡中所記年號最早一枚為東漢靈帝中平二年）”^③，其中所說的這枚中平二年簡，應當就是指筆者上面所舉的走馬樓 J22 的簡 9831。所以，再依據上面（3）中所論，從時間上來講，人形木牘和“主記史譚超省”簡存在時間上延續的可能性。

根據以上多方面的考察，從而判斷“主記史譚超省”簡中的“譚超”就是人形木牘中的“譚超”應當不差。認定人形木牘的“譚超”和“主記史譚超省”竹簡的“譚超”是同一人，則相應產生了一個新問題，即人形木牘的性質是什麼。此前王素先生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概述》中對人形木牘進行了考論，認為雖然還存有一些問題，“但仍可認為：這應是一件死者覃超給道、巫世界的上言”^④。黃人二先生則提出不同意見，認為人形木牘的性質更可能與漢代的司命信仰有關，“然實與‘司命’神更為密切相關”^⑤。筆者前面有考證，認為譚超可能先為小史，而後做到了主記史的位置，既然人形木牘中的“譚超”可以由小史而逐步做到主記史的話，則其就極不可能在熹平元年還是職位卑微的小史的時候就死去。換言之，即走馬樓 J22 的“主記史譚超”與人形木牘中的“小史譚超”是同一人的話，則在書寫人形木牘的時候，此“譚超”並未去世。所以，王素先生此前認為的“這應是一件死者覃超給道、巫世界的上言”的推論就值得商榷。在此件人形木牘的性質上，筆者傾向於黃人二先生的論斷，即此件人形木牘的性質可能與漢代司命信仰有關。筆者以為，黃人二先生的考證中最令人信服的證據就是引用應劭《風俗通義》對東漢時期民間司命信仰的描述。《風俗通義》卷八《祀典》載：“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擔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⑥這與東牌樓人形木牘實物極為吻合。東牌樓人形木牘的實物，“應該是先刻為人形，再在正面上部描畫眉、眼、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走馬樓二十二號井發掘報告》，《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莧》，文物出版社，1999，30 頁。

②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 [壹]》，文物出版社，2003，1097 頁。

③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東牌樓七號古井發掘報告》，《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28 頁。

④ 王素：《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概述》，《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77 頁。

⑤ 黃人二：《長沙東牌樓東漢熹平元年覃超人形木牘試探》，簡帛網。

⑥ 應劭著、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1，384 頁。

鼻、口、胡鬚及軀干，最後纔在下部及背面寫字”^①。現在由於認識所限，此件木牘到底什麼用處，還待進一步考證，但我認為沿着司命信仰的方向去思考應該是可行的。關於東牌樓人形木牘與司命信仰的關係，筆者還有一點補充。現在的湖南長沙地區，春秋以來就屬於楚地，而司命信仰在南方楚地有著悠久的歷史，《楚辭·九歌》中有“大司命”、“少司命”，出土的楚卜筮祭禱簡所見諸司神中就有司命^②，而且正如一些學者提到在《史記·封禪書》中記載了司命之神為晉巫和荆巫所祠，“應該是代表司命在這兩地區為人們所崇信”^③，所以，在東漢時代的長沙地區出現這樣一件代表司命信仰性質的人形木牘也是可以理解的。

通過對東牌樓東漢人形木牘和走馬樓 J22 “主記史潭超省”簡的討論，不僅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走馬樓 J22 出土簡牘年代，也有助於進一步研究東牌樓東漢簡牘與走馬樓吳簡的關係。東牌樓東漢簡牘的出土、整理，正如整理者所指出的，與同地出土的三國吳簡，可以“綜合、比較地進行研究”^④，筆者對人形木牘的進一步補充研究正是基於這個原則之上的。反過來講，如果沒有東牌樓人形木牘的發現，“主記史潭超省”簡作為孤簡，實在很難確定大致年代。此前，走馬樓 J22 出土的簡牘大部分年代被斷定在孫吳時期，J22 還出土了數枚建安年號紀年簡，羅新先生在《走馬樓吳簡中的建安紀年簡問題》^⑤一文中討論了走馬樓吳簡中的“建安二十五年”、“建安二十六年”和“建安二十七年”等紀年簡，認為這些簡的建安年號很可能是後來追述的，是孫吳政權出於政治目的延長建安年號從而銜接孫吳黃武年號的，並認為“如果這一推論不誤，那麼，吳簡中的建安紀年，反過來證明了現有的長沙吳簡，在時間上並沒有逾越孫吳歷史時期”^⑥。關於“建安二十五年”、“建安二十六年”和“建安二十七年”等紀年簡的存在，羅新先生的考證令人信服，結論可以接受。但是，關於走馬樓 J22 中出土的簡牘是否“在時間上並沒有逾越孫吳歷史時期”這點還可以商榷。因為在上文中已經提到，走馬樓 J22 中明確出現了一枚“中平二年”紀年簡，而且通過對人形木牘的研究，對於出土於 J22 的“主記史潭超省”簡的年代我們也有了一個大致範圍的確定。東牌樓人形木牘中所書的熹平元年（172），至現在斷定的走馬樓 J22 最早的紀年建安二十五年（220），中間相隔了四十八年，時間跨度太長了，從時間推理上講不太可能，所以“主記史潭超省”簡的年代應該不會在建安二十五年（220）之後，而只能更靠前。如果說孫吳政權有理由追述“建安二十五年”、“建安二十六年”和“建安二十七

① 王素：《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概述》，《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75 頁。

② 晏昌貴：《楚簡所見諸司神考》，《江漢論壇》2006 年第 9 期。

③ 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81 頁。

④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東牌樓七號古井發掘報告》，《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28 頁。

⑤ 羅新：《走馬樓吳簡中的建安紀年簡問題》，《文物》2002 年第 10 期。

⑥ 羅新：《走馬樓吳簡中的建安紀年簡問題》。

年”，但是恐怕没必要追述到建安二十五年之前。走馬樓吳簡的出土屬於搶救性的清理發掘，特別是最先出土的一批竹簡，破壞嚴重，其原始狀況不得而知。根據走馬樓 J22 發掘報告的描述，J22 “現存竹簡放置在井中部偏南的位置，竹簡裏夾雜著部分木牘。簡牘的擺放有一定的順序，層層相疊，似有意爲之”^①。這個“有意爲之”之“有意”是不是就是根據年代而來呢？不同時代的簡牘分別安置，而其中或許有可能包括一部分東漢靈帝時期的簡牘。

東牌樓東漢簡牘發掘有五個層位，四個層位出土了簡牘。簡牘的“書法風格不太一致，有的書法似乎顯得較晚”^②。其中的第二層則晚到孫吳初期^③，此外，通過對東牌樓出土簡牘的 J7 層位堆積分析及器物的類比，最後判定的結論是“J7 的廢棄年代當在靈帝末年至孫吳初期”^④。筆者也懷疑東牌樓東漢簡牘中不只有東漢末年簡牘，甚至也可能包含了孫吳時期的簡牘，只是這個推斷現在沒有辦法去證實。但是，根據上文對東牌樓人形木牘和走馬樓 J22 “主記史潭超省”簡的分析，筆者以爲，走馬樓 J22 的部分簡牘年代可能可以再做進一步商榷，走馬樓 J22 與東牌樓 J7 兩地出土的簡牘確實存在相當密切的聯繫，走馬樓 J22 中不僅有大量的吳簡，甚至有部分東漢末年簡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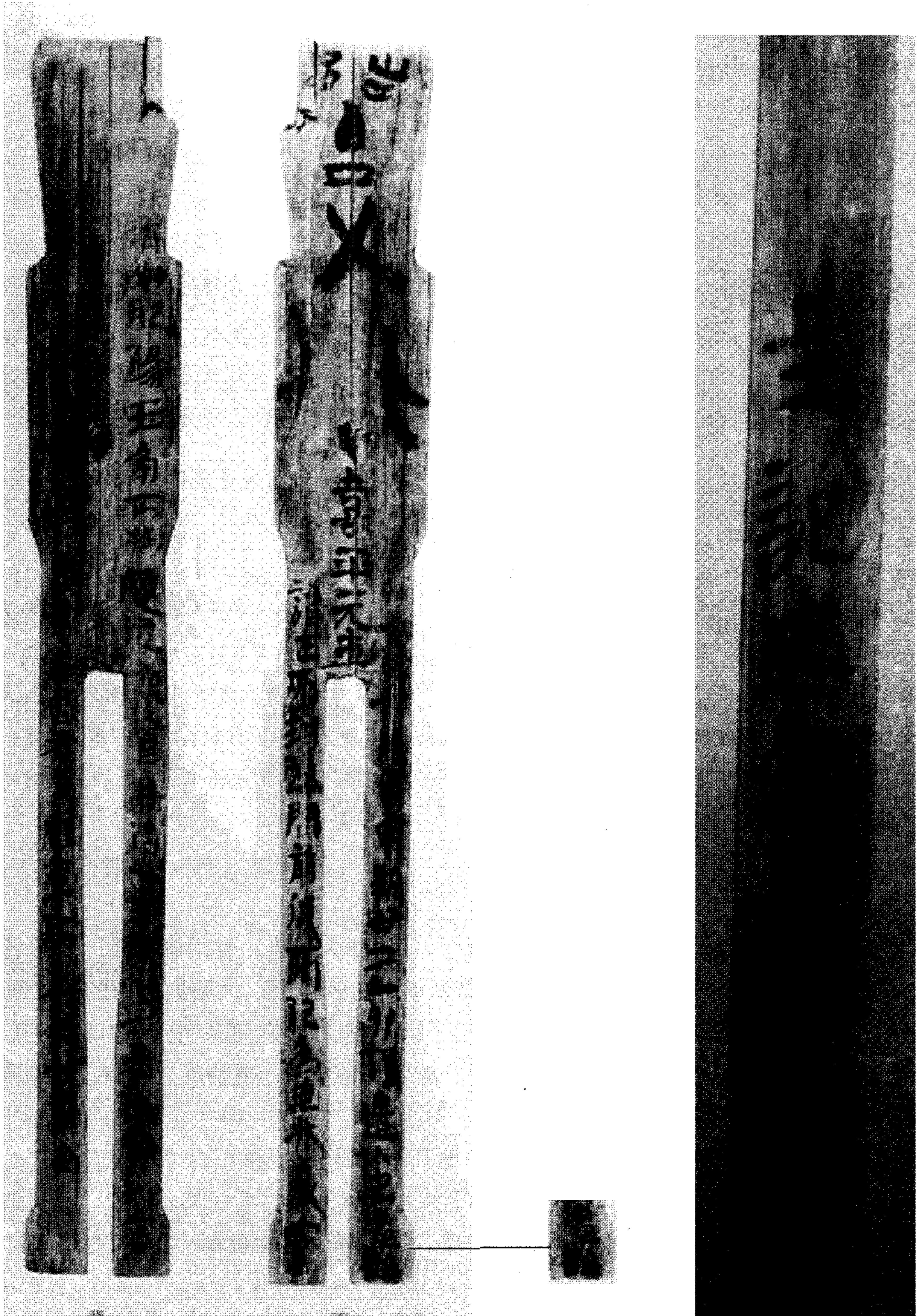
（附記：本文初稿完成後，又得到王素、馬怡、羅新、中村威也等先生的指正，一並致謝。）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走馬樓二十二號井發掘報告》，《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莧》，第 7 頁。

②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東牌樓七號古井發掘報告》，《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28 頁。

③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東牌樓七號古井發掘報告》，31 頁。

④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東牌樓七號古井發掘報告》，31 頁。



簡牘所見“棄妻”“去夫亡”“妻棄”考

石家莊學院歷史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賈麗英

內容提要 學界一般認為，“棄妻”指古代丈夫遺棄妻子。本文通過對秦漢簡牘中“棄妻”、“去夫亡”、“妻棄”簡的考察，認為法律簡牘所言“棄妻”，是帶有性別歧視性質的詞匯。但並不表示丈夫“拋棄”或“遺棄”妻子，而是指經過官方認可的男女雙方婚姻關係的結束。“去夫亡”指女性逃婚行為，折射出社會現實中的“棄夫”現象。《日書》等數術材料所言諸“棄”，進一步說明了“棄夫”現象在中下層社會的廣泛存在，這一階層“妻”在婚姻關係中居於更加主動的地位。

關鍵詞 秦漢 簡牘 棄妻 去夫亡 妻棄 一夫多妻

棄妻，一般意義上認為是古代丈夫遺棄妻子。《漢語大詞典》有兩個釋義：一是名詞，指被丈夫遺棄的妻子。二是動詞，指丈夫遺棄妻子。在例證上，大詞典所用的是東漢的文獻史料，如馬融的《長笛賦》：“於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彭、胥、伯奇，哀姜、孝己，攢乎下風，收精注耳。”禰衡《鸚鵡賦》：“放臣爲之屢歎，棄妻爲之歔歔。”《辭源》、《辭海》的釋義與之大同小異。

即使研究秦漢史的學者也這樣釋文。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有“取妻”條：“取妻龍日，丁巳、癸丑、辛酉、辛亥、乙酉，及春之未戌，秋丑辰，冬戌亥。丁丑、己丑取妻，不吉。戊申、己酉，牽牛以取織女，不果，三棄。”有學者這樣解釋：“假如在這個日子娶媳婦，丈夫會三次拋棄妻子。”^①

^① 吳小強：《秦簡日書集釋》，嶽麓書社，2000，108頁。

上述釋義祇表述了“棄妻”一詞的部分含義。實際上，考諸秦漢史實，我們會發現“棄妻”並非僅僅指丈夫“拋棄”或“遺棄”妻子，在法律層面及社會生活層面還有其它含義。下面就從文獻和簡牘材料，討論一下“棄妻”，以及“妻”在婚姻關係中的地位問題。

一 法律簡牘中的“棄妻”簡

棄，《說文》云：“棄，捐也。從𠂔推𠂔棄也。”段注：“竦手推𠂔而捐之也。”而“𠂔”是推糞之器。因此，“棄妻”顯然是帶有性別歧視性質的一個詞匯，顯示在一夫多妻制的男權社會，男性被法律賦予了更多的主動權。

在秦漢法律簡牘中，有不少簡文涉及到“棄妻”。《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①有這樣一句律文：

“棄妻不書，貲二甲。”其棄妻亦當論不當？貲二甲。

其意為男子“棄妻”，如果不上報官府登記，應該被“貲二甲”。“棄妻”是不是也應當被論罪？也應“貲二甲”。從夫和妻適用同樣的量刑標準來看，此處的“棄妻”應當表示的是夫妻婚姻關係的結束，而不是“拋棄”或“遺棄”妻子。

其它律文也有言及“棄妻”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收律》規定：

罪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財、田宅。其子有妻、夫，若為戶、有爵，及年十七以上，若為人妻而棄、寡者(簡 174)，皆勿收。(簡 175)^②

此外，《二年律令·戶律》還規定：

女子為戶母後而出嫁者，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宅不比，弗得。其棄妻，及夫死，妻得復取以為戶。(簡 384)^③

簡 174—175 是說，結束婚姻關係的女兒和配偶死亡的子女^④，在連坐時均不被收孥。簡 384 對為戶母後而出嫁的女子，不同婚姻狀況下的為戶和名有田宅作出了具體規定：婚姻存續期，丈夫若名有田宅不足，可以將妻子的田宅並入自己戶內，宅不相鄰的情況則不能名有。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以下簡稱睡虎地秦簡。

②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以下簡稱張家山漢簡。

③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

④ 簡 175 所言“寡者”，既可指守寡的女兒，也可指喪失妻子的兒子。簡牘材料中多見“寡夫寡婦”。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丙亡，為問者不寡夫乃寡婦，其室在西方，疵在耳，及折齒(簡 255)”；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寡夫、寡婦母子及同居，若有子，子年未盈十四，及寡子年未盈十八，及夫妻皆瘠(癯)病，及老年七十以上，毋(簡 342)異其子；今毋它子，欲令歸戶入養，許之。(簡 343)”

“其棄妻”的情況下，或夫死，妻可以拿回當初自己名下的田宅，並立戶。因此，這兩支簡文提到的“為人妻而棄”及“其棄妻”，較之理解為被拋棄或遺棄，理解為結束婚姻關係更為恰當。

事實上，在秦漢社會生活中，夫妻婚姻關係的結束也並不是全由男方說了算。女子或女方家庭主動“求去”、“亡其夫”或自行“更嫁”的情況甚多。現把文獻材料匯成表1：

表1

妻方	原因	史料	出處
外黃富人女	丈夫平庸不才	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	《史記》卷八九《張耳陳餘列傳》
呂榮父	夫操行不良	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	《後漢書》卷八四《列女傳》
平陽公主	夫有惡疾	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	《漢書》卷五五《衛青霍去病傳》
王政君母	夫納妾	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後以妒去，更嫁為河內苟賓妻。	《漢書》卷九八《元後傳》
卓文君		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西京雜記》卷三《白頭吟》
修成君女	夫不愛己	(淮南王太子)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	《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
魏霸妻	夫不想成婚	魏霸……妻死，長兄更為娶妻。妻至官舍，霸笑曰：“年老，兒子備具，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為？”……妻慚求去，遂送還之。	《東觀漢記》卷一三《魏霸傳》
禽堅母	夫遠行不歸	(禽堅父)去時，堅方妊六月，生，母更嫁。	《華陽國志》卷十上《先賢士女總讚》
枚皋母	與夫意見不合	(枚)乘在梁時，取皋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乘怒，分皋數千錢，留與母居。	《漢書》卷五一《賈鄒枚路傳》
朱買臣妻	夫家貧困	朱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漢書》卷六四上《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武帝外祖母臧兒	夫家低賤	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	《史記》卷四九《外戚世家》
史丹	夫家不睦	(王)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迕，為女求去。	《漢書》卷八二《王商史丹傳》

即使是女方主動“求去”，在男方和法律上也視為“棄”。劉向《列女傳》卷二《賢明傳》記載陶答子：“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於是妻抱着孩子哭泣，提出“願與少子俱脫”。婆婆聞聽大怒，“遂棄之”，即解除了婚姻關係。

因此，秦漢時期所謂“棄”，應不是指女方被“拋棄”或“遺棄”，而是指男女雙方解除婚姻關係且得到官府認可，是以男性為本位的特有名詞。正如元代律文所云：“嫁女棄妻皆由所由，若不由所由，皆不成婚，亦不成棄。”^①

二 法律簡牘中的“去夫亡”簡

如上所述，“棄”是經過官府認可的離婚關係。法律簡牘中還有不少沒有經過官府認可，女方擅去的“去夫亡”簡。關於這類情形，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有如下問答：

女子甲為人妻，去亡，得及自出，小未盈六尺，當論不當？已官，當論；未官，不當論。(簡 166)

女子甲去夫亡，男子乙亦闖亡，相夫妻，甲弗告請(情)，居二歲，生子，乃告請(情)，乙即弗棄，而得，論可(何)毆(也)？當黥城旦舂。(簡 167)

甲取(娶)人亡妻以為妻，不智(知)亡，有子焉，今得，問安置其子？當畀。或入公，入公異是。(簡 168)

如果我們不考慮“亡人罪”，單純就婚姻關係而言，“人妻，去亡”、“去夫亡”、“亡妻”等都指已婚女性逃婚，唐律中叫做“妻妾擅去”。^②漢律中也有關於此類性質罪名的規定，如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亡律》：

取(娶)人妻及亡人以為妻，及為亡人妻，取(娶)及所取(娶)，為謀(媒)者，智(知)其請(情)，皆黥以為城旦舂。其真罪重，以匿罪人律論。弗智(知)(簡 168)者不□。(簡 169)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第 21 例提到：

夫生而自嫁，及取(娶)者，皆黥為城旦舂。(簡 192)

“取人妻”、“夫生而自嫁”，都是指不合法的重婚現象，屬於法律規制的範圍。不過上述律文不管是“亡妻”，還是“人妻去亡”，分析其實質都是事實上的“棄夫”行為。此類情形也見於文獻史料，如我們表 1 提到的張耳妻，“亡其夫，去抵父客”。《史記·秦始

① 郭成偉點校：《大元通制條格》卷三《嫁娶所由》，法律出版社，1999，43 頁。

② 參見[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中華書局，1983。薛梅卿點校：《宋刑統》，法律出版社，1999。

皇本紀》始皇三十七年會稽刻石述當時的社會風氣時說：“妻爲逃嫁，子不得母”，《正義》注釋“謂棄夫而逃嫁於人”。

法律是社會現實的反映，“去夫亡”、“夫生而自嫁”諸簡折射出當時已婚女性在婚姻關係中常常採取“去亡”的方式，主動脫離不理想的婚姻。

三 《日書》中的“棄”、“妻棄”簡

《日書》是戰國秦漢時期非常流行的數術類書籍，主要用於選擇時日吉凶。其所反映的多爲社會中下層生活情況^①。《日書》中也有不少簡文涉及到婚姻關係中的“棄”。我們僅舉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爲例：

翼，利行。不可臧(藏)。以祠，必有火起。取妻，必棄。生子，男爲見(覲)，【女】爲巫。(94 正壹)

取妻龍日，丁巳、癸丑、辛酉、辛亥、乙酉，及春之未戌，秋丑辰，冬戌亥。丁丑、己丑取妻，不吉。戊申、己酉，牽牛以取織女，不果，三棄。(155 正)

癸丑、戊午、己未，禹以取桀山之女日也，不棄，必以子死。(2 背壹)

戊申、己酉，牽牛以取織女而不果，不出三歲，棄若亡。(3 背壹)

庚辰、辛巳，敝毛之士以取妻，不死，棄。(5 背壹)

戌興〈與〉亥是胃(謂)分離日，不可取妻。取妻，不終，死若棄。(10 背)

中春軫、角，中夏參、東井，中秋奎、東壁(壁)，中冬竹(箕)、鬥，以取妻，棄。(5 背貳)

凡參、翼、軫以出女，丁巳以出女，皆棄之。(6 背貳)

那麼，這些“棄”是否是丈夫“拋棄”或“遺棄”妻子之義？

我們先來看睡虎地秦簡“取妻龍日”條：“取妻龍日……戊申、己酉，牽牛以取織女，不果，三棄。”此簡顯然與傳說的牽牛織女神話故事有着直接的淵源。王子今先生即說：“‘牽牛以取織女’的說法，說明在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成書的時代，牛郎織女愛情傳說已經形成了比較確定的主題，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結構。”^②

關於牽牛織女，《天中記》卷二引《小說》：

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杵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容貌不暇整理。天

① 參見吳小強《試論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觀念》，《中國史研究》1989年第3期；賀玉坤：《雲夢秦簡〈日書〉所反映的秦國社會階層》，《江漢考古》1995年第1期。

② 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92-293頁。

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紵，天帝怒焉，責令歸河東，但使其一年一度相會。

《天中記》還引《荆楚歲時記》云：

嘗見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備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

這兩條材料一條是說織女因“廢織紵”，惹天帝發怒，令其居河東，一年與牽牛見一次面；一條是說因為牛郎借錢不還，被天帝趕到營室。拆散他們的人都是“天帝”。東漢時已經形成織女是天帝子孫的傳說。《後漢書·天文中》：“織女，天之真女。”《漢書·天文志》“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因此，如果睡虎地《日書》成書的年代這個故事已較為完整，牽牛織女分離的原因應該不會遠離《小說》和《荆楚歲時記》的記載，那麼，“牽牛以取織女，不果，三棄”，與其說是男方三次拋棄女方，倒不如說是女方多次棄男方而去。

再者，由漢人的其它記載可以獲悉織女應該是時人心目中的好妻子。《焦氏易林》卷四《中孚·益》：“久鰥無偶思配織女，求其非望自令寡處。”《淮南子·俶真》：“若夫真人……臣雷公，役誇父，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王逸《哀歲》：“歷九宮兮遍觀，睹秘藏兮寶珍。就傳說兮騎龍，與織女兮合婚。”^①這些描述中的織女儘管是神女，但“思配織女”顯然是男性理想的姻緣。由此也可以推想，《日書》簡“牽牛以取織女，不果，三棄”中，採取“棄”行為的不是牽牛，而是織女。

此外，孔家坡漢簡《日書》中可見到“妻愛”見“棄”簡。如：

【三月胃】利入禾粟及爲困倉，吉。以取(娶)妻，妻愛而棄。利以祠祀。復(覆)內，入馬牛。不可以葬。(簡 65)

既然是“妻愛”為何要“棄”？是夫主動之“棄”，還是妻主動之“棄”？孔家坡《日書》中還有一簡：

【翼】……起。取(娶)妻，妻棄。司臧。以生子，爲巫，男爲見(覲)。可以□門牖。(簡 75)

這是目前所見到的《日書》材料中，唯一一枚“妻棄”簡。從簡牘照片看，第一個妻字下方確有一個重文號，釋文應該沒有錯誤。而“妻棄”比之“棄妻”，在字義上則更加顯示了“妻”在婚姻關係中的主動性。因此，筆者以爲“妻愛而棄”之“棄”，可能指“妻棄”

① 《全後漢文》卷五七《哀歲》，據《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550頁。

而非“棄妻”。而數術材料見到的其它諸“棄”，“妻棄”也會佔相當比例。

實際上我們從《日書》等數術材料關於婚後生活的預測中，還可以進一步證實這種可能性。這些材料中除了“棄”、“必棄”諸簡，以及“死”、“不終”等預測外，還有不少內容則顯示了“妻”是婚姻關係破裂的主因。下面僅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乙種、孔家坡漢簡《日書》、香港中文大學館藏簡牘《日書》^①、尹灣漢墓簡牘《博局佔》^②等幾類簡帛中的數術材料匯集如下：

表 2

材料	出處	簡號
角，利祠及行，吉。不可蓋屋。取妻，妻妬。生子，爲【吏】。	睡簡《日書·甲種》	68 正壹
牴(氏)，祠及行、出入貨，吉。取妻，妻貧。生子，巧。	同上	70 正壹
心，不可祠及行，凶。可以行水。取妻，妻悍。生子，人愛之。	同上	72 正壹
箕，不可祠。百事凶。取妻，妻多舌。生子，貧富半。	同上	74 正壹
虛，百事凶。以結者，易擇(釋)。亡者，不得。取妻，妻不到。以生子，毋(無)它同生。	同上	78 正壹
營室，利祠。不可爲室及入之。以取妻，妻不甯。生子，爲大吏。	同上	80 正壹
戊申、己酉，牽牛以取織女而不果，不出三歲，棄若亡。	同上	3 背壹
壬辰、癸巳，囊婦 ^③ 以出，夫先死，不出二歲。	同上	4 背壹
壬申、癸酉，天以震高山，以取妻，不居，不吉。	同上	7 背壹
營室，利祠。不可爲室及入之。以取妻，不甯。生子，爲吏。	睡簡《日書·乙種》	80 壹
角，利祠及【行】，吉。不可蓋室。取妻，妻妬。生子，子爲吏。	同上	96 壹
氏，祠及行、出入【貨】，吉。取妻，妻貧。生子，巧。	同上	98 壹
心，不可祠及行，兇(凶)。可以水。取妻，妻悍。生子，人愛之。	同上	100 壹
箕，不可祠。百事兇(凶)。取妻，妻多舌。生子，貧富半。	同上	102 壹
虛，百事【凶】。以結者，易擇(釋)。亡者，不得。取妻，妻不到。以生子，毋(無)它同生。	同上	106 壹
【八月角】，……蓋屋。取(娶)妻，妻妬。司□。以生……	孔家坡漢簡《日書》	49
虛，百 事 凶。以 結 者，易□□□□□。取(娶)妻，妻不到。司死。以生，毋它同生。不可取(娶)妻、嫁女。雖它大吉，毋用。	同上	59
正月營室，利祠。不可爲 室 及入之。以取(娶)妻，不甯。司定。以生子，爲大吏。	同上	61
戊申、己酉以取(娶)妻，妻不出三歲，棄、亡。	同上	175 貳
戊己毋取妻、取妻癡(厭)姑一。入妾，有家環死，必彼(披)刑若亡。	同上	182 壹

① 陳松長編著：《香港中文大學館藏簡牘》，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
② 《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9。
③ 囊婦，“囊”，睡虎地整理小組疑讀爲攘，盜取。劉樂賢、王子今釋“囊”爲“妒”。參見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315-316 頁。

□見人行水除渠，以取(娶)妻，妻悍，利學人 陷庚 引月從日	港大館藏簡牘《日書》	19
□禦。伐木，吉。取(娶)妻，妻痔(恃) ^① 。不可入奴。	同上	31
褐婦妬，，不終，生。	尹灣漢簡《博局佔》	
張婦強梁，有子，當家	同上	
大生……取(娶)婦者，生而貧，或胃(謂)爲憂。	馬王堆 3 號墓帛書《式法·天一》	

以上諸簡材料是影響婚姻關係不穩定或直接導致婚姻關係破裂的因素，大體可以分作三類：

一是妻悍、妻妬、妻貧、妻多舌之類。妻悍，指妻子強悍、兇暴；妻妬，指妻子嫉妒；妻貧，大概指婚後妻子不會過日子、不能使家庭富裕；妻多舌，指妻子愛搬弄口舌。上述諸簡中睡虎地《日書·甲種》68 正壹、70 正壹、72 正壹、74 正壹、4 背壹，《日書·乙種》96 壹、98 壹、100 壹、102 壹，孔家坡《日書》49、182 壹、港大簡《日書》19、31，以及所引尹灣漢簡《博局佔》兩條，馬王堆帛書一條，都是此類情況。這些都是站在男性的立場上對妻子的評價。妻子的這些品行是不受夫所歡迎的，可能都是導致婚姻關係破裂的原因。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妻悍，夫毆治之，决(決)其耳，若折支(肢)指□肤體，問夫可(何)論？當耐。(簡 79)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奏讞書》均有關於妻悍的法律規定。妻悍，影響家庭和睦，也有人因此而去妻，如東漢馮衍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②。但是我們不能據此認定此類婚姻關係的解除，主動權都在夫方。如元帝皇后王政君的母親李氏，“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後以妒去，更嫁爲河內苟賓妻”^③，這句話的主語是李氏，“去”的主語也應該是李氏，即李氏因嫉妒而“去夫”，改嫁他人。

二是妻不甯、妻不居類。妻不甯，指妻不安寧。《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这里“寧”即“不安寧”。妻不居，可能指妻不在夫家居住，或夫對妻不能佔有。《禮記·月令》：“[季秋之月]民氣解惰，師興不居。”鄭玄注：“不居，象風行不休止也。”孔融《論盛孝章書》：“歲月不居，時節如流。”《老子·道經》：“功成而不居”。這些材料中的“不居”應該與“妻不居”意思一致。睡簡《日書·甲種》80 正壹、7 背壹，孔家坡漢簡《日書》61，都屬此類。妻子不安寧，不在夫家居住，必然會影響夫妻感情，導致婚姻關係的結束。而此類現象多源于妻方對於夫方才能、經濟、

① 妻痔，陳松長釋“痔”爲“恃”，訓爲“怙”，當指其妻仗勢跋扈，其義應與妻悍相同。陳有祖認爲“痔”疑如字讀，即痔瘡，參見簡帛網《漢簡專欄》<http://www.bsm.org.cn>《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獻疑四題》。本文採用原釋。
② 《後漢書》卷二八下《馮衍傳》，中華書局，1965，1002 頁。
③ 《漢書》卷九八《元后傳》，中華書局，1962，4015 頁。

社會地位等條件的不滿，婚姻關係的解除往往由女方提出。像表 1 提到的漢武帝的母親王夫人、張耳妻、朱買臣妻等。

三是妻不到、妻逃亡類。妻不到，應該指妻子逃婚。妻逃亡指妻逃離夫家，即我們上面所提到的“去夫亡”。睡簡《日書·甲種》78 正壹、3 背壹，《乙種》106 壹，孔家坡漢簡《日書》59、175 貳，都屬此類。妻不到、妻逃亡這類情形，與上述兩類情形相比，更加顯示了妻在婚姻關係中的主動性。

以上三類情況，第一類可能影響到家庭關係，但並不至於使婚姻關係破裂；而第二類和第三類情況往往會直接導致婚姻關係的法律結束或事實結束，且“妻”比“夫”居於更加主動的地位。

我們知道《日書》等數術材料多反映了中下層民眾的社會生活和社會信仰，上述妻在婚姻關係中的主動性，也應該是這個社會階層的反映。為什麼這個階層“妻”會是導致婚姻關係結束的主要因素？筆者以為，這與上古農業社會一夫多妻的婚姻形態有直接的關係。

現代人口學認為男女性別比有一個通常理論值。據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1955 年 10 月)，聯合國出版的《用於總體估計的基本資料品質鑒定方法》(手冊 II) (*Methods of Appraisal of Quality of Basic Data for Population Estimates, Manual II*): “出生性別比偏向於男性。一般來說，每出生 100 名女嬰，其男嬰出生數置於 102—107 之間。”這是在無人為干擾情況下，接近於生物學規律所取得的一個資料。而秦漢社會還沒有現代選擇胎兒性別的技術，因此這個資料用於秦漢，也應該是合適的。也就是男女比例大體相當。

但是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形態，必定使女性向少數家庭集中。即皇族、貴族、豪族等社會上層妻妾成群，而中下層，尤其是下層男性社會成員難以娶妻。正如貢禹所言：“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①這種情況也存在於世界其它一夫多妻制的民族中，像所羅門群島、新不列顛的加澤爾半島、澳大利亞的土著人等。^②

不過，這種情況對於女性來說則是相反的。正如朱諾在描述南非某個部落的生活時所說的那樣：“在盛行一夫多妻制的地方，每個女子都可以找到一個丈夫”^③。就秦漢社會而言，情形應與之相似。為了改善生活境況，家境貧困的女性流向少數富裕家庭，貧困地區的女性流向較富裕地區，形成了典型的“高攀婚”。^④在這種情況下，下層男性娶妻不易，怎會輕言“棄妻”？即使“妻不甯”、“妻不居”，男方也多盡力維持婚姻。如《後漢書·

① 《漢書》卷七二《王貢兩龔鮑傳》，3071 頁。

② [芬蘭]E. A. 韋斯特馬克：《人類婚姻史》第一卷，商務印書館，2002，314—317 頁。

③ Junod, *The Life of a South Africa Tribe*, i. 184. 轉引自《人類婚姻史》第一卷，317 頁。

④ 不同社會地位的家庭和對象之間的婚姻，是通過運用婚姻應對貧困的特定策略。參見[德]羅梅君《19 世紀末以及今日中國鄉村的婚姻與家庭經濟》，據張國剛主編《家庭史研究的新視野》，三聯書店，2004。

《孝明八王列傳》就記載平民男子章初之妻，與樂成靖王黨通奸。章初不肯罷休，結果導致殺身之禍。

我想這可能是這一時期中下層社會中“妻”在婚姻關係中居主動性地位的主要原因。

綜上，秦漢社會是一個以男性為本位的社會，法律類簡牘所言“棄妻”，是以男權的角度，帶有性別歧視性質的詞匯。但它並不表示丈夫“拋棄”或“遺棄”妻子，它所代表的是經過官方認可的男女雙方婚姻關係的結束。不管是男方主動提出，還是女方主動提出，一經認可，即可為“棄”。

法律簡牘中的“去夫亡”、“夫生而自嫁”諸簡，不僅僅顯示了法律對逃婚、重婚行為的制裁，同時也反映了社會現實中的“棄夫”現象，顯示出“妻”在婚姻關係中的主動性。

此外，秦漢社會的婚姻形態為一夫多妻制。這一時期處於上古農業社會，社會貧富不均；加之去古未遠，禮教理論正在形成，而未深入人心。這就使得社會上的成年女性成員（未婚的、已婚的），流向少數富裕家庭，或較為富裕的地區。而普通中下層男性成員無力娶妻，或不能長期維持婚姻關係，形成了“內多怨女，外多曠夫”之局。因此反映中下層社會生活的《日書》等數術材料所言諸“棄”，除了“棄妻”的情況外，更多的應該是“妻棄”。妻在雙方的婚姻關係中居於更加主動的地位。

小議簡牘文書中的“告”“謂”句式

——秦漢官文書用語研究之一

鞍山師範學院政史系 蘇衛國

內容提要 簡牘官文書中，行程式及用語均有一定的章程。從“告”“謂”用語實例中可以看出，“告……謂……”似乎形成了一個十分固定的句式，並且其中也體現了一種相對固定的等級搭配關係。實際應用中，大致有如下規律：（1）“敢告卒人”用於郡長官之間；（2）“告”的用法較複雜一些。如發語方為郡府或都尉府長官時，其受語方多為府屬資深官吏，而當發語方為候官或縣廷之長官時，其受語方固定為所在機構的尉官；（3）“謂”用於行政建制的上下級之間。“告”“謂”用語在簡牘的製作、流轉過程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秦漢兩代也經歷了一定的變化。“告”“謂”用語的研究有助於一些殘破簡牘文書性質的認定。

關鍵詞 秦漢簡牘 官文書 告謂句式

已知出土簡牘中，官文書比例頗重。但由於簡冊散亂，簡面殘破，往往不易釋讀，更難以通貫。不過，作為官文書來講，行程式及用語均有一定的章程，這是解讀官文書的基礎。筆者不揣冒昧，從常見於文書用語中的“告”與“謂”入手，對簡牘文書的解讀做一點嘗試。

一、再論“敢告卒人”

東漢王充《論衡·謝短》云：“兩郡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這裏講的是兩郡太守之間平移文書的用語規則問題。近世學者多用此語爲出土簡牘中頻現的“敢告……卒人”之語作注釋，並反過來通過簡牘驗證此語的虛實。

最早討論這個問題的是王國維先生。他在《流沙墜簡·屯戍叢殘考釋·烽燧類》簡 44：

1. 候史德在所以亭次行（簡面）令敢告卒人□九月癸巳敦煌（簡背）^①

注釋中講“此簡乃抵候史德者，而曰‘令敢告卒人’，知前漢此語不限於兩郡遺書也”。^②此後，陳直先生亦有概括性的論述，指出：“本郡太守與本郡都尉之公牘，亦稱爲敢告卒人，不獨兩郡太守移書爲然也。”並解釋說：“卒人指府門卒而言，內官公卿，外官太守及都尉府皆有之。縣令長無府門卒之制度，故王充設作疑問，稱爲兩縣不言何解也。但卒人雖係指府門卒，實指太守或都尉而言，等於後代人之稱閣下也。”^③隨後，汪桂海先生又在《漢代官文書制度》一書中檢討上面兩位學者的說法，揚棄了王國維之說，指出“漢代郡級官府向縣級官府下達文書有時也言‘敢告卒人’”並總結了官文書中稱“敢告卒人”的三種情況，即“1. 甲郡太守移乙郡太守的文書；2. 郡太守移本郡諸都尉、校尉的文書；3. 郡級官府移所屬縣級官府的文書”^④。

以上三位學者的看法有一個共同之處，即均對王充之說有所發展。其中郡太守移本郡諸都尉文書中“敢告卒人”的用法在簡牘材料中反映尤爲明顯，可以說是爭的事實。^⑤看來，這一發展是非常正確的。不過，此外的另一個發展（即“敢告卒人”在除兩郡移書和同郡太守與都尉的移書之外的文書中亦有應用的說法）則略顯證據不足。除王國維所引簡 1 一例之外，汪文又引了居延新簡中的一例。

2. ……□長丞拘校必得事實牒別言與計偕如律令敢告卒人 E·P·T53: 33A

在將其與王文所引簡 1 相對照後，汪文又從文書移送的角度對兩簡進行了重新闡釋。這是很有創見的。在下面的分析中，汪文將簡 2 定爲郡移縣之文書，其證據是簡文中的“長

① 《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編號爲 504，敦煌漢簡中爲 2035，釋文稍有不同。

② 《流沙墜簡》，中華書局，1993，141 頁。

③ 《居延漢簡研究》“居延簡所見漢代典章及公牘中習俗語”條，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127—128 頁。

④ 《漢代官文書制度》，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100—102 頁。另，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一書對“敢告部都尉卒人”也有簡單的解釋，不過結論與上面幾說類同，不再列入正文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2 頁注釋。

⑤ 具體文例請參見本文後面引用的簡文。很不幸的是，反而兩郡間移書中“敢告卒人”的用法卻未見一例。酥油土所出 81.D38:28（即敦煌漢簡，1382）依稀肩水倉長代行太守或丞事敢告酒泉太守卒人的意思。如果真如筆者所推測的話，這當是反映兩郡間移書“敢告卒人”用法的僅有一例。

丞”二字。當然，由於簡文殘缺，單單依靠此簡，我們也無從否定這一推斷。不過，很幸運，在居延漢簡中，我們又找到一個更完整的例子。

3. ……得倉丞吉兼行丞事敢告部都尉卒人詔書清塞下謹候望備蓬火虜即入料度可備中毋遠追爲虜所詐書已前下檄到卒人遣尉丞司馬數循行嚴兵□……□禁止行者便戰鬥具驅逐田牧畜產毋令居部界中警備毋爲虜所誑利且課毋狀不憂者劾尉丞以下毋忽如法律令敢告卒人 / 掾延年書佐光給事□……都尉事司馬丞登行丞事謂肩水候官寫移檄到如大守府檄書律令 / 卒史安世屬樂世書佐延年……□行曹謂□□□長充宗官寫移檄到警備□□門□毋爲虜所乘□毋忽如律令 12·1A、B、C、D, A33 地灣

這是一支觚，文字寫於四面，頂部略有殘缺。很清楚，在完整的文書中“敢告卒人”是配對出現的。這點，與文書中“敢言之”的配對是一樣的，所起的作用亦大致相同，是“敢告卒人”所告內容開始和結束的限定標誌。如此一來，我們便明白，出土簡牘大多數“敢告卒人”的例子是簡3中前一個“敢告卒人”的用法，而簡1和簡2是簡3中後一個“敢告卒人”的用法。^①還可以找到一些殘缺的例子。如：

4. 知令重寫移書各明白大扁書市里官所寺舍門亭燧候中令吏卒民盡訟知之且遣都吏循行問吏卒不知令者案論尉丞令丞以下毋忽如律令敢告卒人 81.D38:11 酥油土^②

5. 擊以檄言有鉞乃以從事失亡重事如律令敢告卒人 81.D38:23 酥油土^③

6. ……□武賢司馬如昌行長史事千人武疆行丞事敢告部都尉卒人謂縣寫重如……卒人 / 守卒史穉守屬奉世 E·P·T51: 202

我們將簡2、3、4對照來看，其中的“令”、“長”、“丞”、“尉”等職官稱謂雖屬縣級，但那只是在文書的具體內容中提及的，並不表明他們就是“敢告卒人”所告的直接對象，而參照簡3、6來推斷，真正所告的直接對象應該是部都尉無疑。即使退一步講，我們也只能作存疑處理，而不能將其所告之直接對象妄斷爲縣級機構或官吏。由此看來，“敢告卒人”一語的用法似乎還未出郡一級往來文書的範圍，王充之言，也還是基本符合事實的。

① 王國維所引的簡1，從圖版上看，正面有封泥槽，背面文字在簡的下半部分，上半部分左右各斜削一刀，很顯然，“令敢告卒人”之上另有文字，只是不知是被削去，還是書于另外一簡。

② 敦煌漢簡，1365。

③ 敦煌漢簡，1377。釋文略有不同。

二、簡牘文書中的“告”“謂”句式

在對出土簡牘 18 件使用“敢告卒人”用語的文書實例^①考察之中，我們發現其中有 9 例是採用“……敢告……卒人、謂……”為起始語的句式。^②並且，除簡面殘破無法確定的兩例，“謂”的對象均為縣、候官或與之同級的機構（或官吏）。比如：

7. 七月庚子將屯敦煌太守登敢告部都尉卒人謂縣官戌卒起郡…… 81.D38:14^③

8. 建昭二年九月庚申朔壬戌敦煌長史淵以私印行太守事丞敞敢告部都尉卒人謂南塞三候縣郡倉令曰敦煌酒泉地勢寒不雨蚤殺民田貸種穰麥皮芒厚以廩當食者小石……

II 0215^③: 46, 釋粹, 70

9. 十月己卯敦煌太守快丞漢德敢告部都尉卒人謂縣督盜賊史赤光刑世寫移今□□
□□□部督趣書到各益部吏□泄□捕部界中明白大編書鄉亭市里□□□□令吏民盡知
□

I 0309^③: 222, 釋粹, 21

看來，其中的“謂”是與“敢告卒人”聯稱的比較固定的規範用字。同“……敢告……卒人”固定用於兩郡間及郡與本郡都尉之間一樣，“……謂……”的發語方和受語方也有比較一致的等級搭配關係。由此，我們進一步拓展考察對象，發現簡牘文書中以“……告……謂……”為起始語的句式也是很多見的。其中也體現了一種相對固定的等級搭配關係。由於此類文書較多，我們依照發語方的不同，將其分為四類。

（一）以郡府長官為發語方的。如：

10. 建昭二年二月甲子朔辛卯敦煌太守彊守部候脩仁行丞事告督郵史眾 V 欣主羌史江曾主水史眾遷謂縣聞往者府掾史書佐往來□案事公與賓客所知善飲酒傳舍請寄長丞食或數……

II 0216^②: 246, 釋粹, 232

11. 建昭二年三月癸巳朔丁酉敦煌太守彊長史章守部候脩仁行丞事告史敞謂效谷今調史監置如牒書到聽與從事如律令

II 0216^②: 243, 釋粹, 76

從上面兩例中可以看出，以郡府長官為發語方的例子中，“告”的對象多為郡之下派屬吏，

① 除上引六件外，還有 237·15 (A33, 地灣)、216·1 (A35, 大灣)、81.D38:10 (敦煌漢簡, 1364)、81.D38:14 (敦煌漢簡, 1368)、E·P·T59: 60、4·1 (A8, 破城子)、I 0309^③: 222 (釋粹, 21)、II 0216^②: 869 (釋粹, 26)、II 0215^③: 46 (釋粹, 70)、II 0314^②: 315 (釋粹, 20)、E·P·T52: 99、E·P·T53: 150。

② 另外的九件中，有四件僅有結束標誌語“敢告卒人”而無起始標誌語；還有三件為殘簡；可以確定無“謂”字的祇有兩例。

③ 敦煌漢簡, 1368。

而“謂”的對象均為郡下之縣。

(二) 以都尉府長官為發語方的。如：

12. 五月甲寅守張掖居延都尉諶丞奉告勸農掾禹督[蓬]掾遷等謂官縣寫移書到如莫府書律令 掾循兼守屬丹書佐萌 E·P·F22: 693

13. 六月壬申守張掖居延都尉曠丞崇告司馬千人官謂官縣寫移書到如大將軍莫府書律令 掾陽守屬恭書佐豐 E·P·F22: 71A

此類中，“告”的對象為都尉之屬吏或官員，“謂”的對象則為“官縣”。

(三) 以候官長官為發語方的。如：

14. 八月庚戌甲渠候長以私印行候文書事告尉謂第四候長憲等寫移 E·P·F22: 158

15. 十二月戊辰甲渠候長湯以私印行候事告塞尉謂士吏輔候長段賢等 82·38, A8, 破城子

這一類的簡牘出土非常多，情況也稍顯複雜一些。不過一般來講，“告”的對象是塞尉（單稱“尉”者應該也是指塞尉而言），“謂”的對象多為候長或士吏。

(四) 以縣廷長官為發語方的。如：

16. ……居延丞竟告尉謂東西鄉□…… 484·23

17. ……建武五年八月甲辰朔丙午居延令 丞審告尉謂鄉移甲渠候官聽書從事如律令 E·P·F22: 56A

此類簡目前僅見兩例。大略言之，“告”的對象為縣尉，“謂”的對象為鄉。

以上，我們大致描述了出土簡牘文書中“（敢）告”、“謂”組合句式的情況，初步整理分析了其中所體現的等級搭配原則。大致有如下規律：（1）“敢告卒人”用於郡長官之間；（2）“告”的用法較複雜一些。如發語方為郡府或都尉府長官時，其受語方多為府屬資深官吏，而當發語方為候官或縣廷之長官時，其受語方固定為所在機構的尉官；（3）“謂”用於行政建制的上下級之間。^①

此外，在簡牘文書中，除了上述的組合句式之外，大量單純為“某官告某官”或“某官謂某官”的句式也基本驗證了這一原則。此類簡文很多，僅舉幾例：

18. 神爵四年正月丙寅朔壬辰敦煌太守快庫丞何兼行丞事告領縣泉置史光寫移書

^① 比較有意思的是，我們在私人書信中亦找到一例“告”、“謂”組合句式——“告大謂子實鞠今可得出不今未可得出也大即”（10·21, A33, 地灣），可能反映了官文書對私人書信用語的影響。

到驗問審如倚相言爲逐責遣吏將禹詣府毋留如律令

II 0215③: 3A, 釋粹, 74

19. 八月乙巳敦煌玉門都尉宮謂玉門候官寫移書到如大守府書律令 / 掾恩屬漢昌
敦煌漢簡, 1254, 蘆草井烽燧遺址

20. 建武五年四月丙午朔癸酉甲渠守候 謂第十守…… E·P·F22: 254A

三、“告”“謂”句式應用範圍分析

當然，我們僅僅歸納出上面的三條規則是遠遠不夠的。因爲即便我們排除那些可能是由於時代、地區的用語習慣差異或書寫者的人爲錯誤等原因所致與此規則相悖的個別特例，還是可以很輕易地找出一些規則之外的例子。^①不過話說回來，能從如此多的例證中得出這些規則也絕非巧合之事。問題在於，我們要爲其限定一個較爲合適的應用範圍。

汪桂海先生曾結合幾例簡牘文書講到，“……‘謂’、‘告’、‘敢告……卒人’與‘敢言之’……分別是表示下行、上行或平行的語辭”^②，話是不錯的。再進一步區分，“敢言之”是通用的上行文書的語辭，“敢告……卒人”用於郡級平行文書，而“告”與“謂”則體現了文書下行的關係。

請看下面幾例：

21. 康居王使者楊伯刀……叩頭自言……

永光五年六月癸酉朔癸酉使主客部大夫謂侍郎當移敦煌太守書到驗問言狀事當奏聞毋留如律令

七月庚申敦煌太守弘長史章守部候修仁行丞事謂縣寫移書到具移康居蘇蠶王使者楊伯刀等獻橐佗食用穀數會月廿五日如律令 / 掾登屬建書佐政光

七月壬戌效穀守長合宗守丞敦煌左尉忠謂置寫移書到具寫傳馬止不食穀詔書報會月廿三日如律令 / 掾宗嗇夫輔

II 0216②: 877-880、881、882、883, 釋粹, 155

22. 甲渠郭候以郵行□ 府告居延甲渠郭候卅井關守丞匡十一月壬辰檄言居延都田嗇夫丁宮祿福男子王歆等入關檄甲午日入到府匡乙未復檄言

甲渠郭候以郵行□ 男子郭長入關檄丁酉食時到府皆後宮等到留遲記到各推辟界中定吏主當坐者名會月晦有

① 在含有“告”的簡牘文書收集中，頻見“府告”和“官告”之辭。不過這裏“告”是有特殊用法和含義的。請參見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50—51頁。文中指出，下行之“記（教）”起首文字皆作“府（或官）告某官”。其中體現的是機構建制的上下級關係。

② 汪桂海先生博士論文《兩漢官文書制度》，35頁。

甲渠鄯侯以郵行□ 教 建武四年十一月戊戌起府

甲渠鄯侯以郵行□ 十一月辛丑甲渠守候 告尉謂不侵候長憲等寫移檄
到各推辟界中相付受日時具狀會月廿六日如府記律令

E·P·F22: 151A、B、C、D

上舉兩例均為比較完整的文書。例 21 為《康居王使者冊》，內容涉及一起投訴案件。案情首先上於大鴻臚的使主客部大夫，使主客部大夫將此案下侍郎，並移送敦煌郡府具體調查此事。隨後調查指令逐級下發，由敦煌郡府到所屬縣，再由所屬縣到相應的縣置機構。我們看到文書中用了三個“謂”字，表明了文書下行時的層遞關係。再看例 22。此例為一起郵書傳送事故調查案件。在卅井關守丞將事故情況報知都尉府後，府下記至甲渠候官要求追查出問題的環節。甲渠候官在收到府記後，再將追查任務傳達布置給所屬各候部。這件文書下行的兩個階段與上一例有所不同，前一階段是以府記的形式下行，後一階段才用“告”、“謂”句式表明下行層遞關係。回過頭來，我們再看前面引用的簡 3 之例。這支觚所反映的情況與例 21 比較相似，差別在於下行的初始環節起於郡府，由郡府將事情“敢告卒人”于都尉府，之後便是以“謂”這一層遞詞逐級下發至都尉府所屬的候官以及候官所屬的候部。

上面解釋的三個例子，都是下行環節多於兩層的。不過，在實際應用中，也有少於兩層的。如下例：

23. 初元五年八月己酉

初元五年八月丙午臨桐燧長仁敢言之 官檄

初元五年 初元五年八月丙午甲渠鄯侯告尉謂士吏

初初

311·15A、B、C、D, A8 破城子

這裏，甲渠候在接到下層的報告後，便直接把處理意見用“告”、“謂”句式下行至部屬。一步便到了基層，也就無需繼續下行了。

在分析了幾例應用“告”、“謂”句式的文書簡冊之後，我們大致可以將其中的“告”、“謂”句式分為兩大類。一類為“下行始發文”的“告”、“謂”句式。如：例 3 中的“敢告卒人”一句^①，例 21 中第二行的“使主客部大夫謂”一句，等等。一類為“下

① 變通地講，其實“敢告”也有下行的意味。《釋名·釋書契》云：“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己意也。”既然上敕下曰告，那麼對於秩級相差無幾的郡級官員互相發文布署任務時，在通用的“告”字前加一個“敢”字，倒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儘管前面我們把“敢告卒人”稱為平行文書中的用語，這裏卻把“敢告卒人”句式放在了“下行始發文”之列。

行轉發文”的“告”、“謂”句式。^①這一類例子很多，如例3中的後兩個“……謂……”句，例22中的“……告……謂……”句，等等。兩類的區別主要有兩點：（1）兩者在文書簡冊中的位置不同。第一類一般位於文書正文的起始或靠近起始的位置，第二類則位於文書正文的尾部，是逐層附加上的。（2）兩者署日期的方式不同。第一類中，年月日均署寫齊全，第二類則僅署月日。

前面引述的諸多下行類文書的例子都是事務性的（即著眼於調查解決問題、布置任務等）。而“告”、“謂”的應用在一些通告類的下行文書中也有體現。當然在用法上並無不同。請看下面兩例。

24. 牒書吏遷序免給事補者四人人一牒

建武五年八月甲辰朔丙午居延令 丞審告尉謂鄉移甲渠候官聽書從事如律令

E·P·F22: 56A

25. 監遮要置史張禹罷

守屬解敞今監遮要置

建昭二年三月癸巳朔丁酉敦煌太守彊長史章守部候修仁行丞事告史敞謂效穀
今調史監置如牒書到聽與從事如律令

三月戊戌效穀守長建丞 謂縣泉置嗇夫寫移書到如律令/掾武卒史光佐輔

II 0216②: 241、242、243、244, 釋粹, 76

那麼，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即，是不是所有官文書在下行時都採用“告”、“謂”句式來表示這種層遞關係呢？答案是否定的。考察當中，我們發現下行之詔書不在此列。詔書下行之成例可參見大庭脩《漢簡研究》^②一書中復原的“元康五年詔書”及“永始三年詔書”，這裏不再贅引。其特點主要是以“下”字來表明逐級的層遞關係。下面試舉幾支疑為詔書冊中散簡的例子。

26. 九月甲戌甲渠候 下尉謂第四候長憲等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書到言

掾 兼尉史嚴

E·P·F22: 452

27. 十二月乙丑張掖太守延年長史長壽丞樊下居延都尉縣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

律令/掾段昌卒史利助府佐賢世

E·P·T52: 96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收集相關簡文時，看到一些“傳”類文書中有“謂”字

① “下行始發文”與“下行轉發文”的稱謂及解釋，請參見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157—158頁。

② 大庭脩：《漢簡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的運用，其主語與賓語亦符合我們歸納的原則。不過，我們最後還是將其從討論中排除出去了。這是因為“傳”作為一種通行證明，其文辭中“謂”的用法體現的絕不是上述的那種層遞關係。最主要的是，我們還發現，“傳”文書中，當發文主體為“太守某”時，用“謂”作動詞，而當主體變化為縣令長或候官首長時，動詞則變成了“移”字。^①看來，“傳”類文書中的用詞還另有規則。我們只能期待以後有機會再探討了。

四、“行書”文書中“告”“謂”句式

在眾多相關材料的爬梳整理過程中，我們發現，除了下行文書正文中存在“告”、“謂”句式外，還可以從“行書”^②的文例中找到一些該類句式的影子。比如：

28. 太守府書塞吏武官吏皆為短衣去足一尺告尉謂第四守候長忠等如府書方察不變更者●一事二封 七月庚辰掾曾佐嚴封 E·P·T51: 79

29. ●俱起燧長程偃等皆能不宜其官換如牒告尉謂誠北候長輔●一事二封八月丁亥士吏猛奏封 E·P·T52: 18

30. □□□□吏毋得離署告尉謂候長常勳等 ●一事一封 3·28, A8 破城子

以上三例屬“行書”文書中的發文記錄。其中“告”、“謂”句式是對文書正文的截取，用於指明所封文書所需下行層遞的對象。發文記錄是文職吏員處理文書的常規登記制度的產物，主要用於吏員的考課。由於此一級發文的主體就是當地機構的長官，無需反映在發文記錄中，所以就被略去了。

除發文記錄外，“行書”文書中的函封與收文記錄也有體現“告”、“謂”句式的例子。見下：

31. 九月戊辰居延都尉湯丞 謂甲渠如律令 /掾弘兼屬駿書佐晏（正）
甲渠 居延都尉章 即日起府 九月辛未第七卒便以來（背）

E·P·T50: 16A、B

32. 五月丙寅居延都尉德庫守丞常樂兼行丞事謂甲渠塞候寫移書到如太守府書律令 /掾定守卒史奉親（正）

① 參見 170·3A, E·P·T51·171。

② 關於“行書”類文書的研究，請參見李均明《漢簡所見“行書”文書述略》，載《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

甲渠 章曰居延都尉章 五月甲戌臨桐卒馮弘以來（背）

E·P·T51: 190A、B

函封相當於盛裝文書正文的封皮，一般會標明寄送的目的地，並在封泥匣中塗泥蓋印。郵件送到之後，收件單位的相關人員一般會在函封封印的一面書寫收文記錄。主要是抄錄印文並記下送信人和送信時間。上面兩例中簡背內容正是函封與收文記錄的體現。不過，我們這裏關心的是此類簡文正面的內容。通過我們上面對使用各種“告”、“謂”句式的兩類文書的區分原則，可以斷定，此兩例正面的文字就是文書的正文，而且是附于始發文之後的表示層遞關係的正文文辭。

由於簡文出土的局限，我們能看到的僅有自都尉府發至甲渠候官的函封及收文記錄、自甲渠候官下行的發文記錄，所以應有的“行書”過程自然無法通貫，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五、秦漢“告”“謂”句式對比

前引王充之語在述及兩郡間文書用語習慣時，實際也涉及到了兩縣間文書中的用語習慣問題。揣王充之意，兩縣間文書是絕無“敢告卒人”之辭的。試圖從漢簡中印證，結果也很令人失望。我們見到的僅有“縣令某丞某告尉謂……”的例子。同兩郡間文書一樣，兩縣間文書在漢簡中也未見一例。不過有幸的是，我們在秦簡中找到了。

33. 卅二年四月丙午朔甲寅遷陵守丞色敢告酉陽丞主令史下絡帛（裙）直書已到敢告主 J1⑧157 正面

34. 廿八年八月戊辰朔丁丑酉陽守丞□敢告遷陵丞主亭里士五順小妾□餘有律事□□□□遷□令史可聽書從事□□□/八月甲午遷陵拔謂都鄉嗇夫以律令從事/朝手即走印行都鄉八月壬辰水下八刻隸妾以來/□手 木□手 J1⑨984

上面的兩例是十分明確的兩縣間的平行文書。尤其是從簡 33 中看到的“敢告……主……敢告主”的配對現象，可以斷言，秦代兩縣間文書稱“敢告”，而無“卒人”之稱。那麼能不能由此來推論漢代沿用秦制，在兩縣間文書中稱“敢告”呢？恐怕還不行。因為通過秦簡、漢簡文例的對比可以看到，兩者還是有一定差距的。在秦簡尚未全部公佈以前，我們只能採取這種保守的做法。

先看下面這支簡文：

35. 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禮謂縣嗇夫卒史嘉段（假）卒史穀屬尉令曰……

它如律令

二月丙辰遷陵丞歐敢告尉告鄉司空倉主前書已下重聽書從事尉別都鄉司空（司空）
傳倉都鄉別啟陵貳春皆弗留脫它如律…… J1（16）5

初看起來，這支簡很合我們上述分析的“告”、“謂”句式的規範。前面年月日齊全的一段為“下行始發文”，在初始文的内容敘述完之後，隨後附上僅有月日時間表示的層遞關係句式。總體上與漢代文書並無二致。不過，其中細節上的差別也是很明顯的。首先縣丞對縣尉亦稱“敢告”，與漢代用“告”不同。其次在申明層遞關係一節，儘管級別上有多層，卻見不到“告……謂”的組合，反而是“敢告……告……別……”之句式。與漢代有極大的不同。

儘管我們依然無法確定漢代兩縣間文書的規範用語為何，但通過秦漢“告”、“謂”句式的對比，我們也看到了兩者之間的密切聯繫。可以說，文書程式上的相似也是“漢承秦制”的一個有利證據。當然，“漢承秦制”絕不是一成不變的因襲，漢代在各項制度上實際都相對秦而言有所變化。而說得更確定一點，這是一種發展，是走向成熟。對文書用語的初步考察，已經讓我們對此有了一層體會。試做簡要說明。在對秦簡“告”、“謂”句式作歸納時，我們發現很難找出一個確定的層級關係搭配來。比如：

36. ……遷陵守丞敦狐告都鄉主以律令從事/建手□□甲辰水十一刻（刻）下者十刻不更成里午以來/肄手 J1（16）9 背面

37. 告臣 爰書：……●丞某告某鄉主……到以書言。 封診式，259 頁

從上面兩例可以看出，縣對鄉稱“告”，但例 34 中卻用的是“謂”字。如何解釋這樣的現象呢？不管此例用詞不一的現象是否另有原因，結合上面我們對秦漢文書用語細微差別的討論，我們似乎可以對秦代有這樣一個初步判斷：秦代的機構建制遠比漢代混雜（尤其是在下層）^①，因此在文書往來中也自然會出現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對應這一關係的用詞。而僅就這點來講，漢代在秦的基礎上有了很大的進步，文書用語中體現出的中規中矩，難道不是很好的說明嗎？

毋庸置疑，秦漢簡牘的大量出土，為秦漢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寶貴的一手史料。但由於簡面殘破者佔了出土簡牘的絕大部分，使我們對這類一手史料的利用實際上大打折扣。

① 此處講“混雜”，並非說秦代的機構建制沒有秩序。彭邦炯說：“漢雖承秦制，也不是一成不變，而且《漢書》所講‘某官，秦置’，‘掌某事’，更不一定是指春秋戰國以來直至統一六國後的秦官制；這裏有一個社會變革引起的變化問題。春秋戰國時代是新舊社會發生大轉變的時期，隨著社會經濟基礎的鉅變，包括官制在內的整個上層建築都在變，秦國變化尤劇，它由原來一個地處邊陲的落後小國，變成了一個強大的最後完成統一的大國。作為國家機器結構的官制變化也很突出；春秋時代的秦官，到戰國時代有所變化；戰國時代的秦官，到統一六國後又有變化，往往職官名稱相同，而它的職責分工卻與前大不一樣。”（彭邦炯：《從出土秦簡再探秦內史與大內、少內和少府的關係和職掌》，《考古與文物》1987 年第 5 期）。當然，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並非本文的幾句話能解決的。

那麼，如何能夠更大程度地挖掘這些殘斷史料的價值，則是我們不可回避的問題。對其中文書類內容的用語研究，應該說是一種值得探討的思路。^①就目前我們對“告”、“謂”句式的認識，這種研究方式至少對兩方面的工作是有意義的。第一即是簡文的釋讀和理解方面。比如：

38. 黃田以次傳行至望遠止（下有封泥匣）

十二月辛未甲渠候長安候史個人敢言之蚤食時臨木隧卒□□□□□□□□□□□□
舉蓬 燔一積薪虜即西北去毋所死亡敢言之 / 十二月辛未將兵護民田官居延都尉渭
城倉長禹兼行〔丞事〕……寫移疑虜有大眾不去欲併入為寇檄到循行部界中嚴教吏卒驚
烽火明天田謹跡候候望禁止往來行者定蓬火輩送便兵戰鬥具毋為虜所萃槩已先聞知失
亡重事毋忽如律令 / 十二月壬申殄北甲〔渠〕……候長護 V 未央候史包燧長畸等疑虜
有大眾欲併入為寇檄到護等各循行部界中嚴教吏卒定蓬火輩送便兵戰鬥具毋為虜所萃
槩已先聞知死亡重事毋忽如律令

278·7, A10 瓦因託尼

在上面我們對上行文書分析的基礎之上，我們大致可以將此觚分為三段，第一段為“十二月辛未甲渠候長安候史個人敢言之”的上行階段，第二段為居延都尉與丞所言一段，第三段即為殄北與甲渠候官下某候長一段。我們的判斷是：後兩段是下行階段，其中觚中兩處文字殘斷處應該是“……謂……”的句式，以顯明其下行層遞的關係。^②如果我們的判斷不錯的話，這倒是一條非常有意義的材料，因為它似乎可以為第四部分“‘行書’文書中‘告’、‘謂’句式”補上另外一個環節，即發文記錄中所言及的發至候部一級的郵書實體。當然，由於該文書是公開類文書，因此上面只有函封“廣田以次傳行至望遠止”的字樣，而沒有收文記錄的痕跡。可見，對於一類句式的把握，可以很大程度地豐富我們對簡文內容及含義的理解。

此類句式的研究還有一方面意義，就是通過“告”、“謂”句式中所體現出的等級搭配關係來研究不同官稱的秩級或隸屬。比如：

39. 二月戊寅張掖大守福庫丞承熹兼行丞事敢告張掖農都尉護田校尉府卒人謂縣律
曰臧它物非錢者以十月平賈計案戌田卒受官袍衣物貪利貴賈賁予貧困民吏不禁止浸益
多又不以時驗問

4·1, A8, 破城子

① 這方面，前輩學者實際已經做了相當多的嘗試，尤其是對於簡牘中慣用辭彙的考釋方面更為突出。如于豪亮先生《居延漢簡校釋》（《考古》1964年第3期），裘錫圭先生《漢簡零拾》（《文史》1981年總12輯）等均屬於此類代表作品。另外，一些簡牘的釋文書籍中，一些有關簡牘文書學的著作中也時有涉及。不過，成果雖有，卻過於零散。如何能夠將這些成果綜合起來，並進一步拓展此類研究，是我們需要努力的方向。

② 筆者按：李均明先生曾對此簡有詳解。見李均明《封檢題署考略》，《文物》1990年第10期。其中對第三段的解釋與我們的判斷不大一致。

簡文中所見的“農都尉”就是在隸屬關係上頗多爭議的官稱。^①本文當然還無法解決這一問題，但起碼提供了思考問題的一個角度。

最後，還應該指出的是，儘管絕大多數相關簡牘可以在我們的範式框架內得到很好的解釋，但依然有個別目前無法很好地解釋，暫列於下，祈望能有專家學者給予指點。

40. ……長□□行大守事守丞宏移部都尉謂官縣大將軍莫府移計簿錢如牒……莫府錄律令（E·P·F22：173A）

41. 河平三年八月居延都尉承告甲渠郭候韋受□…… E·P·S4·T2：5

^① 參見趙儷生先生主編《古代西北屯田開發史》，甘肅文化出版社，1997，46—48頁。其中所引述各家的觀點比較全面。

談漢代碑刻、簡牘中的賻贈名籍

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 汪桂海

內容提要 賻贈是古人用來幫助死者家屬辦理喪事以及日後生活的一種禮俗。漢代的賻贈風俗比較盛行，文獻中有一些記載，但不多。碑刻、簡牘中則有不少直接的材料，可以彌補文獻的不足。本文搜集、分析了碑刻、簡牘中的賻贈名籍資料，總結了此類名籍的特點以及當時通行的賻贈標準，對進一步研究漢代的喪葬禮俗有一定的意義。

關鍵詞 賻贈 喪禮 碑刻 簡牘

古代有人去世，鄰里親朋或他人往往向死者親屬贈送一定數量的錢財和用品，用來幫助死者親屬辦理喪事和日後的生活，這就是賻贈制度。贈送的物品按照類別各有不同的名稱。《荀子·大略》：“貨財曰賻，輿馬曰贈，……賻贈所以佐生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贈者何？喪事有贈。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贈，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史記·魯仲連列傳》：“鄒魯之臣，生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正義》：“衣服曰襚，貨財曰賻，皆助生送死之禮。”賻贈在當時已經成為較固定的喪葬禮俗。當時贈送佐理喪事的物品基本是固定的，主要包括車馬、錢財、衣物三類。春秋戰國時，諸侯王死後以車馬陪葬的例子較多，且得到考古發現的證明，說明賻贈物品的一部分是用來作為陪葬品使用的。

賻贈之制產生較早，春秋戰國文獻中對周王室和諸侯國的賻贈之制有清楚的記載，有人也已經做過一些探討。^①這裏不擬贅述。本文要說的主要是漢代賻贈禮俗中記錄賻贈物品的簿籍。

史書記載表明，賻贈之禮在漢代依然很盛行。首先，諸侯王去世或重要官員死于職任，朝廷通常贈賜其家人以錢或物，以示慰問。《漢書·何並傳》，何並為潁川太守，病逝前，遺命其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顏師古注引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後漢書·羊續傳》，南陽太守羊續，“征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賻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敕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杜詩傳》，杜詩為南陽太守，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這說明，漢代二千石以上官員死于任內者，其家屬皆可按照規定，得到百萬左右的賻錢或千匹絹帛。

“典”即典制、制度，可見漢代已經把針對高官的賻贈作為一項制度而確立起來，有了固定的標準。

諸侯王得到的賻錢或絹帛更多。《後漢書·中山簡王傳》：“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十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十萬、布帛萬匹。”同書《濟北惠王壽傳》：“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為十萬，布萬匹；嗣王薨，五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十萬，布三萬匹。”

朝廷給予的賻贈之外，來自各種社會關係的賻贈也不少。《漢書·朱建傳》：“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辟陽侯乃奉百金祝。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漢書·遊俠·原涉傳》：“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十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贈。”《漢書·儒林·歐陽生傳》：“元帝即位，（歐陽）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漢書·敘傳》：王莽少與班旂友善，“旂之卒也，修緦麻，賻贈甚厚”。《漢口朝侯小子殘碑》云：“口僚贈送禮賻五百萬以上，君皆不受。”又銘辭云：“辭賻距贈，高志凌雲。”^②《論衡·量知篇》：“貧人與富人俱齎錢百，並為賻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為富人饒羨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為財富貧富皆若一也。”以上諸例，其為賻禮死哀之家者或為友朋，或為屬吏，賻錢之數雖多寡不一，但似乎當時最低的額度不低於百錢，故有《論衡·量知篇》所說的貧困之家不易湊足其數的情況。

① 曹瑋：《東周時期的賻贈制度》，《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6期。

② 周進：《居貞草堂漢晉石影》三六《漢口朝侯小子殘碑》，1929。

二

作為喪禮的一項內容，賻贈錢物者的名字和所送錢物需要登記下來。《儀禮·既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書賻于方，若九、若七、若五。”鄭玄注曰：“方，板也。書賻莫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板，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這種登錄賻贈錢物者的名籍在史書中是很難有所保留，在碑刻和簡牘等出土資料裏卻經常可以見到。例如《隸釋》卷五《酸棗令劉熊碑陰》羅列了一百餘人的人名與錢數，從內容上看，應是向劉熊家屬賻贈錢者的名籍。這裏僅摘抄其中的數例，以見其格式：

.....

故外黃守令尹松大德五百，

故雍丘守令李保世德三百，

.....

故守東昏長蘇勝德陽二百，

故五官掾王暹宜孟二百，

故雍丘守令王習叔河三百，

故都郵左位宣高二百，

.....

故郡曹史李豫妙高二百，

.....

故列掾李表憲台二百，

故郡文學李義子仁二百，

故浚儀守丞李璜伯瑰二百

.....

故主簿衛宣宣台二百，

.....

從掾位李奉奉明二百，

.....

處士李相成祖二百，

.....

好學魯庠子序二百

.....

洪适跋云：“右劉熊碑陰，其可見者百八十人，不書郡邑，皆酸棗人也。其稱‘故華長’、‘故雍丘令’之類，則邑之薦紳大夫也；其稱‘故郡文學’、‘故都郵’之類，則嘗吏於郡者也；其稱‘從掾位’，則酸棗之吏，而不稱故吏，則可見劉君之在官也。處士之後有好學四十餘人，必泮宮之後進以處士爲丈人行者。其間有德行一人，必是嘗貢孝察廉者。”^①按，贈錢者皆酸棗縣人，則劉熊必卒于任內，碑文所錄乃酸棗縣人賻贈劉熊家屬者。據碑文，賻贈錢者約一百八十人，錢的數額多少不一，其中二百錢者七十七人，三百者三十三人，四百錢者一人，五百錢者三十人，因碑文殘泐，另有三十九人所送錢的數額不很清楚。

《隸釋》卷九《婁壽碑陰》所刻文字與《劉熊碑陰》相近，也是賻贈錢者的名籍。贈錢者共五十四人，除兩人分別爲南郡、汝南人外，其餘未注明籍貫者皆應與婁壽同屬於南陽郡。婁壽終生在鄉里傳授經學，未嘗接受郡縣禮請。碑陰所記贈錢的人員有曾爲縣令者，有曾爲掾史者，也有未曾出仕過的處士，他們都應是婁壽的門生。每人所贈錢數與《劉熊碑陰》相近，除了十二人的錢數因碑文殘泐而不清楚外，計一百錢者二人，二百錢者二十人，三百錢者八人，四百錢者二人，五百錢者六人，一千錢者三人，五千錢者一人。

此種名籍在漢碑中尚有《太尉陳球碑陰》^②，記錄故吏、故民凡四十人，各有賻錢之數。其中二百錢者八人，三百錢者五人，五百錢者十一人，一千錢者三人，二千錢者一人，因碑文殘泐而不能肯定其錢數者十二人，其餘則原記錢數完全殘泐。此僅爲陳球曾爲郡守的魏郡吏民的賻贈名籍，其它的賻贈尚不在其內。

《太尉劉寬碑陰》^③刻劉寬門生名籍，存者凡二百五十三人，知其賻贈錢者凡八十六人，其中，二百錢者三人，三百錢者二人，四百錢者一人，五百錢者四十五人，一千錢者二十五人，二千錢者一人，一萬錢者一人，因碑文殘泐，數額不確定者八人。

碑刻之外，出土簡牘中的這類例子也不少見。比如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一枚編號二的木牘，裘錫圭先生曾說此木牘“性質無法判斷”^④。從格式、內容以及出土地點分析，應爲一件賻贈錢名籍：

載翁仲七十	王翁季五十	揚公子卅
莊伯五十	胡兄五十	靳悍卅
□小伯五十	袁兄五十	張父卅
□翁仲五十	汜氏五十	

① 洪适：《隸釋》卷五，中華書局，1985，65—68頁。

② 洪适：《隸釋》卷一〇，111—112頁。

③ 洪适：《隸續》卷一二，401—407頁。

④ 裘錫圭：《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簡牘考釋》，《文物》1974年第7期。

陶仲五十 姚季五十
王它五十 張母卅 張蒼卅

(以上爲正面)

不予者 陳黑 宋則齊

(以上爲背面)^①

該墓的主人名偃，是一位閭里的里正。木牘記錄了在他死後爲之賻贈錢者的情況，賻贈錢的數額主要爲四十錢、五十錢兩種，只有一人送了七十錢，此外沒有更多的。木牘背面甚至書寫了兩位未賻贈錢者的名字。

江蘇連雲港東海尹灣 6 號漢墓出土兩枚木牘，上面書寫的內容也是賻贈錢名籍。其中木牘 M6D7 的釋文如下（有節略）：

王季卿二百 英小君二百 張稚翁五百 陳君嚴二百 蔡君長三百
□□卿二百 華君實百
莊子孝三百 塗真卿二百 王君都五百 夏稚卿二百 陽況遊功二百
陳君長二百 弓長叔二百
陳子河三百 淳于子上百 王都卿三百 單君仲二百 朱子上二百
莒子高三百 □君伯二百
莒子元三百 戴少平百 周君兄五百 羊子張三百 王公文三百
張君長三百 京君兄百
陳君兄五百 裴子真二百 陳少平五百 茅初卿二百 戴孝卿二百
薛子僑二百 薛君長二百
朱謁公千 程長孟三百 朱君房二百 番次翁二百 許君功三百
朱長紿二百 □紿君三百
梁君長二百 師子儀二百 劉子嚴三百 塗長史二百 朱中實二百
華喬卿二百 處初卿百
.....
.....

(以上爲正面)

□莒少平百 淳于君房二百 華君實 李林卿
□□□百 州君遊二百 朱中實 劉子嚴

① 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文物出版社，1990，67 頁。

塗子平二百	王季卿	薛元功
賁君長二百	罕子張	□君房
薛子孝二百	于子勢	朱三石
□子家二百	□孫卿	●外大母
王君功二百	孫都卿	
□元卿二百	戴子然	
師君長五百	京君兄	
永始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蔡君長	
	莒威卿	

(以上爲背面)

《尹灣漢墓簡牘》119—120 頁

又如木牘 M6D8 正面的釋文：

蕭主簿	□少君	陳君嚴	●蔡君長二百
劉子嚴	公父游君	蕭子□	李林卿二百
薛君上	□長實	孫少卿	(其餘刪略)
師君長	塗君都	張□君	
共千錢	□師子實	師君長	
	盛中子	冬利君嚴	
	陳君長	□中叔	
	鐘中子	于子嚴	
	朱子高	王大卿	
	王君兄	●右廿二人錢五百	
	毛君卿	罕子張百	
	□子□	戴子然百	

之長安 淳于君房

《尹灣漢墓簡牘》121 頁

應該說明的是，尹灣的這兩枚木牘在各自的末尾分別用黑圓點標有“外大母”、“季母”兩個稱謂。《漢書·文三王傳》：“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共王母曰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共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木牘中的外大母似應指墓主師饒的外祖母。季母則應指師饒的叔母。《後漢書·西域傳》：“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于閭吾陸谷，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百人。”又據《三國志·魏書·辛毗傳》裴松之注引《世語》，晉羊祜呼叔父羊耽妻爲季母。

出土於同一墓葬的這二枚木牘之所以特意標出“外大母”、“季母”兩個稱謂，應當表示這兩枚木牘上所記錄的分別是向墓主師饒的外祖母和叔母賻贈錢者的名籍。

尹灣木牘記錄的賻錢數額以二百、三百、五百居多，最多的為一千錢，少的為一百錢，最少的是第二枚木牘（M6D8）中的“□少君”至“王大卿”等二十二人合湊五百錢為賻禮，平均每人不足二十五錢。

尹灣 6 號墓的前一件賻錢名籍背面第二欄最末一行文字為“永始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當是師饒喪事辦理的時間，也是該名籍製作的時間，該賻錢名籍應終止於此。之後的第三、第四兩欄只抄錄了一些人名，每個人後面卻沒有相應的賻錢數。經核對，第三欄中的華君實、朱中實、京君兄、蔡君長四人已經見錄於名籍的前半部分，疑此四人皆屬於出力幫助辦理喪事者。《漢書·陳平傳》：“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華君實等四人不僅向喪家贈送了賻錢，而且還出力侍喪，所以又有另外的列名。此四人之外的其它數人，則應屬於家貧無力出賻錢、僅出力侍喪者。

尹灣 6 號墓的後一件賻錢名籍正面第一欄在記錄了蕭主簿四人共出的賻錢數後，末尾又補記了“之長安”三字。蓋此時蕭主簿等四人早已經離開東海郡，到長安辦理公事，四人共同賻贈的千錢當非他們親自決定的，應是他人根據情況代替四人所出的，故而有此說明。有人根據“之長安”三字，認為此木牘所記錄的或為墓主去長安外徭，東海郡吏員所捐助的旅費^①，所言不確，應予糾正。

《儀禮》及鄭玄注說賻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書寫於板牘，鳳凰山與尹灣出土賻錢名籍皆書於木牘之上，所記錄的內容包括兩項，即人名、錢數。它們是當時實際使用的物件，從而印證了《儀禮》記載與鄭玄之解說。漢碑中保留的賻贈名籍資料與木牘記載的在各個方面基本一致，可以肯定是根據當時的賻贈名籍刊刻於墓碑上的。

下面再將各碑刻、簡牘中的賻錢數額列表，作一簡單統計：（單位：人）

錢額 \ 碑、牘（死者身份）	劉熊碑陰 （縣令）	婁壽碑陰 （經師）	陳球碑陰 （太尉）	劉寬碑陰 （太尉）	鳳凰山 木牘 （里正）	尹灣木牘 （郡功曹 史）	合計
二十至三十錢						22	22
四十錢					5		5
五十錢					10		10
七十錢					1		1
百錢		2				35	37
二百錢	77	20	8	3		95	203

① 滕昭宗：《尹灣漢墓簡牘概述》，《文物》1996 年第 8 期。

二百五十錢						4	4
三百錢	33	8	5	2		18	66
四百錢	1	2		1			4
五百錢	30	6	11	45		9	101
千錢		3	3	25		2	33
二千錢			1	1			2
五千錢		1					1
萬錢				1			1

從表中的統計可以看出幾個特點。首先，漢代民間每人所出賻錢數額的多少與死者的身份地位有一定關係。死者若為鄉里小吏以下，賻贈標準通常是每人出數十錢；死者若為經師或縣令，賻贈標準通常是每人出二百至五百錢，而以二百錢居多；死者若為郡府掾史，賻贈標準通常是每人出一百至三百錢，亦以二百錢居多；死者若為郡守乃至三公等高官，賻贈標準通常是每人出五百錢或千錢。劉寬官至太尉，其門生所出賻錢有的甚至高達一萬。

在察舉制度的影響下，東漢門生、故吏和經師、府主的關係比較緊密，漢碑中經常可以見到登載門生故吏的名籍，反映了他們之間的這種關係。門生故吏為死去的經師或府主賻贈錢，共同協助其家屬來辦理喪事，這在當時是很常見的事情，一點不奇怪。

賻贈錢額的多少除了與死者的身份地位有關係之外，也應與送錢者的經濟能力有關聯，但是也不能完全反映送錢者的經濟能力。《論衡》說貧人與富人俱齋百錢，並為賻禮死哀之家，就表明當時賻贈錢大致上有一個普遍認可的標準。從表中也可以看出，結合死者的情況，漢代人賻贈錢的數額基本集中在數十錢、百錢、二百錢、三百錢、五百錢、千錢這六個標準。這一總結儘管不夠全面，但應是真實的。

其次，賻贈人數的多少與死者的社會影響力直接相關。死者生前的社會影響力越大，為之賻贈的人就越多，特別是身居郡縣以上官位者和傳授經學的經師，他們往往有大批的門生故吏追隨，具有很大的社會影響，賻贈的人也格外地多。太尉陳球曾一為縣令三為郡守，碑文所記錄的僅魏郡吏民的賻贈人數即有四十人。太尉劉寬死後，賻贈的門生當不下百人。劉熊官為縣令，死後，來自酸棗縣社會各界的賻贈人數也有一百多人。

鳳凰山與尹灣的兩份賻錢名籍所記錄的賻錢數額相差數倍乃至十倍、二十倍，四十餘倍，同時參加賻贈的人員多寡相差懸殊，也反映了兩個墓主的不同身份和社會影響。鳳凰山漢墓墓主偃是一位間里的里正，其社會影響力大致在所居住的間里範圍內，贈送賻錢者基本為同鄉里的平民，故賻錢不多。尹灣 6 號漢墓墓主師饒為東海郡功曹史，地位明顯較里正偃要高，社會影響範圍也更廣泛些，送賻錢者除了東海郡府屬吏，也應有東海郡管轄下的其它吏民，故人員多，賻錢數額也大都比較高。

再次，尹灣出土第二枚木牘（M6D8）中有五百錢是二十二人合湊的，這頗值得注意。此二十二人極有可能是經濟上比較困難，但礙於某種壓力，不得不儘量表示，因能力有限，所出賻錢甚少，故合夥共出賻錢。前引《原涉傳》有“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的話，說明賻錢在某種程度上是徵收賦斂來的，不是完全出於個人自願。尹灣木牘的二十二人合夥賻贈極有可能有著與此類似的背景。又鳳凰山木牘背面特別書寫了兩位未賻贈錢者的名字，也隱約透露出漢代鄉官行事的霸道以及賻錢助葬帶有一定的強制性。這種現象的形成與漢代豪強地主經濟、人身依附的發展有著割不斷的聯繫。

賻贈名籍與遣策既有聯繫，也有區別。其聯繫在於，賻贈名籍與遣策所記錄的錢物在名義上都是給予死者的，遣策所載之物是陪葬品，賻贈名籍也要向死者誦讀。《禮記·既夕禮》：“主人之史請讀賻。”《檀弓》也提到“讀賻”。孫希旦《集解》云：“讀賻，謂書賻于方，將行，主人之史當柩東前束讀之也”，這是向死者報告。賻贈之物的一部分用來給死者陪葬使用，因此在遣策中也有記錄。賻贈名籍與遣策在古代墓葬中都有發現。但有的賻贈錢物並不是用來陪葬，而是幫助死者親屬生活所需的，這部分錢物則不會見於遣策。

《禮記·檀弓》記載，子柳為母親辦完喪事之後，把吊喪者贈贈的剩餘財物“班諸兄弟之貧者”。在《既夕禮》中明確把賻贈簿籍與遣策區分開，云“書賻于方，書遣於策”。

說“步兵還民”^①

中國文物研究所 胡平生

內容提要 走馬樓吳簡舊釋為“步侯還民”一語有幾種解釋，本文從“侯”、“兵”二字字形相似易混淆入手加以討論，改釋為“步兵還民”，解釋為軍人步兵復員恢復平民身份，並證以傳世文獻中的“還民”。進而改釋原 2301 號簡之“呂侯都尉”為“步兵都尉”，即“步兵校尉”。

關鍵詞 步兵 還民 步兵都尉

整理研究簡牘，最要緊的是認字。只有正確地釋讀文字，才可能理解簡牘的意義，進而作為可以依憑的史料加以利用研究。目前，我們釋讀簡牘文字還需再三斟酌，不僅是非常繁難的戰國楚簡文字如此，就是看起來已經基本上是楷書的三國吳簡文字也是如此。在長沙走馬樓吳簡中有一個詞叫“步兵還民”，在王素先生的《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以下簡稱《新收穫》）中釋為“步侯還民”^②，認為這個“步侯”，就是臨湘侯步騭。

“還民”的意思是“還給居民”。文中公佈的兩枚簡是：

§ 1 右西鄉入步兵還民[限米]一斛四斗 （1532）

§ 2 入都鄉嘉禾二年步兵還民限米一斛 （1556）

（見附圖一）

① 2000 年夏初稿，2005 年春 2 稿，2006 年夏 3 稿。2007 年元月寫定於臺北。

② 王素等：《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文物》1999 年 5 期。

這兩枚簡已經收錄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第二卷《竹簡[壹]》。^①《新收穫》引《吳志·步騭傳》所記，說步騭從延康元年到黃龍元年在長沙待了十年，此後雖然離開了長沙，但由於被封為長沙郡治臨湘縣侯，在長沙地區仍有廣泛的影響。該文認為，上引二簡“所稱‘步侯’，無疑均指步騭”，並猜測說，“大概步騭在漚口徵召士兵過多，糧食不足，曾向當地居民商借不少限米，以至離開漚口四年，尚未將限米還完。其時，步騭不在長沙，主持還民限米事務的應是臨湘侯國”云云。

後來，孟彥弘先生發表《釋“還民”》一文^②，不同意《新收穫》將“還民限米”解釋成“歸還民之限米”，他認為，“還民”似指歸附之民，即過去曾一度脫籍者。其引《三國志·魏書·魏覲傳》文：“至長安，道路不通，覲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孟文的結論是：“可知，這些一度流亡而重新歸籍的百姓，當時被稱作‘還民’”，“簡中的‘步侯還民’，似指這些歸附之民，原本是歸步侯所領者。因此，倉庫在收到他們繳納的限米時，標明是‘步侯還民’所應繳納之限米”。

這兩枚看似簡單的短簡，卻涉及到兩個很重要的問題，一個是所謂的“步侯”究竟是不是應當釋為“步侯”，究竟是不是步騭；一個是“還民”到底是什麼意思，是“歸還”的意思，還是“歸附之民”的意思，抑或是其它的意思。

我們認為，兩簡中的“步侯”，其實都應當釋為“步兵”，因此與步騭無關：“還民”的意思也不是上述兩文所理解的意思，而是“復員”，即“恢復平民身份”的意思。下面，分別加以申論。

我們將“步侯”改釋為“步兵”的想法，由來已久。最初由於《新收穫》沒有公佈兩簡照片無法得到印證，後來我想起在整理《嘉禾吏民田家荊》時，看到過一個混入“田家荊”大木簡的殘片。這個原本不屬於“田家荊”的木牘，不知何故和大木簡“田家荊”一起拍了照，我們在整理時將它剔除。我從照片資料中找到了這張編號為 1974 的木牘。（見附圖二）木牘文字如下：

其卅九斛三斗[租]米

其一斛四斗復民租米

其一百七斛吏帥客限米

……斛……限米

（第一欄）

其二斛……

其廿六斛金民限米

① 文中所引走馬樓吳簡竹簡簡文，除特別注明者外，皆見《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第二卷《竹簡[壹]》，文物出版社，2003。

② 孟彥弘：《釋“還民”》，《歷史研究》2001年4期。

其十三斛步兵還民限米。

其二百六十七斛三斗司馬黃松限米 (第二欄)

這枚木牘有殘缺，據文例，木牘原來最右邊有一行較大的字，是倉吏姓名及接受米穀總數，如《發掘簡報》例 7 所舉“州中倉吏郭勳、馬欽、張曼、周棟，起正月廿三日訖廿六日，受雜米三百八斛五斗八升”。此牘左側也有部分殘缺。可以依據這張照片並參考走馬樓吳簡第二卷圖版來討論“步兵”二字的字形特點與釋讀。

在漢代簡牘帛書及碑誌中，由於“侯”字都寫作“𠂔”形，與“兵”字的寫法很相像，在釋讀時，尤需注意。在馬王堆帛書中，“兵”與“侯”就有較相近的形態：

兵 𠂔 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趙怒而兵〈與〉王爭秦

侯 𠂔 “候”的偏旁，馬王堆帛書·胎產書：不觀木（沐）候（猴）。

見《馬王堆帛書文字編》

以下再舉一些漢碑、秦漢簡帛中“兵”和“侯（𠂔）”字寫法的一些例子。（引自《木簡字典》、《馬王堆簡帛文字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等。）

兵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侯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根據我們的考察，隸書寫法的“兵”字與“侯（𠂔）”的確很相似，“兵”字的字頭也寫成“𠂔”形，上部“斤”形的一豎上也添加橫畫，因此這兩個字有的時候看起來幾乎是相同的。不過，我們也看到，在比較“規範”的寫法裏，“兵”與“侯”的寫法還是不同的。主要的差別有三處：一是，“兵”字左邊一豎通常比較短，呈豎筆寫法，而“侯”字左邊一畫有時也寫成豎畫，但通常寫成一撇，或者在末梢處呈現撇勢，一般寫得稍長一些。二是，“兵”字上部的“斤”形，在豎畫上一般添加一短橫畫，而“侯（𠂔）”中心部位的橫畫一般有兩畫。三是，“兵”字下面的一橫畫一般稍長些，“侯（𠂔）”字下面的一橫畫一般稍短些。四是，“兵”字末一橫畫底下一撇一捺兩點一般分得比較大、比較開，“侯”字末一橫畫底下一撇一捺兩點一般分得比較小，比較窄。當然，這些差異都不是絕對的，都因不同的書家而各不相同，有的時候“侯”、“兵”兩個字是會混淆的。而到了楷書裏兩個字的寫法反而分得比較清楚了。在 1974 號木牘上，可以看出這個“兵”字與“侯（𠂔）”的寫法還是有些微小的差異，它的左邊一豎畫仍有向外的走勢，“斤”形豎畫上只添加了一短橫畫，末一橫畫底下一撇一捺兩點分得比較大、比較開。我們認為，這是“兵”字不是“侯（𠂔）”字。

從文義而言，這兩個字讀為“步兵”當然沒有任何問題。

其次要討論“還民”的意義。前面已介紹《新收穫》和孟彥宏的意見，我們認為，“還民”指恢復民籍，如果是軍人，“還民”就是“復員”，即“恢復平民身份”；其它各種身份的人恢復平民身份，也可以叫做“還民”。這種用法，在文獻中有許多例子。在《文獻通考》卷一五一《兵考二·兵制》中，稱為“還民伍”。秦漢編戶制度“五家為伍”，所謂“還民伍”，即恢復平民戶籍。其文曰：“（建武）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惟更賦如故。”^①

《續文獻通考》卷十三《戶口考·戶口丁》記至元十七年“敕軍戶貧乏者還民籍”，就直言“還民籍”。“還民伍”、“還民籍”，可省稱“還民”。

如，《魏書·夏侯道遷傳》記夏侯道遷奏表寫與蕭衍白馬戍將尹天寶作戰，其表云：

……臣即親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鋒苦戰。武興之軍，乘虛躡後。天寶凶徒，因宵鳥散。進既摧破，退失巢穴，潛舍軍眾，依山傍險，突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躬擐甲冑，率其所領，登即擒斬。戍內戶口，即放還民。斯由皇威遐振，罪人授首，凶狡時殄，公私慶快……

這是說，尹天寶軍遭到打擊後，解甲回鄉，恢復了平民身份。

又，《魏書·刑罰志》記世宗永平三年，符璽郎中等坐其弟逆反罪，除名為民，會赦之後，被旨勿論。尚書邢巒上奏云：

案季賢既受逆官，為其傳檄，規扇幽瀛，遘茲禍亂，據律準犯，罪當拏戮，兄叔坐法，法有明典，賴蒙大宥，身命獲全，除名還民，於其為幸。

這是說，將受到牽連的官員革除官職，降為平民。

又，《魏書·釋老志》記世宗即位後對僧尼加強管理，永平二年，沙門統惠深上言訂立戒律僧制：

諸州、鎮、郡維那、上坐、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內禁，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又，出家之人，不應犯法，積八不淨物。……或有不安寺舍，遊止民間，亂道生過，皆由此等。若有犯者，脫服還民。……僧尼之法，不得為俗人所使，若有犯者，還配本屬。其外國僧尼來歸化者，求精檢有德行合三藏者聽住，若無德行，遣還本國，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

這是說，對於不守戒律寺規的僧人，除去僧服，恢復平民身份，不准他們繼續為僧。

^①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五一《兵考二·兵制》，中華書局，1986，1314頁。

又，《周書·武帝紀上》記：

（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

這是說武帝禁佛、道二教，讓僧人、道士恢復平民身份。

《新唐書·玄宗本紀》記：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乙亥，耕籍田。大赦。侍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州司馬。賜陪位官勳、爵。征防兵父母年七十以上者，遣還民。酺三日。^①

這是說玄宗宣導尊老、優老，讓從軍兵士父母有七十歲以上的人復員，使他們能夠照顧服侍老人，克盡孝道。

綜上所述，走馬樓竹簡中的“步兵還民”都是指陸軍兵士復員回鄉，他們繳納限米的標準大概有一定的優惠，所以單獨列出。

這裏還需要討論一條釋為“吕侯”的“步兵”簡，見於走馬樓第二卷《竹簡[壹]》2301（見附圖三），釋文云：

□……[月]廿二日丁亥書給吕侯都尉陳□□□

所謂的“吕侯”二字寫作：

吕
侯

2301

我們認為，這裏的“侯”字應當釋為“兵”而不應釋為“侯”。而這裏的“吕”字似乎也與竹簡中其它的“吕”字寫法有別，此字下部不是“口”形，右豎向下然後又向左的一筆勾挑。以下是竹簡中所見的“吕”字的寫法：

吕	2257	吕	5151
吕	2326	吕	6268
吕	2378	吕	8022
吕	4662		

① 按，最後一句中華書局標點本在“還”字下斷句，讀為：“征防兵父母年七十者遣還。民酺三日。”

這些“吕”字，上下兩個“口”形都很完整，與 2301 所謂的“吕”字明顯不同。這個字或應當釋為“步”。“步”字本來從兩“止”（趾）一前一後，象邁步之形。在漢代簡帛中，“止”形往往被簡化，“步”字或寫作：

阜陽漢簡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河堤簡

馬王堆帛書

在走馬樓竹簡中，也有“步”字可以參照：

（一百廿步）

1377

（卅八步）

6239

從文義而言，竹簡中還有不少類似的辭例可以對讀：

[五]斗被督軍糧都尉嘉禾元年八月九日壬寅所書給武猛都尉（2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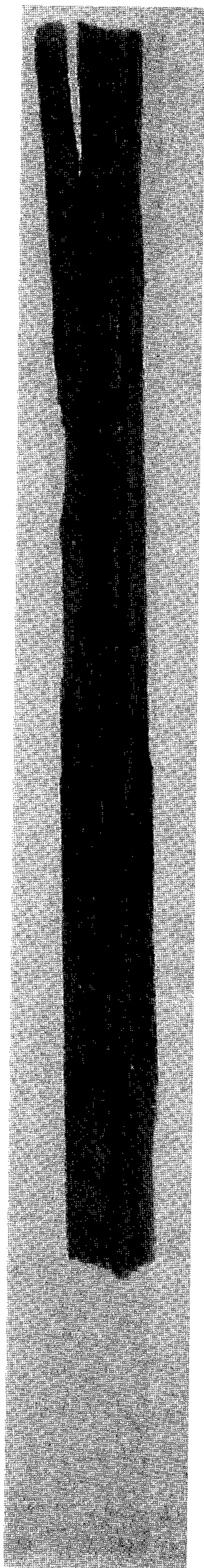
都尉嘉禾元年八月十一日甲辰書給將軍吕[岱]所部□□所□士四人合五人（2257）

五斛一斗五升被督軍[糧]都尉嘉禾元年六月廿九日癸亥書給右郎中何宗所督武猛司馬陳湯所領吏□□（20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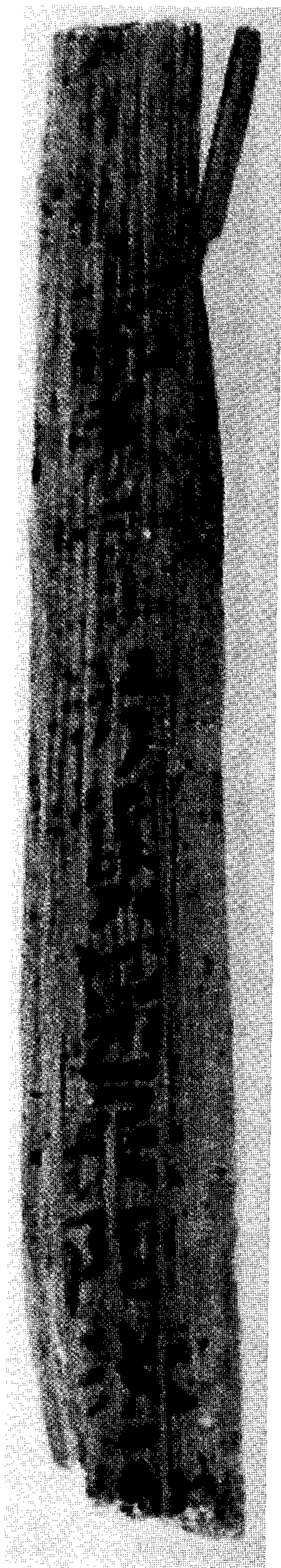
簡文意義是很清楚的，這是從糧倉中出納軍糧的賬目。以 2095 號簡為例，前面“五斛一斗五升”是出納糧食的數量，“被督軍[糧]都尉嘉禾元年六月廿九日癸亥書”是出納糧食的憑據，“給右郎中何宗所督武猛司馬陳湯所領吏……”是廩給軍糧的對象，廩給者係某將軍、某官員之部屬。2301 簡“給吕侯都尉陳……”顯然與上引文例不合，“吕侯”與“都尉”之間不能斷開，廩給的對象當然不可能又是“吕侯”，又是“都尉”，職官名稱也沒有叫“吕侯都尉”的。如果是“步兵都尉”，應當就是“步兵校尉”之訛，《吳志》記東吳有此官。“校尉”訛為“都尉”，則如 2255 號簡之“武猛都尉”為傳世文獻中“武猛校尉”之訛。當然，也有可能是當時確有“步兵都尉”一職而典籍未記；或“都尉”之名是當時俗稱亦未可知，如“督軍糧都尉”，也不見於史書記載。三國時最為著名的“步兵校尉”是阮籍。《三國志·魏書·阮籍傳》注引《魏氏春秋》曰：“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而 2301 號簡中的“步兵都<校>尉陳某”已不可考。

（後記：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黎石生先生在《長沙走馬樓所見“步侯還民”簡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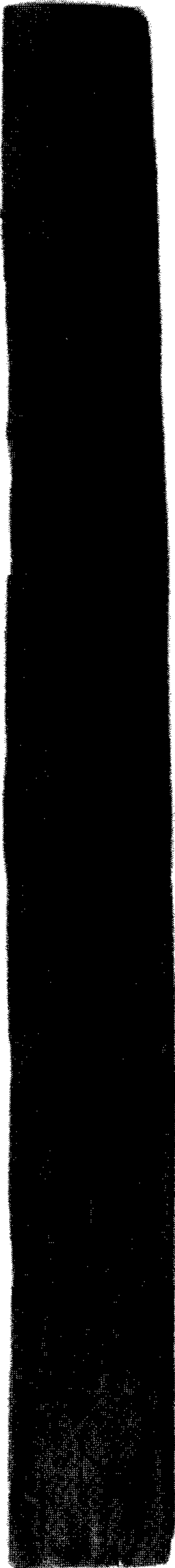
[《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07—112 頁]一文中支持孟彥弘釋“還民”爲“歸附之民”的意見，並進而發揮說，有的步侯還民原籍可能在臨湘侯國周邊地區；有的步侯還民可能是步騭非法佔有。這些看法，皆源於某些研究者的“逃亡戶口”、“非國家正戶”說。我在 2005 年春在長沙工作期間，已經向黎石生、于振波二先生介紹過拙文觀點，惜當時未見黎君大作，未能有的放矢作深入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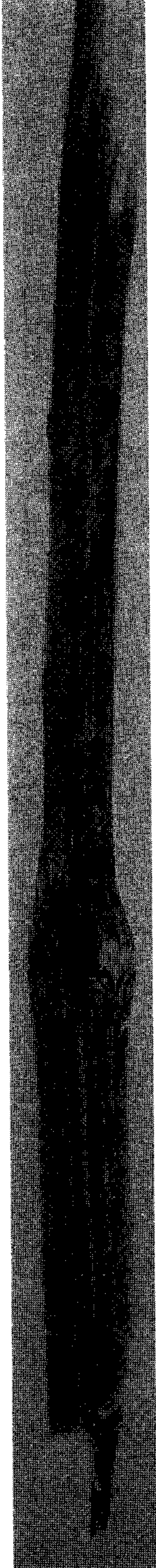
附圖一（1532）



附圖一（1556）



附圖二



附圖三

平夜君成楚簡“卜筮祭禱簡”初探^①

——戰國楚的祭祀儀禮

[日] 早稻田大學 工藤元男

前言

近年在河南省東南部新蔡葛陵的平夜君成楚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楚簡。《文物》2002年第8期刊登了發掘簡報^②，翌年出版了正式的發掘報告書^③，公佈了全部內容。

這些新資料（下文簡稱“平夜君成楚簡”）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其中包含了“卜筮祭禱簡”。衆所周知，戰國時期的貞人（巫祝）被邀請到封君或世族的宅第，給這些委託人^④貞問一年的吉凶，如果佔卜到不祥，就提出對抗儀禮方案和祖先祭禱方案，“卜筮祭禱簡”就是其記錄，以及包含祭禱實施的記錄。這類資料從戰國楚墓中出土，以楚系文字記錄，因此被認為是揭示楚地域文化的材料。下面按發掘年代順序介紹截止目前出土的“卜筮祭禱簡”。

1. 湖北江陵望山1號墓出土的“卜筮祭禱簡”^⑤。出土於1965年冬至1966年春發掘的

① 原載早稻田大學《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第三號，2005。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駐馬店市文化局、新蔡縣文物保護管理所：《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發掘》，《文物》2002年第8期。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

④ 將邀請貞人的楚貴族稱作“委託人”（Client），是採用池澤優《祭らわる神と祭らわぬ神—戰國時代の楚の「卜筮祭禱記錄」竹簡に見る靈的存在の構造に関する覚書—》（《中國出土資料研究》創刊号，1997，以及同氏撰《戰國時代の祖先祭祀—「卜筮祭禱記錄」楚簡と睡虎地秦簡「日書」—》（收入同氏著《「孝」の思想の宗教学的的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中的說法。

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中華書局，1995。

中型土坑木椁墓中。全部是殘簡，綴合後的總枚數為 207 枚。墓主悼固的身份是下大夫。

2. 湖北江陵天星觀 1 號墓出土的“卜筮祭禱簡”^①。出土於 1978 年發掘的大型土坑木椁墓中。完整的簡有七十餘枚，其餘的是殘簡。墓主是邸陽君蕃勅，邸陽是封地名，君是封號，蕃勅是姓名。據推測，墓主生前爵位為上卿，官職為令尹、上柱國。

3. 湖北江陵秦家嘴 1 號墓、13 號墓、99 號墓出土的“卜筮祭禱簡”^②。1986 年 5 月至 1987 年 6 月，從春秋晚期至戰國晚期早段的 105 座楚墓中的三座出土的竹簡，全部是殘簡。報告稱墓葬群整體的年代下限是戰國晚期早段（公元前 278 年以前），但每個墓葬的年代不詳，墓主的身份也不詳。

4. 包山 2 號墓出土的“卜筮祭禱簡”^③。從 1987 年發掘的大型土坑木椁墓中出土了 57 枚簡，是目前有關“卜筮祭禱簡”中最完整的資料。墓主的職位是左尹，姓名是邵朮，身份是上大夫。

綜上^④：望山楚簡雖然是最早出土的“卜筮祭禱簡”，但全部是斷簡。天星觀楚簡雖然包含了很多完整的簡，但由於正式的發掘報告書還沒有出版，具體的內容無法知曉。^⑤秦家嘴的詳細內容也不清楚。與此不同，包山楚簡是唯一公佈全部簡文的簡，內容也完整，據此可以初步搞清楚卜筮祭禱這一楚地的習俗。筆者已在其它文章中就其內容進行了詳細的考察^⑥，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對望山楚簡進行了分析^⑦。本文擬結合上述考察結果研究平夜君成墓楚簡，分析它們之間的異同，以期搞清楚平夜君成墓楚簡資料的性質，並嘗試對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的資料加以定位。

一、新蔡平夜君成墓和“卜筮祭禱簡”簡介

關於平夜君成墓以及從中出土的“卜筮祭禱簡”的內容，發掘報告書等是這樣介紹的^⑧：平夜君成墓（94XGM1001）位於河南省駐馬店市新蔡距縣城西北 25 公里的李橋鎮葛陵村東北。1992 年 11 月，葛陵村的村民採挖燒瓦用的燒土時，發現了這個位於村東北的墓。

①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 年第 1 期。

② 荊沙鐵路考古隊：《江陵秦家嘴楚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88 年第 2 期。

③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

④ 滕壬生氏將江陵磚瓦廠 340 號墓竹簡也視為“卜筮祭禱簡”（同氏著《楚系簡帛文字編》序言，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陳偉氏不同意這一看法，認為它是司法方面的資料（同氏撰《楚國第二批司法簡芻議》，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第 3 輯，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

⑤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登載了一部分照片和臨摹的字形。

⑥ 工藤元男：《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の構造とシステム》，《東洋史研究》第 59 卷第 4 號，2001，譯文《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的構造與系統》刊載在《人文論叢》2001 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

⑦ 工藤元男：《望山楚簡「卜筮祭禱簡」の基礎的研究》，收入福井文雅博士古稀・退職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アジア文化の思想と儀礼》，春秋社，2005。

⑧ 前揭《新蔡葛陵楚墓》。

由於挖土，墓葬一部分被破壞，1993年又再次被盜掘，1994年5月實行緊急發掘。墓葬是大型土坑木槨墓。平面呈甲字形，墓口東西為25.25米，南北為22.50—23.25米。墓室東壁中部有東西殘長16米、南北3.50—6.40米斜坡狀的墓道。墓室的四壁呈階梯狀，從墓口向下有七級台階。槨室呈“亞”字形，分內槨和外槨。外槨分東、西、南、北、中五個槨室，竹簡是從南室的東南部出土的。根據這個墓葬的形制和棺槨的構造來看，該墓應是楚封君的規格。此外，隨葬品中有一個編鐘，表明墓主的身份是上卿。

南室的內部由於盜掘而被攪亂，竹簡出土時全部呈殘簡狀態。將它們按出土的位置分為甲乙兩區，再進一步分組，進行編號（簡號）。甲區523枚，乙區299枚，此外，破損嚴重的沒有編號，臨摹時編號的有749枚，共1571枚。原簡的簡長不明，幅寬在0.8釐米左右，窄的只有0.6釐米，寬的為1.2釐米。文字一般寫在竹的黃面，但也有寫在竹的青面，字跡大部分很清晰。從筆迹推測是由多人書寫的，字間距稀疏。

竹簡的內容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兩類。

第一類：“卜筮祭禱記錄”。佔大多數，內容主要分以下三種。（1）和包山楚簡中的卜筮祭禱簡很相似，主要為平夜君成舉行佔卜祭禱的記錄，佔卜的內容以求問病情為主。簡文的體例也和包山楚簡很相似，由前辭、命辭、佔辭等部分組成，由此可瞭解墓主生前的病情。（2）“小臣成”（平夜君成）自己祈禱的記錄，數量很少。這類簡的簡幅都較寬，字也大。（3）與祭禱有關的記錄，但看不到有關佔卜的記錄。體例統一，竹簡較短，數量也很少。第二類：“遣策”二十餘枚。

繼1957年在河南省信陽市信陽長台關一號楚墓發現楚簡^①之後，平夜君成墓楚簡是中原地區第二次發現楚簡，因此十分珍貴。

二、以事紀年和楚月名的考察

下面分析平夜君成墓楚簡。如前所述，這批楚簡由於全部是斷簡，冊書復元極其困難，因此發掘報告書也未涉及。這一情況和望山楚簡“卜筮祭禱簡”幾乎完全相同。但關於望山楚簡，最近淺原達郎氏根據“簡長和契口”、“綴合”、“右類和左類”等分析方法，初次嘗試進行整體復元。^②亦即，《望山楚簡》整理者指出考釋二五“之”字有兩種寫法，它們和日期有一定的對應關係。^③據此，淺原氏將“之”的筆畫呈從左向右流動型的稱為“右類”、從右向左跳躍型的稱為“左類”，由於這一區別也表現在其它字上，因此，他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

② 淺原達郎：《望山一號墓竹簡の復元》，收入小南一郎編《中国の禮制と禮學》，朋友書店，2001。

③ 前揭《望山楚簡》，91頁。

將望山楚簡分爲兩種筆迹，以此作爲分析的綫索。雖然也希望能將這一方法用於平夜君成墓楚簡，但對此將另作他文，此次拙文仍首先採用包山楚簡中卜筮祭禱簡的體例分析方法。

（一）以事紀年

發掘報告中將竹簡中見到的以事紀年分作九種^①。按照頻率高低排列如下：

- a. 王徙於鄢郢之歲（王遷徙到鄢郢之歲）四十例
- b. 齊客陳異致福於王之歲（齊客陳異向王致福之歲）七例
- c. 王復於藍郢之歲（王恢復藍郢之歲）五例
- d. 句郢公鄭余穀大城茲方之歲（句郢公鄭余穀建造大茲方城之歲）三例
- e. 萇荅受女於楚之歲（萇荅接受楚的女之歲）以下兩例
- f. □致師於陳之歲（……向陳致師之歲）
- g. □大莫囂殤爲晉師戰於長城之歲（……大莫囂殤爲晉師戰於長城之歲）
- h. 我王於林丘之歲（我王在林丘之歲）以下一例
- i. □□公城郢之歲（……□公在郢建城之歲）
- j. 王自肥還郢徙於鄢郢之歲（王從肥回到郢，遷徙到鄢郢之歲）

發掘報告書列舉的九種以事紀年的有 a—i，但是，細檢簡文還可發現 j 的例子。由於 j “徙鄢郢”和 a “徙鄢郢”是楚王的同一行動，因此可以理解爲兩者是同一以事紀年的不同表現形式，或者是不同年次楚王的同一種行動。

（二）楚月名

楚國使用與中原地區不同的楚固有的月名。楚月名的部分情況由於鄂君啓節等出土文字資料而得以清楚，此後由於將楚月名和秦月名相對照的睡虎地秦簡《日書》歲篇的發現，楚月名的情況全部都清楚了。由於包山楚簡中也有許多楚月名，將其加以綜合，作成表 1。^②與此相對，將平夜君成墓楚簡中所見月名和其頻率數作成表 2。

從表 2 可以看到，平夜君成墓楚簡中七月、八月出現的頻率最高。而望山楚簡出現的月名中留郢（四月）有六例、爨月（十一月）三例、獻馬（十二月）三例。望山楚簡留郢（四月）頻率最高，通常認爲它的出土地（江陵縣）即楚國都郢一帶以此月爲歲首進行歲貞，包山楚簡也是如此，因此，爨月、獻馬的貞問是臨時舉行的疾病貞。^③與此不同，平夜君成墓楚簡月名集中于七月（夏禘）、八月，同時，除了爨月外，大多數月名都出現了，這是其特點。那麼，這裏七月、八月頻繁出現的原因是什麼？下面把與這兩月有關的記事納入先前筆者列舉的“卜筮祭禱簡”的體例中進行考察。

① 前揭《新蔡葛陵楚墓》，182—183 頁。

② 劉彬徽：《從包山楚簡紀時材料論及楚國紀年與楚曆》，載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

③ 工藤元男前揭論文《望山楚簡「卜筮祭禱簡」の基礎的研究》。

表 1 秦楚月名對照表

秦月	楚月	
十月	正月	冬夕 冬禱
十一月	二月	屈夕 屈禱
十二月	三月	援夕 遠禱
正月	四月	刑夷 𠄎𠄎
二月	五月	夏𠄎
三月	六月	紡月 高月
四月	七月	七月 夏夕 夏禱
五月	八月	八月
六月	九月	九月
七月	十月	十月
八月	十一月	爨月 𠄎月
九月	十二月	獻馬

表 2 平夜君成楚簡的楚月名和頻率數

楚月名	
冬夕 冬禱	4
屈夕 屈禱	5
援夕 遠禱	2
刑夷 𠄎𠄎	2
夏𠄎	2
紡月 高（享）月	6
七月 夏夕 夏禱	35
八月	28
九月	6
十月	5
爨月 𠄎月	0
獻馬	9

三、七月、八月例子的考察

（一）七月的例子

第一次佔卜的前辭（包含一部分命辭）。夏禱（七月）的月的前辭，有以下八例：

- a. ☒【王徙於】鄆郢之歲，夏禱之月乙卯之日，應嘉以衛侯之筮爲坪夜君貞，「既
有疾，尚速瘥，毋有 ☒甲三:114,113
- b. ☒王徙於鄆郢之歲，夏禱之月癸亥之日，彭定以小龙龍☒ 甲三:204
- c. ☒鄆之歲，夏禱之月乙丑之日，君朝於筮☒ 乙一:5
- d. 王徙於鄆郢之歲，夏禱之月乙巳之日，頤與良志以陵尹☒ 乙一:12
- e. 王徙於鄆郢之歲，夏禱之月乙巳之日，涇誓以陵☒ 乙一:18
- f. ☒夏禱之月丙辰之日，陵尹懌☒ 零:200,323
- g. ☒夏禱之月乙卯☒ 甲三:159-3
- h. ☒夏禱之月己丑之日☒ 乙三:49,乙二: 21

a 劃綫的命辭部分被認為是疾病貞。其餘的由於命辭的部分全都没有，因此不清楚。這裏需要注意的是 a — e 的夏禱（七月）和“王徙於鄆郢之歲”屬同一年（c 目前尚是推測）。據此可知，王徙於鄆郢之歲的夏禱之月中，乙巳至乙丑的二十一日間，乙巳、乙卯（乙巳的十日後）、癸亥（乙卯的八日後）、乙丑（癸亥的二日後）的各日，是由不同的貞人進行貞問的。同日舉行歲貞和疾病貞的例子也見於包山楚簡，只是没有歲貞在不同日進行多

次的明確例子^①，即使有的話其理由也不清楚，進而從 a 的命辭確定為疾病貞，大概可以認為 a — e 的簡文都是疾病貞的前辭、命辭。

第一次佔卜的命辭。下面應當是第一次佔卜的命辭中出現的夏禘（七月）的例子：

- a. ☐卒歲或至來歲之夏禘☐ 甲三:248
 b. 自夏禘之月以至來歲夏禘，尚毋有大咎」。☐ 乙一:19
 c. 禘之月以至來歲之夏禘，尚毋有大咎。涇誓佔之，「恒貞吉，無咎。☐ 甲三:117,120
 d. ☐☐貞，「七月至冬禘之月尚☐ 甲三:107
 e. 疾隴、脹腹、膚疾。自夏禘之月以至冬禘之月，盡七月尚毋有大☐ 乙一:31,25

a “卒歲或至來歲之夏禘”（卒歲、或者到來歲的夏禘）的“卒歲”指一年^②。但是由於其起始的月份不明，因此到底指哪個月無法確定。b、c 應當是同一內容，指當年七月至翌年七月的一年間。特別是 c 的後半段劃綫的部分和以包山楚簡為典型的歲貞的固定句型酷似。而且，e 和 d 一樣，以七月為起點，貞問到翌年冬禘（正月）的七個月間的安危。與此相比，平夜君成墓楚簡的貞問，以當年七月至翌年七月的一年為時限，因此和當年七月至翌年正月的七個月為時限是同時舉行的。再者，從 e 劃綫部分來看，這一貞問應當解釋為疾病貞。根據上述情況來看，或許可以認為表示當年七月至翌年正月的短時限的 d、e 也是疾病貞。如果是這樣，由於包山楚簡中疾病貞沒有設定時段，因此這應當是平夜君成墓楚簡的重要特徵。

祭禱的實施記錄。作為平夜君成墓楚簡中夏禘（七月）頻出的背景，有必要重視下列簡文。

- a. 夏禘之月己丑【之日】，以君不懌之故，就禱陳宗一豬。壬辰之日禱之。 乙一:4,10,乙二:12
 b. 夏禘之月己丑之日，以君不懌之故，就禱三楚先屯一牂，縵之玼玉。壬辰之日禱之。☐ 乙一:17
 c. 夏禘之月己丑之日，以君不懌之故，就禱靈君子一豬；就禱門、戶屯一牂；就禱行一犬。壬辰之日【禱之】☐ 乙一:28

① 淺原達郎氏以《望山楚簡》考釋四四、四五的解釋為基礎，認為它和“郢客困芻問王於菽郢之歲，型厠之月，癸未之日”是同年同月癸亥之日的歲貞（淺原達郎前揭論文《望山一號墓竹簡の復元》），並據此認為這一年的型厠（四月）的歲貞是在癸未、癸亥分兩次舉行的。但前揭拙稿《望山楚簡「卜筮祭禱簡」の基礎的研究》認為此簡的綴合有問題。

② 工藤元男前揭論文《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の構造とシステム》，同氏撰《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の構造与系統》。

雖然缺少以事紀年，但它們都被看成是夏禘（七月）己丑祈禱平夜君成康復的祭禱提案，以及在三天後的壬辰日進行實施的記錄。

（二）八月的例子

第一次佔卜的前辭（包含一部分命辭）。在第一次佔卜前辭中八月的例子有以下十五例。

- a. ☐王徙於鄆郢之歲，八月丁巳之日，愴以大央爲坪【夜君貞，】☐ 甲一:3
- b. 王徙於鄆郢之歲，八月丁巳之日，鹽壽君以吳夏☐ 甲二:6,30,15
- c. ☐【王徙】於鄆郢之歲，八月丁巳之日，應寅以小央爲☐ 甲二:22,23,24
- d. ☐【王徙】於鄆郢之歲，八月丁巳之日，應寅☐ 甲三:178
- e. 王徙於鄆郢之歲，八月丁巳之日，應寅以大央☐ 甲三:258
- f. ☐【王徙於鄆郢】之歲，八月丁巳之日，鹽壽君以吳夏之☐ 甲三:342-1, 零:309
- g. 王於鄆郢之歲，八月己巳之日，鄭建以☐☐ 甲三:223
- h. 王徙於鄆郢之歲，八月己巳之日，鹽寤以駘靈爲坪夜君貞：既心☐ 甲三:215
- i. 王徙於鄆郢之歲，八月辛酉之日，東☐ 甲二:14,13
- j. ☐於鄆郢之歲，八月辛酉之☐ 乙三:29
- k. 王徙於鄆郢之歲，八月庚辰之日，所受盟於☐ 甲三:221
- l. ☐歲，八月己未之日，鹽券以長☐ 甲三:26
- m. 八月己未之夕，以君之病之【故】☐ 乙四:5
- n. 【王徙】於鄆郢之歲，八月戊☐ 零:113
- o. ☐八月乙卯之日，鄭卜子悖以夔頁之鼈爲君三歲貞☐ 乙四:98

其中，a—f 是“王徙於鄆郢之歲”八月丁巳的同一天舉行的貞問（f 尚限於推測），從簡文無法判斷屬歲貞還是疾病貞。此外，能夠確認作爲貞人的愴、鹽壽君、應寅三人的名字，在六個貞問中愴出現一次，鹽壽君兩次，應寅三次。包山楚簡中也有在同一天的歲貞和疾病貞中有數個貞人參加的例子，但沒有同一貞問中同一貞人幾次出現的例子^①，這一點也是平夜君成墓楚簡很大的特色。g、h 也是同年八月的貞問，都在己巳日。從 h 劃綫的命辭“既心○”可知是疾病貞。i、j 也是同年八月的貞問，日子是辛酉，從簡文無法判斷屬歲貞還是疾病貞。k 也是同年八月的貞問，日子爲庚辰。它後面接著“所受盟於☐”沒有採

① 在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大司馬恐鼈徙楚邦之師徒以救郢之歲，留居之月己卯之日”舉行的第 16—20 條的歲貞和第 21—25 條的疾病貞，分別有五名貞人參加，兩者貞人的名字完全相同。而且，這些貞人組不是同時舉行歲貞和疾病貞，而是舉行歲貞之後舉行疾病貞。因此，同一歲貞和疾病貞不是由同一貞人幾次出場。由於是斷簡尚無法肯定，但是望山楚簡的情況想來也是如此。

取通常以貞人名和祭禱名開始的形式，表明它可能採取與歲貞、疾病貞或者祭禱簡的禱辭（包山楚簡中的 4、5、14、15 各條）不同的形式貞問。和它比較接近的是望山楚簡的簡 154：

日，所可以齋☐

簡文中的“盟”字，【明】張自烈《正字通》午集中皿部曰：

盟，盟本字。

將盟解為“盟”的本字。那麼，k 是否是與盟誓有關的貞問呢？l、m 缺少以事紀年，有可能也是同年八月己未的貞問。從 m 劃綫部分可知它是疾病貞。但是，干支日辰後面附上“夕”（時辰名）的例子在包山楚簡中沒有見到。“夕”字在望山楚簡的簡 184 中有一例：

☐夕☐☐。

但是，它和 m 的例子是否有關尚不清楚。n 也是同年的貞問，但是日期是八月戊（地支不明）。根據干支的順序，戊的後面可能是辰或者寅。其餘的由於缺少命辭，無法判斷是歲貞還是疾病貞。o 缺少以事紀年，日期是乙卯。雖然只有一例歲貞的例子，但是這個簡文和通常的體例有很大不同。即歲貞的場合，以事紀年和日月的後面，例如包山楚簡簡 197：

盥吉以保豕為左尹旽貞……

通常採用

“貞人名”、“以”、“卜筮用具名”、“為”、“委託人名”、“貞”

的形式，將其和 o 的原文相對比，就是

“鄭卜子悝”“以”“鬯頁之鬯”“為”“君”“三歲貞”

可發現最後的“三歲貞”體例不合。包山楚簡中貞問的時限有“卒歲”、“集歲”，諸家均將“卒歲”解釋為滿一年。關於“集歲”，考釋 401 以及彭浩氏解釋為三年。^①與此相對，李零氏、陳偉氏及筆者認為是一年。^②筆者至今仍持這一看法，假如將“集歲”解釋為三歲，“三歲”之語和“為君三歲貞”句的體例不合，也很難將其解釋為“為君貞問三年間的安危”。

① 彭浩：《包山二號楚墓卜筮和祭禱竹簡的初步研究》，載前揭《包山楚墓》上冊。

② 李零：《包山楚簡研究（佔卜類）》（《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一輯，中華書局，1993）；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152 頁；工藤元男前揭論文《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の構造とシステム》。

根據以上考察，可知在王徙於鄴郢之歲的八月，至少在丁巳、己巳、辛酉、庚辰日進行過貞問。n的“戊□”按干支的順序可以推定是辰或者寅，這樣進行貞問的日子就有五日。進而，l的“……歲、八月、己未之日”看成是王徙於鄴郢之歲的“歲”，當年八月的貞問就有六次。另一方面，m的己未日的貞問是疾病貞。假如將王徙於鄴郢之歲的八月貞問視為歲貞，歲貞在一個月內舉行六次也太不尋常了，因此，還是應當把a—o的例子全部看成是疾病貞。將六次貞問的日子的順序（按照干支順序）排列出來：

乙卯（52）→丁巳（54）→己未（56）→辛酉（58）→戊辰？（5）→己巳（6）→戊寅？（15）→庚辰（17）

當年八月似乎每天都舉行疾病貞，由此可以窺知墓主的病情嚴重惡化。

3. 前辭以外八月出現的例子

八月在前辭以外也時有出現。

第一次佔卜的佔辭

a. □佔之曰：吉。盡八月疾瘥□

甲二:25

b. □【佔之】曰：甚吉。未盡八月疾必瘥。□

甲三:160

a、b被認為是第一次佔卜的佔辭的一部分，a佔斷說“到八月結束疾病痊愈”，b佔斷說“八月未結束疾病一定會痊愈”，將疾病的痊愈限定在八月，這裏出現的八月是否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呢？

第二次佔卜的命辭。下面的a—c是第二次佔卜的命辭中八月的例子，即為了消除第一次佔卜的命辭中佔斷的憂患，貞人對委託人平夜君成提出的祭禱案中有關八月的例子。

a. □之說。擇日於八月之中賽禱□

甲三:303

b. □擇日八月之中脰□

甲三:339

c. 擇日于八月脰祭競平王，以逾至文君。占之，“吉”。既敘之。

甲三:201

這些簡行文大體相同，特別是c，劃綫部分的命辭是祭禱方案，劃雙重綫的佔辭是佔卜祭禱案是否可行，佔斷的結果是“吉”。事實上，下列簡文應當是在八月實施祭禱的例子。

祭禱的實施記錄。

a. □巳之昏薦（薦）且禱之，地主。八月辛酉□

乙三:60,乙二:13

b. □八月甲戌之日薦（薦）之。□

甲三:80

c. 八月辛巳之夕歸一璧於□

甲三:163

d. □文君與帝，解於太，遂其足說。八月壬午之日薦（薦）太。□ 甲三:300,307

在 a—d 中有辛酉（58）、甲戌（11）、辛巳（18）、壬午（19）4 個干支日辰，在 a、b、d 的日子舉行“薦（薦）”。“薦（薦）”在包山楚簡中作“𡇗”，考釋 395 解释说它是“𡇗”字的異體字，作為“薦”的假借字，關於它的字義，列舉了《周禮·天官·庖人》鄭玄注：

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羞。

即以貢品進行祭祀的意思。此外，關於 c 的“歸”，包山楚簡簡 218：

壁（避）琥，畢（擇）良月良日遯（歸）之。

考釋 432 認為“歸”是“餽”的假代。“歸”在望山楚簡中亦散見，例如簡 28：

□志事，以其古（故）啟之。“享遯（歸）佩玉一環東大王，盥禱宮行一白犬酒食”。

似乎是舉行向祖靈貢獻玉器的祭禮。從 a—d 中出現了記載這些與“薦（薦）”、“歸”有關的具體的干支日辰來看，應當將它們理解為是實施記錄的一部分。

以上就平夜君成墓楚簡中的月名集中於夏禘（七月）和八月的情況進行了考察，據此得出下列結論：（1）平夜君成墓楚簡中所見七月的貞問，大多與疾病貞有關。（2）貞問以七月為起點，以一年為限，從七月到翌年正月是短期貞問，它也與疾病貞有關。（3）八月的貞問全部是關於疾病貞的。這應該就是為什麼平夜君成墓楚簡中七月和八月的記事格外多的原因吧。

四、出現其它月名的例子

下面考察七月、八月以外的各月是在怎樣的文脈中出現的。

1. 冬禘（一月）的例子

a. □□貞：七月至冬禘之月尚□（甲三:107）

b. 疾隴、脹腹、膚疾。自夏禘之月以至冬禘之月，盡七月尚毋有大□ 乙一:31,25

c. 【王復於】藍郢之歲，冬禘之月，丁亥之日，鄭疾以駁鼃為君□ 乙四:63,147

d. □【王】復於藍郢之歲，冬禘之月，丁亥之日，鼃尹【丹】□ 零：294,482,
乙四:129

e. □之歲，冬禘□（零:496）

首先，一月中 a、b 已經在七月條中進行過考察，因此省略。c、d 都是由固定句型的第一次佔卜的前辭構成，e 也應當是它的一部分。由於缺少前辭後接續的命辭，它的内容到底是歲貞還是疾病貞不清楚。

2. 屈禱（二月）的例子

- a. 句邦公鄭余穀大城茲方之歲，屈禱之月，癸未【之日】☐ 乙一:14
- b. 句邦公鄭【余穀】大城茲方之歲，屈禱之月，癸未之日，謠【生】☐ 乙一:32,23,1
- c. ☐歲，屈禱之【月】☐ 零:414
- d. ☐歲，屈禱☐ 零:503
- e. 夏禱、享月賽禱大水，佩玉卣。擇日於屈禱 乙四:43

a、b 都是第一次佔卜的前辭，年月日也相同，月名相同的 c、d 很可能也是同年月日的前辭的一部分。e 是第二次佔卜的命辭，即祭禱方案的一部分，其中和五月、六月的賽禱提案一起，二月時也應當提議進行了什麼祭祀。

3. 遠禱（三月）的例子

- a. ☐【萑荅受女】於楚之歲，遠禱之月，丁酉☐ 甲三:34
- b. ☐萑荅受女於楚之歲，遠禱之月，丁酉之日 甲三:42
- c. ☐禱☐、嘒禱、𠄎𠄎賽禱☐ 零:248

a、b 同是第一次佔卜的前辭，年月日也相同。c 應當是祭禱案中提議三月和四月實施的賽禱。

4. 𠄎𠄎（四月）的例子

- a. 𠄎𠄎之月，己巳之日、☐☐ 甲三:51
- b. ☐☐、嘒𠄎 𠄎𠄎賽禱☐ 零:248

a 是第一次佔卜的前辭，b 在遠禱（三月）條中已述。據包山楚簡，歲貞通常在四月舉行，它和楚的歲首有關，但平夜君成墓楚簡中四月的例子只有此兩例。這使得平夜君成墓楚簡是否存在四月的歲貞成爲疑問。關於這一點，將在後文進行討論。

5. 夏禱（五月）的例子

- a. ☐大城茲方之歲，夏禱之月，癸亥之日，𠄎𠄎以𠄎𠄎爲☐ 甲三:8,18
- b. ☐夏禱、享月賽禱大水，佩玉卣。擇日於屈禱 乙四:43

a 是第一次佔卜的前辭，b 在二月條中已述。

6. 享月（六月）的例子

- | | |
|--------------------------------------|---------|
| a. □□公城鄆之歲、享月□ | 甲三:30 |
| b. 王自肥還郢徙於鄆郢之歲，享月□ | 甲三:240 |
| c. 王徙於鄆郢之歲，享月，己巳之日，公子號命諱生以衛筆□ | 乙一:16 |
| d. 王徙於鄆郢之歲，享月，己巳之日，諱生以衛筆爲君貞，「將逾取稟，還□ | 乙一:26,2 |
| e. □之歲，享月□ | 零:51 |
| f. □夏禱、享月賽禱大水，佩玉牝。擇日於屈禱 | 乙四:43 |

a 和 b—d 與以事紀年不同（b 和 c、d 的關係已如前述），均是第一次佔卜的前辭。特別是 d 劃綫部分的命辭，在判斷是歲貞或疾病貞時十分重要，但是仍然無法斷然下結論。e 是第一次佔卜的前辭的一部分，f 前已述。

7. 九月的例子

- | | |
|--------------------------------|--------|
| a. 我王於林丘之歲，九月□ | 甲三:1 |
| b. □之歲，九月，甲申之日，攻差以君命取惠靈（靈）□ | 乙四:144 |
| c. □歲，九月，乙卯之日，□□ | 零:431 |
| d. □【佔】之，恆貞吉，無咎。疾罷癘罷也。至九月有良聞。□ | 甲一:22 |
| e. 日於九月薦且禱之，吉。□ | 甲三:401 |
| f. □八月有女子之賁，九月、十月有外□□ | 乙四:106 |

a—c 應當是第一次佔卜的前辭，但是，b、c 是否和 a 一樣是以事紀年尚不清楚。d 是第一次佔卜的命辭的一部分，劃綫部分由於有“至九月有良聞”的句子，很明顯是疾病貞。e 可能是第二次佔卜的命辭的一部分^①。f 不清楚。

8. 十月的例子

- | | |
|-----------------------|--------------|
| a. □至師【於陳】之歲，十月，壬戌□ | 零:526, 甲三:37 |
| b. □至師於陳之歲，十月，壬【戌】□ | 甲三:49 |
| c. □以至十月，三月□ | 甲三:191 |
| d. □八月有女子之賁，九月、十月有外□□ | 乙四:106 |
| e. □大資，十月□ | 零:192 |

a、b 年月日相同，應當是第一次佔卜的前辭，c—e 不清楚。

① 包山楚簡簡 250 的祭禱案中有“命攻解於漸木立，獻遲其尻而桓之，尚吉”句，和“如果……吉”句式有共通之處。

根據以上考察，可作進一步歸納：上文已指出，作為第一次佔卜命辭出現的七月 c 的例子：

之月以至來歲之夏禱，尚毋有大咎。涇瞽佔之，「恒貞吉，無咎。」

劃綫部分和歲貞的固定句式十分相似。但由於簡尾殘缺，尚不敢斷定為歲貞。另外，九月的例子 d：

「【佔】之，「恒貞吉，無咎。疾罷癘罷也。至九月有良閒。」

“恒貞吉，無咎”的後面，由於接續的是表示疾病貞的“至九月有良閒”，因此前面的七月的例子就不一定是表示歲貞的。這樣平夜君成墓楚簡中表示歲貞的簡就變成一例也沒有。這意味著什麼呢？

五、平夜君成墓楚簡的性質和年代的確定

平夜君成墓楚簡的體例除了上文考察的之外，還包含著包山楚簡和望山楚簡中見不到的新形式。正如第一節所介紹的那樣，平夜君成墓楚簡大體上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卜筮祭禱記錄”，第二類是遣策，第一類中又分（3）“平夜君成生前佔卜祭禱記錄”；（2）“小臣成”（平夜君成）自己祈禱的記錄；（1）和祭禱有關的記錄三種。其中，第一類（2）的簡文即新的形式。下面列舉與（2）有關的簡文。

1. 小臣成（平夜君成）自己祈禱的記錄

- | | |
|----------------------------|---------------|
| a. 小臣成速瘳，是 | 甲三:16 |
| b. 有祟見于大川有汭，小臣成敬之瞿 | 零:198,203 |
| c. 食，昭告大川有汭，曰，鳴虘哀哉。小臣成暮生畢孤 | 零:9, 甲三:23,57 |
| d. 食，昭告大川有汭。小臣 | 甲三:21 |
| e. 小臣成拜手稽首，敢用一元 | 乙四:70 |
| f. 臣成敢 | 乙四:28 |
| g. 小臣成奉遠戲 | 甲三:64 |
| h. 【小】臣成之 | 零:106 |

a 有“小臣成快快痊愈”之語，因此應當理解為是平夜君成就自己的病進行祈禱的一部分。b 根據佔斷“有祟見於大川有汭（不祥）”，應是為了解除祟而採取了行動。c 中平夜君成向大川有汭昭告有祟，自己為了解除祟採取了什麼行動。以上三例，可能是向神靈請求解

除祟，也可理解為是池澤優氏所謂的“對抗儀禮”的一種。^① e 可能是平夜君成為了除祟，發誓以非常虔誠的禮儀，向神格等貢獻什麼供品。f、g 基本相同。假如以上解釋沒有大的問題的話，發掘報告書所說的“小臣成自己祈禱的記錄”，應當就是平夜君成為了求得病情痊愈自己進行祈禱的記錄。包山楚簡和望山楚簡雖然也有貞人為委託人求問病狀（疾病貞）的簡，但卻沒有這種委託人自己祈禱的例子。

而且，平夜君成墓楚簡中以事紀年至少有九種，簡文的內容幾乎全部與疾病貞有關，沒有一例可以確認為歲貞。據此可以推想，平夜君成與疾病鬥爭的生活至少經歷了這九種以事紀年簡中出現的九年，其中頻率最高的“王徙於鄢郢之歲”很可能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年。^② 平夜君成墓楚簡中七月、八月出現的頻率非常高，而且，以事紀年中這兩個月幾乎都屬於“王徙於鄢郢之歲”也可以作為旁證。總之，平夜君成墓楚簡應當是平夜君成在與病魔進行鬥爭的九年間，貞人們關於疾病貞的記錄、祭禱的記錄、平夜君成祈禱自己康復的記錄等的合集。

2. 平夜君成楚墓的年代

那麼，它的年代是什麼時期的？最初，《文物》發表的發掘簡報認為是戰國中期楚聲王以後^③，發掘報告書通過墓葬層位關係、隨葬品的類型比較，以及簡文內容等方面的分析，推測在戰國中期前後，即楚聲王以後、楚悼王末年或者稍晚一些，絕對年代大約是在公元前 340 年左右。^④ 與上述意見不同，劉信芳氏認為以事紀年中出現頻率最高的“王徙於鄢郢之歲”是墓主卒年，按曆法推算這一年是楚肅王四年（前 377）^⑤；李學勤氏也贊同劉信芳說^⑥。而出土“卜筮祭禱簡”的其它墓葬的年代是什麼時期的呢？

關於天星觀一號墓，發掘簡報認為稍晚於公元前 361 年，約在公元前 340 年左右，即楚宣王或者威王時。^⑦ 此後，包山楚簡文書類中發現了與鄢陽君有關的記事，鄢陽君被認為是天星觀一號墓墓主鄢陽君蕃勅的後裔。^⑧ 那麼，包山二號墓的下葬年代就應當比天星觀一號墓晚。另外，關於包山二號墓，根據以事紀年的遺策，可知墓主的葬禮是在公元前 316

① 前揭池澤優《祭られる神と祭られぬ神—戦国時代の楚の「卜筮祭禱記録」竹簡に見る霊的存在の構造に関する覚書一》。

② 前揭《新蔡葛陵楚墓》（183 頁）也是這樣推測的。但說平夜君成楚簡的月名“集中於享月、夏祭、八月三個月”，卻是錯誤的，享月不超過六例。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駐馬店市文化局、新蔡縣文物保護管理所：《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發掘》，《文物》2002 年第 8 期。

④ 前揭《新蔡葛陵楚墓》，180—183 頁。

⑤ 劉信芳：《新蔡葛陵楚墓的年代以及相關問題》，簡帛研究網站，<http://www.bamboosilk.org>，2003 年 12 月 13 日。

⑥ 李學勤：《論葛陵楚簡的年代》，《文物》2004 年第 7 期。

⑦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 年第 1 期。

⑧ 何浩、劉彬徽：《包山楚簡“封君”釋地》，載前揭《包山楚簡》上。

年 6 月舉行的。公元前 316 年是懷王在位時期。關於望山一號墓，它與同時出土的越王勾踐劍的關係有各種說法^①，陳振裕氏認為它的下葬年代是在戰國中期楚威王時或者楚懷王前期^②，此後出版的發掘報告書繼承了陳振裕說^③。

關於這些墓葬的年代，在細節上還有探討的餘地，但是其前後關係大體上無法動搖。因此，就目前來說，出土以“卜筮祭禱簡”為主的墓葬中，以平夜君成墓最早，天星觀一號墓次之，而包山二號墓和望山一號墓中包山二號墓稍晚。將這些墓葬和楚王的世系表作成表 3 僅供參考^④。

表 3 戰國中期前後的楚王世系（依據《史記·六國年表》作成）

聲王（前 407—前 402）—悼王（前 401—前 381）—肅王（前 380—前 370）—
宣王（前 369—前 340）—威王（前 339—前 329）—懷王（前 328—前 299）

結 語

本文以包山楚簡的基本體例為基礎分析平夜君成墓楚簡，其結論如下：它應是平夜君成在與疾病作鬥爭的九年間，貞人們關於疾病貞的記錄、祭禱的記錄、平夜君成自己祈禱病體康復的記錄的合集。因此，它不是歲貞，這一點是與包山楚簡和望山楚簡最大的區別。在這一意義上引人注目的是天星觀楚簡中：“𠂔月期中尚毋又（有）𦣻（恙）”的記事。由於它是貞問𠂔月（十一月）中有無災難的，因此，貞問的時限限定為一個月，彭浩氏將其理解為“月貞”^⑤。也就是說，在包山楚簡以前，除了以一年為時限的歲貞以外，還存在著這種月貞。

這樣，與其將平夜君成墓楚簡的“卜筮祭禱簡”看成是新蔡葛陵楚墓所處的地域，由於北面連著黃淮平原，處於南北文化交融的淮河上游，楚文化因接觸中原文化而發生了變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第六章結語介紹了各家之說。

② 陳振裕：《望山一號墓的年代與墓主》，載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

③ 前揭《江陵望山沙冢楚墓》，210 頁。

④ 此外，根據平勢隆郎氏的編年，其年代如下（同氏著《新編史記東周年表—中国古代紀年の研究序說—》，東洋文化研究所叢刊第一五輯，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1995 年 3 月）：

聲王（前 410—前 405）—悼王（前 405—前 385）—肅王（前 385—前 375）—
宣王（前 375—前 346）—威王（前 346—前 326）—懷王（前 326—前 297）

⑤ 彭浩：《包山二號楚墓卜筮和祭禱竹簡的初步研究》，載前揭《包山楚墓》上。

化的反映；不如反過來，將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所反映的體系性構造和系統，看成是吸收了它以前的卜筮祭禱習俗，整理統合的一個完整形態。包山楚簡和年代接近的望山楚簡看不到這種體例上的差異^①，可以作為傍証。在這個意義上，應當說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最能夠體現戰國楚的楚文化特徵。

（附記一：本文是由2004年7月在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主辦的21世紀COE研討會“楚文化研究的現在”上宣讀的報告《新蔡葛陵楚墓竹簡「卜筮祭禱簡」初探》大幅度修改而成。當天的研討會上，是將平夜君成楚簡和包山楚簡之間的差異，看成是楚文化在與中原文化的接觸中導致的變化，此後的討論記錄也是以此為前提的。但是在收錄論文時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雖然論文的結論和討論的記錄之間有距離，但當天的記錄仍然照原樣刊登了。對會議中提出寶貴意見的各位深表感謝。

附記二：本文是21世紀COE課題“アジア地域文化エンハンシング研究センター”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同時也是科學研究補助金[基礎研究C〈一般〉]“從秦簡、楚簡看中國古代地域文化研究”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楊振紅 譯）

^① 前掲工藤元男《望山楚簡「卜筮祭禱簡」の基礎的研究》。

《曹沫之陳》中竹簡的綴合與契口^①

[日]島根大學 竹田健二

一、《曹沫之陳》的釋讀與竹簡的綴合

古佚文獻《曹沫之陳》，已經由《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公之於衆。關於其釋讀，與其它戰國楚簡文獻一樣，不僅竹簡的排列復原成爲問題，而且屬於《曹沫之陳》竹簡的綴合、復原也成爲很大問題。

據負責釋讀《曹沫之陳》者李零的“說明”，《曹沫之陳》的竹簡數爲“整簡”四十五支、“殘簡”二十支，共計六十五支。但是，李零所謂“整簡”，並不都是沒有缺損之“完簡”。《曹沫之陳》的竹簡多在中間部分折斷，上半部與下半部分離，而完簡僅有二十支。^②李零對這些斷開的竹簡進行綴合、復原，其所謂“整簡”，就是完簡二十支再加上綴合復原的竹簡二十五支。

對於李零所進行的綴合、復原，已經有一些研究者提出修訂的意見。陳劍在《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2日）中指出，在李零綴合、復原的二十五支之中，第32、37、46、51、53、63這六支簡的綴合有問題，並嘗試就此重

① 原載《東洋古典學研究》第19集，2005。

② 李零在釋文中將第28支簡視爲完簡，但是只要看一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11頁的“圖版”照片，就知其非完簡。又，陳劍認爲第36簡不是完簡，但是從照片看，應如李零釋文所說是完簡。根據照片核實，完簡的20支簡是：第05、09、10、13、14、18、19、20、21、22、33、35、36、38、39、40、50、52、54、65簡。其中第52支簡的上端部分雖有缺損，但是因文字無殘缺，故從李零釋文將之作爲完簡來處理。

新進行綴合。^①而陳斯鵬在《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曹沫之陳〉釋文校理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20日）中，李銳在《〈曹劌之陳〉釋文新編》（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22日）中，都各自進行了新的綴合、復原。

如上所述，對於上博楚簡《曹沫之陳》的釋讀，關於上半部、下半部分離之竹簡的綴合、復原，已經有過種種的嘗試，推測今後還會有更多的說法出現。

與《曹沫之陳》釋讀相關聯之竹簡的綴合、復原，存在折斷部分的狀況等成為明確根據的情況。^②不過，大部分情況下是以文脈為根據的。既然竹簡的本來形狀與編綴失而不存，釋讀者理所當然要以其所理解的文脈作為綫索，嘗試進行竹簡的排列與竹簡本身的復原。然而，如果在復原時能得到客觀證據，就必須從之。

拙見以為存在這樣的情況，即：在復原竹簡的綴合時，作為客觀的綫索，竹簡的契口是有效的，根據契口的位置，可以確認竹簡綴合、復原是否妥當。因此，拙文將以竹簡的契口問題為中心，就《曹沫之陳》竹簡的綴合、復原進行探討。

二、竹簡的契口

首先談一下戰國楚簡的契口是什麼這一問題。

我們試以《曹沫之陳》第10簡（完簡，參見圖一）為例。《曹沫之陳》的竹簡有三道編綫，從第10簡上端稍下的第一道編綫處（參見圖二），與竹簡中央稍上的第二道編綫處（參見圖三），在向著竹簡的文字面的右側簡側，都清楚地刻有鋸形的豁口。竹簡的下端稍上的第三編綫處則不甚明顯，但是如果仔細審視，還是能夠確認刻著的豁口（參見圖四）。

編綴竹簡制成冊書時，因為要固定竹簡所以刻下這些豁口，在此稱之為契口。^③該契口實際上有兩種：一為刻在向著竹簡文字面的右側面（下文稱為右契口），一為刻在左側面者（下文稱為左契口）。

就目前所公佈的上博楚簡來說，根據《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02、2003、2004），核查所有的竹簡照片，有左契口的竹簡只有《曹沫之陳》第15簡、第59簡、第63b簡、第64b簡這4支簡（參見圖五一八）。而且，這4支簡全是斷簡的下半部，能夠確認的契口都位於簡下端稍上的第三編綫處。

① 下文中，竹簡的編號仍使用李零釋文中的竹簡編號。祇是，關於李零所綴合者，其上半部竹簡用“a”表示，下半部竹簡用“b”表示，加上其相應竹簡編號，以相區別。

② 例如，《曹沫之陳》第01簡的綴合，上半部、下半部分離之處正好在“昔”字之上，“昔”字的字形因綴合而得以復原，前後的文脈亦貫通。這樣的綴合使人看到是有客觀根據的。

③ “契口”之語，馬承源、陳佩芬曾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竹書（一）》中使用，現採用。富谷至在《木簡・竹簡の語る中國古代——書記の文化史》（岩波書店，2003）中，就大英圖書館收藏敦煌漢簡醫書簡的簡側上的“楔形豁口”論述說：“這些大概是為了作為書籍長期保持編綴的一種裝幀吧。”

上博楚簡中能夠確認的契口，除了上舉這 4 支簡外，都是右契口。右契口的竹簡與左契口相比較，佔壓倒性多數。

然而，並不能因此認為左契口的竹簡有何特殊。因為在郭店楚簡中有相當多的左契口竹簡。

根據《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核查郭店楚簡中有左契口的竹簡，能夠確認以下所列的簡為左契口：^①

《六德》第 33、34、36、44 簡，計四支

《語叢三》第 08、17、18、19、21、23—47、49、52—55、58—68、70—72 簡，計四十八支

“附 竹簡殘片”第 07、08、09、13 簡，計四支^②

如此，因為郭店楚簡中至少有五十余支竹簡為左契口，所以雖然與有右契口的竹簡相比是少數，但是有左契口的竹簡決不可以被認為是特殊的竹簡。

以上，已可以確認這樣的事實：上博楚簡及郭店楚簡中多數竹簡為右契口，而少數竹簡為左契口。接著探討契口與竹簡綴合、復原的關係。

三、契口與竹簡的綴合

拙見以為，在復原竹簡的綴合時，竹簡的契口是有效的客觀的線索。其理由是迄今所公佈的上博楚簡及郭店楚簡的照片中，尚未見到有左右契口混雜在一支簡上的現象。因此，可以認為在上博楚簡及郭店楚簡中不存在某一支竹簡上有左右契口混雜在一起的情況。

不過，在能夠確認為左契口的竹簡中，《曹沫之陳》的第 15、59、63b、64b 簡，《語叢三》的第 18、21、32、34 簡，“附 竹簡殘片”的第 07、08、09、13 簡，這些竹簡都是祇有一個契口的斷簡。從這些竹簡，不能判斷是否是左右契口混在的簡。

① 收入《郭店楚墓竹簡》的照片很小，且幾乎都是黑白照片。而且一部分竹簡的照片被認為有經過修改的痕跡。因此，有時很難判斷有無契口的存在。例如，郭店楚簡《老子乙》第 05 簡，在第二編綫處的竹簡左端可看見黑影，但是難以判斷這是顯示契口存在的陰影還是編綫的痕跡。根據《郭店楚墓竹簡·老子乙·丙本》（《簡帛書法選》編輯組編，文物出版社，2002）所收錄的黑白放大照片，則該陰影不是左契口，而是編綫的痕跡。因此，在此不計入該簡。

② 關於郭店楚簡《語叢三》，在福田哲之《郭店楚簡〈語叢三〉の再検討——竹簡の分類と排列——》（《集刊東洋學》第 86 號，2001）及《郭店楚簡〈語叢三〉釈文》（平成十二年度—平成十五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礎研究（B）（一）研究成果報告書《戰國楚系文字資料の研究》所收，2004）中，認真分析了句讀符號與對應關係得以認可的字形、書寫風格，並將《語叢三》分為三類。但是，福田所分的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都是既有左契口竹簡，也包括右契口竹簡，未看出契口的位置與字形、書寫風格之間的對應關係。

那麼，試著看看有左契口的郭店楚簡之《六德》及《語叢三》的完簡，如以下各例所示，同一竹簡上的契口都是左契口，右契口一個也沒有（圖九至十七）。

由上可知，在戰國楚簡的任一支竹簡上，均不存在左契口與右契口混雜在一起的情況。

如果在同一支簡上左契口與右契口是不混雜的，則在李零等先行研究所綴合、復原的竹簡中，就有不被認可者。具體說就是，由李零綴合的第 63 簡及第 64 簡，由陳劍綴合的第 57 簡與第 15 簡，由李銳綴合的第 48 簡與第 59 簡、第 37a 簡與第 63b 簡。

第 63 簡、第 64 簡其各自的下段部分，即第 63b 簡、第 64b 簡，如前所述存在位於第三編綫處的左契口（參見圖七、八）。一方面，第 63 簡、第 64 簡各自的上段部分，即第 63a 簡、第 64a 簡有第一編綫處和第二編綫處，同時兩編綫處都有右契口（參見圖一八、一九）。如果李零綴合的第 63a 簡與第 63b 簡、第 64a 簡與第 64b 簡，各自是同一竹簡的上段部分與下段部分，那麼這兩支竹簡就變成是右契口與左契口混雜的竹簡。

第 57 簡與第 15 簡、第 48 簡與第 59 簡、第 37a 簡與第 63b 簡的綴合也是如此。第 15、59、63b 簡都在第三編綫處有左契口（參見圖五、六、七）。另一方面，第 57、48、37a 簡有第一編綫處與第二編綫處，而兩編綫處都有右契口（圖二〇、二一、二二）。因而，這些綴合、復原的各個竹簡都變成左契口與右契口混雜的簡。

若同一竹簡上右契口與左契口是不能混雜的，則以上所舉李零等所綴合、復原的竹簡都不成立，這些都是誤綴。

四、《曹沫之陳》竹簡的殘缺

在《曹沫之陳》中，能夠確認是左契口的有第 15、59、63b、64b 這四支簡，都是在中間部分折斷的竹簡的下半部。而在《曹沫之陳》的竹簡之中，有左契口的上半部的竹簡一支也沒有。

如前所述，在戰國楚簡的任一支竹簡上，不存在右契口與左契口混雜的現象。因而，有左契口的竹簡的下半部，即第 15、59、63b、64b 這四支簡，應該理解為都缺少上半部，而不得與其它竹簡綴合。

說起來上博楚簡是被盜掘的，不是通過考古發掘出土的。上博楚簡中的文獻，即使在隨葬時竹簡是完完整整的，並原封不動地被上海博物館收藏，到現在竹簡也齊全的可能性也應當很低。《曹沫之陳》的第 15、59、63b、64b 簡這四支簡的上半部均殘缺，是很有可

能的。

由有左契口的第 15、59、63b、64b 這四支簡的竹簡上半部殘缺丟失這一事實，可以認為在《曹沫之陳》中右契口居多的竹簡中，上半部或下半部殘缺丟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全部竹簡整個都被丟失的可能性也相當高。在釋讀《曹沫之陳》時，有必要格外留意這樣的可能性。^①

（李力 譯）

① 《曹沫之陳》是右契口的竹簡與左契口的竹簡混雜在一起的文獻。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什麼，目前還不清楚。我想該問題與文獻的書寫與竹簡的編綴是如何進行的有關，擬另行研究。

图一『曹沫之陳』第10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

图二『曹沫之陳』第10簡第一編綫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

图三『曹沫之陳』第10簡第二編綫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

图四『曹沫之陳』第10簡第三編綫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

图五『曹沫之陳』第15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

图六『曹沫之陳』第59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

图七『曹沫之陳』第63b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

图八『曹沫之陳』第64b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

炭多日增不，帝弟劉勣，由上下也。已還。

二
五
三
又
子
勤
光
同
五
魯
主
勇
子
五
五
二
一
子
子

六
下
卷
上
二

天
下
之
事
無
不
有
其
理
也

THE

卷之四

宋王元之

哲 學 概 論

從
日
登
成
日
進
義

卷之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847 848 849 850 851 852 853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866 867 868 869 870 871 872 873 874 875 876 877 878 879 880 881 882 883 884 885 886 887 888 889 890 891 892 893 894 895 896 897 898 899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931 932 933 934 935 936 937 938 939 940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50 951 952 953 954 955 956 957 958 959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 1010 1011 1012 1013 1014 1015 1016 1017 1018 1019 1020 1021 1022 1023 1024 1025 1026 1027 1028 1029 1030 1031 1032 1033 1034 1035 1036 1037 1038 1039 1040 1

图二一『曹沫之陳』第48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



图二二『曹沫之陳』第37a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



秦律、漢律關於未遂、預備、陰謀罪的處罰^①

——以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為中心

[日]早稻田大學文學部 水間大輔

序 言

雖然意圖實施犯罪行為，但是並未按照意圖實現其結果時，即：在犯罪行為未達到既遂，在未遂、預備、陰謀階段就終了的情況下，中國古代的秦律、漢律是如何論處的呢？在進入本題之前，先確定一下未遂、預備、陰謀的定義。這些都是當今刑法學的用語，是按照犯罪行為的發展階段來區分犯罪行為未達到既遂的情況。所謂未遂，是指雖著手實施犯罪但並未按意圖實現其結果。例如，企圖殺害人並用刀具砍了過去，但對方未受傷，或雖已負傷但並未至於死亡的場合等。而預備、陰謀是比未遂更靠前的階段。所謂預備，是指準備實施犯罪；陰謀，則是指二人以上策劃實施犯罪，是比預備更早的階段。

在被認為繼承並發展秦律、漢律的唐律中，如上的未遂、預備、陰謀是怎樣論處的，綜覽以往的研究，可以概括如下。^②首先，唐律尚未確立未遂的概念，也不見有處罰犯罪未遂的一般規定。但是，關於個別犯罪，則屢屢設有處罰其未遂的規定。關於預備、陰謀，

① 原載《史學雜誌》第113編第1号，2004年1月。

② 關於唐律之未遂、預備、陰謀，參見戴炎輝《唐律通論》（正中書局，1964，134—137頁）、蔡墩銘《唐律與近世刑事立法之比較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182—198頁）、錢大群《唐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230—234頁）等。

唐律有大體上相當的法律用語——“謀”。可是，並非所有犯罪的未遂、預備、陰謀都被作為處罰的對象，而祇限於條文所規定的犯罪。即使其中預備、陰謀被作為處罰對象者，也限於重大的犯罪。另外，未遂、預備、陰謀，在唐律中一般要科以比既遂輕的刑罰，但是，極其重大的犯罪，也有科以與既遂同一刑罰的場合。

那麼，相對於如上的唐律，秦律、漢律是如何論處的，即使原來秦律、漢律中有這樣的條文，但是祇有被引用於文獻史料之中才為人所知，因此有關這個問題的史料幾乎不存在。然而，1975年出土了包括大量戰國後期秦之法制史料的《睡虎地秦簡》，其中有若干條關於秦律之未遂、預備、陰謀的史料，但是仍然不夠充分。

可是，在2001年圖版與釋文初次被公佈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包括了就各種犯罪的未遂、預備、陰謀所制定的條文。《二年律令》，是1983年至1984年從湖北省荊州市荊州區張家山第247號漢墓出土的竹簡資料，被認為是西漢初期呂后二年（前186年）的律令條文。由於《二年律令》的公開發表，關於漢律的史料突飛猛進地增多了，但是不僅限於此。即，若據《史記》、《漢書》等文獻史料，則西漢高祖佔領秦之際，廢止此前所施行的秦之酷法，公佈了極其簡便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但是，因為僅據三章之法不能制止犯罪，所以曾任相國的蕭何以秦律為基礎，制定了漢律。也就是說，漢建國之初，雖然一度否定了秦源於苛酷的法治主義的政治，但是在其後所制定的漢律中，其更多的部分卻繼承了秦律。然而，漢律後來被多次修改，又增加了許多新東西，伴隨著時代的發展，似乎慢慢地朝著漢獨自的法律體系變更，但是由於《二年律令》被認為是呂后二年、繼承秦律不久的產物，所以應該比較直接地反映了秦律的內容。現在可知，《二年律令》在律之篇名、條文、刑罰、法律用語等方面，與秦律有很多共通之處。^①因此，分析《二年律令》或許可以成為逆向瞭解秦律內容的重要線索。

因此，本文擬在詳細分析《二年律令》中關於各犯罪的未遂、預備、陰謀所制定條文的同時，亦結合睡虎地秦簡進行再研討，由此搞清楚在秦律、漢律中各種犯罪是在哪一階段被作為處罰對象的，要科以什麼刑罰。進而擬考察秦律、漢律對於未遂、預備、陰謀一般傾向怎樣進行處罰，尤其是，擬通過與唐律的比較來把握其特徵、傾向的意義。以前，我討論有關秦律、漢律對共犯的處罰時，就通過與唐律的比較把握其特徵^②，本文也打算用

① 舉一例，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曰“夫有罪，妻先告，不收”（第540簡），夫犯罪時，妻若告發夫之犯罪行為，則可以免於“收”之連坐刑。與這條律文所載內容類似的是，二年律令《收律》云：“夫有罪，妻告之，除於收及論”（第176簡），可見與之幾乎是同一條文。關於秦律與漢律條文的比較，擬另文研究。本文中睡虎地秦簡的簡號根據睡虎地秦墓編寫組《雲夢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釋文根據同書及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另，二年律令的簡號、釋文根據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

② 參見拙文《秦律、漢律における共犯の処罰原理——その歴史的変遷と思想的背景——》，《法制史研究》第51號，2002。

同樣的分析方法。在傳統中國律中，選擇唐律作為秦律、漢律的比較對象，基於以下三個理由。第一，唐律是從秦律、漢律發展來的，它不僅是中國古代法的集大成，而且是傳統中國律的代表。例如，後世的明律、清律等大致都繼承了唐律，而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各國的法律，也是在唐律的強烈影響下制定的。第二，在傳統中國律中，以完整形式流傳至今的，也以唐律為最古。漢之後的三國至隋，雖然各個時代都有其獨自的律施行，但是可惜這些律的條文只是曾被文獻史料等引用了片斷，還沒有達到作為秦律、漢律比較對象的程度。第三，秦律、漢律經過三國至隋，而被繼承發展到唐律，雖在形式上有很大的變化，可是，唐律在用語、條文、篇名等方面，也保留了很多與秦律、漢律相似之處，所以作為比較的對象是很合適的。

不言而喻，即使僅分析秦律、漢律，在某種程度上也能夠把握秦律、漢律本身的傾向。但是，與唐律進行比較，恐怕才能更具體地把握秦律、漢律在傳統中國律中所具有的相對的某些特徵。

一 比既遂處罰輕的未遂、預備、陰謀犯罪

下面，就各犯罪之未遂、預備、陰謀被如何論處進行探討。秦律、漢律中，似乎與唐律一樣，既有未遂、預備、陰謀比既遂處罰輕的犯罪，也有與既遂處罰一樣的犯罪。因此，考慮到行文的方便，首先本章擬就屬於前者的犯罪加以分析。但是，在此先要聲明的是，此分類較為粗略，例如，在作為前者分類的犯罪之中，由於情況不同，未遂有處以與既遂同樣刑罰的場合（參見第二節）；反之，也存在未遂、預備比既遂處罰更重的場合（參見第三節）。

（一）殺人

關於殺人，唐律《賊盜律》“謀殺人”條曰：

諸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

其規定所處相應之刑為：“謀殺”，徒三年；“已傷”，絞；“已殺”，斬。所謂“謀殺”之“謀”，《名例律》“稱日年及衆謀”條曰：

稱謀者，二人以上。

據此，則為二人以上共同謀劃的犯罪行為。於是，在“謀殺人”條中，二人以上者共同犯罪，即被設定為共犯，但是“稱日年及衆謀”條之注云：

謀狀彰明，雖一人同二人之法。

即使是一個人制訂了犯罪行為的計劃，若計劃狀況明瞭，則與二人以上制訂者同樣作為“謀”來論處。“稱日年及衆謀”條疏議曰：

假有人持刀仗入他家，勘有仇嫌，來欲相殺，雖止一人，亦同謀法。故“雖一人同二人之法”。

並舉具體之例。據此，則持“刀”、“仗（杖）”闖進平素就有仇嫌的對手家並企圖殺他時，就適用這條律文。即如滋賀秀三所述：“犯罪意图、動機明瞭，且有被認為客觀著手實施犯罪行為的行動時，即使是一個人也不妨礙視為‘謀’”。^①因而，“謀殺人”條不限於共犯，也適用於一人制訂犯罪行為計劃的場合。

其次，所謂已傷是指基於“謀”而實施殺害行為，但被害者並未至於死亡、祇是負傷的場合。已殺，則是指按照計劃殺害的場合（本文祇論述謀殺、已傷、已殺中的已殺，因為祇記“已殺”難於理解，所以下文有稱之為“謀殺已殺”之處）。於是，謀殺就好像是殺人之預備、陰謀，已傷則像是未遂，已殺則相當於既遂；但是，若嚴格地講，則謀殺大概不限於預備、陰謀，恐怕也包括一部分未遂。亦如戴炎輝所指出的，已著手實施了殺人，即使未曾被殺害，甚至沒有負傷的場合，都不應適用已殺、已傷，祇有被作為謀殺來處罰。^②無論如何，像這樣在唐律中，將殺人按照犯罪行為的發展階段，區分為三：謀殺、已傷、已殺，隨著犯罪行為迫近於既遂，科以越來越重的刑罰。

那麼，相對於如上唐律的規定，秦律、漢律是如何論處的呢？首先，關於漢律的“謀殺”，前揭拙文已經搞清楚了如下的事實。^③即，漢律之謀殺，至少已被分為“謀殺未殺”與“謀殺已殺”。前者是指已實行企圖殺害人之謀但還未“殺”；後者是指殺害已終了。也就是說，後者相當於既遂，在這種情況下，對實施殺害行為者，以“賊殺”之罪處以“棄市”之刑。所謂“賊殺”指故意殺害，棄市則是在市中公開執行死刑之一種。一方面，僅參加“謀”而未曾擔當實施行為者雖沒有犯賊殺之罪，但是律中適用與賊殺同一規定，仍要被處以棄市之刑。

因此，在探討本文課題時成為問題的是，前文已討論的謀殺未殺問題。首先，《二年律令》之《賊律》有如下的條文：

謀賊殺傷人，未殺，黥為城旦舂。（簡 22）

① 律令研究會編：《詁注日本律令》五，東京堂出版，1979，330 頁。

② 參見前揭戴炎輝《唐律通論》，135 頁。

③ 參見拙文《秦律・漢律における殺人罪の類型——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を中心に——》，《史觀》第 148 冊，2003。

按其規定，雖然密謀“賊殺傷”人，但是最終“未殺”，仍要處以“黥爲城旦舂”之刑。所謂“賊殺傷”，或許是概括“賊殺”、“賊傷”的表達。賊傷是故意使之負傷。總而言之，本條就是有關謀殺未殺即“雖密謀‘賊殺傷’人但最終未殺”情況的規定。關於後者，將在本文第二章第四節分析，若據本條，則謀殺未殺之罪會被處以“黥爲城旦舂”之刑。

“黥爲城旦舂”之“黥”是在臉上施以刺青；“城旦舂”是強制服勞役的刑罰。但黥城旦舂是比對謀殺已殺所科的棄市要輕一等的刑罰。因此，由本條可知，謀殺未殺要處以比謀殺已殺輕一等的刑罰。

此外，在《二年律令·賊律》中，可以見到另一條與前揭簡 22 的規定幾乎相同的條文。即：

賊殺人，及與謀者，皆棄市。未殺，黥爲城旦舂。

其規定已賊殺人者，及賊殺共謀者，均處以棄市之刑。但未殺的場合，則處以黥爲城旦舂之刑。

謀殺未殺是以密謀賊殺人、及犯罪行爲在未殺的階段終了爲成立要件。因此，即使僅密謀賊殺，也要以謀殺未殺之罪被處以黥城旦舂之刑。即使實施比“謀”更進一步的犯罪行爲，但祇要是未殺，則仍處以黥城旦舂之刑。在這一意義上，“謀”可以說是以謀殺未殺之罪處以黥城旦舂之刑的起點。

但是，與此相關的問題是一人制訂殺人計劃的情況。首先，例如，在二人以上共謀賊殺人的場合，如據簡 23 的前半部分，實施加害行爲者就是“賊殺人”，僅參與密謀而未曾實行加害行爲者則相當於“與謀者”，他們都要處以棄市之刑。一方面，未與人共謀，一個人故意殺了人的場合，也相當於“賊殺人”，要處以棄市之刑。總之，無論是二人以上的共犯，還是一人的單獨犯，故意殺害人的場合都適用本條。

那麼，簡 23 後半部分的“未殺，黥爲城旦舂”，應該既適用於共犯也適用於單獨犯。但是，關於秦律、漢律的“謀”，富谷至在分析其用例的基礎上，已經搞清楚了關於二人以上共同策劃犯罪行爲的唐律“謀”的定義，也完全適用於秦律、漢律。^① 因此，要使該原則得以貫徹，在單獨犯的場合，“謀”就不成立，處以黥城旦舂之刑的起點也就不存在了。因而，可以推測，恐怕秦律、漢律也與唐律一樣，即使一人策劃犯罪行爲，也存在被視爲“謀”的特例。

如上，謀殺未殺是將“謀”作爲起點，那麼終點在哪裏呢？如前所述，即使犯罪行爲比“謀”更進一步，祇要未殺就同樣要處以黥城旦舂，所以謀殺未殺的終點就會與該未殺

① 參見富谷至《謀反——秦漢刑罰思想の展開》，《東洋史研究》第 42 卷第 1 號，1983。

有關。那麼，未殺具體是在怎樣的意義上被使用的就成爲問題。不用說，所謂未殺是還沒有殺的意思，既可以理解爲是指並沒有著手實施“殺”這一行爲，也可以理解爲是指雖已著手實施殺害但沒有發生“殺”的結果即人死亡這一結果的時候爲止。總之，將未殺的終點理解爲怎樣的時候，就決定了謀殺未殺的終點。在這一意義上，未殺的終點也可以說就是謀殺未殺的終點。

可供參考的是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下列記載：

臣妾牧殺主。●可（何）謂牧。●欲賊殺主，未殺而得，爲牧。（簡 446）

開頭的“臣妾牧殺主”，大概是秦律條文的一部分。圓點以下或許是以問答形式說明見於該條文的“牧殺”之語的解釋。據此，則“牧殺”是指：“臣妾”（奴婢）“欲”賊殺其主，但仍未殺的時候就被逮捕了。就是說，此“牧殺”本身是以“欲”賊殺和犯罪行爲在未殺階段終了爲成立要件的，但與謀殺未殺一樣，可以說前者是認定牧殺的起點。一方面，未殺的終點與謀殺未殺一樣，也就是牧殺的終點。因此，毋寧反之，若知道“牧殺”本身的終點，則未殺的終點也自然而然就清楚了。

“牧殺”的用例，《二年律令·賊律》就有：

子牧殺父母，毆詈泰父母、父母、段（假）大母、主母、後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棄市。（簡 35）

其規定：子對父母進行牧殺時，要處以棄市之刑。若據前揭睡虎地秦簡簡 446，加害者是臣妾，而被害者是其主的場合，將“欲”賊殺而仍未殺稱爲牧殺，而從該《二年律令》簡 35 看，至少在子爲加害者、父母爲被害者的場合，也被稱爲牧殺。那麼，本條所說的牧殺，也應該是作爲“欲”賊殺而“尚未被殺”之意而使用的；但是，根據本條則要被處以棄市之刑。如前所述，棄市是對於賊殺既遂所科的刑罰，由此可知，子對父母的牧殺，不管犯罪行爲是否達到既遂，都要受到與賊殺既遂同樣重的處罰。

而在子已賊殺父母的場合，不是按照通常的賊殺科以棄市之刑，而是處以更重的刑罰。如《二年律令·賊律》說：

子賊殺傷父母，奴婢賊殺傷主、主父母妻子，皆梟其首市。（簡 34）

其規定：子賊殺或賊傷父母時，處以“梟其首市”。所謂“梟其首市”，簡言之即指“梟首”。梟首就是斬落頭示衆，是比棄市更重的刑罰。

綜合以上《二年律令》簡 34 與簡 35，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限定牧殺是以什麼階段爲終點的。首先，據簡 34，則不但在子賊殺父母的場合而且在賊傷的場合，都要被處以梟首。相

對於此，據簡 35，則牧殺要處以比梟首輕的棄市之刑。那麼，牧殺至少應該是指比賊傷情形輕的階段。所謂賊傷，因為是故意使人負傷，所以大概是比這種情形——在賊殺之罪未達既遂之前是更輕的階段，雖已著手實施賊殺但對方未至於死亡而止於負傷的場合（下文暫且稱之為“牧殺已傷”）——更靠前的階段吧。因而可知，牧殺的終點起碼是在比牧殺已傷更靠前的時候。

基于這樣的理解，一讀到《二年律令·賊律》如下的律文，就可以領會到其意味深長之處：

賊殺傷父母，牧殺父母，毆詈父母，父母告子不孝，其妻子為收者，皆錮，令毋得以爵償、免除及贖。（簡 38）

即，本條規定：在對父母犯了賊殺、賊傷、牧殺、毆、詈、不孝等罪時，一律為“錮”（禁錮），即使是有爵位者也不允許減免刑罰，同時不許贖罪。根據本條，對父母賊殺和牧殺，也作為錮、不許減免刑罰這一措施的對象，於是，在位於賊殺和牧殺之間，例如牧殺已傷等要怎樣論處就成了問題。但是，很難想象祇有位於賊殺與牧殺之間的牧殺已殺被置於這一措施對象之外。因此，牧殺已傷當然也應該被視為錮、不許減免刑罰的對象。而且，在本條中，因為賊殺與牧殺被認為是這種措施的對象，很難想象卻祇有位於其中的牧殺已傷在別的條文中另有規定，所以必須認為牧殺已殺也適用本條。因此，如果再看一下本條，雖然賊殺、牧殺之外，列舉出對於父母的種種犯罪，但是其中符合牧殺已傷者，祇有意味著同樣使之負傷的賊傷。因而，牧殺已傷應作為賊傷之罪來處理。

接下來的問題是，賊傷（牧殺已傷）與牧殺之間的行為將會受到怎樣的論處呢？在本條所列舉的犯罪之中，在賊傷與牧殺的中間比賊傷靠前階段者祇有牧殺。因此，在賊傷與牧殺之間是不存在任何階段的，在賊傷之前的就是牧殺。在本條中，接著“賊殺傷父母”記有“牧殺父母”，也是因為在賊傷之前的就是牧殺吧。因此，牧殺的終點就在賊傷之前，即：雖然打算賊殺人並已著手實施，但是沒有殺害對方甚至連傷也未負的階段。於是，如前所述，因為牧殺的終點即是未殺的終點，所以，未殺就是指直至賊傷之前的階段。

現在重新回到《二年律令》簡 22、簡 23 的分析，這些條文規定預謀賊殺人、但尚未殺的情況下要處以黥城旦舂之刑，而根據以上分析，未殺或許也可理解為是指在賊傷之前的階段。就是說，密謀賊殺人，雖然已著手實施，但是未至負傷，根據簡 22、簡 23，會被處以黥城旦舂之刑。於是，發展到比未殺更進一步的犯罪行為的階段，即：雖想賊殺人並已著手實施，對方雖未死亡，但負了傷時（下文暫且稱之為“謀殺已傷”），加害人要和賊傷父母的場合一樣，作為賊傷之罪來處罰。如前所述，在賊傷父母的場合要被處以梟首之刑，但是，賊傷與犯人沒有親屬關係等特定身份關係者（下文暫且簡稱為“普通人”）時，矢

澤悅子以張家山漢簡《奏讞書》、居延舊簡、《漢書》為材料，搞清楚了直至西漢文帝廢止肉刑前的黥城旦舂之刑和肉刑廢止以後髡鉗城旦舂之刑的問題。^①另外，《二年律令·賊律》有如下條文：

賊傷人，及自賊傷以避事者，皆黥為城旦舂。（簡 25）

規定賊傷之罪要處以黥城旦舂。

整理以上的分析結果，則漢律的規定如下：（1）預謀賊殺人時，或者雖已著手實施賊殺但未曾使之負傷時，以謀殺未殺之罪處以黥城旦舂；（2）祇是使之負傷時（謀殺已傷），以賊傷之罪處以黥城旦舂；（3）在按照計劃已經殺害的場合，以賊殺（謀殺已殺）之罪處以棄市。

將這樣的漢律對殺人罪的處理措施與唐律進行比較，則可以就其特點作出如下的概括。即如前所述，在唐律中，按照犯罪行為的發展階段，可將殺人罪分為謀殺、已傷、已殺三個階段；而漢律也可見謀殺未殺、賊傷、賊殺（謀殺已殺）這三個階段。而且，謀殺未殺、賊傷、賊殺分別與唐律的謀殺、已傷、已殺一樣是指相同的犯罪行為的發展階段。如前已述，唐律的謀殺是指密謀殺害，或者雖已著手實施殺人但連傷都未負的場合，而已傷是指僅使之負傷的場合，已殺則是指按計劃已殺害的場合。因此，在這點上，可以說漢律對於殺人罪的處理措施正是唐律這一措施的起源。^②

但是，漢律與唐律，也可以見到如下的大不相同之點。第一，漢律對於殺人之謀的處罰比唐律重得多。唐律規定謀殺人要被處以三年之刑，這比已傷所科之絞輕四等，更比已殺所科之斬輕五等。可是，漢律規定謀殺人與賊傷（相當於唐律的已傷）一樣要處以黥城旦舂之刑。而且，黥城旦舂僅比對賊殺（相當於唐律的已殺）所科的棄市稍輕一等，由此可知，在漢律中，謀殺未遂要被處以與既遂極其相近的刑罰。

第二，與傷害罪的關係。雖已著手實施殺人但僅使之負傷時（謀殺已傷），和雖無殺意但故意傷人的場合（下文暫且稱之為“傷害罪”），在表面的動作上沒有太大的變化。然而，相對於前者故意的行為，後者的不同之處祇是在無主觀故意這點上。但是，唐律卻區別兩者，前者比後者的處罰要重。即，如前所述，前者是根據“謀殺人”條，以已傷之罪處以絞刑；而後者祇不過是作為“故傷”之罪來處罰。《鬥訟律》“鬥故殺人”條曰：

① 參見矢澤悅子《鬪與賊——秦、漢代における傷害と殺人の二つの形態について——》，池田雄一編《奏讞書——中国古代の裁判記録——》，刀水書房，2002。另，髡鉗城旦舂是剃掉頭髮、戴上頭枷，再服五年的強制勞役刑。富谷至認為，隨著文帝十三年廢止肉刑，黥刑也被廢止，代之而設的就是髡鉗城旦舂這一刑罰。參見富谷至《秦漢刑罰制度的研究》，同朋舍，1998，141—148頁。

② 順帶提及，《魏書》卷百十一《刑罰志》所引用的北魏《賊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者，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據此，北魏律也與唐律一樣，採謀殺、已傷、已殺之三分法。漢律的三分法可能就是經北魏律的這一規定而為唐律所繼承。

不因鬥，故毆傷人者，加鬥毆傷罪一等。

據此，規定故傷之罪加“鬥傷”一等處罰。所謂鬥傷，指打架鬥毆時致傷，按照致傷的手段、傷的部位、程度，科以相應刑罰。因此，加鬥傷一等的對故傷之刑罰有一定的幅度，但都比對已傷所科之絞刑要輕。

可是，在漢律中，謀殺已傷與傷害罪卻沒有區別，均作為賊傷之罪處以黥城旦舂之刑。關於謀殺已傷以賊傷之罪論處的問題，在以上的分析中已經搞清楚了，關於傷害罪有如下的史料。《漢書》卷八三《薛宣傳》載：

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賂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況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唇，身八創。

據該記載，西漢哀帝時，楊明受右侍郎薛況的委託，砍博士申咸，砍斷其鼻與唇，身受傷八處。其下文又載：

廷尉直〈真〉以為，律曰：“鬥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中略）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

關於此事件，廷尉龐真根據律的規定，即：“鬥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判楊明為賊傷之罪，薛況為共謀之罪，兩人都應該處以爵減完城旦之刑。但是，楊明、薛況並沒有殺意。即，據其所載“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薛況的目的頂多是想毀壞申咸的“面目”，使之無法再居官吏之位，似乎未曾有過殺意。因此，龐真對於該事件的判斷是傷害罪以賊傷之罪來論罪。但是，一方面如以上分析所明瞭的，因為謀殺已傷也是以賊傷之罪來處理的，所以不管究竟有無殺意，祇要故意使之負傷，大概就以賊傷之罪來處罰吧。於是，漢律與唐律不同，對謀殺已傷與傷害罪不加區別，存在於兩者之間的殺意有無的差異被忽視，在刑罰上也就不會被反映出來。本文擬在第二章第四節及結語分析這意味著什麼。

另外，在唐律中，謀殺已傷比傷害罪處罰更重，相對於此，在漢律中，兩者卻被處以同樣的刑罰。這只要比較一下漢律與唐律，就可知道對謀殺已傷的處罰要輕。但是，本來在漢律中，傷害罪本身比唐律要受到更重的處罰。即，唐律規定：傷害罪以故傷之罪來處罰，而故傷按照使之負傷的手段、傷的部位與程度，處以杖七十至流三千里之刑。相對於此，漢律規定：以賊傷之罪來處罰，但是賊傷無論在何種情況下，也都處以比死刑僅輕一等的黥城旦舂，而一般認為這是被處以極重的刑罰。賊傷與故傷不同，使之負傷的手段、傷的部位與程度全然不是問題。從前揭《二年律令》簡 25 祇規定“賊傷罪處以黥城旦舂”

看，這一點也是很清楚的。因此，與傷害罪一樣被處以黥城旦舂之刑的謀殺已傷，也決不可能處以較輕的刑罰。

（二）牧殺

在前節，爲了弄清楚謀殺未殺之“未殺”的意思，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內，就牧殺及子殺害父母進行了分析。本節擬就此展開更進一步的探討。首先，關於這個問題，整理一下前節已經明瞭的認識，則有如下幾點。即：（1）子“欲”賊殺父母，雖已著手實施，但在未負傷的階段，以牧殺之罪，處以棄市之刑；（2）雖已著手實施賊殺，但在對方並未死亡，祇是負傷的場合，以賊殺之罪處以梟首之刑；（3）在殺害已完成的場合，以賊殺之罪處以梟首之刑。

那麼，尚未解決的問題是（1）的“欲賊殺”。如前節所述，因爲這處於牧殺的起點，所以若知道其所顯示的具體意思，自然就應該清楚犯罪行爲進行到什麼階段被認定爲牧殺。但是，“欲”語義模糊，既有僅僅是內心的希望之意，也有指打算做什麼的狀態的情況。因此，即使著眼於“欲”這個詞，牧殺的起點也是不明確的。

那麼，試著考慮一下牧殺之“牧”本身的意義，因爲牧殺起碼是指犯罪行爲未達到既遂的狀態，所以可以推測，“牧”這個詞本身是在“想要幹……”、“計劃幹……”的意義上使用的。可是，“牧”有這樣的意義，既未見於以往的字書中，迄今所知的文獻史料與出土文字史料也沒有這樣的用例。其原因爲何？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將前揭睡虎地秦簡簡 446 的“牧”作爲“謀”的通假字，將牧殺解釋爲“謀殺”。^①實際上也沒有“牧”與“謀”通用之例，但是，據董同龢的研究，“牧”的上古音爲 miwāk（入聲），“謀”爲 miwǎg（平聲）^②，兩字音近，確實可以通用。而且，因爲牧殺是以未殺爲成立要件之一，所以如果“牧”是“謀”的通假字，那麼牧殺就是指謀殺未殺。於是，牧殺的起點也與謀殺未殺一樣指“謀”形成的時候。

但是，即使如此，基於如下理由，我認爲“牧”與“謀”多少有別。除前節舉出的關於牧殺的史料外，還應該注意加害者爲臣妾或子，被害者爲主或父母的關係的史料。在唐律中，此類犯罪與普通人的犯罪是有區別的，有特別規定（例如後揭的“謀殺期親尊長”條），一般有比通常的犯罪處罰重的傾向。^③這種傾向也可見於秦律、漢律^④。例如，如前節所分析的，在漢律中，賊傷要處以黥城旦舂之刑，賊殺要處以棄市之刑，而子賊傷、賊殺父母時，要科以比黥城旦舂、棄市更重的刑罰梟首。睡虎地秦簡與《二年律令》中，牧殺

① 參見前揭《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注釋 111 頁“臣妾牧殺主”條注[一]及“譯文”。

② 參見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4，128、130 頁。

③ 關於唐律如何論處對父母等尊親屬、奴婢對主的犯罪，仁井田陞《補訂 中國法制史研究 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351、352 頁）進行了整理。

④ 在秦律中，對父母等尊親屬、臣妾對主的犯罪，要科以較重的處罰，可參見栗勁《秦律通論》（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223、224、229 頁，堀敏一《中國古代的家と集落》（汲古書院，1996，76—89 頁）等。

雖僅見三例，但這三例都是在臣妾、子加害主、父母的特殊場合，決非偶然。就是說，牧殺並非在加害者與被害者有任何身份關係的場合都適用，而祇適用於臣妾、子加害主、父母，即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有特殊身份的場合。相對於此，例如，如前揭《二年律令》簡 22、簡 23 所見，“謀”不能設想為是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有特殊身份關係。因此，“牧”與“謀”的適用對象是不同的。

那麼，“牧”與“謀”有什麼不同之處呢？當然如以上所分析，“牧”與“謀”的適用對象不同，但是僅此恐怕沒有必要僅將臣妾、子加害主、父母的情況稱為“牧”吧。因此，“牧”與“謀”應該是在不同的意義上使用的。雖然這全然是推測，也許兩者的起點有所不同。而且，從其起點看，“謀”是否比“牧”更早些呢？臣妾“欲”賊殺主、子“欲”賊殺父母，則以牧殺問罪，這也許就是立法者的旨趣所在，即：將這樣重大的犯罪作為比謀早的階段的處罰對象。所謂比“謀”早的階段，大概就是指例如決意賊殺主、父母，對主、父母已懷有殺意的場合，等等。

以上兩節，就牧殺與子殺害父母進行了探討，大致可以概括如下。即，普通人同謀殺人時，謀殺未殺與已傷（賊傷）處以黥城旦舂之刑，已殺（賊殺）處以棄市之刑；相對於此，子殺害父母時，牧殺處以棄市，已傷（賊傷）與已殺（賊殺）處以梟首之刑。因此可知，子殺害父母，不管犯罪行為的階段，都比普通人同樣的殺人罪處罰要重。尤其是，因為已傷與已殺同樣被處以梟首之刑，所以即使未遂也要與既遂一樣處以重罰，將這樣重大的犯罪在其發展階段的早期就作為重罰的對象，這大概是立法者的目的吧。

相對於如上的漢律，唐律未設置相當於牧殺的罪名，但是子殺害父母即使未至於既遂也處以重罰。如《賊盜律》“謀殺期親尊長”條曰：

諸謀殺期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斬。

規定犯人只要謀殺父母等一定範圍內的尊親屬，就處以斬刑。^①而關於已傷、已殺這些尊親屬要處以怎樣的刑罰，本條中未有明確記載。但是，《名例律》“斷罪無正”條云：

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

疏議曰：

案賊盜律：謀殺期親尊長，皆斬。無已殺、已傷之。如有殺、傷者，舉始謀是輕，尚得死罪。殺及謀而已傷是重，明從皆斬之坐。

① 不過，在這裏所列舉的親屬名稱之中，不包括父母。但是，根據本條可以理解為：謀殺父母也要被處以斬刑。參見律令研究會編《詠注日本律令》七，東京堂出版，1987，87、88 頁。

如此，則已傷、已殺也要處以斬刑。因此，殺害父母，不論是在犯罪行為的謀、已傷、已殺的任何發展階段，都要處以斬刑。

將漢律對殺害父母的處罰與唐律比較，漢律從牧殺至已殺，按照犯罪行為的發展階段，分別處以棄市至梟首的刑罰。那麼，在不論犯罪行為的發展階段均處以斬刑的唐律中，似乎也可以見到比殺害父母重的刑罰。然而，如果改變看法，就未必不是那樣。即，在唐律中，因為斬是普通人犯已殺所科的刑罰，所以殺害父母的場合，謀殺及已傷就與普通人犯已殺所處的刑罰一樣。但是，在處以比已殺靠前的階段，與普通人犯已殺一樣的刑罰這點上，漢律亦是如此。即，普通人犯已殺要處以棄市之刑，但牧殺父母也處以同樣的處罰。並且，在漢律中，因為已傷父母要處以梟首之刑，所以就會比普通人犯已殺所科刑罰要重。若進一步說，則在唐律中，已殺父母也與普通人犯已殺的情況一樣，都要被處以斬刑，相對於此，在漢律中則要處以比普通人犯已殺重的梟首刑。因此，至少在已傷、已殺的部分，對於殺害父母，漢律比唐律的處罰更重。

（三）竊盜

關於竊盜罪，唐律《賊盜律》“竊盜”條有如下的條文：

諸竊盜，不得財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疋加一等；五疋徒一年，五疋加一等，五十疋加役流。

據此，則以“布”（絹）之長度來換算已竊取財物的價值，按其價值來確定刑罰，但是，在“不得財”的場合，笞五十。“不得財”，不用說就是沒有能夠獲得財物的意思。如其疏議所說：

盜而未得者，笞五十。

雖然已實施竊盜，但是根本未能獲得財物。此“不得財”，被認為是實施竊盜的成立要件之一。這裏的問題是，犯罪行為究竟進展到什麼階段才被認定為是“已實施竊盜”呢？就是說，“不得財”的起點在何階段？僅據唐律的條文及疏議的記述，這一點並不明確。可供參考的是，明律、清律所附的注釋。唐律的該規定也為後世的明律、清律所繼承，明律、清律之《刑律》賊盜篇“竊盜”條曰：

凡竊盜已行而亦未得財，笞五十，免刺。

[明]雷夢麟《讀律瑣言》曰：

人行竊盜，已入主家，為事主所逐，未得財物者，雖未得財，業已入其家。

[明]衷貞吉等《大明律集解附列》纂注曰：

竊盜已至盜所，或穿壁踰牆，若爲事主覺逐而未得財，爲首，笞五十，免刺。

[明]熊鳴岐《昭代王章》卷三說：

已行竊盜而未得財，或因撞遇人退避，或因門戶堅固不能入內。

大概唐律也是如此。在以往的研究中，唐律的“不得財”被解釋爲指竊盜未遂，^①如果明律、清律諸注的解釋也適用於唐律，或許可以認爲它的確大致相當於今天所說的竊盜未遂。^②

另，竊盜罪的情況與殺人罪有別，“謀”並不作爲處罰的對象。^③

那麼，秦律、漢律到底是怎樣處罰的，首先犯罪行爲達到既遂的情況與唐律是一樣的，按照已盜財物的價值來確定刑罰。關於贓物的價值與刑罰的對應關係，此前曾有論述，^④在秦律中爲：

1 錢以上未滿 22 錢……貲一盾
22 錢以上未滿 110 錢……貲二甲
110 錢以上未滿 220 錢……耐隸臣妾
220 錢以上未滿 660 錢……完城旦舂
660 錢以上……黥城旦舂

在漢律中則是：

1 錢以上未滿 22 錢……罰金一兩
22 錢以上未滿 110 錢……罰金四兩
110 錢以上未滿 220 錢……耐隸臣妾
220 錢以上未滿 660 錢……完城旦舂
660 錢以上……黥城旦舂

① 參見前揭戴炎輝、蔡墩銘、錢大群等研究。

② 未遂是以著手實施爲起點，但是關於現在所說的竊盜未遂，圍繞其實施的著手時期，學界有不同爭議。參見大塚仁《實行の着手》（《綜合判例研究叢書 刑法（3）》，有斐閣，1956）。因此，由於學說的不同，現代所說竊盜未遂的起點與“不得財”的起點之間，多少也有產生分歧的情況。

③ 可是，《元典章》卷四十九竊盜條曰：“諸切（竊）盜，始謀未行者，[杖]四十七。已行而不得財，五十七”，被認爲是繼承唐律之竊盜罪規定的條文。據此，則在元之刑法中，竊盜之謀也被作爲處罰的對象。又，在1909年俄國的科茲洛夫探險隊于內蒙古自治區阿拉沁盟額濟納旗的黑水城址所發現的西夏文字資料之中，包括《天盛改舊新定律令》文書，其卷三“雜盜門”有條文曰：“一、偷盜已謀未往，造意十杖，從犯八杖。已往，物未入手，造意十三杖，從犯十杖”，似乎西夏律文竊盜之謀也被作爲處罰的對象。另，本條的原文是以西夏文字來記載的，上揭律文據史金波、聶鴻音、白浜譯注的《天盛改舊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的漢譯。

④ 參見拙文《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刑法雜考——睡虎地秦簡出土以降の秦漢刑法研究の再検討——》，《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6號，2002。

可見，在秦律與漢律之間，在一錢以上未滿二十二錢及二十二錢以上未滿百十錢的場合，所科的刑罰是不同的。即，在秦律中，一錢以上未滿二十二錢及二十二錢以上未滿百十錢的場合，分別要科以“貲一盾”、“貲二甲”的貲刑，而在漢律中卻要科以“罰金一兩”、“罰金四兩”的罰金刑。貲刑是繳納相當於“盾”、“甲”價值的金錢的刑罰，罰金刑是繳納黃金的刑罰。但是，由於漢律的罰金刑是繼承秦律的貲刑而來，所以在秦律、漢律的刑罰制度中貲刑與罰金刑處於相同地位。

一方面，關於竊盜未到既遂即結束的場合，首先，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有如下的記載：

甲謀遣乙盜，一日，乙且往盜，未到，得，皆贖黥。（簡 374）

該事例說的是：甲與乙共謀，並打算派乙去盜；某天，乙去盜時，在未到達犯罪行為地之前就被逮捕。甲乙二人都要被處以“贖黥”（使繳納黃金一斤的刑罰）。在本案中，乙祇是前往預定的犯罪地點，儘管並沒有實施竊盜行為，但是仍要受到處罰。因此，從本條可知，秦律與唐律相對照，竊盜罪在早期的預備階段也要處罰。

其次，關於犯罪行為比上述睡虎地秦簡稍發展的階段，《法律答問》有如下的記述：

挾籥（鑰），贖黥。可（何）謂挾籥（鑰）？挾籥（鑰）者，已挾啟之乃為挾，且未啟亦為挾？挾之弗能啟即去，一日而得，論皆可（何）毆（也）？挾之且欲有盜，弗能啟即去，若未啟而得，當贖黥。挾之非欲盜毆（也），已啟乃為挾。未啟，當貲二甲。（簡 400、簡 401）

開頭的“挾籥（鑰），贖黥”，大概是秦律的條文。在其後，對“挾鑰”（撬鎖孔）的解釋是以問答體來進行說明的。據此，雖然打算入盜並已撬鎖孔，但是未能打開鎖而離去時，或者尚未打開鎖就被逮捕時，都要處以贖黥。本條並沒有明記什麼是鎖孔，但是《方言》卷五曰：

戶鑰，自關而東、陳楚之間，謂之鍵。自關而西，謂之鑰。

如此，則“鑰”通常是指建築物門上的鎖，所以被認定是侵入建築物等的侵入盜。

那麼，在實際上成功打開鎖的場合，將會以何罪論處呢？若根據上文的睡虎地秦簡，則在沒有入盜之意，而撬開鎖孔的場合，要以“挾鑰”之罪處以贖黥，而關於有入盜之意並打開鎖的情況，卻沒有被提及。但是，《二年律令·襍律》曰：

越邑里、官市院垣，若故壞決道出入，及盜啟門戶，皆贖黥。（簡 182）

據此，在因入盜而已打開門戶的場合，要處以贖黥。因此，如果想入盜並撬鎖孔，那麼不管是否打開，都要處以贖黥。

從以上分析可知，在秦律、漢律中，（1）前往竊盜的犯罪預定地點，（2）打算入盜並撬開鎖孔，（3）打開門。這些全部都要被處以贖黥。將這些與唐律比較，則在唐律中，（2）與（3）是被作為“不得財”處罰的，而（1）不作為處罰的對象。

問題是贖黥的處罰與對竊盜既遂的刑罰相比處於怎樣的地位？因此，將貲一盾至黥城旦舂或者罰金一兩至黥城旦舂，即對竊盜既遂所科的刑罰，與贖黥比較，則首先贖黥是一種贖刑。贖刑有“贖死”、“贖城旦舂”、“贖鬼薪白粲”、“贖斬”、“贖腐”、“贖劓”、“贖黥”、“贖耐”、“贖遷”等種類，但是，如前文所述，在當時的刑罰制度中，這些贖刑被認為是比“耐”輕的刑罰。^①因此，贖黥至少是比一百一十錢以上、未滿二百二十錢的場合所科的耐隸臣妾輕的刑罰。

其次，未滿一百一十錢時所科的貲刑、罰金刑與包括贖黥的贖刑是怎樣的輕重關係呢？關於貲刑與贖刑的輕重關係，亦如角谷常子所指出的，從前揭睡虎地秦簡簡 400、簡 401 所載“抉之非欲盜毆（也），已啟乃為抉。未啟，當貲二甲”可清楚。即，沒有入盜的意思，已撬鎖孔並打開鎖時，要處以贖黥；如果未能打開鎖，就處以貲二甲。因為對犯罪情節進展方要科以贖黥，所以贖刑是比貲刑重的刑罰。^②那麼，繼承貲刑的罰金刑，也應認為是比贖刑輕的刑罰。這也可以從《二年律令·告律》得到證明：

告不審及有罪先自告，各減其罪一等。（中略）贖耐罪罰金四兩（以下略）（簡 127—129）

贖耐減刑一等，就變成罰金四兩。

因此，在秦律、漢律中，（1）—（3）的場合，其處罰比竊取一百一十錢以上輕，比竊取未滿一百一十錢重。就是說，由於情況不同，如（1）—（3）那樣的竊盜之預備、陰謀，就會比既遂所受到的處罰更重。如前揭，唐律規定，若竊取相當於一尺布價值的財物，處以“杖六十”之刑，這是竊盜既遂之中所科刑罰最輕的，而在“不得財”的場合則要處以輕一等的“笞五十”之刑。因此，唐律中不會有竊盜未遂比既遂處罰重的情況。但是，在秦律、漢律中，不但如（2）、（3）那樣的唐律所謂“不得財”的情況，而且如（1）那樣的處於比“不得財”更早的階段，也比已竊取未滿一百一十錢的場合處罰重。這也不見於唐律，是秦律、漢律特有的處罰方法，為何形成這樣的處罰原因不詳。但是，至少可以確定

① 參見拙文《秦律・漢律における殺人罪の類型》。另，關於耐具體指的是何種刑罰，有各種說法。前揭拙文之注（16）曾歸納諸說，可供參考。

② 參見角谷常子《秦漢時代の贖刑》，梅原郁編《前近代中国の刑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

與唐律相比，秦律、漢律對竊盜之未遂、預備處罰很重。

（四）盜鑄錢

唐律《雜律》“私鑄錢”條曰：

諸私鑄錢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備未鑄者，徒二年。作具未備者，杖一百。

規定：“私鑄錢”罪，流三千里；“作具已備未鑄”，徒二年；“作具未備”，杖一百。私鑄錢指民間隨意鑄造錢。又，關於“作具已備未鑄”及“作具未備”，疏議曰：

其作具已備，謂鑄錢作具並已周備而未鑄者，徒二年。若作具未備，謂有所欠少未堪鑄錢者，杖一百。

前者是指雖已準備好鑄造必需的器具但“未鑄”，相對於此，後者是指雖正在準備器具但實際上還不足以進行鑄造。因此，按照“私鑄錢”、“作具已備未鑄”、“作具未備”這三個犯罪行為發展階段，其應處的刑罰就會有所區別。其中，因為“私鑄錢”是既遂，所以“作具已備未鑄”就是指從準備好器具直至既遂之前為止。就是說，這裏所謂“未鑄”，大概是指雖已著手實施鑄造但並未達到鑄造完錢的狀態以前。另外，戴炎輝將“作具未備”理解為預備，將“作具已備未鑄”理解為未遂。^①而蔡墩銘卻認為，兩者都處於預備階段。^②的確，“作具未備”恐怕是處於預備階段，而“作具已備未鑄”一方面是將準備好器具的預備行為作為起點，另一方面是將鑄造完了之前作為終點，所以，應該理解為預備的一部分及處於未遂階段。

那麼，秦律、漢律是如何論處的呢，首先關於既遂的場合，《二年律令·錢律》曰：

盜鑄錢及佐者，棄市。（簡 201）

規定“盜鑄錢”之罪處以棄市之刑。盜鑄錢相當於唐律的私鑄錢。一方面，關於盜鑄錢之罪達到既遂前，同《錢律》有如下條文：

諸謀盜鑄錢，頗有其器具未鑄者，皆黥以為城旦舂。（簡 208）

“謀盜鑄錢”，按照文字來講就是謀劃進行盜鑄錢。一方面，“頗有其器具未鑄”的“頗”，散見於《二年律令》，正如以前所指出的，都是作為“小部分”之意來使用的。^③因此，“頗有其器具未鑄”是指雖然準備了很少的鑄造錢的器具但是尚“未鑄”。因此，一

① 參見戴炎輝《唐律各論》，三民書店，1965，248 頁。

② 參見蔡氏前揭書，196 頁。

③ 參見早稻田大學簡帛研究會《張家山第二四七號漢墓竹簡詁注（一）——二年律令詁注（一）——》，《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創刊號，2002，簡 1、簡 2 注[八]。

看本條就能夠讀為：“謀劃盜鑄錢，（其後）即使準備了很少的器具，如果未鑄，就處以黥城旦舂之刑”。如果這樣理解，那麼不僅謀劃盜鑄錢要成為處罰的對象，祇要開始備哪怕很少的器具也會被處以黥城旦舂之刑。不要忽視的是，本條以“皆黥以為城旦舂”結束。在秦律、漢律中，“皆”一般是指其上文所記多種以上犯罪的全部^①，所以本條也一定是就多種犯罪規定的。於是，“謀盜鑄錢，頗有其器具未鑄者”，不是一種犯罪，而必需被視為“謀盜鑄錢”和“頗有其器具未鑄”這兩個犯罪。簡而言之，根據本條的規定，不但準備了部分器具，而且即使只謀劃盜鑄錢，也會被處以黥城旦舂之刑。

因此，將本條與前揭唐律的“私鑄錢”條比較，或許可指出如下兩個特點。第一，關於盜鑄錢之“謀”，在唐律中並未被作為處罰的對象，而在《二年律令》中卻被處以黥城旦舂之刑。黥城旦舂比盜鑄錢之既遂所科的棄市僅略輕一等，因此成為極重的處罰。

第二，在唐律中，私鑄錢之預備、未遂被區分為“作具已備未鑄”與“作具未備”，各自被科以不同的刑罰。而在《二年律令》中，這兩者被一總為“頗有其器具未鑄”，處以黥城旦舂之刑。即，如前所述，因為唐律的“作具未備”是指雖然準備器具但實際上還不足以進行鑄造的場合，正與《二年律令》的“頗有其器具未鑄”一致。可是，《二年律令》沒有如唐律的“作具未備”之類的有關已準備器具時的規定，從準備部分器具到鑄造完了之前，均是以“頗有其器具未鑄”來總括。因而，唐律是根據是否已準備好器具，設定了有三等級差的刑罰；相對於此，《二年律令》則沒有區別兩者，而處以同一刑罰。僅在這點上，就可以說《二年律令》是加重處罰盜鑄錢之預備、未遂。

二 未遂、預備、陰謀受到與既遂同一處罰的犯罪

如本文開篇所概述的，唐律關於謀反與殺害父母等極其重大的犯罪，對其未遂、預備、陰謀要處以與既遂一樣的刑罰。那麼，秦律、漢律對於什麼樣的犯罪會處以這樣的刑罰呢？這一部分要檢討的就是，秦律、漢律中未遂、預備、陰謀要與既遂處以同樣刑罰的犯罪。

（一）謀反

所謂“謀反”，是指企圖叛逆國家和皇帝。關於漢律的謀反罪，《史記》、《漢書》、《後漢書》等文獻史料可見到很多相關的處罰例，布目潮瀨、富谷至都有相關的研究。^②尤其是，

① 附帶提及，唐律《名例律》“共犯罪本罪別”條曰：“若本條言皆者，罪無首從”。在唐律中，“皆”是在不問“首從”的意義上使用的。即，唐律按照其在犯罪行為中的作用，將共犯者區分為“首”與“從”，原則是處罰“首”重；但是，關於記載有“皆”的條文，該首從之法就不被適用。可是，秦律、漢律原本沒有唐律那樣的首從之法，其原則是所有共犯處以同一刑罰。參見拙文《秦律、漢律における共犯の処罰原理》。因此，秦律、漢律中的“皆”，並沒有像唐律那樣在不問首從的意義上來使用。

② 參見《布目潮瀨中国史論集》上卷（汲古書院，2003，90—99頁），富谷至前揭論文。

富谷至認為，謀反是“反”罪的未遂犯，無論是“謀反”還是“反”，都要被處以“誅”或者“腰斬”（死刑的一種，是截斷軀體的刑罰），未設置刑罰的級差。不過，如昝山明所指出的，因為謀反是指著手實施“反”之前的階段，所以準確地講不能稱為未遂，稱之為預備、陰謀是正確的。^①以前也指出，謀反、反都要被處以腰斬，這從《二年律令》也可得到確認。^②《二年律令·賊律》曰：

以城邑亭障反，降諸侯，及守乘城亭障，諸侯人來攻盜，不堅守而棄去之若降之，
及謀反者，皆要（腰）斬。（簡1、簡2）

其規定，“以城邑亭障反”等行為，要處以腰斬之刑。開頭的“以城邑亭障反”，可以理解為反逆是已著手實施反罪之例。但是，另一方面，如劃有底綫的部分即“及謀反者”所說，謀反罪也要被作為腰斬的對象。

因此，在漢律中，關於反罪的處罰，並不區分犯罪行為的發展階段，即使是預備、陰謀的階段也會和既遂一樣處以腰斬。這是因為反罪是侵害國家存續、皇帝生命的極其重大之法益的犯罪，因此在早期的預備、陰謀階段，也有必要與既遂一樣嚴厲處罰吧。

順便說一下，唐律《賊盜律》“謀反大逆”條曰：

諸謀反及大逆者，皆斬。

規定謀反罪處以斬刑，有關已著手實施反罪的場合並沒有規定。其原因恐怕是，這也與漢律一樣在謀反階段就要處斬，之後著手實施的反罪，也要同樣論處吧。

（二）劫人

所謂“劫人”就是掠奪人。但是，在秦律、漢律中，具體被處以何刑罰，迄今並不清楚。而《漢書》卷七十六《趙廣漢傳》曰：

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

記載長安少年數人，聚集在里中最裏頭的空房中，共謀掠奪人，官吏闖入並將其逮捕。由此可知劫人之謀是要被作為處罰的對象的，但還不知被科以怎樣的刑罰。

所幸《二年律令》有關於劫人罪之處罰規定的條文。《盜律》曰：

劫人、謀劫人求錢財，雖未得若未劫，皆磔之。（簡68）

其規定，“劫人”及“謀劫人求錢財”的場合，都處以“磔”刑。為了行文的方便，先從

① 参见昝山明所写的书评（《法制史研究》第34号，1984）。

② 参见拙文《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刑法雜考》。

後者開始檢討，那麼簡而言之，其宗旨是：在謀劃劫人並掠奪金錢財物時，即使“未得”或“未劫”，也處以磔刑。就是說，這是關於以財產金錢為目的而劫人質的規定。未劫，如果按照文字解釋就是尚未掠奪人，但是，也可理解為是指尚未著手實施劫持之前的時段，也可理解為是指雖然已實施劫持但尚未掠奪完了之前的時段。一方面，未得大概就是指雖已掠奪人但還沒有獲得金錢與財物吧。那麼，未劫就成為比未得更早的階段，所以應該是指雖已著手實施掠奪但尚未掠奪完了的時候。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未劫是指尚未著手實施掠奪止之前，那麼就沒有關於雖已著手實施掠奪但尚未掠奪完了階段的處罰規定了。

不過，根據本條規定，不管犯罪行為進展到未劫或更進一步的未得的階段，祇要進行謀劃就處以磔刑。而且，如同“雖未得若未劫”所說，如果從所謂“雖”（雖然）回頭來讀“謀劫人求錢財，雖未得若未劫，皆磔之”，其意思大概是：劫人並要搶金錢、財物，若獲得金錢、財物，處以磔刑，雖然犯罪行為在未得或未劫的階段已終了，也處以磔刑。就是說，可以認為，即使既遂，也與謀、未劫、未得的情況一樣，要處以磔刑。因此，劫人並搶金錢、財物罪，不論犯罪行為的發展階段，都要被處以磔刑，是很重的處罰。另外，磔是在處刑後將屍體示眾的刑罰，是比同樣為死刑的棄市更重的刑罰。^①

一方面，本條開頭的“劫人”大概是指祇掠奪人，不像“謀劫人求錢財，雖未得若未劫”那樣以搶財物、金錢為目的。前者與後者不同，因為至少在本條中並沒有設定處罰其未遂、預備、陰謀的規定，所以或許可以認為在犯罪行為至於既遂之後才處以磔刑。可以認為，前者的未遂、預備、陰謀，假使在別的條文被作為處罰的對象，大概也要被處以比磔輕的刑罰。

相對於如上的漢律，唐律《賊盜律》“有所規避執人質”條曰：

諸有所規避，而執持人為質者，皆斬。

其規定，以財物金錢為目的，或者為了免罪而劫持人質者，處以斬刑。唐律沒有設定關於劫持人質的結果實際上獲得財物、或者免罪場合的規定，以這樣的目的劫持人質時要被處以斬刑，而不管後來犯人的目的是否實現。如前所述，因為在漢律中，如果以財物金錢為目的掠奪人的話，設有未得之罪，未得也與既遂處同樣的刑罰，所以，在這點上，唐律與漢律是相同的。但是，唐律與漢律不同之處在於，沒有處罰“謀”的規定，更沒有“劫”這個階段的處罰規定。因此，從與唐律的比較可知，在漢律中，從犯罪行為的早期階段就將以搶財物金錢為目的的劫人作為重罰的對象。順便說一下，關於不以財物金錢為目的的掠奪，唐律《賊盜律》“略人略賣人”條曰：

① 參見早稻田大學秦簡研究會《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詁注初稿（一）》（《史滴》第20號，1998）注④，拙文《秦律・漢律における殺人罪の類型》。

諸略人、略賣人，奴婢者，絞。爲部曲者，流三千里。爲妻妾子孫者，徒三年。

在掠奪之後，根據被掠奪者爲“奴婢”、“部曲”、“妻妾子孫”中的具體身份，分別處以不同的刑罰，但是未遂、預備、陰謀没有被作爲處罰的對象。

（三）略賣

所謂“略賣”，就是掠奪人並將其賣掉。在將掠奪作爲成立要件之一這點上，與前節的劫人有共通之處。但是，略賣需要賣掉人身。關於略賣，《二年律令·盜律》曰：

群盜及亡從群盜，毆折人枳（肢），肤體，及令跛（跛）蹇（蹇），若縛守將人而強盜之，及投書、縣（懸）人書，恐獨人以求錢財，盜殺傷人，盜發塚，略賣人若已略未賣，橋（矯）相以爲吏，自以爲吏以盜，皆磔。（簡 65、簡 66）

其規定，“群盜”略賣人，或者雖已掠奪人，但還沒有賣掉，處以磔刑。就是說，只要掠奪完了，即使尚未賣掉，就與既遂處以同樣的刑罰。但是，與以搶財物金錢爲目的的劫人不同，至少在本條中，謀與未劫都未被作爲處罰的對象。

另外，所謂群盜，《二年律令·盜律》曰：

盜五人以上相與功（攻）盜，爲群盜。（簡 62）

指五人以上的犯罪集團。那麼，由未滿五人略賣的場合，就不適用簡 65、簡 66 的規定。但是，如前節所分析的，因爲連在不將財物金錢作爲目的掠奪人的場合都處以磔刑，所以很難認爲未滿五人以略賣爲目的並已掠奪人時，進而實際上已賣掉時，要處以比磔輕的刑罰。而且，因爲很難想象未滿五人的一方比群盜那樣的犯罪集團犯罪處罰重，所以不管未滿五人略賣究竟是既遂還是未賣，都要被處以磔刑吧。

附帶說一下，在唐律中，如前節所列舉出的，賊盜律“略人略賣人”條有略賣的規定，但是關於其未遂、預備、陰謀卻没有被作爲處罰的對象。

（四）賊傷

如第一部分第一節所分析的，所謂“賊傷”就是故意傷人。在漢律中，欲殺害人，但僅使之負傷的場合（謀殺已傷），還是沒有殺意而故意傷了人的場合（傷害罪），都以賊傷之罪處以黥城旦舂之刑。因爲前者已分析過，所以本節將就後者之未遂、預備、陰謀加以探討。

如前揭，《二年律令》，簡 22 有如下之律文：

謀賊殺傷人，未殺，黥爲城旦舂。

就與謀殺未殺並列的、“雖謀劃賊傷人，但最終並未殺”的情況（以下，暫且稱之爲“謀

傷未殺”）作了規定。謀傷未殺因為被規定與謀殺未殺合併處置，所以與謀殺未殺一樣，以謀為起點、以未殺為終點，即以直至賊傷之前止作為終點。

謀殺未殺與謀傷未殺雖然在犯罪行為在未殺階段終了這一點上有共通之處，但前者有殺意，後者沒有殺意，僅有想使人負傷的意思。儘管如此，根據本條，因為兩者都要被處以黥城旦舂之刑，所以有無殺意就不會被反映在刑罰上。

但是，像這樣無視殺意之有無，不祇限於謀殺未殺與謀傷未殺的場合。即如第一章第一節所檢討的，在謀殺已傷和傷害罪之間，儘管存在有無殺意的區別，但是都以賊傷罪論處。並且，忽視殺意之有無在犯罪行為更有進展並已殺害人的場合，也是同樣如此。謀殺已殺以賊殺罪被處罰，如第一章第一節所分析的，在謀殺已殺的場合，犯人有殺意。可是，在漢律中，即使在没有殺意傷害致死的場合，也以賊殺之罪來論處。如前所述，在漢律中，使人負傷後，被害者在一定期間因該傷而死亡的場合，適用以殺人論處的“保辜”規定。^①因此，雖無殺意，但故意傷人，並致對方死亡的情況下，就以賊殺問罪。由此可知，在漢律中，有殺意之謀殺已殺，與無殺意之傷害致死，兩者是没有什麼區別的，都要以賊殺之罪處以棄市之刑。

綜上所述，大概可以有如下的認識，即在漢律中，故意殺傷人時，不管犯人是否有殺意，如果犯罪行為在未殺階段終了，就處以黥城旦舂；如果被害者負傷，就以賊傷罪處以黥城旦舂；如果死亡，就以賊殺罪處以棄市之刑。就是說，在整個犯罪行為的發展階段中，有無殺意沒有關係，而是要按照犯罪行為產生的結果來科處刑罰。

順便說一下，如前所述，漢律的賊傷大致相當於唐律的故傷，但是並沒有制定處罰故傷之未遂、預備、陰謀的規定。

結語

以上，在可能的史料範圍內，分析了秦律、漢律中各種犯罪之未遂、預備、陰謀將分別受到怎樣的論處。可是，與漢律相比，秦律有關未遂、預備、陰謀的史料非常少，所以先將漢律整體的傾向與唐律比較，如下特徵便浮現出來。

第一，漢律與唐律相比，將早期“謀”之階段作為處罰對象的犯罪很多。在唐律中，處罰“謀”的限於謀反、謀大逆、謀叛、謀殺等最重大的一些犯罪；而在漢律中，盜鑄錢、以搶財物金錢為目的的劫人、賊傷之謀，也被作為處罰的對象。

第二，在唐律中，按照犯罪行為的發展階段將殺人、私鑄錢之罪區分為三階段，分別

① 參見拙文《秦律・漢律における殺人罪の類型》。

處以不同的刑罰；而在漢律中，刑罰被分為既遂及既遂之前兩部分。可是，在漢律中，按照犯罪行為的發展階段，殺人被區分為謀殺未殺、賊傷、賊殺，盜鑄錢則被分為謀盜鑄錢、頗有其器具未鑄、盜鑄錢三個階段。在殺人的場合，謀殺未殺、賊傷處以黥城旦舂，賊殺處以棄市；在盜鑄錢的場合，謀盜鑄錢、頗有其器具未鑄處以黥城旦舂，盜鑄錢處以棄市，如此，則在刑罰上祇是分為既遂與既遂之前兩個階段。

第三，如第二章所明瞭的，在漢律方面，與唐律相比，將未遂與既遂處以同樣刑罰的規定有很多。這樣的處罰，在唐律方面僅限於謀反、殺害父母等極其重大的犯罪；而在漢律方面，對於以財物金錢為目的的劫人、略賣、賊傷，也要處以這樣的刑罰。又，竊盜之未遂，根據不同的情況，還有處罰比既遂重的現象出現。

因此，綜合以上三點，要言之，可以說漢律與唐律相比，犯罪之未遂、預備、陰謀有重罰的傾向。秦律大概也是如此。《二年律令》是繼承秦律不久的律令，而且秦律也有與漢律同樣的關於牧殺的規定，並且連竊盜那樣比較輕微的犯罪，從早期前往犯罪行為預定地的階段開始，就被作為處罰的對象，因此可以認為，秦律同樣也有重罰未遂、預備、陰謀的傾向。

那麼，秦律、漢律的這種傾向到底意味著什麼呢？富谷至主要從睡虎地秦簡入手，關於秦律、漢律提出這樣的看法：“刑法適用的基本原則是，不承認未遂與既遂、主犯與共犯之間有特別的差距，兩者同等量刑”，“未遂與既遂之間，沒有截然分開，將未然階段的著手、企行進而犯意的形成也作為處罰的對象，而且量刑與已然之時沒有區別”。這樣處罰是因為秦律、漢律重視犯人的動機、心意，並且以“達到預防犯罪”作為刑罰的目的。^①可是，正如本文的分析所明瞭的，秦律、漢律中雖然並非所有的犯罪未遂以前都被處以與既遂同樣的刑罰，但是，與唐律相比，這樣的規定確實有很多。而且，如第一部分所檢討的，即使未遂被處以比既遂輕的刑罰，也有很多其刑罰與既遂極其相近的情況。

那麼，秦律、漢律對於未遂、預備、陰謀進行這樣的處罰，果真是因為重視犯人的動機、心意並且以達到預防犯罪為目的嗎？首先，關於犯人的動機、心意，如第一章第一節及第二章第四節所檢討的，謀殺未殺與謀傷未殺、謀殺已傷與傷害罪、謀殺已殺與傷害致死，雖然各自在殺意之有無上有差別，但是都無視這一點，被處以同樣的刑罰。因此，至少關於未遂、預備、陰謀，未必可以說秦律、漢律更重視動機、心意。

不過，如以往所指出的，在漢代治獄之際，除了律這一法律規範之外，也援引主要以《春秋公羊傳》的思想為基礎的“春秋之義”的道德性規範作為判決的根據。據說，在該《公羊傳》中有這樣的傾向：不重視行為的結果這一客觀的事實，而極其重視動機、心意

① 參見富谷至前揭書 382—388 頁。

等主觀性因素。^①因此，如果確實根據春秋之義來進行治獄，如未遂、預備、陰謀，即使沒有按照犯人的意圖達成其結果，也因為其動機、心意是邪惡的，所以從犯罪行為發展階段的早期就要重重地處罰。《春秋繁露·精華篇》曰：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其成。

正表達了這一點：在據春秋之義治獄時，如果犯人的動機是邪惡的，那麼不論是否實現其行為結果都要受到處罰。但是，律中對殺人罪、傷害罪之未遂、預備、陰謀的處罰，與春秋之義不同，犯人的動機未必受到重視。因此，春秋之義暫且不論，秦律、漢律對於未遂、預備、陰謀所規定的如本文已搞清楚的處罰，是有其它理由的。

其次，關於預防犯罪，首先富谷至認為，秦律、漢律將預防犯罪作為目的之一，其所提出的預防特徵有兩個：預防著手犯罪與預防實現犯罪。這兩者都是由富谷至暫時命名的。關於前者，其定義是：“通過執行刑罰，威嚇犯罪者之外的一般的第三者，抑制犯罪，抑制的直接對象不是犯罪者而是著手犯罪的一般的第三者”；而關於後者，其定義是：“在犯罪行為的未然階段加以嚴厲制裁，回避在其犯罪完成時產生的重大後果，所以其對象與其說是沒有犯罪的第三者，莫如是行為並且是萌芽階段的行為，這是以未然地預防其行為最終被完成為目的的”。

的確，秦律、漢律在犯罪行為的早期發展階段將各犯罪作為處罰的對象這點上，是將預防犯罪完成作為刑罰目的之一的。但是，若祇是純粹“回避在其犯罪完成時產生的重大後果”，則祇從早期作為處罰對象就應該足夠了，“加以嚴厲制裁”就沒有必要吧。這是因為，若在犯罪行為的早期階段被逮捕，則不管後來被科以怎樣的刑罰，自然就可以回避犯罪的完成。因此，對於未遂、預備、陰謀科以重罰，並非因為秦律、漢律是以預防犯罪完成作為刑罰目的，而應該有其它的原因。

因此，我認為秦律、漢律嚴厲處罰未遂、預備、陰謀，仍然是因為將預防著手犯罪作為刑罰目的。即，通過在律文中宣佈、威嚇，即使犯人沒有按照意圖實現其結果，也自犯罪行為的早期階段處以嚴厲的處罰來防止犯罪的發生本身，不正是立法旨趣嗎？換言之，或許可以說，秦律、漢律重罰未遂、預備、陰謀，就是由於極端重視著手預防該犯罪。而且仁井田陞說過：“中國的國家權力，自古就從維護國家秩序的立場，特別重視與自己有深刻利害關係的法益的侵害（對君主、父母的反逆），對著手前的行為也要科以最重的刑

① 關於《公羊傳》重視心意及根據春秋之義治獄，參見日原利國：《春秋公羊傳の研究》三“心意の偏重——行為の評価について——”，創文社，1976；同氏《漢代の刑罰における主觀主義——〈春秋〉と刑罰との關係——》，《漢代思想の研究》，研文出版，1986；富谷至：《西漢後半期の政治と春秋學——〈左氏春秋〉の対立與展開——》，《東洋史研究》第36卷第4號，1978；高恒：《論〈引經決獄〉》，《秦漢法制論考》，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等等。

罰。”^①即使對比較輕微的犯罪也是如此，以此維持國家與社會的秩序這一國家的政策性意圖，比後世的唐律有更深刻的反映。

（附記：本文基於 2002 年 10 月 6 日在法制史學會第五十次研究大會所作的研究報告，並對部分解釋等作了大幅修正。又，本文是平成十四年度文部科學省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特別研究員獎勵費[研究課題“中国古代刑法研究——中国古代刑法の刑法總論的研究とその民衆支配的性格の検討——”]資助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李力 譯）

① 參見仁井田陞《補訂 中國法制史研究 法と慣習・法と道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616 頁。

2004、2005 年張家山漢簡研究綜述

魯東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 王寧

1983 年，湖北江陵張家山五座漢墓出土竹簡 2000 餘枚，內容包括《二年律令》、《奏讞書》、《蓋廬》、《脈書》、《引書》、《算數書》、《日書》、曆譜、遺冊等，內涵十分豐富，對研究西漢社會狀況有重要價值。繼《脈書》、《引書》、《奏讞書》、《算數書》釋文公佈後，2001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一書，公佈了《二年律令》和《蓋廬》。自此，學術界掀起了第一個研究張家山漢簡的熱潮。2004 年，蔡萬進、張小鋒發表《2002、2003 年張家山漢簡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4 年第 10 期）一文，對 2002、2003 年張家山漢簡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作了綜述，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近兩年，張家山漢簡的研究又有了新的進展。因此，很有必要對 2004、2005 年張家山漢簡的研究狀況進行梳理，寫成綜述，以貢獻給學術界。

2005 年 8 月初，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第十屆年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呼和浩特召開。會議專設簡牘考古組，討論了秦漢簡牘及相關問題。朱紅林《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集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一書，在充分吸收前人注釋成果的基礎上，對《二年律令》進行了較詳細的注釋。曹旅甯《張家山漢律研究》（中華書局，2005）一書，由 24 篇論文組成，其研究範圍基本涵蓋了《二年律令》的主要內容。蔡萬進在《曹旅甯著〈張家山漢律研究〉出版》（《中國史研究動態》2005 年第 12 期）一文中對此書作了評述。另外，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編纂的《秦漢史論叢》第九輯（三秦出版社，2004，文中簡稱《史叢》），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編纂的《秦文化論叢》第十二輯（三秦出版社，2005，文中簡稱《文叢》），《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文中簡稱《研究》），《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

究》第二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等書籍型刊物，均較多地收集了有關張家山漢簡的論文。下面對研究論文分類擇要介紹。

一、漢初的法律體系與法律思想研究

關於漢初的法律體系。孟彥弘《秦漢法典體系的演變》（《歷史研究》2005年第3期）一文，從總體上論證了秦漢法典體系的演變過程，並對所謂“漢律九章”及漢晉至唐律的繼承變化等問題提出了意見。南玉泉《論秦漢的律與令》（《內蒙古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一文，論述了律令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法律形式，並對秦漢律令特點作了分析。閔曉君《略論秦律對漢律的影響》（《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一文，通過對秦漢法律條文沿革的考述，具體說明了漢律對秦律的繼承和發展。楊振紅《秦漢律篇二級分類說——論〈二年律令〉二十七種律均屬九章》（《歷史研究》2005年第6期）一文認為，秦漢律典存在二級分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以及傳世文獻中不屬於九章的漢代律篇，應是九章之下的二級律篇。楊振紅《從〈二年律令〉的性質看漢代法典的編纂修訂與律令關係》（《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4期）一文，則通過對《二年律令》中諸律令的制定年代以及與惠、呂時期詔書關係的考察，揭示了漢代律令的本質以及漢代法典編纂修訂的原則和實態。鄭璞《從張家山出土漢簡看漢代律法》（《湖南冶金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一文，提出了漢律存在的兩個特點：一為漢律治吏以重典，目的在抑制腐敗；二是漢律治民以重典，目的在維護封建倫理關係。

關於漢初的法律思想。劉歡、趙璐《從〈二年律令〉看儒家思想對西漢立法的影響》（《人文雜誌》2004年第4期）一文認為，儒家思想和儒家倫理觀念在《二年律令》中已有不少體現，並在很大程度上深入到漢初統治者的治國實踐中，成為當時立法的理論依據之一。武麗娜、王樹金《試論秦漢法律中的宗法思想——以睡虎地秦簡和張家山漢簡為例》（《文叢》）一文，探討了秦漢律簡宗法思想的存在及其薄弱的一面。相關論文還有，曾加《〈二年律令〉中的〈盜律〉及其法律思想初探》（《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及《〈二年律令〉中的〈賊律〉及其法律思想初探》（《西北工業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等。

二、漢初的刑法研究

閔曉君《秦漢盜罪及其立法沿革》（《法學研究》2004年第6期）一文，對秦漢時期各種類型的盜罪及立法進行了研究，並對《盜律》沿革進行了考述。韓樹峰《秦漢徒刑散論》

(《歷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一文認為，秦漢刑罰體系中有三個等級，這為加刑和附加刑等非正式刑名提供了存在的空間；就肉刑和徒刑的關係而言，秦及漢初刑罰以徒刑為主，肉刑為輔。日本學者水間大輔《秦律、漢律中的殺人罪類型——以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為中心》(《史叢》)一文，研究了秦、漢律的殺人罪類型及其相應的刑罰，並認為漢律的殺人罪與唐律的“六殺”十分相似。徐世虹《“三環之”、“刑復城旦舂”、“繫城旦舂某歲”解——讀〈二年律令〉札記》(《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一文，分析“三環之”這一程序的設置，是對不孝罪的起訴可能會出現的“告不審”後果採取的預防措施；“刑復城旦舂”是指城旦舂刑徒受肉刑後依舊服城旦舂勞役；“繫城旦舂某歲”在“城旦舂”後面綴有一定的年數，應是作為加刑手段。萬榮《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之“司寇”、“城旦舂”名分析》(《晉陽學刊》2005 年第 6 期)一文，認為“司寇”的用法在性別上不十分明晰；“城旦舂”的使用不是嚴格以男子為城旦、以女子為舂，而是互有交叉。高葉青《漢代的罰金和贖刑——〈二年律令〉研讀札記》(《南都學壇》2004 年第 6 期)一文，對漢代的罰金、贖刑、罰金與贖刑之間的異同進行了論述。宋豔萍《從〈二年律令〉中的“貲”看秦漢經濟處罰形式的轉變》(《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一文認為，張家山漢簡經濟處罰雖以罰金為主流，但仍保存了秦簡貲錢和以勞役抵償經濟處罰的形式，此時的貲既有經濟處罰的意思，又有財產、資產的含義。李均明《簡牘所反映的漢代文書犯罪》(《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一文，考證了與文書直接相關的犯罪，如：矯制、為偽書、上書謾與上書詐、書失誤、亡書、弗為書、泄秘書、偽寫印及亡印信等。他的《關於八月案比》(《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一文，對案比涉及的內容及案比多在八月進行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張小鋒《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自告資料辨析》(《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一文指出，自首制度在漢初已相當完備。相關文章還有，支強《〈二年律令·具律〉中所見“刑盡”試解》(《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王紀潮《張家山漢簡〈具律〉的流變及“斬右趾”罪的棄市問題——讀江陵張家山〈二年律令·具律〉札記》(《東南文化》2004 年第 4 期)、劉少剛《漢律偽寫璽印罪與西漢的政治鬥爭》(《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張小鋒《釋〈二年律令·告律〉第 126—131 簡及漢初的“遷”與“贖遷”》(《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等。

三、漢初的訴訟法研究

蔡萬進《〈奏讞書〉與漢代奏讞制度》(《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一文，勾勒復原了漢代奏讞制度的基本輪廓。他的《〈奏讞書〉編訂成書年代蠡測》(《出土

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一文認為，《奏讞書》的編訂年代有可能在高祖十一年八月至惠帝二年蕭何去世之間。邵正坤、禹平《漢代讞疑獄制度試探》（《晉陽學刊》2005年第4期）一文，就漢代讞疑獄制度的施行及其發展、讞疑獄的程序、讞疑獄制度產生的原因等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李曉英《漢代證據制度探析》（《鄭州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一文，指出漢代的證據制度與其它司法制度一樣處於草創時期，它重視證據的法律精神及其中包含著無罪推定的原則。閆曉君《試論張家山漢簡〈錢律〉》（《法律科學》2004年第1期）一文認為，漢簡反映了漢代在盜鑄錢上的“告訴”與連坐制度，同時還將《錢律》與唐律作了比較，認為唐律中關於私鑄錢犯罪的有關規定是由漢律繼承發展而來。劉華祝《關於秦律、漢律中的“三環”問題》（《史叢》）一文認為，秦漢律中的“三環”應視為《周禮》中的“三宥”，屬於審訊判決程序中的規定。朱紅林、陳恩林《試說張家山漢簡〈具律〉中的“證不言請”律》（《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2期）一文，指出了“證不言請（情）”律是漢代《具律》中一條應用非常廣泛的律文，並廓清了“滿三日而證不言請”、“反坐”與“證不言請”的應用問題。

四、漢初的行政法研究

關於漢初的政治制度。沈剛《〈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所見漢初國家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學術月刊》2004年第10期）一文，從政權對基層社會的管理範圍、調控手段、對基層官吏的保護和整飭等幾個方面論述了漢初國家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卜憲群《秦漢之際國家結構的演變——兼談張家山漢簡中漢與諸侯王國的關係》（《文叢》）一文，論述了秦漢國家結構的演變，並指出張家山漢簡所反映的漢與諸侯王國之間不會是超越中央與地方關係之上的國與國的關係。陳蘇鎮《漢初王國制度考述》（《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一文認為，漢朝法律祇在漢朝直轄地區普遍適用，各王國另有一套自己的法律，用來管理本國的其它事務和制裁本國吏民的其它犯罪行為。李均明《張家山漢簡所見制約行政權的法律》（《史叢》）一文認為，在漢代，官吏的地位、構成、編制、權力劃分都是法定的，並且官吏的行政權還受到法律手段的監督和制約。臧知非《張家山漢簡所見漢初馬政及相關問題》（《史林》2004年第6期）一文，指出養馬業在西漢受到重視，政府在詳細規定養馬程式的同時，突出了國家對馬匹的控制。連劭名《〈二年律令〉與漢初傳驛制度》（《四川文物》2004年第4期）一文，詳細考證了漢初傳驛制度的具體情況，認為傳驛制度在漢初時已發展具備了一定的規模。朱紅林《張家山漢簡中所見的勞績制度考析》（《考古與文物》2004年增刊[漢唐考古]）一文，考析了張家山漢簡中所載的勞績制度。李均明《張家山漢簡〈行書律〉考》（《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一文，勾勒了漢代行書制度的大致輪廓。另外，張俊

民《〈二年律令·行書律〉淺析》（《史叢》）、曹旅甯《從張家山漢律說漢初列侯的政治經濟權益》（《長沙理工大學學報》2005 年第 3 期）、龔留柱《論張家山漢簡〈津關令〉之“禁馬出關”——兼與陳偉先生商榷》（《史學月刊》2004 年第 11 期）、鄔文玲《漢初“禁物”略考》（《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等文也從不同角度對相關問題進行了論述。

關於漢初的官制與爵制。王璦琿《從〈二年律令〉看漢初的以法治吏》（《邊疆經濟與文化》2004 年第 5 期）一文，認為漢初統治者在治吏時十分重視懲處官吏的瀆職、失職、不稱職等行爲，治吏已上升到了法律層面。張忠煒《〈漢官休假雜考〉補遺》（《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一文，論述了漢代官吏的休假制度，認為休假制度內容大體有四類，一是年度休假規定，二是有關喪假的規定，三是伏日等休假，四是諸如休假時所享受的傳食待遇、宿舍等零散規定。王惠英《從〈二年律令〉看漢初丞相與御史大夫的關係》（《徐州師範大學學報》2004 年第 3 期）一文認為，相權在漢初並不完全獨立，御史大夫比丞相承擔了更多的日常政務，並對丞相進行監督與牽制。張鶴泉《〈二年律令〉所見二十等爵對西漢初年國家統治秩序的影響》（《吉林師範大學學報》2005 年第 3 期）一文認為，西漢初年二十等爵與授田制、治安制度、養老制度及賞賜制度等有密切關係，對穩定西漢初年國家統治秩序起到了積極作用。于振波《張家山漢簡中的“卿”》（《文物》2004 年第 8 期）一文認為，“卿”應是二十等爵之內的某些爵名的代稱，而不是二十等爵之外的一個爵名。譚衛元《從張家山漢簡〈具律〉看漢初“爵論”制度》（《江漢考古》2004 年第 1 期）一文，從《具律》有關內容出發，討論了漢初“爵論”制度在法律規定及司法實踐中的表現，並通過與秦律作比較來探討其變化與根源。相關論文還有，鄒水傑《秦漢“長吏”考》（《中國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姜建設《從〈二年律令〉看漢律對瀆職罪的處罰》（《史學月刊》2004 年第 1 期）、劉向明《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見漢初對官吏犯罪的懲處》（《嘉應學院學報》2004 年第 4 期）、劉向明《從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看漢初吏治的特點》（《安慶師範學院學報》2005 年第 3 期）、張伯元《“爵戍”考》（《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4 年第 1 期）、劉敏《張家山漢簡“小爵”臆釋》（《中國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等。

五、漢初的經濟法研究

關於漢初的土地、賦役制度。于振波《張家山漢簡中的名田制及其在漢代的實施情況》（《中國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一文，重點探討了名田制在漢代的實施情況。他的《從張家山漢簡看漢名田制與唐均田制之異同》（《湖南城市學院學報》2005 年第 1 期）一文，認為儘管漢名田制與唐均田制在具體規定上有諸多不同，但總體來說，兩者之間存在著明顯

的繼承關係。他的《從簡牘看漢代的戶賦與芻稟稅》（《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2期）一文認為，漢代的戶賦是諸多賦稅中的一個單獨稅目，按戶徵收，與芻稟稅一樣均以徵收飼草為主，主要供應本縣之需，性質上與口錢、算賦、田租等截然不同。王彥輝《論張家山漢簡中的軍功名田宅制度》（《東北師大學報》2004年第4期）一文，對軍功名田宅制度的特點及其實行之初存在的地域差別進行了分析。朱紹侯《論漢代的名田（受田）制及其破壞》（《河南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一文，討論了名田制的建立及其破壞，認為名田制是一種有受無還的土地長期佔有制，並理清了軍功地主、豪強地主掌權的不同時期和不同特徵。朱紅林《從張家山漢律看漢初國家授田制度的幾個特點》（《江漢考古》2004年第3期）一文，從畝制的大小、按爵位等級授田宅、田宅的有條件買賣、芻稟稅的徵收等幾個方面對漢初國家授田制度的特點進行了探討。臧知非《秦漢“傅籍”制度與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為中心》（《人文雜誌》2005年第1期）一文，對“傅籍”制度的內容及功能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指明了它與社會結構變遷之間的關係。他的《從張家山漢簡看“月為更卒”的理解問題》（《蘇州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一文，將“月為更卒”理解為每月服役一次，每月服役天數相等。張榮強《〈二年律令〉與漢代課役身份》（《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2期）一文，重點探討了“傅”、“皖老”、“免老”等課役名目及漢代婦女的服役問題，重新梳理了漢代課役制度及丁中制的發展演變軌跡。

關於漢初的貨幣與平價制度。葉玉英《論張家山漢簡〈算數書〉的經濟史料價值》（《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認為，《算數書》反映了秦代及西漢初年的社會經濟現象，並從物價、關稅、合資、高利貸、田租與畝產等幾個方面考察了張家山漢簡《算數書》的經濟學史料價值。安忠義《從“平價”一詞的詞義看秦漢時期的平價制度——對〈張家山漢簡看西漢初期的平價制度〉的幾點辯正》（《敦煌學輯刊》2005年第2期）一文，對秦漢以來的物價制度作了考辯。陳戰峰《從〈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看兩種貨幣與漢初社會》（《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一文，具體探討了漢初的貨幣情形及其折射出來的社會情況，通過對漢初黃金與銅錢兩種貨幣的使用和功能的分析，折射出當時經濟蕭條、通貨緊張、偽錢盛行、物貴錢輕、重金賤錢、斂金風起的社會現象。此外還有王剛《“行錢”辯》（《西安金融》2005年第4期）等。

六、漢初的民法研究

關於漢初的等級身份。臧知非《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見秦漢主奴關係試析》（《文叢》）一文，對秦漢的主奴關係作了基本解析。楊頡慧《張家山漢簡中“隸臣妾”身份探討》（《中

原文物》2004 年第 1 期）一文認為，“隸臣妾”是一種刑徒，其刑期有限，具有官奴隸身份，但又不同於奴隸社會中的奴隸。張小鋒《釋張家山漢簡中的“御婢”》（《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一文認為，“御婢”是比普通奴婢身份略高、比妾身份略低的一種奴婢。王愛清、王光偉《試論張家山漢簡中的“私屬”》（《烏魯木齊職業大學學報》2004 年第 2 期）一文認為，張家山漢簡中的“私屬”，既非一般意義上的依附性家眾，也不是作為私家財產的奴隸，更不是庶人，“私屬”是一個法定的特殊身份階層。此外還有，李天石《從張家山漢簡與唐律的比較看漢唐奴婢的異同》（《敦煌學輯刊》2005 年第 2 期）、徐世虹《“主親所知”識小》（《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蔣非非《〈史記〉中“隱宮刑徒”應為“隱官、徒刑”及“隱官”原義辨》（《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等。

關於漢初的家庭關係。李國鋒《試論漢初對家庭關係的法律調整》（《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4 年第 4 期）一文，探討了漢初家庭關係的法律調整，對維護家庭穩定，保證國家加強戶籍管理，保證財政稅收和徭役徵發所起到的作用。韓國學者尹在碩《張家山漢簡所見的家庭犯罪及其刑罰》（《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一文，主要分析了有關家庭內部發生的親屬之間犯罪及其處罰的法律規定。劉敏《論漢代“敬老”道德的法律化》（《天津社會科學》2005 年第 3 期）一文，從三老制、王杖制、賜衣食制、免役制、寬刑制等五個方面，具體探討了漢代的敬老問題。賈麗英《〈漢代有關女性犯罪問題論考〉——讀張家山漢簡札記》（《河北法學》2005 年第 11 期）、魏燕利《漢代“王杖制”新探》（《許昌學院學報》2005 年第 1 期）、張松《睡虎地秦簡與張家山漢簡反映的秦漢親親相隱制度》（《南都學壇》2005 年第 6 期）等也就相關問題發表了意見。

七、漢初的軍事、地理研究

連劭名《張家山漢簡〈蓋廬〉考述》（《中國歷史文物》2005 年第 2 期）一文，從《蓋廬》與黃帝家言、陰陽五行、實戰理論、古代刑法四個方面對其文字內容進行了考述。王昕《張家山漢簡軍制釋名三則》（《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一文，對《二年律令·秩律》445 簡中所涉及的“發弩”、“輕車”、“司空”等軍職進行了討論，認為：“發弩”應為戰將，是漢時分設在中央和郡內統率弩兵的官長；“輕車”是統領戰車部隊的官長；“司空”指部隊官職，執掌軍事工程。閻曉君《〈奏讞書〉所反映的漢初政區地理與司法管轄——張家山漢簡研究之三》（《煙臺師範學院學報》2004 年第 3 期）一文，揭示了漢代司法管轄以地區管轄為主的特點，指出行政管轄和司法管轄是相一致的，並考察了漢代政區地理的沿革和演變。晏昌貴《張家山漢簡釋地六則》（《江漢考古》2005 年第 2 期）一文，對《秩律》中的六個有問題的地名進行重新考釋。此外還有，張榮強《張家山漢簡中所見武安史料》（《邯

鄆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

八、《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的文本復原研究

彭浩《談〈二年律令〉中幾種律的分類與編連》(《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一文,對《二年律令》中《復律》《具律》《告律》《錢律》《捕律》《亡律》《盜律》等幾種律的歸類、編連作了補充。張建國《張家山漢簡〈具律〉121簡排序辯正——兼析相關各條律文》(《法學研究》2004年第6期)一文,認為整理小組對121簡的編聯是錯的,正確的編聯應將其與107—109簡構成一條,而整理小組原以121簡作為條文開頭的編在一起的數枚簡,應當以122簡作為條文的開頭;根據律文內部的邏輯結構以及律文之間的邏輯關係,可以認為107—109簡確屬具律而非屬於囚律或告律。此外,相關文章還有劉金華《張家山〈算數書〉“乘”簡試析》(《江漢考古》2004年第3期)、劉金華《竹書整理舉例:試說張家山〈算數書〉“乘”簡》(《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4年第6期)、李力《關於〈二年律令〉簡93—98之歸屬問題的補充意見》(《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許道勝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賊律〉補釋》(《江漢考古》2004年第4期)、朱紅林《張家山漢簡〈賊律〉集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5年第2期)。

九、簡帛語言文字研究

孟蓬生《張家山漢簡字義札記》(《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4年第5期)一文,就《張家山漢墓竹簡》的十個字的字義進行了考釋。湛玉書《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中的司法程序詞語研究》(《河南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一文認為,《奏讞書》中的審判術語不僅在西漢法律中有重要意義,還可以在語言研究方面糾正歷代訓詁和現代字典辭書中的缺漏甚至錯誤。孫尊章《試論張家山漢簡〈蓋廬〉在歷史詞彙學上的價值》(《龍岩師專學報》2004年第4期)一文,以語言學角度研究《蓋廬》,從增補義項和提前始見書兩方面著手,對《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的釋義進行了增補。武曉麗《〈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量詞》(《江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一文,對《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量詞作了全面考察,分析了33個量詞的用法和意義,考證了其中部分量詞的形成年代、新用法及新意義。王學雷《〈二年律令·史律〉的性質及“史書”》(《中國書畫》2004年第2期)一文,重點指出了《史律》對文字學和書法史研究的重要意義。這方面的論文還有,王貴元《張家山漢簡與〈說文解字〉合證》——〈說文解字校箋〉補遺》(《古漢語研究》2004年第2期)、李發《讀張家山漢簡〈引書〉札記》(《四川理工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陳

斯鵬《張家山漢簡〈引書〉補釋》（《江漢考古》2004 年第 1 期）、趙修《從張家山漢簡〈算數書〉數學用語看兩大語文辭書的收詞釋義》（《宜賓學院學報》2004 年第 3 期）、李靜《〈張家山漢簡·蓋廬〉虛詞研究》（《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5 年第 4 期）、孟琳《〈張家山漢簡·算術書〉副詞研究》（同上）、胡憶濤《張家山漢墓〈二年律令·賊律〉構詞法分析》（《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5 年第 3 期）、鄧統湘《張家山漢簡〈脈書〉副詞用法調查》（《宜賓學院學報》2005 年第 7 期）、王昕《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織物名詞試析》（《出土文獻研究》第七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吳玉梅《秦漢簡牘札記》（《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5 年 6 期）等。

十、其它方面研究

曾代偉、王平原《〈蠻夷律〉考略——從一樁疑案說起》（《民族研究》2004 年第 3 期）一文，對《蠻夷律》的內容、適用對象、範圍及其歷史作用進行考析。郭書春《〈算數書〉與〈算經十書〉比較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一文，從體例、術文的抽象性與演算細草、數學表達方式、數學內容四個方面對《算數書》與《算經十書》中可與之對比的《九章算術》、《孫子算經》、《張丘建算經》、《五曹算經》等算經進行了比較研究。

綜上所述，2004、2005 年張家山漢簡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首先在進一步研究《二年律令》的基礎上，加大了對《奏讞書》、《算數書》、《蓋廬》等的研究力度；其次對模糊不清的簡帛語言文字作了考釋，為更好地理解簡文內容開了方便之門；再次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的文本復原方面，也做了有價值的研究。所有這些，都為我們今後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幫助。相信在廣大學者的共同努力下，還會迎來張家山漢簡研究的新高潮。

徵稿簡約

一、本刊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的專業性學術刊物，歡迎與下述內容相關的論文投稿：

1.出土簡帛的辨識、考證；2.根據出土簡帛考辨史實，研究中國古代的各種制度、思想文化以及社會發展狀況；3.有代表性的國外簡帛研究譯文；4.簡帛研究綜述；5.簡帛研究著作書評；6.簡帛研究論著索引。

二、本刊提倡嚴謹的學風，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堅持相互尊重的自由討論。本刊發表的文章均不代表本刊的意見，由作者文責自負。

三、來稿請提交一份文本稿，一份電子文稿（電子郵件或磁盤）。

四、本刊採用繁體橫排。

五、本刊實行頁下注。注釋中所引專著，務請注明著者、書名、卷數、出版社名稱、出版時間和頁碼；所引論文請注明篇名、刊物名稱和期數。如果引用書目為外文，請用原文，不必譯成中文。

六、投稿者（書評、索引、譯文除外）請附300字以內的中文摘要和3—5個關鍵詞。

七、本刊實行雙向匿名專家審稿制度。稿件中請勿出現作者個人資訊。有關作者姓名、單位、聯繫方式等，請另紙提供。

八、本刊對刊登的稿件擁有為期兩年的專有版權。作者如有異議和特殊要求，請於投稿時聲明。請勿一稿兩投。

九、本刊處理來稿期限為60個法定工作日。逾期未接到通知，作者有權對自己的稿件另行安排。因本刊經費緊張，來稿一律不退，請作者自留底稿。

十、來稿請寫明作者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工作單位、職稱或職務、通訊地址、郵政編碼、電話號碼和電子郵件，以便聯繫。

來函請寄：

北京建內大街五號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室 戴衛紅收

郵編：100732

電子郵件請寄：jbyj2005@yahoo.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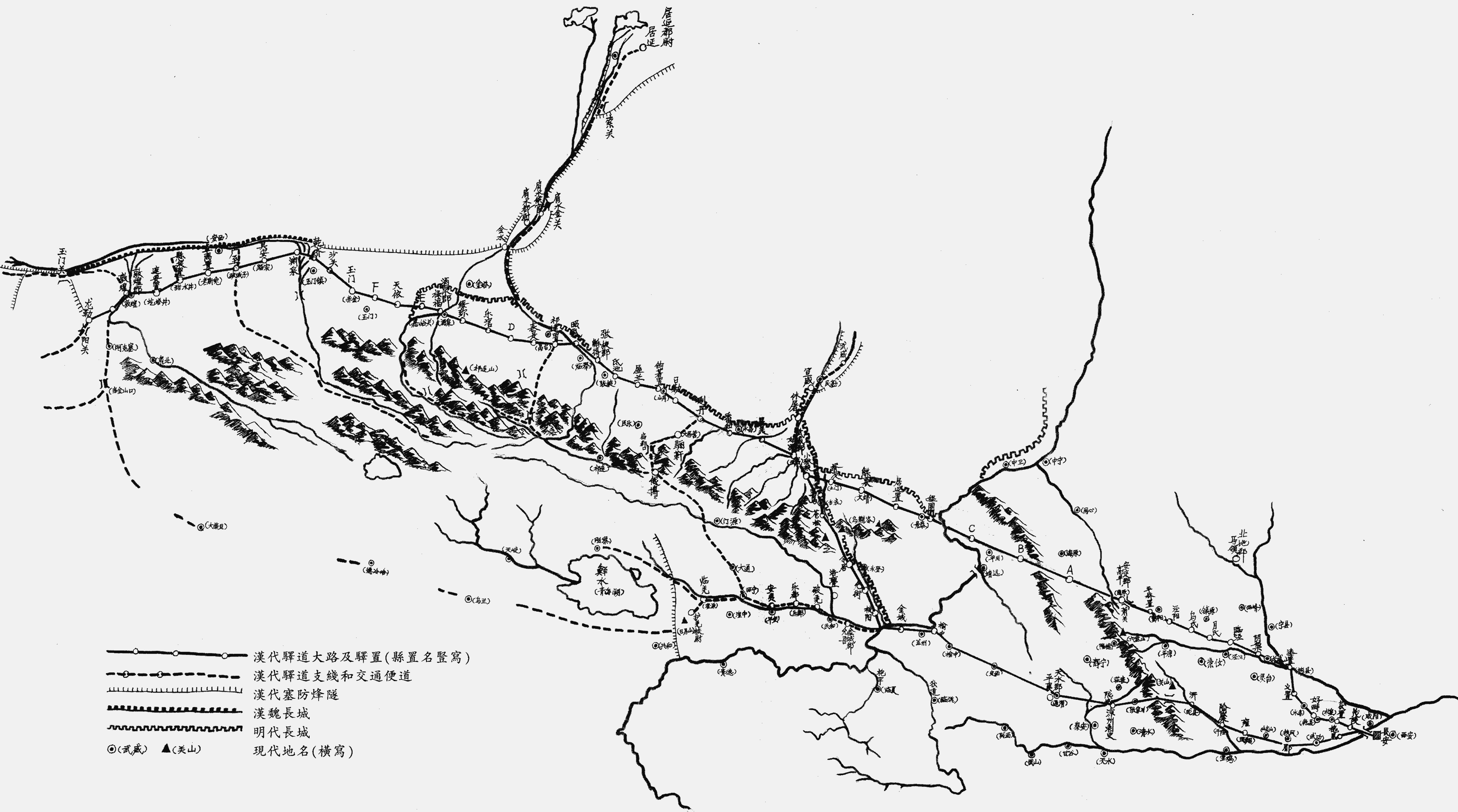


圖 1

